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 · · 六 · 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125 插页9 字数 25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 - 224 - 00165-1 / K · 30

统一书号: 11094·236 定价: (平)4.25元



网站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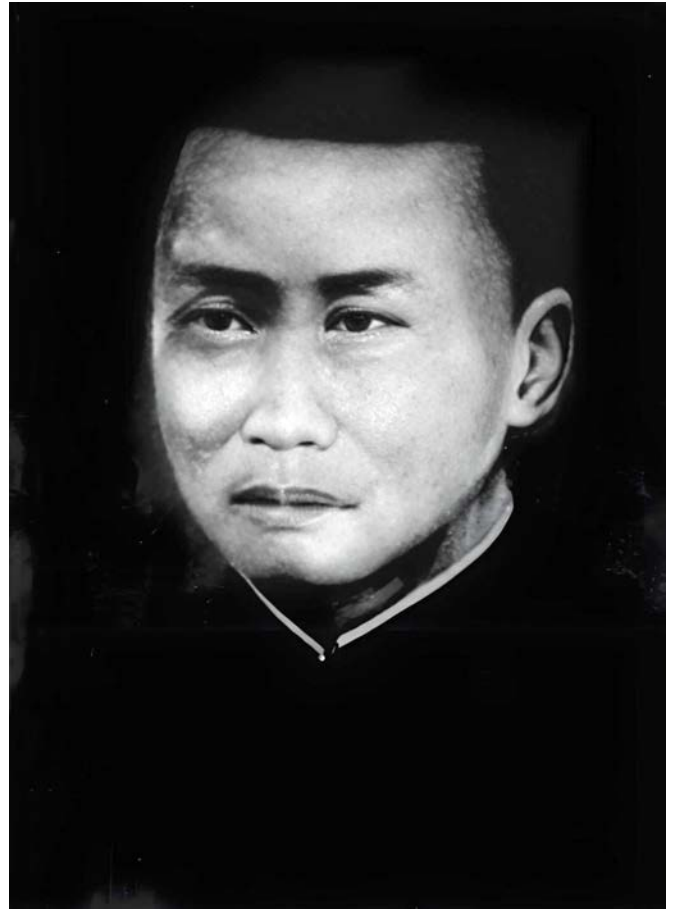
邓 中 夏



陶 静 轩



向 钧



叶 天 底



唐 鉴



张 昆 弟



旷继勋



黄励



蔡 协 民



邓 乾 元



陈为人



李敦仁



何耀榜



陈伯钧



吕 振 羽

邓中夏

谭双泉 何鹤志 谢豪卓
谭献民 夏霖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字仲灏，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邓锡锦亦农亦商，逐步创下小康家业。父亲邓典谟，清末举人，曾任清朝浙江省温州、台州两府学务佐治员，北洋政府诠叙局主事、衡山县知事、湖南省参议会候补议员，南京国民党行政院三等书记官、一等书记官等职，晚年回乡教书，并从事著述。他为官数十载，只是留有为数众多的诗集文稿。他有子女七人，六男一女，邓中夏排行第二。

（一）

一九〇一年，邓中夏发蒙读书，就读于族办私塾——增经门学。一九一一年考入宜章县城阁邑高等小学堂，为该学堂唯一获甲等廪生者。因成绩优异，邓中夏提前于一九一三年春考入郴县第七联合中学。举家欢喜，深望他能学优入仕，光宗耀祖。

在第七联合中学读书期间，邓中夏各科成绩均列甲等前三名，是宜章在该校的特等生，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该校有位由日本留学归国的陈姓体育教师，给邓中夏以深刻的影响。陈

老师在给学生上体育课时，讲了他在留日时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日校举行游泳比赛，规定凡是取得前五名的学生，可以免缴一年的学杂费。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比赛结果是他得了第一名。但他不但没有享受到免缴学杂费的优待，反遭日本学生的一顿痛打，唯一的理由是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不配得第一名。邓中夏听后愤慨不已。他从此一直以这件事鞭策自己，坚持体育锻炼。

一九一五年夏，邓中夏借用哥哥的文凭，改名邓康，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文科乙班，与蔡和森同学。他早诵夜读，刻苦用功，开始对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中的民族思想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中的爱国思想发生兴趣。同时，他也受到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新思想的影响，还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鼓吹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是年冬，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他感慨赋诗，斥责权奸，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一九一七年夏，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师，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入校后，他一心攻读古文，是个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潮激烈斗争的场所。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名流到校任教和工作。蔡元培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学生自由选课，提倡学生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支持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活动。这个办学方针使得北大的学术讨论和自由争辩之风盛行，从而使得长期钻古书堆、受

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的邓中夏深为震动，很快的觉醒过来，志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参加哲学研究会，并组织该会一些同学成立哲学自学小组，不时地探讨中西哲学及时事问题。他给自己取笔名“大壑”，即要象峡谷那样容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开始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曾毫不犹豫地将一位同乡花三块银元买来送他的王先谦所注《庄子》撕得稀烂，并且明确表示：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不能再埋首书堆，要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一九一八年五月，北大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课请愿，邓中夏是此次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事后他又积极参与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并被选为负责人之一。但不久，学生救国会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压。事实教育了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使他们认识到救国光靠学生的请愿是不行的。正好这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学生走向社会；李大钊也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等文章，极力号召青年到民众中去，进行民主主义宣传。一九一八年底，邓中夏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和几位同学一道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现实生活的体验，使邓中夏愈加感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遂逐渐产生“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协助李大钊将学生救国会改组为国民社。翌年一月创刊《国民》杂志，邓中夏任编辑干事，拟定该刊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①二月二十五日，

^① 《国民》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出版。

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邓康君致校长函》，主张为平民广设阅书报室，“以负大学转移风气，指导人民之责”。在一月到四月的《国民》杂志上，邓中夏针对国内外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南北和会、国防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权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向广大民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为把“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①的运动向前推进，三月二十二日，邓中夏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被选为总务干事。四月三日至五日，讲演团在北京东便门蟠桃园连讲三天。邓中夏接连两天登台讲演，题目是《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很受群众欢迎。那两天，北京刮大风，“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②

一九一九年五月初，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收回中国山东权益等七项要求，并且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大学，爱国学生被激怒了。五月三日晚，在北大学生大会上，邓中夏愤慨地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③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月四日凌晨，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这次具有历

① 1919年3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

② 1919年4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

③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辑，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队伍刚走出校门，北洋政府教育部一个次长匆匆赶来劝阻：“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邓中夏大声喊道：“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他指着那位次长说：“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五四的爱国示威游行，遭到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多少学生血染街头，身陷囹圄。邓中夏参与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后，也险遭逮捕。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又召开大会，决定：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学生，并进一步组织起来，继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会上，北大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编《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主任。

五四那天的浴血奋战，邓中夏壮怀激烈，赋诗云：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姐妹们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光明和愉悦的地带。
兄弟姐妹们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①？

强大的号召力，使人振奋，催人向前。邓中夏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五月五日起，他率平民教育演讲团走向街头，连续讲演十多天；他自己讲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等。五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了湖南学联，发动并参加领导了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暑假，邓中夏回到湖南宜章故乡，向乡亲们进行反帝爱国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并且坚决拒绝了父亲为他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找到的一个待遇优厚的差事，明确地表示：“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是要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绝不为自己谋私利，单独发财。”②他的父亲被激怒了，从此再也不出钱供他上学。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邓中夏开始以主要精力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当时，“国内各种期刊报纸，从《新青年》、《建设》、《晨报副刊》、《觉悟》、《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到《东方》、《今日》、《亚细亚》，只要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俄国革命后的情况的文章和资料，他都细心阅读，重要的还摘录在笔记本上，并经常剪报贴报，分别归类。”③他还组织几位懂德文的同学集

①转引自郭长征：《邓中夏与文学》，《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②转引自邓隆烈：《邓中夏片断事实记》，《宜章人民革命斗争史》第9期。

③杨东莼：《回忆邓中夏》，1959年5月9日《光明日报》。

资，汇到德国去购买马克思的原著，想系统地学习马克思的学说。为此，他自己首先拿出相当于三个月伙食费的二十块银元。书买到后，他又组织同学阅读翻译。后来，他听说日本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著作，便马上办了一个日文补习班，自己带头报名参加，努力学习日文。

一九一九年十月，邓中夏组织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倾向马克思学说的进步学生，租下离校不远的东黄城根达教胡同四号大院，建立曦园公寓。“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新村’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为宗旨。”^①他们订购了许多报刊、杂志和新书，依据不同的爱好和学习专业，组成各种学科的研究小组。这些研究小组主要是阅读有关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他社会新思潮的著作，互相讨论，交流心得。

五四运动以后，曾经英勇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北大学生，组织过各种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如开办国货商店的商业救国活动，试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工读互助团。这些活动有如昙花一现，纷纷破产。邓中夏耳闻目睹这一切后，更加有兴趣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毅然谢绝胡适保送他出国留学的厚爱，决心留在国内搞社会改造运动。

一九二〇年三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和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报告会，组织会员搜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称为“亢慕尼斋”（亢慕尼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邓中夏每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66页。

天一早就到北大第二院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是年四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与研究会成员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十二点钟后才就寝。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的强烈要求^①。

邓中夏在研究会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他积极响应李大钊提出的“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②的号召，领导同人对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强调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③。一九二〇年四月二日到八日，邓中夏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第一次乡村讲演。这次讲演分三组出发，他带领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一带，围绕着“国耻纪念日”、“救国方法”等题目，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邓中夏又率平民教育演讲团赶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演讲。他们的讲题有“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历史”、“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并向长辛店的广大铁路工人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群众：从今以后，要“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凡不作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存在

①周子信：《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其成员》，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7期。

②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第23期。

③1920年3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

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的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的劳工朋友呵！快快起来”^①。这表明，邓中夏等一批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优秀青年，已经转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李大钊的具体领导下，以邓中夏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被选为书记。邓中夏作为小组成员之一，一开始就积极协助李大钊的工作，并介绍朱务善等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他到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波涛汹涌的洞庭湖时，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写了《过洞庭》一诗：“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② 这表明邓中夏已经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节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委托邓中夏负具体编辑责任。他在创刊号上撰文阐明刊物的宗旨是：“劳动者要有充足的知识 and 善良的方法，作为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③ 十二月，邓中夏率领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部分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力图通过浅显的道理和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传播马

①转引自《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98页。

②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

③《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页。

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邓中夏主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免费招收学生，学生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夜班为工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王铮、吴容沧当长驻教员。邓中夏对他们说：“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目的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认识字，有了文化，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他还说：我们不能用吴稚晖的《平民识字课本》，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的生活、劳动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等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钳’三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①

邓中夏经常来劳动补习学校讲课。他以通俗的语言，生活的事例，向工人群众讲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常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共产党》等，也都在这个学校里出现了^②。有一次，邓中夏给大家讲“工人最伟大”的道理。有个工人想不通，就问：“做工的人伟大，我怎么不觉得伟大？”邓中夏笑呵呵地说：“大家想想，火车谁开的，机器谁造的，工厂谁盖的，布谁织的，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了。大家说说，工人伟大不伟大！”提问的工人不住的点头。另一个工人还不明白，就问：“做工的伟大，为什么这么穷！”邓中夏愤慨地说：“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厂主把我们剥削穷的。军阀、厂主吃香的、喝辣的，哪一样不是工人的血汗换来的。工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都

^{①②}《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62、265页。

被军阀、厂主吃了、喝了，工人怎么能不受穷呢？！工人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却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这时，有个工人又问：“怎么做，做工的才不受穷呢？”邓中夏高兴地说：“大家抱个团体，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象泰山，谁也搬不动。”^①在邓中夏等的努力下，劳动补习学校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一九二一年初，邓中夏征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意，受聘于保定高师，在国文科教授新文学。他编选的教材中，一小部分是古典名著，绝大部分为五四以后介绍新思潮、提倡新文学的论著，如李大钊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钱玄同的《尝试集序》、郭沫若的《儿童文学研究》和他自己写的《文学与社会改造》等。他要求学生“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更莫忘了社会改造”。他发动学生组织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亲自为新文化研究社的成员拟定必读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史》等七十本，冀图使他们通过阅读上述论著和进行对比研究后，认识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总的改造，达到“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②的道理。这表明邓中夏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邓中夏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的身份^③，主持学会的会务。该会于一九一九年七月由李大钊

①参见《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第28页。

②邓中夏：《三个月的教程》，保定高师油印件。

③《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集第273页。

发起成立，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邓中夏是最早的会员之一。由于该会会员成份复杂，对“创造少年之中国，应否采取某种主义”的问题争论不休。邓中夏主持会务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始为“改造组织、明确主义”而斗争。二月十九日，邓中夏在执行部会议上提出，应当专门“讨论学会采取何种主义的问题”^①。执行部决定在七月份的南京大会上，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并接受邓中夏的建议：“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以备吾人参考。”^②

这年四月中旬，邓中夏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托，赶到长辛店，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创办长辛店工会。他找到劳动补习学校的驻校老师和工人活动积极分子史文彬、陈励茂、王俊等，商量创办工会之事，决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宣布工会成立。

五月一日那天，长辛店工人举行纪念大会，正式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邓中夏和工人们一起游行庆贺，兴奋不已。回到北大后，他奋笔疾书，写了一首九十多行的长诗，歌颂工人阶级的力量。诗的末尾，记述了他与工人活动骨干分子促膝谈心，共商大计的情景：

坐灯光底下，
作扞风之谈。
“人生”、“社会”，
“阶级斗争”、“世界共产”，
都是我们的话料^③。

①②《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1921年3月出版。

③《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第32页。

六月初，邓中夏又火速赶到长辛店。原来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官僚政治集团交通系指使其在长辛店的爪牙——工头邓长荣，出面组织了一个由工头、员司、路警参加的“工会”，想把邓中夏组织的工会搞垮。邓中夏与史文彬等人开会研究对策，决定一方面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上发表文章，揭露邓长荣的横行霸道；另一方面以长辛店全体工人的名义，叫邓长荣滚出长辛店。经过工人们齐心协力的斗争，终于打垮了“员司工会”。这次斗争使邓中夏认识到清理和加强工人组织的重要性。他与史文彬等人又开会讨论，决定将长辛店工会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且规定俱乐部只要工人，不要工头、员司和路警；俱乐部由十一名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邓中夏和高君宇等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二次年会着重讨论以何种主义为学会宗旨的问题。会上，马克思主义者要求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国家主义者要求以国家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邓中夏就这个问题多次发言。他说：“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学会有共同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①。针对有人具有“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因大家意见不同而引起分裂”的顾虑，邓中夏坚定地表示：“苟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②他还明确说道：“我所谓主义，是指共同所要择定的政治经济上

^{①②}《南京大会纪略》，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出版。

的主义而言”，坚决主张确立社会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

同年十月二十日，学会执行部召开工作常会，“议决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由邓中夏负责组织工作。”^①十二月初，邓中夏筹备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强调会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为目的。研究会确定研究的题目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克’、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之现况、社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②这表明邓中夏已经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和基本核心，开始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造中国社会相结合的问题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创刊，邓中夏参与负责编辑。他以“重远”的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宣传共产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给当时不少划不清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视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青年以极大的启迪。

（二）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集第277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集第391页。

他总结北方工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的名义，向大会提出《工会组织原则案》。提案首先指出：“工人阶级斗争力之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然后，提案建议：一，凡是“有新式产业的企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因为它能“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斗争力就异常雄厚”。二，凡是“手工行业应当以职业组合为原则”。三，全国总工会应当建立在地方总工会的基础上。提案写道：“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①这个提案得到大会通过。从此，产业组合和地方组合相结合的组织原则就成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在这次大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七月十六日，邓中夏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著名的党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订。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二二年夏的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重开国会，制订宪法”。邓中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他提出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是：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开办劳动补习教育。根据这些原则，邓中夏主持制订了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以“保护劳工”为标榜的北京政府承

^①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 1957 年版。

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大纲还对劳动者的工时、工资、假日、教育等权利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个大纲既重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

大纲发布后，邓中夏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举行招待会，招待国会各位在京议员。邓中夏在会上宣传了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他提醒诸位议员：“我们中国在此国际资本主义掠夺与压迫之下，想照欧美资本家那样发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资产阶级觉悟起来，与劳动阶级携手，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他又告诫工人群众：“国际的资本主义不打倒，军阀也难打倒，而我们劳动立法上的幸福也实难享受。”^①邓中夏实际上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必须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劳资统一战线的观点，丰富了中共二大所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到上海。由于党的事业的需要，邓中夏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前往上海，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活动。抵沪后，党组织要他去上海大学工作。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对校方贪污经费、管理不善和课程复古强烈不满，最后将校长、副校长王理堂、陈织云等人赶走，恭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于欣然应允，并请他的留日同学李大钊给予帮助。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决定同国民党合办上海

^① 《邓中夏文集》第18页。

大学。李大钊便推荐邓中夏任该校总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着手实现党的培养人材的计划。

四月，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职，改名邓安石，决心学王安石锐意革新、进取不息的精神。他抓了三件大事：确定教育方针和教学目的、要求；改革学校建制，草拟上海大学章程；聘请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及进步教育家、文学家来校任教。

邓中夏在《上大之使命》一文中明确提出：上大的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材，促进文化事业。”他特别赞同瞿秋白提的上大“应该具有划时代性和革命性，以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责任^①”的主张。他强调学生要“读活的书，让学生走上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把学到的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②他在上大设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院设社会科学系，文艺院设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德文系、绘画系、音乐系等；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李达、沈雁冰、肖楚女、李立三、杨贤江、陈望道、郑振铎、丰子恺等来校任教。他们大多数是尽义务，不拿薪水。

上海大学的进步学生走着一条崭新的道路，课内课外，生气勃勃。“课堂里是殚精竭虑的讨论，街头巷尾是如火如荼的讲演，舞台上是民族的血泪魂灵的活动，刊物与传单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器中吐出来。”他们“一心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③

邓中夏还改变上大以往收取高额学费的做法，对思想进

① 《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85页。

②③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期第53、54页。

步、追求革命的有志青年，实行免费入学。中华书局印刷厂学徒刘华，就是这样进入上大中学部半工半读的。

邓中夏在上大的革命活动，遭到以上大中学部主任陈德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在校内到处宣传反共思想，破坏国共合作。邓中夏和瞿秋白等联合学校中的国民党左派将陈赶走；不久，国民党右派、学校教务长叶楚伦，英文系主任何世楨也自动离校，上海大学完全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大学”。帝国主义者曾经惊呼：“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一百三十二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校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党的政治信仰。”^①在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下，上海大学的学生如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王稼祥、张琴秋、杨之华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少优秀战士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邓中夏在上海大学工作了两年，给上海大学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之华回忆说：“邓中夏同志是我们的总务长。他的头发很黑，眉毛浓而长，眉心很宽。当他抬起头来看人的时候，两眼闪闪有光。他常常喜欢讲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是我们敬爱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②

^①《上海大学瞿秋白等活动》，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1924 年 12 月《警务日报》。

^②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 8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

一九二三年六月，邓中夏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上海地方区委会委员长。

同年八月十二日，邓中夏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于十月份在上海创刊，邓中夏为主要编辑。他亲书刊名“中国青年”四字，并在繁忙的工作中抓紧时间写文章，批评当时部分青年学生和文学青年中的一种错误倾向。五四运动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大量传入，使一部分青年醉心于当“艺术至上”、“爱情至上”的所谓“新诗人”，对当时火热的革命斗争漠不关心，不闻不问。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七期和第十期上连续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两篇文章。他首先指出：“我们不反对新诗，我们不反对人们做新诗人，我们是反对人们这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这种新诗和新诗人“不明白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他们的作品要么是“厮混男女交际场中，肉麻的讴歌恋爱的新浪漫主义”；要么是“混沌的欣赏自然的所谓‘为艺术求艺术’”。这种风气“若长此下去，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这不是此辈新诗人之罪吗？”他要求广大青年诗人：“第一，须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说：新诗唯其如此，才能“抬高民族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

《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公开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某些“左”的“太幼稚太急躁”的思想，以为中国革命立刻就能取得胜利。二者都不能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的道路。为此，邓中夏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银行公会反对收回粤海关主权之索隐》、《论士兵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方法等基本问题。

怎样看待二七罢工失败后的政治形势？邓中夏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国工人运动“这么一枝刚刚含苞发蕊的劳动之花，却经前年冬间和去年春间几阵狂风骤雨，摧残得零落殆尽了。虽说它的根蒂现在还是孕育滋长着，不免有含苞发蕊以至于尽情开放的一日；但是无论如何，终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了。”^①因此，他一方面批评右倾情绪，说他们因京汉路工人罢工的失败，就看不到中国革命的花朵终将有“尽情开放的一日”，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发生“动摇”，“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他指出，如果“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那么，“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②。

①② 《邓中夏文集》第66、44页。

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提醒“要免除幼稚和急躁这两个弊病”。因为患有这些弊病的人，完全不懂得中国革命“终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因而只是“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不愿意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容易“引导劳动者走向纯经济的斗争道路”^①。

究竟应当依靠哪些社会力量来复兴中国革命呢？邓中夏从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中看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②中国过去的民主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作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③为什么这“三个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呢？“自然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谚所谓‘狗急跳墙，人急反噬’，他们不能不断然的趋向而且硬干起来”^④。

在工农兵三种力量中，邓中夏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尽管二七大罢工失败了，革命由进攻转入退守，革命的政策可以有所变更，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否则就象“建屋于沙土之上”，永远“不能成功”^⑤。他用大量的事实阐明，只有工人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⑥。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同欧美产业先进国的工人比较起来还有许多短处，但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领袖地位的。这是因为：一，工人阶级是同“新式

^{①②③④⑤⑥}《邓中夏文集》第67、40、40—41、43—44、102页。

工业”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发展缓慢，但是外国资产阶级却在这里大力投资，“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①；二，中国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的压迫”，是“最勇敢而坚决”的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剥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因此，“以心理断定它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②；三，工人阶级同机械化的大生产相联系，这种劳动条件便于他们组织起来，使之富于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二七罢工失败以后，各地的工人组织虽然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但“大部分还仍旧存在”^③；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数目虽小，而他在社会里所占据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一举手，一投足，皆可使社会蒙受极大的影响。”比如说，“香港海员一罢工，可以使欧亚的交通断绝；开滦煤矿一罢工，可以使秦皇岛的轮船开不出渤海口；京汉铁路一罢工，可以使整个中国南北阻隔。”这样就不能不使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军阀势力“胆震心惊”^④。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上述一系列特殊的优点，当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共计罢工不下二三百次，却无一役不具足表现他们阶级斗争的精神，以致前仆后继，“百折不回，没有屈服，没有妥协”^⑤，这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欧洲劳动运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有近代意义的革命的劳动运动，还不过近十年来的事。并且除掉俄国以外，其余各国恐怕还没有及上中国的。”^⑥

①②③④⑤⑥《邓中夏文集》第43、101、94、67、144、143页。

当时，邓中夏已经看到，要获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首先是领导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他说：“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①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中国农民运动只是在南方少数省份的个别地方开始崭露头角，还没有引起党的重视。邓中夏列举一九二一年浙江肖山的农民，一九二二年江西萍乡的农民，一九二三年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和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出，痛快淋漓地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泻出来”^②的事实，明确指出：“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用什么方法能够争得此领导，就是哪个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对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应该结成坚固不拔的联合战线。”^③

邓中夏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商业资本（买办资本）、银行资本（官僚资本）和工业资本。买办官僚资本是附属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之动机”。这种革命动机“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而“不能坚持到底”，最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④。他以上海资产阶级曾经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之资格，要求修改税则，废止厘金，

①②③④ 《邓中夏文集》第132、50—51、371、101页。

废督裁兵、制宪、组织民治委员会等作例子，指出他们缺乏“革命到底”的“大胆和魄力”，“终至妥协”^①。因此，他得出结论：“殖民地的资本家因其与外国资本有关联故不能使他取决然的革命手段，这是客观的经济条件使他不得不然”^②；而“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③

邓中夏从广东、湖南等地兴起的农民斗争迅速遭到反动势力的武装镇压这一血的实事中看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应该有自己的武装。他说：“组织民团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人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招募的民团，……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如此层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如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④

总之，邓中夏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必须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如果“把普遍的国民运动置之不理，而一味专靠军事活动，那就革命的方法未免太简单太幼稚了。至于兵士运动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⑤因此，我们必须“自造党军”、建立“工人纠察队”和“组织民团”，切实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应当说，邓中夏是中共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

邓中夏上述的思想观点，是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提出的，它为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迎接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

①②③④⑤ 《邓中夏文集》第101、107、102、57—58、64页。

准备。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讨论工人运动新的任务”。会议批判了二七大罢工以后党内出现的取消工人运动的倾向，决定加强党对工运的领导。会后，邓中夏仍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邓中夏召集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分析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很少获胜的原因。他经过分析考虑后指出：上海是由极富有反革命经验的帝国主义统治着，而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太弱，党员数量很少，大部分又是搞学生运动的，搞工人运动的寥寥无几，因而难以对付凶残狡猾的帝国主义者。他要求上海党组织采取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工人党员和牢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几项重要措施，以实现党对工人运动的有力领导。他自己更是率先身体力行。

首先，他将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所办的小沙渡两个工人补习班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了沪西工友俱乐部。这年秋季，他经常来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们讲课，讲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些老工人至今还记得他讲“剥削”这一课的动人情景。

邓中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剥削”两个大字，然后教工人读了两遍，就问大家：“做一天工，有多少工钱？”工人们有的回答一角多，有的说两角。有个工人不解地问：“邓老师，工人做工，老板给工钱，从来就是这样，工钱和剥削有什么关系？”邓中夏严肃地说：“工钱和剥削，有密切的关系。工钱，不是老板‘给’工人的，是工人出卖劳动力得来的，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工人劳动创造

出来的大部分财富哪里去了？”他扳起手指头，给工人算起“剥削”帐来：“比方说，一个工人一天干活十二个小时，纺出十斤纱。按照市面价格，十斤纱可以卖十块钱。除掉纺十斤纱花费的成本、机器折旧等六块钱外，剩下的四块钱，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工人只能拿到两角钱，剩下的三块八，全被老板装进腰包，这就叫剥削。”工人们听了恍然大悟。他们说：怪不得工人天天做工，累死累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老板却越来越富，工厂越办越多。被人剥削，这就是我们工人穷困的根源。

当时，沪西工友俱乐部有些做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见工人运动难搞，就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邓中夏认为这种情绪可能在全国许多地区存在。因而，他除了找个别同志谈话，做较详细的思想鼓励外，又在《中国青年》第十三期上发表《胜利》一诗：

哪有斩不除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豺虎？
哪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诗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他又写了六千多字的《列宁年

谱》，发表在《中国青年》第十五期上，详尽生动地记叙了列宁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领导俄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感人事迹。

沪西工友俱乐部既教工人读书、识字，又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进步工人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经过邓中夏辛勤地工作，短短三个月时间内，沪西工友俱乐部已经在华商、日商等十九个纱厂中建立了秘密组织，部员发展到近千人。党的基层组织在产业工人中扎下了根。

一九二五年一月，邓中夏出席中共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大闭幕后，邓中夏为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日夜奔波。

同年二月，由于上海内外棉八厂的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该厂粗纱车间五十个男工，工人怒不可遏，立即罢工。他们又派代表去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党组织发动其他各厂工人予以支持。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决定抓紧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

邓中夏、李立三受党组织的委托，立即召开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会议，分析当时形势，研究罢工策略和措施。邓、李在会上先后发言指出：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开展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日本纱厂利用纱价低落，花价奇涨，纱业发生恐慌的时机，加紧打击、并吞中国纱厂，造成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罢工，能够得到各阶层人士，包括资本家的支持，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是有可能获胜的。但是，从敌我力量的组织程度对比来看，还是敌强我弱。日本人在国内、国外开设的纱厂，都属于纱厂同业总会管辖。内外棉八厂罢工的消息传到日

本后，日本纱厂同业总会立即致电上海日本纱厂“严厉对付，誓为后盾”。最后，罢工委员会决定：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出面领导这次罢工，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大罢工规模；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等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口号，号召各阶层人士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资本家；内外棉八厂应当迅速建立工会和工人纠察队。

沪西工友俱乐部代表内外棉八厂工人，提出了反对无故辞退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六项要求，要厂方作出回答，结果遭到日本厂方的横蛮拒绝。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二月九日，全厂工人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的内外棉五厂、七厂、十二厂也于同一天宣布罢工。第二天，九厂工人宣布罢工。第三天，十三厂、十四厂工人罢工。

罢工后不久，日本厂方宣布：罢工期间，凡是到工厂报到的工人，不论开工与否，每天发给三成工钱。有些工人因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厂里报到。邓中夏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罢工委员会进行讨论，决定采取两个解决办法：一，向进厂报到的工人进行教育，派人家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表示关怀和慰问；二，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各社会团体募捐，援助罢工，切实解决罢工工人经济上的困难。自此以后，再无工人去报到了。邓中夏总结这个经验，向罢工委员会的同志嘱咐道：对于罢工的工人，一方面要注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方面要不断激发士气，稳定军心。应当每天召开一次大会，向群众宣布有关罢工的消息，散发俚歌式的传单，解释道理，揭破谣言，传播消息，鼓舞斗志，

邓中夏还亲临斗争前线指挥。有一天，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大会时，上海警察厅派了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将群

众包围起来，妄图驱散集会的工人。在同警察的搏斗中，邓中夏英勇地站在一个坟顶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他被捕后，不顾个人安危，鼓励其他被捕工人说：“他们能捉住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后经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营救，他得到释放。

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罢工委员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了共有二十二家日本纱厂的三万五千人参加这次大罢工。工人群众的斗争不仅得到上海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日本厂方害怕这次罢工发展成为民族斗争，在中国掀起排日运动，不得不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不虐待工人等四条协议，罢工胜利结束。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工人阶级的联合，动员全国工人群众参加国民革命。邓中夏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所以被指定去主持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四月初，邓中夏到达广州。他从多方了解情况，起草各种文件，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提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目的是：总结近年工人运动的“一切丰富的经验”，以便“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确定的观点与指导”。他认为当时工人运动的重要问题有六个，即组织问题；经济斗争问题；争取自由运动的问题；参加国民革命的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和国际联合问题。他明确指出：工会组织应有阶级性和系统性；经济斗争应当服从于政治斗争；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是

要争得政权以便进行社会革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都必须依靠工农联盟；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观点。邓中夏提出的上述六个问题，都被大会筹备组接受，作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

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共通过三十多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中夏提出的六个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次大会弥补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不足。

邓中夏出席了这次大会，任大会秘书长，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又被执委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工作。

(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这标志着大革命高潮和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待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刘杨叛乱后，

^① 《向导》周报第117期，1925年6月6日出版。

发动省港大罢工，并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去香港作罢工的筹备工作。六月上旬，邓中夏、苏兆征与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书记的杨殷抵达香港，住九龙油麻地柏街三十一号四楼张克青家，策划罢工的各项工。

当时香港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当弱，全港共产党员不到十人，团员十一人；工人阶级的力量虽较雄厚，全港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各工会领导人的思想政治情况极为复杂。邓中夏和苏兆征等，在认真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个别走访、谈心等方式，对各工会领导人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既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解除不同的思想顾虑；又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终于争取了绝大多数人赞成罢工。原来少数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逐渐有所转变。接着，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正式召集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省港大罢工问题，决定在六月十九日举行罢工，并通过了罢工宣言。

十九日清晨，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电车、华洋排字、洋务、海员等工会首先发难；紧接着，起落货、煤炭等工会也陆续宣布罢工。香港华人机器工会的工人勇猛地冲决会长韩文惠的束缚，自动宣布罢工。两天以后，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也宣布罢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省港大罢工终于爆发了。

省港大罢工提出的条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第二部分是对香港当局的六项要求，即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

六月二十四日，由邓中夏主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名义出版的《工人之路》周刊开始发行。邓中夏为《工人之

路》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审定重要稿件，并且根据罢工时期各个阶段中不同的任务、方针和策略，亲自撰写各种评论文章共七十五篇。《工人之路》周刊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创刊，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被迫停刊，共出版五百五十三期。该刊文字通俗简洁，观点鲜明准确，议论生动形象，成为省港罢工工人团结战斗的旗帜。

根据广东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着手组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五十人选一人的原则确定大会代表，否决了黄金源所提由各工会选派代表的提案，共选出八百多名工人代表。六月二十六日，邓中夏、苏兆征主持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邓中夏主持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并且决定会后由邓中夏负责草拟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规划和指导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七月三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会址设于广州东园，由十三个委员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聘为顾问，并任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书记。中共党团成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干事局，下设文书、宣传、游艺、交际、庶务、招待、交通等办事机构，并设财政委员会、纠察委员会、审计局、会审处、拘留所、劳动学院、工人医院，又将《工人之路》周刊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

邓中夏亲手组建的工人纠察队于七月五日正式成立。它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武装，有两千多名队员、两百多条枪，其任务是：封锁香港、截留粮食、扣缉仇货、逮捕走狗。时任中

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支工人武装，委派军校学生徐成章、唐澍等人任军事教官，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邓中夏兼任工人纠察队的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广东沿海一带的农产品一向销往香港，农民再从香港换回日用品。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后便和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因而出现部分农民偷运粮食出口的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罢工工人和沿海农民的团结，于罢工斗争十分不利。邓中夏立即撰写《怎样实行工农联合》一文，发表于《工人之路》第三十四期上。他以农民兄弟所受的压迫与剥削的事实告诫罢工工人，“农民是我们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我们须得亲密地联合起来”，才得“以打倒一切压迫我们的特殊阶级”。因此，他提出对于部分农友的做法，可以通过宣传教育，使之明白“工农联合是工农谋求解放的基础”^①。根据邓中夏的建议，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东农民协会决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为期半月的训练班，培训农村宣传员。经过培训的宣传员携带《工人之路》、《罢工画刊》等宣传品，向沿海农民和纠察队员广泛宣传“工农联合”的道理，使沿海农民自觉参加封锁香港的行动。此后，汕头、汕尾、北海等十九个港口联成了一条铜墙铁壁似的封锁线。

由于广东历来是一个依靠从海外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地区，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给广东人民的生 活带来不便，也使广州商人无生意可做。资产阶级对罢工日益不满，英帝国主义也利用这种情况，竭力拉拢各国共同反对中国人民。

^① 《邓中夏文集》第155页。

这种状况极有害于罢工斗争。邓中夏从广东海关近年贸易统计材料上看出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广东市场的矛盾，向省港罢工委员会提出应该区别对待英、法、日、美等国，建议实行“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对英国以外的各国商船，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商品，不经过香港，可颁发“特许证”准许他们在广州贸易。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特许证”制度正式实行，取得很好的效果。各国商船均按规定来广州领取证件，恢复贸易，平均每天有几十艘外轮。这样做，促进了广东的经济繁荣，保持了商人的中立，稳定了广东政局，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盟。

“特许证”制度实施后不久，广州商会便向邓中夏等人反映说，商人对此仍有意见，因为“特许证”是由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商务厅、公安局共同签发的，没有商会参加，收费较多，手续亦较麻烦。邓中夏认为这种状况仍然可能使罢工斗争失去商界的的支持，给帝国主义进行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于是，他又建议罢工委员会取消“特许证”，改由罢工委员会发“出入口证”，不必再经外交部、商务厅、公安局等签字，手续费也一律免除。“出入口证”的实行，进一步改善了罢工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邓中夏从这件事上联想到，应当建立一个组织，加强工农商学兵的联合，以共同对付敌人。他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国民政府建议，在广州建立工农商学联合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广州工农商学联合会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邓中夏被聘为该会顾问。此后，他经常到工农商学联合会和商民大会作政治报告，阐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商人要得到解放，唯一出路要打倒帝国

主义。工人要得到解放，唯一出路也要打倒帝国主义。目的相同，所以工人商人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成功”^①的道理，驳斥英帝国主义要以十万大兵进攻广州的威胁与恐吓。正确的工商联合政策和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广东商人由对罢工采取中立转变到积极支持。如一九二六年春，当香港政府拒绝接受复工条件时，广东四商会便召开大会，坚决表示：“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②

广东国民政府自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成立后，其内部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斗争相当激烈。邓中夏积极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参加这场斗争。他于这年七月、九月、十月连续著文，表明省港罢工工人坚决支持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驳斥省港罢工委员会内部出现的工人阶级不应拥护支持国民政府的“左”倾观点。他指出：“我们工人阶级明知现在的国民政府，并非工农自己的政府，但仍要给以坚决支持。”我们支持的原因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需要一个真正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谋中国民族解放之国民政府。”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国民政府的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都离不开省港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应当侧重两点：“第一，应立即实行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应诚恳为工农阶级谋利益。”唯其如此，“我们绝对多数之国民——工农阶级自然愿出死力为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国民政府的后盾。”^③九月二十四日下午，邓中夏参加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解决罢工问题

①②③ 《邓中夏文集》第 239、652、150 页。

的专门会议。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解决罢工问题很简单，“就是要香港政府承认罢工工人的条件”；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以省港罢工工人和全国人民为后盾，“压迫香港政府承认罢工工人条件”^①。会议决定邓中夏参加起草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谈判的协议。协议草就送交香港政府后，香港政府不仅拒绝接受，而且阴谋策划利用东江反动军队陈炯明进攻广州。十月五日，邓中夏写了《香港最后之一政策》的时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陈炯明虽有香港政府的帮助，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号召省港罢工工人积极帮助国民革命军东征，因为“东征的胜利，便是罢工的胜利。东征的胜利，香港政府之最后一着失败，它就将被迫承认罢工工人的条件。”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同国民革命军挥师东征，于十月底克复东江。十一月初又大举南征，打垮邓本殷部，至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坚持省港罢工斗争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邓中夏总结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工会论》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的表现就是工会。”怎样组织好工会？文章简要地阐明以下七个问题：第一，工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工人利益而奋斗”^②。因此要“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③，以实现党对工会的领导。第二，工会是“工人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其责任有三：团结工人“与资产阶级斗争”；“教育训

①《邓中夏文集》第249—250页。

②③《邓中夏文集》第363、458页。

练工友，使他们有阶级觉悟”；“养成工人有管理生产机关之才能”。第三，工会组织以产业组织为主，职业组织为辅。第四，工会组织的系统应以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相结合。第五，每一工会内部的组织系统应以委员制代替会长制，以免个人专制。第六，全国劳动大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统辖各地工会。第七，每一工厂的工会之最高权力机关为工厂委员会，工厂之每一车间设支部委员会，支委会下应设小组^①。这篇文章指导着当时省港地区各工会组织加强自身内部的建设 and 相互之间的团结，它又是中共早期有关工会运动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创刊，邓中夏任编委。他为该刊拟定的宗旨是：“本报的使命是要唤起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参加民族运动，并指导革命民众——特别是工农自己的阶级的组织之发展”^②。

三月三十一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百次会议，邓中夏致《训词》。他讲述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特征及斗争经验之后，明确指出：“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将来中国工人政府的先声”，强调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夺取和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现在就要通过省港罢工委员会学习建设政权的知识与经验，“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③。

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联合开幕，邓中夏任大会开幕式执行主席并致开幕

① 《邓中夏文集》第179—182页。

② 《人民周刊》第1期，1926年2月7日。

③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纪念刊》，1926年5月出版。

词。他指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我们的力量并与各阶级建立统一战线”^①。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宣言及决议案，会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常委，并代表全总任广东工农商学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和宣传部主任，参与起草联合会章程。

六月十七日，全总决定成立劳动学院，邓中夏被聘为院长兼省港罢工课程教授。他要求学院“以各工会领袖为学生”，在讲课中反复阐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只有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邓中夏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有余，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香港政府被迫于七月十五日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谈判。七月下旬，邓中夏连写两篇文章——《中英谈判中的我见》、《中英谈判总评》，阐述对谈判的要求和希望。文章指出：排英既是阶级斗争，又是民族斗争，需要民族团结；各界人士应当全力支持政府的谈判斗争。文章又肯定国民政府能够代表民族利益，驳斥英国政府种种诬蔑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谬论，要求国民政府坚持民族正义立场，毫不妥协。

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结识了亲密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英。邓中夏平时给李英讲革命道理，指导她读书；李英为邓中夏料理生活琐事。两人在革命斗争中相爱了，并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结婚，简朴的结婚仪式是在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的。邓中夏情深意长地对李英说：“妹妹，要记住：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②

^① 《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5月。

^②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第113页。

十月初，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考虑到，由于北伐军出师节节胜利，改变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总形势，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取消对港封锁，并决议对各国入口货物增收二五附税，即在原有关税之上加收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作为结束罢工后津贴罢工工人的费用。国民政府同意此项决议，并从十月十一日起，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机关，开始征收附加税。

一九二七年二月，邓中夏著文《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文章总结了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经验，比较深刻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①。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因为国际国内的条件决定“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②邓中夏说：以第三种形式建立的反帝联合战线政权的国民革命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国民革命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社会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劳农专政”；国民革命“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因此，只有完成国民革命的“初步解放”，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全部解放”。而

^{①②}《邓中夏文集》第373页。

“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向，“就目前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它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①就相互联系而言，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此，“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以“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绝不容许中国有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存在”^②。邓中夏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统一战线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有力批判。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邓中夏赴武汉参加筹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中国革命形势急骤逆转。中共五大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汉口召开，邓中夏参加了大会，和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等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央委员。

六月十九日，邓中夏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组织委员会和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他被选为全总执委会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大约在六月二十四日，经政治局正式决定”，调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③，负责处理繁重的中央日常事务。

大革命失败后，鉴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唐生智矛盾较深，又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合共产党返回广东的打算，

①②《邓中夏文集》第129、373页。

③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4页。

中共曾有“集合我们的力量，随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①，故派邓中夏和李立三于七月十九日去九江与叶挺等研究此事。七月二十日左右，邓中夏、李立三和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开会，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一致认为七一五政变后，张发奎也有“清共”打算，回粤计划已难以实现。况且，即使与张发奎同回广东，他也不会让共产党达到“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②。邓中夏与诸同志一致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叶挺应即刻联合贺龙率领的“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③。会后，邓中夏等立即“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④。邓中夏同李立三又“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⑤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中夏、李立三的多次电报和瞿秋白的口头汇报，经过研究，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

七月底，邓中夏从九江回到武汉，受中共中央委托，筹备召开八七会议。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邓中夏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表示坚决拥护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⑥。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地下省委书记，并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会委员。

①②③⑥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通讯》第7期，1927年10月。

④⑤邓中夏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八月中旬，邓中夏受党的指派，去上海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历尽周折，终于找到时任省农委书记的王若飞，初步了解情况后就马上开始工作。邓中夏首先着手恢复县一级党的组织。他从城市中“调一些本乡本土的同志下乡，又调一些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黄埔军校学生、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本地工人等充实县委”^①一级的领导。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江苏全省就有八个县恢复了县委；十一个县建立了独立支部，九个县派驻了党的特派员^②。到一九二八年夏，在江苏六十个有农村党组织的县中，有五十五个成立了县委。在县委一级党组织恢复的基础上，省委又将全省划为六个地区，陆续建立了淞浦、沪宁、南通、淮盐、徐海、扬州六个特委。省委决定，各县县委书记均参加特委会^③。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会议，邓中夏到会作报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他要求与会同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起来举行暴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这个报告一扫党内当时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同志们重新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这年十一月一日，中共领导宜兴一千多贫苦农民首先打响江苏秋收暴动的第一枪。暴动队伍占领县城，宣布成立宜兴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组成工农法庭，惩办罪恶累累的土豪劣绅。宜兴暴动后，党又领导了无锡、海门、江阴、崇明等地的

①黄逸峰回忆邓中夏在江苏省委（1961年7月）。

②③《建国前二十八年江苏革命斗争简要情况》，《江苏社联通讯》1981年第15期。

农民暴动。这些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缺乏斗争经验而遭到失败。邓中夏经过调查了解，知道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所谓“一暴二移”的错误做法，即暴动时只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分完财产后就把积极分子带到别处再搞，群众接着就散伙，缺乏坚持原地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邓中夏专门召集省委工作会议，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他说：这是流寇主义的做法，“搞农民暴动、武装斗争，要坚持原地斗争，不要脱离群众”；“最好几个地方联合起来暴动，不要这边起来那边又息下去了，这样才能壮大暴动声势，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①。在省委领导下，一九二八年江苏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就改变了这种做法。如苏北的如皋、泰兴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时，打土豪、分钱财，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武装游击队，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游击队日渐壮大，逐步发展成为红十四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疯狂屠杀工人领袖和工会干部，取消革命工会。他们还组织“白色工会”，即所谓“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强迫工人入会，对入会工人实行连保连坐，并规定工人罢工须经“工统会”驻厂指导员的允许，否则即行逮捕。当时，中共党内是如何对待“工统会”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发动工人退出“工统会”，驱逐“工统会”所派的指导员，以恐怖手段打击“工统会”委员；另一种是让中共党员打进“工统会”，在其内部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邓中夏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主张，决定“以外表灰色的党员打进工统会”^②，逐步

^{①②}黄逸峰回忆邓中夏在江苏省委（1961年7月）。

夺取工会组织的领导权，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斗争。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一九二八年，上海工人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二十一万四千多人（十二月份尚未统计在内），比一九二七年二十三万余人只少一万六千人，比一九二六年二十万零二千余人还多一万二千人^①。这期间，邓中夏还将在罢工斗争中已经暴露的工会骨干，通过中共中央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大学去学习深造。

一九二八年二月，党派邓中夏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接替李立三的职务。在广州起义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英勇牺牲后，中共中央曾派李立三接任，处理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当时广东党内部分同志因对广州起义的失败缺乏正确理解而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李立三未能加以正确解决，工作难以开展。邓中夏到任后，通过个别了解和小型座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结合自己从中央掌握的材料，详尽地阐明了广州起义的全部过程和失败原因，并正确地评价了广州起义。他着重指出：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它“给了我们丰富无比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在错误中去学习，去锻炼”，绝不能因此互相埋怨而影响党的团结。他强调，只有加强党的团结，才能“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强组织力”，去“战胜”各种“反革命的势力”^②。经过邓中夏一连串的工作，广东党内同志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又开始干劲十足地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邓中夏参与领导中国工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国工会在会

^{①②} 《邓中夏文集》第380、421页。

上作了重要讲话，“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会组织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反抗人民公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英勇斗争事迹，阐述了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的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战略和策略。”^①在这次大会上，邓中夏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参与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的领导工作，并参与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六月十八日，邓中夏出席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对许多问题都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参加了各种重要决议案的起草工作”^②，并明确表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把大革命断送了，这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的教训；但我们也应该反对非无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的统治，因为这种机会主义也会对革命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害。”^③他向大会报告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大纲》得到顺利通过^④。他被大会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七月十七日，邓中夏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主席团建议，要求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和研究，如将《马克思全集》和《列宁全集》译成中文；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应当加强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将在莫斯科的

①杨放之：《邓中夏同志在红色工会国际的革命活动》（1977年8月）。

②③罗章龙：《回忆邓中夏同志之二》（1961年12月）。

④《中共党史资料》1981年第3辑。

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调至该会；一九二八年二月停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应当复刊等等^①。他的这些建议，大都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采纳。会后，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全总给邓中夏的具体任务是：向国内“介绍国际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同时，也向国际“介绍中国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建立中国赤色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所属之各国工会（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联系。”^②邓中夏先后写了《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等文章，在《赤色职工国际》月刊上发表。《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一文，还被德国、美国的进步刊物和《太平洋工人》月刊转载^③。这篇文章明确提出：大革命失败后，党要深入到黄色工会去，与国民党争夺对一般工人群众的领导。为此，必须既反对“左”的幼稚病，又反对右倾思想。“我们相信这是中国革命高潮再来可以取得稳固胜利的保障”^④。

从一九二九年初起，邓中夏开始写《中国职工运动史》一书。这本书他打算写三十章，后因国内斗争需要立即回国，就只写了十三章。在已经写成的十三章中，邓中夏总结了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各次重大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工人运动的有关理论，受到党的极高评

①④ 《邓中夏文集》第375—376、390页。

②③ 《邓中夏、余茂怀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1929年5月28日）。

价。延安解放社在一九四三年出版此书时，特在《再版声明》中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①

一九二九年秋，邓中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劳动会议，参与大会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对“革命工会组织如何参加反帝斗争，如何反对当时已露征兆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如何实现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会组织的统一战线和团结等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中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被指定为第一个在大会上作长篇的“报告性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既有事实数据，又有理论分析，使与会的各国同志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充满信心”，并以大会名义致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致以“极大的敬意”和“慰劳”^③。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向中共中央诬告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老党员俞秀松、董亦湘组成了“江浙同乡会”反党派别集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邓中夏协助瞿秋白前往中山大学调查此事。他们经过反复调查了解，向中央报告实无此事。这个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的认可^④。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延安解放社1943年出版。

②③杨放之：《邓中夏同志在红色工会国际的革命活动》（1977年8月）。

④《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230—232页。

米夫、王明等又将中国工人运动的“老英雄”李剑如、余笃山打成“工人反对派”反党集团，并使中山大学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邓中夏等与王明一伙作坚决的斗争，先将上述两位老同志保护下来，再向中山大学提出抗议，指出壁报之事“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从此，邓中夏受到王明一伙的恼恨。

这年年底，米夫、王明等决定利用苏共中央清党的有利时机“打垮代表团”。米夫、王明等先将中山大学一批学生诬为组成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反党集团，然后再将瞿秋白、邓中夏发表在共产国际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断章取义，以作为他们“反国际路线”和支持“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的“证据”^①。联共中央派一中共委员到中山大学调查，米夫通过上层关系对之施加压力，结果，这个中央委员的调查报告作出错误定论：“第二条路线联盟基本上是反党的”，瞿秋白、邓中夏等“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②。联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也于一九三〇年春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为问题决议案》，赞同联共中央的调查报告。接着中共中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代表团，命瞿秋白、邓中夏随时准备回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九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党组织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不久，由于工作的需要，党又任命他作为中央代表，去湘鄂西苏区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①②}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244、247页。

邓中夏接受任务后于八月下旬离沪，日夜兼程赶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区是中共创建不久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它包括洪湖、湘鄂边、巴(东)兴(山) (秭) 归等几块红色区域；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是一年前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共有一万多人，五千支枪^①。

邓中夏抵湘鄂西后，即面临着如何搞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新课题。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一边熟悉地理环境，了解风土人情；一边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经过一段工作，他发现苏区一些地方“左”倾急躁情绪给革命带来不少损失，如农民“反水”问题和赤白区群众对立问题等。

有个时期，监利有不少农民在国民党的欺骗、煽动下，竟帮助白军攻打红军和工农民主政权，甚至举行“暴动”来残害共产党员和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当时有人把这些“反水”农民与反动派同样看待，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结果是火上加油，问题愈加严重。邓中夏根据自己的调查，认为这些农民“反水”也与我们经济和土地政策不妥有关。有些地区的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只是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转给原来的佃户，而大量的雇农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未得到实际利益；同时还普遍存在着把中农当富农，对富农打击过重的现象，加上苏区政府中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使不少群众容易接受国民党的恶意挑拨。邓中夏把情况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汇报，并在工作中坚持说服教育，争取群众，控制农民的“反水”。

由于国民党的欺骗、挑拨和煽动，一部分白区群众见到赤区群众就抢、就杀。赤区群众则以牙还牙，导致在赤区和白区

^① 《红军第二军军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7月22日）。

交界的地带，形成了荒无人烟的“仇杀区”。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反而认为这是赤区群众觉悟高的表现，不仅不加制止，相反还鼓励这种做法。邓中夏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道：“赤区、白区的对立，是赤区、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两个阶级的对立，不是群众的对立。仇杀白区群众，会使白区群众仇恨赤区，赤区就不可能发展。”^①他要求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一定要带头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后来，红二军团攻打白区仙桃镇时，抓到会道门的门徒五百多人，经过宣传教育，全部释放，有力地争取了白区群众。

九月中旬，红二军团奉命进攻监利、沙市，连连受挫^②。但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仍命令部队去进攻武汉，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红二军和红六军之间“大有分家倾向”^③。邓中夏得知消息后，连发四封信给红二军团负责人，“嘱其将军队调回，先集中洪湖附近，俟开军事会议后”再确定部队的下一步行动^④。他又向中央如实报告：红二军团奉命进攻武汉，“惟据我观察，第二军团是否能担此重任，尚是问题，因其战斗力实属有限，从上次进攻监利失败，此次进攻沙市无功可证”^⑤。九月二十日，邓中夏赶到洪湖地区的周家嘴，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他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下监利，以振士气。九月二十二日，部队一举攻克监利，歼敌两千余名，缴枪千余支。

九月二十四日，邓中夏在监利召开了原特委与原前委联席会议，选出由二十一人组成的新的湘鄂西特委。邓中夏建议

①④ 《邓中夏文集》第648、640页。

②许光达：《红六军历史材料》（1945年7月）。

③⑤ 《邓中夏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15日）。

推举周逸群为特委代理书记，并决定由周逸群兼任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集中精力抓地方工作。在新选出的二十一名特委委员中，有七人是红二军团的同志。为了加强军队中的集体领导，经邓中夏提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由参加特委的七位同志组成红二军团党的前委，前委书记由军团政委邓中夏兼任。他强调前委要抓部队的思想工作，“用公开方式与各种不正确倾向斗争”，并“从组织方面尽量消灭可以引起不平的现象（如经济分配问题、补充问题等）”^①。联席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经济政策、苏维埃联县政府建设、根据地党的建设、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

为着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联席会议结束后，邓中夏又在监利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根据联席会议上讨论的几个主要议题，通过了由邓中夏等人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经济政策决议案》、《苏维埃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等。这些决议对全国政治形势的估计，虽有李立三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但对苏区具体政策的规定却是正确的；纠正了原来许多“左”的错误。如《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就具体地划分了农村各阶级，提出了党在农村必须“抓住雇农及贫农、联合中农”的路线，明确规定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绝对不应侵犯中农。“大纲”要求加强宣传，加紧准备，依靠基本群众，使苏区平分土地的工作于本年内实行。

《苏维埃经济政策决议案》又明确提出：“赤区经济务需与白

^① 《邓中夏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15日）。

区流通，封锁是自毁政策”；“经济流通与赤区工业品供应，必须以商人做中间”，“要允许中小商人正当营业，对中小商人不要过于苛刻限制”。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促进了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正确开展，工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军队的壮大。红二军团由一万多人发展到两万人，枪枝由五千多支发展到一万二千多支。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进攻岳州。十月下旬，邓中夏等率红二军团渡江南征。进入江南后，在苏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三座县城；十一月又克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共歼敌万余名。但这些城镇不久又被敌人占领。十二月初，红军再度猛攻津市等城镇，由于敌军死守，何键部“两师以上”的兵力又赶来与我军决战，红二军团受挫后主动退到松滋县的杨林寺一带。这时，邓中夏提议采用“集中兵力、选择阵地”的战术，以“打破敌人大举包围”^①。他的意见得到前委的同意。但杨林寺一战使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强”^②，加上部队因战斗未能赶回洪湖，洪湖根据地惨遭敌人摧残，到一九三一年秋才由红军重新夺回。

血的教训使邓中夏开始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他给中央的报告说：“我们要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以至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失，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今后当然应努力纠正这一错误。”^③这说明他对“左”倾冒险主

^{①②③}邓中夏：《关于红二、六军转至湘北后作战情况及行动方针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2日）。

义错误的认识已经提高了一步。

邓中夏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决不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是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完全负责。”他还说：“事实已经很清楚，洪湖赤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的削弱，都应由我负责。”^①这些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正视错误、严于律己的高度责任感和坦荡胸怀。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全党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并对各苏区政府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实行大改组，对一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年夏天，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

一九三一年冬，邓中夏被调回上海作“检查”。王明的惩办主义使这位长期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忠诚战士，一到上海就遭到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几乎陷于绝境。没有分配他任何工作，也不给他任何经济援助，连吃饭都成问题。李英当时在上海做党的情报工作，得知消息后，强烈要求和邓中夏生活在一起，但竟遭到拒绝。李英再三要求说：“只要邓中夏是共产党员，他就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这个愿望虽然得以实现，但她却被从党的情报机关调出到日本纱厂做学徒工，每月挣得七元钱，除三元交房租外，用剩下的四元钱，艰难地维持着他们夫妇的生活。每天，李英早出晚归，干着十分劳累的活。邓中夏主动地承担起琐碎的家务，如生火、做饭、买菜、洗衣等，什么都干。就是这样，遇到那些受王明

^① 《邓中夏报告的总结》（1931年12月）。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生活没有来源的同志，他们还要尽力接济，以至把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几件象样的衣服都送进了当铺。但对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也无力抚养，只好忍痛送人。邓中夏深情地对李英说：“我们现在只有这点钱，要先救济同志们，不能再顾孩子。孩子送给群众养，你放心吧！”

一九三二年初，邓中夏得知组织给他分配了工作，很是高兴。尽管这工作是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板，印传单，他“仍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①。后来，沪东区委又要邓中夏编印油印小报——《前锋》。他把小报办得有声有色，战斗力很强。当时，上海党组织内许多人人都知道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一位同志很会写文章^②。

一九三二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上海地下工会准备发动工人游行，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宣言稿。组织上叫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妇女工作的帅孟奇按照联络暗号，去找沪东区委宣传部那位“很会写文章”的同志帮助修改。帅孟奇去求见时大吃一惊，想不到她要找的竟然是邓中夏这位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她的眼眶湿润了。邓中夏连忙制止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说着，他便埋头帮助她修改“宣言”，使帅孟奇感动不已^③。

一九三二年秋，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国赤色互济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它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各阶层的力量来营救被敌人逮捕和关押的同志及朋友；照顾和救济死难烈士的家属。

①②匡亚明：《关于邓中夏烈士的一些情况》（1972年1月29日）。

③帅孟奇：《工运的明灯、革命的中坚——纪念邓中夏同志》，1980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这个组织曾受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亟待恢复。由于互济会的工作常常需要出头露面与各方人士商谈接洽，同志们考虑到邓中夏曾长期在上海工作，而且影响很大，容易暴露身份，所以一致要求他不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邓中夏笑着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①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和江苏省委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市中心举行“飞行集会”和大示威，并令邓中夏发动革命群众参加。邓中夏鉴于这种错误做法已经使党受到严重损失，便再三向上级组织说：革命群众刚刚组织起来，力量还很薄弱，“有的厂里党员不过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参加赤色群众团体的也不到全厂工人的百分之二、三”^②，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再拿群众的生命去冒险。“我们刚刚反对了立三路线，这样做与立三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呢？”^③但是“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拒绝接受邓中夏的正确意见，反而责备他说，“这是党的决定，……是不允许怀疑的”，“你怀疑党今天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是立三路线吗？”^④事后，邓中夏感慨地对其他同志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些同志，这些自以为理论水平很高的同志，才能真正懂得只有长期积蓄力量，才可进行决战的真理呢？”^⑤

五月十五日晚，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

①②③④⑤陈农非：《邓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

五月十六日，设在法租界的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讯。邓中夏利用法租界尚未搞清自己真实身份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并请史良等著名律师帮助辩护；党组织得知消息后也多方设法营救，迫使法庭判处邓中夏五十天监禁。但是，林素琴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后，随即叛变，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蒋介石得知消息，大喜过望，亲自派人以现洋一万元买通法租界各级官吏，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命令高三分院将邓中夏引渡给上海公安局，而且立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邓中夏被关进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后，蒋介石先派余飞（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后背叛革命）前来“劝降”。余飞曾与邓中夏共事数年，企图以旧友的感情和现身的待遇说服邓中夏，但被邓中夏骂得狗血喷头，狼狈而去。国民党一中央委员又阴险地利用王明一伙对邓中夏的残酷打击，伪善地为邓中夏鸣不平，以离间邓中夏与共产党的关系。邓中夏义正辞严地驳斥道：“我要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很高的自信力，我们敢于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够克服它。我们懂得错误较诸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你们还有脸来指责别人的缺点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①这些批驳痛快淋漓地表达了邓中夏对党的热爱与忠诚，对敌人的蔑视与嘲讽。但

^①陈农菲：《邓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蒋介石还是不死心，又派一个国民党的所谓“理论家”前来说降。邓中夏与之唇枪舌剑地斗了几个小时，最后笑着说：“请告诉你们的中央委员，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合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你们的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的辩护律师可由我自己担任。最后，谁若在事实面前被说得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宣布向对方投降。”“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便不敢这样做”^①。

监狱的同志见邓中夏接连几天都以“贵宾”的身份被国民党请去，便以监狱共产党地下支部的名义，通过一位难友对邓中夏说：“同志们很关心你，问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问得好，应该问。一个革命者到这个时候，同志们是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的。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②

国民党反革命派又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一次严刑毒打之后，一个特务还对邓中夏出言不逊。邓中夏怒骂道：“你们活着狂吠的日子不多了。中国人民和英勇的红军会消灭你们的！”那个特务不解地吼道：“你还这样强硬，难道你不想出去了吗？”邓中夏凛然道：“我没有进来以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的。现在进来了，却从未想到会出去。”^③国民党当局终于意识到共产党人是不可征服的。

同监狱的难友们很敬佩邓中夏。大家凑钱让他吃外面的“包饭”，请他给难友们上党课。邓中夏把每次收到的包饭都

①陈农菲：《邓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②郑绍文：《回忆邓中夏纪事》（1959年7月3日）。

③《夏明关于邓中夏第三次被捕遇难情况的调查》。

分给体弱病残的同志，自己坚持吃“狱饭”。他给同志们上党课，讲马列主义，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气节，讲工人运动。有一次，他刚受完重刑回到牢房，稍息片刻，便接着讲上次未讲完的斯大林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讲着讲着，牵动嘴角和鼻子边上的伤口，血不断地流出来。但他一边揩血一边讲，坚持讲完那一课。听课的难友忍不住泪湿衣衫，更被他那坚毅的精神所激励。

邓中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坚持学习，阅读一本借来的通史。一次审讯过后，他估计到那是最后一次审讯，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在给同志们上完最后一次党课后，便抓紧时间读完那本通史。他说：“我还来得及读完这本书。”当他读完这本书后，又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①

果然，第二天黎明，即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晨，按照南京政府的批示，国民党反动派将邓中夏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邓中夏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访问过邓中夏的夫人李夏明（即李英）及有关的亲属、战友邓隆泽、邓隆烈、邓隆培、杨富思、熊光楚、黄平、杨放之、帅孟奇、蹇先任、黄逸峰等同志，还参考了以下资料：

1. 《邓氏族谱》、《邓氏联谱》，存湖南省宜章县档案局。
2.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3. 李致宁：《邓中夏在岳麓书院》，《岳麓书院通讯》1982年第3期。

^① 《湖南革命烈士传》（1952年）。

4. 王兴国：《杨昌济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通讯》1982年第3期。
5. 《国民》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出版。
6.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1920年3月16日。
7.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2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
8. 郭长征：《邓中夏与文学》，《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9. 邓隆烈：《邓中夏片断事实记》，《宜章人民革命斗争史》第9期。
10. 杨东莼：《回忆邓中夏》，1959年5月9日《光明日报》。
11. 周子信：《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其成员》，《党史通讯》1986年7期。
12. 《五四时期的社团》（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13. 《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4.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
15. 《向导》周报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16. 《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7. 《红旗周报》第29期。
18. 《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5月）。
19.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通讯》第7期。
20. 罗章龙：《回忆邓中夏同志之二》（1961年12月）。
21. 杨放之：《邓中夏同志在红色工会国际的革命活动》（1977年8月）。
22. 《邓中夏、余茂怀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1929年5月8日）。
23. 黄平：《邓中夏在苏联》。
24. 刘长胜给邓中夏夫人夏明的信（1955年10月18日）。
25. 《邓中夏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31日）。
26. 郑绍文：《回忆邓中夏纪事》（1959年7月3日）。
27. 《夏明关于邓中夏第三次被捕遇难情况的调查》。
28. 姜平：《邓中夏的一生》，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陶 静 轩

熊 经 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陶静轩在浦东英勇就义。噩耗传出，上海工人“莫不悲愤流泪，而为他呼冤！”^①中共上海区委为追悼陶静轩发表了《告同志书》，赞颂他“实在是一个很好而难得的工人领袖”^②。

颠沛流离到上海

陶静轩，又名静仙、景宪、经轩、振元、鑫元、景惠、时之，湖北省江陵县熊河区谭市乡陶家嘴人，一八九〇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陶家嘴过去是“十年九不收”的湖区边缘。由于陶家耕地较少，又经常受灾，故除种田以外，还得兼以捕鱼、挖藕和打短工的收入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尽管家境贫寒，他的父母为了使孩子日后不受欺凌，仍节衣缩食，甚至不惜举债，让他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只好

①《愿同志们熟读此可痛的报告——收拾陶静轩同志尸首的详情》
中共上海区委《教育杂志》第3期，1926年12月1日出版。

②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追悼陶静轩同志》（1926年11月18日）。

辍学回家种田。

一九〇七年秋，已经十七八岁的陶静轩因农活纠纷离开家乡，先后给地主打短工、干杂活；辛亥革命前，投考了前清荆郡陆军学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他满以为中国从此有了希望，个人有了出路。但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代之而起的是在民国招牌下的大小军阀的残暴统治。这些军阀为了争城夺地，割据逞雄，在帝国主义操纵下不断混战，致使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辛亥革命后，陶静轩曾在北洋军十六师炮兵营充任书记等职^①。他生情耿直，疾恶如仇，勇于反抗，常常引起上司的不满。他所在的师原是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后为奉系所控制。一九二二年夏在奉直战争中，这个师在长辛店倒戈反奉，致使张作霖败退关外。由于这个师动摇于直奉两派军阀之间，使它的下级官兵倍受歧视和压迫，受到的军阀混战之苦更为深重。严酷的事实，使陶静轩看清了北洋军阀对外卖国、对内残民的罪恶，他再也不愿为他们卖命了！一九二三年春，势如狂飙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了他冲破黑暗的勇气，遂愤然脱离了祸国殃民的北洋军，辗转到达了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根本转变。到沪之初，他先在码头当装卸工，后经友人介绍，进入小沙渡日商内外棉十五厂做工。

在沪西工友俱乐部锻炼成长

沪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纱厂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产业工

^① 《陶静轩事略》，《中国青年》第143期，1926年11月25日出版。

人最集中的地区。陶静轩虽然摆脱了军阀部队的压迫，却又套上了日本资本家的枷锁。日商纱厂的工人工资低，工时长，一般都是“六进六出”（即日班工人从早晨六时进厂到下午六时出厂；夜班工人从下午六时进厂到次日早晨六时出厂），连吃饭和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日本厂主还订了许多虐待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工人经常被日本监工辱骂为“贱种”、“亡国奴”，动不动拳棒交加。陶静轩每见这种情景，总是愤愤不平。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共产党在纱厂工人中办起了沪西工人补习学校。进厂不久的陶静轩，积极参加了工人补习学校的学习，成为这个学校的首批学员。共产党员邓中夏、项英、李立三、瞿秋白、徐梅坤，以及上海大学的一些进步师生如杨之华等，经常到补习学校讲课，找工人谈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事例，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说明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获得自由解放。由于陶静轩读过几年私塾，又有饱经沧桑的曲折经历，对这些革命道理接受得快，理解得深，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他不仅认真学习，而且积极宣传，动员更多的工友参加补习学校学习，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逐步扩大。

一九二四年夏，党组织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便更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工人。陶静轩热忱拥护党的决定，积极从事筹备工作。他和嵇直、孙良惠、徐玮、戴器吉、刘贯之等，热情向工人兄弟宣传成立俱乐部的好处，积极发展部员，并选定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三间新建平房作为俱乐部的部址。陶静轩还热心地把自己家的单椅搬到俱乐部作为办公之用。

八月三十一日，是俱乐部成立的日子。陶静轩和三十多名与会者，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会场。项英到会作了演讲。

会议根据项英的讲话精神和大家的意见，拟订并通过了俱乐部的章程，推举了俱乐部的领导成员。陶静轩被推举为交际委员。会上还为筹集俱乐部经费进行了募捐，陶静轩和与会者都罄其所有，热情捐助，表现了大家对俱乐部的热忱。这样，沪西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就在简朴而热烈的气氛中宣告诞生了。陶静轩不仅是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后来被选为俱乐部第二届委员长^①。

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以后，广泛地在工人中开展了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陶静轩更忙了。他利用工余时间频繁来往于工房和“地滚龙”之间，深入于工人家庭之中，积极进行联络发动，足迹遍及内外棉十一个厂，并在他自己所在的十五厂建立了俱乐部“基本小组”。经过陶静轩和刘华、孙良惠等在工人中深入细致的工作，积极分子的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些积极分子又以结拜兄弟的形式，团结了更多的工人。俱乐部很快成为工人们的活动中心。由于俱乐部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又有生动感人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在成立后的短短三个月里，就在十几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基层组织，工人基本小组成员发展到近千人。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锻炼了陶静轩，党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觉悟，党的领导人项英等亲自找他和顾正红等俱乐部骨干谈话，让他们参加有关会议，热情洋溢地向他们宣讲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宣讲二七大罢工中工会如何组织工人、团结工人，同敌人开展斗争的英勇事迹，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地委委员的徐梅坤，也曾

^① 《陶静轩事略》，《中国青年》第143期。

亲自找陶静轩谈话，并于一九二四年秋在小沙渡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陶静轩入党后，工作“愈加勤奋”，在每次群众运动中，都“奋勇争先”^②；他原来的火暴性子和急躁情绪也有所克服。陶静轩等纺织工人的入党，使中共开始在工人中扎下了根。正如当时的俱乐部成员刘贯之回忆所说：“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是从这个俱乐部而开始打进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在这以前，共产党的组织还是以学界为主要发展对象）。”^③沪西工友俱乐部部员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建立，为迎接工人运动的高潮作好了组织准备。

站在二月罢工的最前列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在沪西的日商纱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东洋人打人”，要求改善待遇的二月罢工。

二月九日，罢工首先从内外棉东西五厂开始，内外棉七厂、八厂、十二厂起而响应。积愤已久的工人群众，冲破巡捕的阻挠，涌出厂门，渡过苏州河，汇集到北岸的潭子湾旷地。次日，被日本厂主长年奴役、几乎与世隔绝的“养成工”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到二月十一日，内外棉株式会社在沪的十一个厂中已有十个厂完全罢工，唯陶静轩所在的第十五厂六百余

①访徐梅坤记录。

②《陶静轩事略》，原载《牺牲》，中国济难总会编印。

③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出版。

人，因厂方防守严密，尚未罢工。这个厂的日本厂主为了阻止工人出厂，将铁门严锁，并系上四百磅电力之电缆，又用自来水管冲散前来援助的工人。陶静轩见此情景，心急如焚。

十二日中午，日本厂主不准工人出厂吃饭，逼迫工人在厂内进餐。陶静轩趁工人吃饭时，鼓动大家说：“其余十厂都已罢工，唯独我们尚在工作，太无义气。”号召大家立即罢工出厂。至下午三时，十五厂的工人们终于冲出铁门，与厂外接应的工人涌到潭子湾汇合。这时，荒凉的潭子湾已是怒潮澎湃的人山人海，一面赫然写着“反对东洋人打人”七个大大的白布旗帜飘扬在会场的半空中。陶静轩带领十五厂的工人来到这里，看见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雄壮场面，真有扬眉吐气之感！在罢工斗争中，成立了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刘华被推举为工会委员长，陶静轩为工会委员并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工作。他带领纠察队巡视工区，维持秩序，传递消息，安抚人心，使罢工浪潮不断扩大。到十八日，参加罢工的有二十二家日商纱厂、三万五千多名工人，日本在沪“九社三十二厂几乎全都不能开工”^①成为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罢工。

日商纱厂工人同盟罢工实现后，为了统一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潭子湾成立了各厂工会联合办事处，陶静轩为负责人之一。随着罢工时间的延续，日本资本家和工贼引诱工人复工的破坏活动日益加紧。内外棉各厂厂主假装同情工人生活困难，宣布罢工期间凡是到厂报到的，不论开工与否，每天发三小时工资。起初，工人不加理睬，可是，随着罢工日

^①《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49页。

久，工人生计发生困难，而罢工领导人如邓中夏、孙良惠等人又先后被捕，群众大会也遭禁止，工贼们则趁机大造谣言，于是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惶惑起来，陆续被拿摩温（工头）骗到厂里报到，罢工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在此紧急时刻，二月二十二日，陶静轩与刘华、顾正红等连夜开会，决定立即动员全体纠察队员把住口子，阻止工贼拉工人进厂，同时印发大量传单，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决不可贪三小时的小利上东洋人的当^①！当晚，陶静轩和顾正红冒严寒，踏冰雪，分头到东京里和英华里等工房，一家家地敲门唤醒熟睡中的纠察队员，传达工会的决议和交待把守口子的地点。经过整整一个通宵的紧急动员，到次日终于稳住了罢工队伍的阵势，同时又将各界捐助的款项分给有困难的工友，以维持生活，击败了厂主引诱工人复工的阴谋。

由于陶静轩和刘华等不辞劳苦，不避艰险，领导数万工友坚持斗争，到二月二十六日，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十七日下午，被警察厅拘捕的十名工人恢复自由。陶静轩和数千群众聚集在苏州河边，点燃爆竹，热烈欢迎受难战友胜利归来。不久，邓中夏、孙良惠等人在群众的救援之下，也被释放。

二月罢工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威信，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使广大工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团结战斗的重要性。罢工胜利后的几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即由一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陶静轩也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有勇有谋，受人爱戴的沪西工人领袖之一。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38页。

不久，陶静轩和项英、孙良惠、张佐臣等当选为纱厂工人代表，出席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更加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五卅运动的工人领袖”

二月罢工后，日本资本家虽然假惺惺地答应工人的要求，但暗中却伺机报复。陶静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复工以后，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克扣工银，更有奇法。”^①他们“侵犯工人团体，违背条约，开除代表，破坏组织，种种无理压迫，更予工人以难堪。”五月七日，上海的日本纺织同业会，竟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人如果罢工，就关闭工厂，并要求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军阀政府取缔“煽动者”及工会的活动。工人闻讯，十分气愤。十五日，靠内外棉十二厂供应棉纱的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无纱关闭七厂。七厂工人根据中共党组织关于轮流罢工的指示，决定用上工的办法，粉碎日本资本家趁棉贵纱贱之机关厂停工、打击工人的阴谋。

十五日下午五时，晚班工人照常来厂上班，日本资本家将厂门锁闭，不让入厂。这时，站在队伍前面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里，与日本资本家讲理，日籍职员举起铁棍乱

^①刘贯之、陶静轩：《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载《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51—553页。

打工人，而内外棉副总大班（副总经理）元木和七厂大班（经理）川村，竟开枪打死顾正红，并打伤十多人。这一血案，燃起了中国人民积愤已久的反帝怒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就以顾正红事件为导火线，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十六日，陶静轩和刘华等及时发动内外棉各厂工人奋起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提出严惩肇事日人、赔偿伤亡工友损失、恢复被开除工友工作等八项条件，吁请各界援助。为了加强斗争的领导机构，五月十七日，纱厂各工会在潭子湾三德里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推定罢工委员会临时职员，刘华、孙良惠、张佐臣为总主任，陶静轩、刘贯之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会后，陶静轩和刘贯之代表内外棉纱厂工会及二万五千工人，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署的交涉使陈世光递交了《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并以传单形式广为散发。呈文以铁的事实，历数了日人在我国各处开设工厂，掠我财货，剥削、虐待工人，破坏工人组织，残暴惨杀工人的种种罪行，强烈要求交涉使“向日领严重交涉，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会等等要求，以平众愤而崇国体。”

为了向新闻界说明惨案真相，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陶静轩在宜昌路文治大学阅报室举行上海各报记者招待会。他详诉了这次工潮的原委，揭露了日人平日虐待我数万工友和此次日人惨杀同胞的真情^①。义正辞严，哀而动人，获得了上海新闻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事后，报界纷纷揭露日人罪行，声援工人斗争。

^①民国 14 年 5 月 26 日《民国日报》。

为了进一步扩大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陶静轩协助刘华、孙良惠在潭子湾举行了全市规模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陶静轩不时领众高呼“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向凶手讨还血债”等口号。大会庄严肃穆，群情激愤，为民族恨、阶级仇激起的反帝怒潮，势不可挡。

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工人学生游行队伍聚集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捕头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几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旧恨未报，又添新仇，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消息传来，陶静轩更是怒火中烧。就在当日下午四时，他与刘华等及时在潭子湾召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刘华宣布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援被捕的学生。陶静轩慷慨陈词：“刚才听到有几个学生在游行时被巡捕杀死。学生已为工人而牺牲”^①。他号召工人奋起报仇！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经过积极筹备，正式宣告成立。李立三、刘华分别任正副委员长，陶静轩等为执行委员。为了便利工作，随后，上海总工会在高郎桥、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等五个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刘华兼第四（小沙渡）办事处主任，陶静轩为组织部长（刘华被捕后，陶静轩接任第四办事处主任）”^②。上海总工会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

^①《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9页。

^②张维桢：《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革命史资料》第1集。

号召全市工人从六月二日起实行总同盟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上海总工会为主体，团结学生联合会，争取总商会实现了“三罢”斗争，形成了上海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八月二十日，在五卅运动的斗争烈火中，上海纱厂总工会正式成立，陶静轩当选为执行委员。他与刘华“奋不顾身，率二十余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①，坚持了长达三个多月的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陶静轩则在这场大革命风暴中，锻炼成为“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之一，五卅运动的工人领袖。”^②

五卅运动后期，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向上海工人阶级进攻。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统治上海的奉系军阀头目邢士廉悍然封闭了上海总工会，通缉总工会负责人；十一月，又拘捕并随后秘密杀害了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刘华，陶静轩也一度失业。工人运动遭受暂时的挫折。但是，敌人的镇压，吓不倒“我们最忠勇的同志陶静轩”。在上海革命群众运动暂时低落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顽强地坚持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在“上海每次重大工人运动中，陶静轩俱受党与工会的指挥，担负重要的使命”^③。

一九二六年五卅运动一周年，陶静轩参与领导了一次重大斗争。这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上海区委即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布置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工作。根据党的指示，陶静轩进行了积极的筹备和紧张的斗争。五卅周年将临，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极端恐惧，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特令各捕房加意

① 《陶静轩事略》，《中国青年》第143期。

②③ 《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追悼陶静轩同志》（1926年11月18日）。

防范”，并在华界和租界交界处加派西捕梭巡^①。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厅长严春阳更三令五申，对于五卅纪念“一律禁阻”，并“通令所属军队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临时加紧戒备三天”，“荷枪实弹，往各马路梭巡”^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八日，陶静轩代表上海总工会出席了在宝通路华寿里三十五号召开的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被推举为五卅烈士墓奠基礼四人主席团成员，参加烈士公墓奠基礼的各项组织领导工作。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一千多个团体五千多名代表，怀着满腔悲愤，在闸北方家木桥北面的五卅烈士公墓基地举行了盛大的烈士公墓奠基礼。那天下午二时半，奠基礼开始，哀乐低回，警钟长鸣，人们噙着泪水向死难烈士鞠躬默哀。林钧致开会词后，由上海大学学生章毓寄宣读全体市民祭文，接着由陶静轩宣读上海总工会祭文，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陶静轩激动地说，我们举行烈士公墓奠基礼，“不要忘记我们的刘华”。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被军阀秘密杀害了，连尸体也未找到，我们要为“我们的领袖刘华报仇”！号召各界人士“继烈士未竟之志，以谋国家之独立自由，否则虽有今日之奠基礼，精神殊不足以慰烈士于九泉之下”^③。

五月三十日，工人停工，学生罢课，商界休业，人们袖缠缀有“卧薪尝胆”的黑纱，市面高悬“卧薪尝胆，永矢勿忘”的白旗，沉痛悼念五卅遇难烈士。这一天，中共上海区委和上

①民国15年5月28日《新闻报》。

②民国15年5月29日《新闻报》。

③民国15年5月30日《新闻报》。

海总工会继发动各界人士举行烈士公墓奠基礼后，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一千数百个团体不下五六万人”参加的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并指派陶静轩为大会总指挥^①。

上午十时，工界和其他各界团体按事前通知涌往会场，民国路一带，但见旗帜如云，万头攒动，沿途观者，尤为拥挤，呼号之声，不绝于耳。大会会场，庄严肃穆，井然有序。陶静轩组织总工会纠察队挽手成篱，维持秩序。十时三刻，由大会主席张超宣布开会，向五卅死难烈士默哀，随即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争取民族解放的宣言和通电。最后由陶静轩领呼口号：“继续五卅运动精神！”“民族独立万岁！”“民族统一万岁！”一时口号声如惊雷滚动，震天撼地。正如《新闻报》记者所说，这个会“为近数月来未有之盛会，民气激昂，溢于言表。”^②

十一时许，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总指挥陶静轩（总工会）、李学誉（学联）的率领下，由公共体育场出发，经林荫路、安澜路、西仓路、肇嘉路、中华路仍回老西门。一路浩浩荡荡，如大江奔腾。陶静轩沿途不断挥动有力的臂膀高声领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游行队伍和沿途观众浑然一体，口号声和鼓掌声接连不断。群众反帝热情又重新高涨起来。

五卅周年纪念活动，打破了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的沉寂局面，使工人群众又一次看到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工人运动开始走向新的高潮。陶静轩始终是这个纪念活动的卓越领导者。

^①民国 15 年 5 月 31 日《民国日报》。

^②民国 15 年 5 月 31 日《新闻报》。

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不久，市场纱价下跌，日商内外棉三、四厂厂主又以闭厂停工威胁工人，并提出压迫和虐待工人的七项荒谬条件。陶静轩代表纱厂总工会，与三、四两厂工人代表一起，同厂方代表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谈判斗争，迫使三、四厂厂主取消七项条件，并承认“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雇佣巡捕进厂殴打工人及无故拘捕工人，复工后一礼拜每人凭折子向厂方借洋五元”等三项条件。七月二十四日，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上海工人首次起义英勇献身

一九二六年，在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给上海工人阶级以极大鼓舞。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早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就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并决定发动码头、电器、电车工人政治大罢工，积极武装工人联合国民党举行武装起义。为此，中共上海区委调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陶静轩到上海码头总工会任副委员长兼浦东方面码头工人的总指挥，并成立了有陶静轩等三人参加的码头运动委员会，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陶静轩深入工人群众，团结上海河、海各港的码头工人，在上万名码头工人中进行了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十月十六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倒戈反孙。中共上海区委鉴于这种形势，加速了武装起义的进程，并于十七日中午召开主席团临时会议，具体研究了武装起义的组织、指挥问题，决定用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名义发动起

义。经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提名，由陶静轩、何松林（即汪寿华）、林钧、余泽鸿等十三人为市民和平维持会的组成人员^①，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

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刚刚开始，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仓猝发动的。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了起义的动员令。然而这时形势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变化：一是夏超兵败，二是事机不密；市内敌人已有戒备。但区委考虑九江已克复、叶开鑫已倒戈的有利条件，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决定于二十四日零时举行起义。到预定时间，原定作为起义信号的军舰炮声也未发出，结果只有斜桥、大木桥、日晖港一带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陶静轩按原定计划组织码头工人纠察队，携带二十支勃郎宁手枪和几枚手榴弹，准备袭击第三区警察署，“统因等待炮声”，致未行动^②。领导机关发现情况异常，立即下令停止起义，但时移事迫，分别通知已来不及。陶静轩没有接到停止起义的通知。二十四日十二时，他和余纪汉、郭妙根、秦良等六人到吴家厅胡鹤云家会晤时，不幸被三区警察署拘捕。

陶静轩等被捕后，中共上港区委和各界人民积极进行营救。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各团体“一致予以援助”，使被捕工友，“得以即日脱离危境，恢复自由。”同时，各团体联合会致函淞沪戒严司令，要求对“无辜被捕”工友，“迅速从轻发落，以示宽大。”^③但是，由于

①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记录》（1926年11月17日）。

② 江元青：《记浦东和南市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5日）。

③ 《两团体为党案被捕者呼吁》，民国15年10月29日《申报》。

陶静轩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加之他被解到南市警察厅时即被叛徒刘铸所指认，这样党和各界人民的营救活动归于无效。敌人曾对他施以酷刑，妄图从他嘴里得到情报，但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始终不为敌人所折服。十一月十六日，陶静轩英勇就义。临刑时神色泰然，视死如归，并“对施刑之士兵及环视之观众作热烈之演说，观众多有泣下者”^①。据当时在场的工人和士兵说，他“毫无惧色，一方面大骂军阀的罪恶，一方面向那些监刑兵士演说革命的意义，并告诉他们不要再当军阀的走狗，赶快觉悟转来。”^②演说完毕，面对沪西，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陶静轩被军阀杀害的不幸消息，激起上海工人阶级的强烈愤慨。十一月十七日，上海总工会“为陶静轩牺牲事”发表宣言，号召“各业工友，一致奋斗到底，为死者伸冤，为生者谋保障”。还大量散发《陶静轩精神不死！为陶静轩报仇！》等传单^③。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上海区委为追悼陶静轩同志发表了告同志书，赞颂陶静轩是“有肝胆、有煽动与领导工人群众的能力，实在是一个很好而难得的工人领袖”。区委号召上海的工人阶级“与压迫阶级之军阀武装决斗”，“为陶静轩同志报仇”^④。罗亦农曾多次赞扬陶静轩的英勇事迹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

① 《陶静轩事略》，《中国青年》第143期。

② 《愿同志们熟读此可痛的报告——收拾陶静轩同志尸首的详情》，中共上海区委《教育杂志》第3期，1926年12月1日出版。

③ 《中国工运史料》1981年第4辑。

④ 《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追悼陶静轩同志》（1926年11月18日）。

说：陶静轩“在就义时是面向西，表示临死都没有忘记沪西的工人兄弟，他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工人兄弟，没有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去死，死得有骨气。”^①次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为“暂停暴动、宣传、追悼陶静轩”事举行会议，决定：“陶同志事应与刘华同志同样扩大”^②。上海总工会根据区委决定，指定专人，组织了丧葬筹备处，赶印了陶静轩的相片和小传，广为散发；并通告各工会于十一月二十日追悼陶静轩。上海各业工人都在这天下午一时关车停工，鞠躬默哀。

十二月十八日，是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刘华惨死一周年及“码总”副委员长陶静轩殉难一个月纪念，上海总工会发起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这些追悼活动在工人群众中起了广泛的政治鼓动作用，为后来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烈士虽死，烈士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深印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头脑中，永远不死！”^③

①转引自金再及：《奚佐尧、陶静轩被捕牺牲的一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

②《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1月19日）。

③《中国工运史料》1981年第4辑。

向 钧

凌 辉 赵士启 向良度*

向钧，别号素我，字俊奇，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平绥乡石洞村砖屋里（现向家乡三和村）。

向钧的父亲向理卿早年科举未中，投笔从商。向钧的祖父、外祖父均设馆授徒。向钧五岁刚满，便在祖父门下发蒙读书。祖父常以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故事，激发他探求新知的兴趣。两年以后，向钧到离家五里的东山寺小学校读新学。毕业后转入作民高等小学堂读书。新书课文给了向钧许多新知识，使他知道了“孙中山，是伟人。废帝制，立共和。”等许多新事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向钧邀集一些进步同学，翻山越岭，到向家石等村镇上去宣传讲演，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和美国政府的罪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使偏僻的山乡，燃起了爱国运动的烈火。

一九二一年八月，向钧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在那里，他通过表姐杨开慧的介绍，阅读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等许多文章。这年初冬的一天，在学宫街十八号，向钧在叔父向明卿家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向钧热情交谈，问他喜欢看什么书，是否喜爱写文章，介绍他多看文化书社发行的宣传新

* 参加本传资料收集和初稿写作的还有杨志超、向良士同志。

思潮的书籍。此后，向钧常去清水塘毛泽东的住处，同他交谈读书心得。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向钧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不久，他担任了岳云中学学生会的代表，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一九二二年一月，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军阀政府杀害。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湖南工人和各界的极大愤怒。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省学联联合各界在船山学社举行了两次追悼大会，发行纪念周刊，揭露和抗议赵恒惕军阀政府的罪行。向钧很快了解到是自己的亲表姑父，当时的省财政厅长兼华实公司总经理黄藻奇等用五万元贿赂赵恒惕派军队将黄、庞捕去杀害。便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与黄藻奇一伙的斗争。当时家里人和好心的亲友很担心，说：“你爸爸的职业是表姑父作的铺保，得罪了黄藻奇，全家的饭碗就靠不住了，你读书怎么办？”对此，向钧置之度外，他满腔义愤地说：“黄藻奇这样的亲戚，我们宁愿不要。①”他理直气壮地带领同学和群众追到北门外黄藻奇公馆，把黄、庞烈士的遗体抬入公馆内，将黄藻奇抓了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然后，他和群众还抬着黄、庞烈士的遗体，悲愤地在街头游行示威。

不久，向钧参加了支援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声援粤汉铁路岳阳机务段工人的卧轨斗争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罢工运动。经过多次严峻斗争的考验，向钧于一九二三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并担任了岳云中学党支部书记③。

①向明卿、向复回忆，存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据谢觉哉、张琼回忆，存平江县革命烈士传办公室。另据郑英所写《向钧传略》说向钧系1922年入党。

③陈新亮：《回忆向钧》，载《湖南青运史研究》1982年2期。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事业在湖南进展迅速，向钧经党组织批准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负责长沙北区学运和国民党长沙市一区六分部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将我党活动的联络地点设在分部驻地文昌阁甲种农业学校，对外用“易陆芬”名义通讯。他与当时的省学联主席和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田波扬密切合作。在这一年内，他们先后召开了二七惨案周年纪念会、列宁逝世追悼会、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五四、五七、五九雪耻会。他还邀请留法勤工俭学的肖子璋（肖三）到岳云中学作报告，广泛地发动校内外进步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向钧任市学联常委、省学联执行委员。湖南人民反基督教大同盟和反帝大同盟成立时，向钧负责宣传工作，并以长沙市北区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名义，协助工农学界负责人郭亮、夏曦、肖述凡、周以栗等部署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省城各界人民在省教育会坪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这时国民党中的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任家井成立了一个伪省党部，并用钱雇了一百多个流氓地痞来捣毁灵堂。向钧立即通知北区各校区分部所有国民党人，人手一根哑铃棒赶到教育会坪。向钧等率领一批学生纠察队，从两侧冲进教育会坪幻灯灵堂。这批雇用的流氓见势不妙，纷纷逃窜。接着，各团体、学校的队伍到了，追悼会照常进行。

一九二五年，湖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向钧即与省学联负责人段潇等在教育会坪召开学生和各界群众两万余人的大会。会上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省雪耻会”，向钧被选为委员。接着，游行队伍齐向小西门、大西门、沿河一带行

进。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顾正红烈士复仇”、“收回海关”等口号。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肖述凡和省委委员周以栗在江岸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任务。向钧受命迅即带领一批学生组成先头宣传队到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游行队伍在周以栗率领下赶到领事馆时，只见向钧正站在一堆木头上慷慨悲愤地向持枪的中国士兵宣传，劝其不要当看家狗，不做亡国奴，不要出卖中国人的良心。那天，日本领事馆的大小官员，耳闻目睹长沙市民的反日怒潮，慌忙将铁栏杆大门关得严严实实。铁栏杆南北两端都横布着木马铁丝网，阻止行人通过，四、五十个士兵持枪守护。大门内坪，朝外架着两挺机关枪，一个军官带领十来个士兵散在机关枪两旁，虎视眈眈，如临大敌。领事馆的围墙墙背上都嵌满了玻璃碎片。这时向钧带领着一批同学把堆在河岸边的杉树一根一根扛过来，架在围墙上。向钧领头，几十人一齐跟着翻过墙，冲进领事馆。他们奔到各个房间去搜查，赵恒惕派去担任所谓保卫的军官也不敢嚣张，只是口头劝阻。其时，日本领事馆的官员早已逃之夭夭。向钧组织同学们清查过后，便将日本人悬挂的太阳旗“唰”的一声扯下来，把一份显目的抗议书钉在旗杆上。顿时，群众的口号声和欢呼声震天动地，大家趁势撬开了木桩铁丝网。手持红绿彩色小旗的示威队伍，一齐涌过日本领事馆，浩浩荡荡经兴汉门进城，进行游行大示威^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长沙在反帝运动高潮中，发生了群众要求收回大金码头风潮。省学联特为此次斗争，于十八日午后四时，在省教育会幻灯场，召开代表委员会联席大会，讨论卖国

^①陈新宪：《回忆向钧烈士》，载《湖南青运史研究》1982年2期。

贼余思九盗租大金码头一案。当即推定向钧、田波扬等十二人为代表，向省长公署、省议会、省交涉司各处请愿。并提交大会议决了《严惩余思九》、《余盗租伪约无效》、《按前约预期收回大金码头》等项提案。在省学联和各界一致坚决斗争下，终于使大金码头主权得以收回。日商戴生昌在“退还大金码头之据约”中，无可奈何地哀叹：“大金码头，经群众一再运动，戴生昌公司知民气不可挡，未便再行租借。……自愿将该码头退还。”^①这一维持码头主权斗争的胜利，给了日资在湘势力以沉重打击。

一九二五年下学期，省教育司当局受赵恒惕指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仅兑泽、长郡两所中学就开除了省学联负责人曾三、段潇等三十多名进步学生，并将曾三等逮捕入狱。这时，担任市学联主席的向钧为此奔走呼号。他一面发动各校罢课抗议，一面组织全市五千学生游行示威。他率领游行队伍涌向省教育司，与教育司长颜方珪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直驳得颜方珪面红耳赤，无言答对，狼狈离去。向钧等十八名代表又赶到藩台衙门，向省长赵恒惕请愿。赵恒惕不肯出来，向钧送进去一封《哀的美敦书》^②限期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赵恒惕倒行逆施，反将向钧等代表扣留。并派一团武装包围教育司内的四千名学生。这更加激起了长沙市各界人士的公愤。徐特立、朱剑凡等教育界著名人士亲赴省长公署，要求保释被捕请愿学生。赵恒惕怕事态继续扩大，只好答应将十八名代表释放。向钧在被释放的当天，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召开学联会议，组织

^①1925年7月19日《大公报》。

^②向明卿回忆，存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在校同学发通电、印传单，揭露赵恒惕鼓吹湘省“自治”的假面具，撕毁“省宪”、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号召全省学生一致行动起来，同全省人民共同开展反对赵恒惕的斗争。

从残酷的斗争中，向钧认识到：“书本中的死文字，不能解救人民痛苦；要解救人民痛苦，必须实际行动”^①。为了求得人民的翻身解放，正临高中毕业的向钧，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投入了革命的实际斗争。此时，他仍以岳云中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青运和工运工作。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平江爆发了有名的“煤油案”事件，平江雪耻会为查禁平江英油商起油案组织了赴省请愿团。向钧代表省学联热情接待了吴创国等代表，详细了解了事件的始末。他对平江驻军团长李柱中枪伤查禁英油的学生民众十余人，并封闭县雪耻会、恫吓学生等暴行无比愤怒。当即要代表们以平江各界请愿团名义向省会进步报纸撰文，揭露事情真相，取得省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向钧还和学联其他负责人一道专门研究，组织声援。在向钧的积极参与下，湖南《大公报》连续登载了“平江英油起岸风潮”、“平江起油风潮愈闹愈大”、“平江县立师范中学全体罢课^②”等消息和评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于十二月六日下午，在省教育会坪主持召开了“平江起油案之长沙市民大会”，并议定向钧、杜修经等十人为请愿代表，全体整队到省署请愿。向钧向省署递交了请愿书。他提出了十项严正要求：惩办李团长；没收亚细亚公司洋

①《向钧传略》，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

②1925年12月6日湖南《大公报》。

油；非通商口岸，不许外人运货上岸；撤销平江戒严令；由县政府发给被伤人医药费；保护爱国运动；保护一切爱国团体；保护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释放被捕工人学生等。在省会各界民众的有力声援下，省署不得不派员前往平江查处。

一九二六年初，向钧参与领导长沙各界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赵斗争。赵恒惕在各方面的打击下，不得不于三月十二日向各界及唐生智等发表“去职通电”。

同年五月二日，叶开鑫军以“讨赤讨唐”名义进占了长沙，并自称“前敌总指挥”。他派兵占领学校，并下令搜捕青年学生，白色恐怖笼罩长沙城。向钧根据党的指示，隐蔽在敌人活动最猖獗的市区，机智地展开对敌斗争。将揭露叶开鑫暴行的传单，通过黄包车夫的帮助散发给市民群众，老百姓读了，人心大快；敌人见了，惶恐不安^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北伐军克宁乡，入长沙。湖南人民在长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北伐军大会。向钧被推选为长沙各界迎接北伐军筹备会宣传部主席，负责撰写消息，发行特刊，组织讲演^②。

同年八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向钧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大会。二十五日，向钧在大会上作了全省青年部工作的报告。报告分“学生运动”和“一般青年运动”两大部分，全面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青年运动^③。二十六日上

①陈新宪、向复回忆，存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②陈新宪、向复回忆及1926年7月16日至30日各期《大公报》。

③见1926年8月23日至29日《大公报》。

午，向钧担任大会执行主席^①。他极力支持通过的两项临时决议：一项是以省代表大会名义，向因赞助省港罢工而被反动势力谋害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致敬默哀；另一项是“援助衡山县农民协会案”，声援衡山县农协反对湘潭团防局勒索压迫农民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九月，向钧被派到衡山担任党的工作。他去之前，衡山已建有中共湘区直属特别支部。由于时间短，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对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向钧去后，首先抓了党的思想建设。他举办党员训练班，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件、决议和《响导》、《战士》、《中国青年》上的有关文章；灌输党的基本知识，并结合衡山斗争实际，深入开展讨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建立了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向钧当选为书记兼组织；陈新宪任工运兼宣传；贺尔康任农运兼青运；周淑良任妇运^②。

向钧和地委一班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在城镇乡村建立党的支部。还派遣优秀党员充任国民党特派员及农工特派员，到全县各乡镇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等革命活动。

为了保证地委机关的安全和便于党的秘密工作的发展，向钧将地委机关设在县城河边的康王庙，庙边陡河边还备有交通船，以防意外。用“冯迪”（即衡山地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衡地”的谐音）、“周智”（即组织部）作代号，与各地联系工作。

^①1926年8月23日至29日《大公报》。

^②衡山县农运史略及有关材料，存衡山县档案馆。

向钧经常到农村去做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找新党员个别谈话，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衡山党员由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二百多人。支部由原来的三个扩建到十四个，区、乡农协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①。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毛泽东来到衡山考察农民运动，在衡山城乡考察了十一二天，对衡山地委在区乡农协坚持贫农领导；对新党员和区乡基层干部及时开办短期训练班、办农运讲习所、妇运训练班；改编地主武装，建立工农武装；提祠产、庙产，兴办工人、农民夜校；普遍实施减租、减息、退押；开办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禁运粮食出境、限制粮价、进行平糶以及筹办区乡自治等工作表示赞许。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存在的某些问题，对衡山县监狱继续关押基层农会负责人，以致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的错误作法，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向钧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立即到县知事公署交涉释放被错抓的农会负责人。自此以后，向钧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加强了农运工作，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并大力发展梭标队。五一劳动节时，衡山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并检阅了工农武装。这时衡山县有组织的农民已达二十余万人，参加工会的工人约二万余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由先年冬的五千余人发展到二万余人，步枪由三百余支增加到八百余支，梭标队由五、六万人增加到十五、六万人，基本做到了每个青壮年农民有一支梭标。反动派对向钧恨之入骨，但也不得不承认：向钧“为人刚愎机智”、“共党组织自向钧一来衡，即猛烈的发展”，“全县农运虽穷乡僻壤，亦风起云

^①陈新亮等人回忆及衡山有关革命历史资料。

涌”^①。

向钧还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共青团的组织。他到衡山后就指派中共党员刘泽南以教员名义作掩护，组织衡山学联，指导学生运动，很快成立了共青团衡山特支，在柴桑洲、白果相继成立了两个团支部。一九二六年底，共青团员发展到三十余人。随即又成立了团的地方委员会，向钧兼任团地委书记。青年们在团组织教育培养下，很快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涌现了不少英雄人物。十六岁的李洁和十四岁的李广这两姐妹，在向钧的亲自培养下，从儿童团员成为共青团员。担任地下“小交通”，后来被反动派抓去。她俩宁死不屈，始终保守了党的机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钧义愤填膺，他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对策。四月二十一日衡山各界群众举行了反蒋大会。这天开会时突然下大雨，狂风大作，寒气袭人，到会群众，全然不顾，赤脚游行。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次日，上演十二幕大型话剧《蒋介石的反动》，民众争相观看，讨蒋之声不绝于耳。其时，县学联、妇联，共青团各界也都组织讲演队分赴四乡，痛斥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据当时《新衡山报》记载，此举“为我邑破天荒之第一次”。

四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钧作为湖南省的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会上，他极力赞成和拥护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的批评。

^①《衡山县农民运动史略》及国民党衡山清乡委员会编《共党祸衡纪实》，存衡山县档案馆。

向钧由武汉返湖南时，曾就便回平江省亲。至长沙时，适逢马日事变，即隐避近郊，参加了反攻长沙的部署。六月中旬，向钧绕道回到衡山。这时，驻衡山的反动军队也开始进犯衡山县城。向钧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严密布防。不料，担任城防的一个中队突然叛变。县委机关被迫撤离县城。当工农武装按原定计划向衡湘方向移动，准备参加再度反攻长沙的战斗时，向钧从两路口赶去，传达党的决定，要以衡山、湘潭、湘乡为活动中心，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在福田铺休整几天后，向钧派工农运负责人陈新宪和周树屏率领工人纠察队和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开赴岳北；贺尔康赴石湾领导河东的工农武装，控制石湾沿河一线；向钧和易克勋等以霞流冲为据点，联络凤仙庙、石桥、福田铺三处的力量开展斗争^①。

这时反动军队向我农村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向钧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当叛军从岳北方向攻来时，他率工农自卫军埋伏在天竹岭上，居高临下，待敌人爬上山腰，便以土枪和步枪加上磨石及松树炮予敌以重创，敌人狼狈逃往县城。战斗过后，向钧到岳北白果，召集参战人员总结经验。当获悉衡阳驻军换防的情报后，县委当即决定，将农民自卫军从白果撤回福田铺，昼夜赶造梭标武器，成立了以睦元勋、李鸿初为正副总指挥的纠察队，与宾冬生领导的石桥铺农民武装和岳北的农民自卫军合击攻城。这次扑城虽然失败了，但对反动派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上海《申报》都曾报道过“衡山暴徒首领刘爱农纠集农匪数千人扑城”^②的消息。

^①易礼容、陈新宪等人回忆及衡山有关革命史料，存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及衡山县档案馆。

^②陈新宪、刘爱农回忆，存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七月，湖南的反动派实行全面“清乡”，衡山、湘潭、湘乡三县的反动军队联合围攻我在岳北的工农武装。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党内一些人动摇；工农自卫军又缺乏军事训练，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向钧率领留在岳北的工农武装避实就虚，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于七月下旬转移到了南岳^①。

七月底，向钧奉命返长沙候任。他交待好工作后，乘煤船秘密回到长沙。他按秘密联络信号找到了地下省委，接受了新的派遣，前往湘潭恢复党的组织，领导湘潭的地下斗争。

湘潭是反革命“清剿”的重点，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前县委完全被破坏。向钧到湘潭后，白天隐蔽，晚上个别串连，终于联系到了一批散失的党员，恢复了县委机关；并在五桂堆等地设立了联络点；在易俗河、射埠等地恢复了党的支部^②。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向钧在改组后的省委中担任组织部长。八月底，他随毛泽东、彭公达、毛福轩到株州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事后，毛泽东去安源，向钧留在株州，负责领导株萍暴动。

向钧在株州附近的铁路工棚，多次召开会议，发动工人，部署起义。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爆发了。起义者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和株(州)、萍(乡)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十二日，向钧等在株州发动了武装起义，缴获敌人枪枝二十余支。这次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大批援兵赶至而遭失败。向钧等人被敌人包围，他机智敏捷地爬上屋顶，得以脱险^③。

^①陈新宪，〈回忆向钧烈士〉，存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②③}《湘潭人民革命斗争史》及陈永清等人回忆。

是年秋冬，湖南省委两度被敌人破坏。党中央先后派遣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来湖南组建省委。向钧参加了这两次组建省委的紧急会议，分别被选为省委农运部长和组织局负责人，并任湘鄂赣军委委员^①。十一月，向钧去湘西巡视工作，布置在邵阳等地举行年关暴动。

一九二七年冬的一天，向钧到长沙参加党的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向钧和六名与会同志一起被捕。在一次刑讯中，敌人惨无人道地把他的双手虎叉剪开，血流如注。向钧忍着剧痛，用反动派送来要他写自首书的笔、纸写出了一页页痛斥讨伐何键屠杀工农、摧残革命的檄文，指出：“现今工农大众一天天觉醒，革命力量一天天壮大，工农必定会站起来，革命一定会成功”^②。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向钧拖着重镣，被刽子手从湖南特别监狱里押了出来。途中，他大声向群众宣传革命！刽子手用刺刀刺破了他的嘴唇，向钧一边口喷鲜血，一边奋力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等口号^③，被敌人杀害在长沙教育会坪。就义时，年仅二十二岁。当时在长沙、平江一带农村坚持地下隐蔽斗争的杨开慧，抚慰了烈士的亲属。她对向钧的妈妈说：“弟弟是为党为人民而殉难的，我们不要难过，应感到自豪。”^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两次接见烈士的叔父向明卿和弟弟向三立，称赞向钧“是一个忠实能干的同志”。李维汉在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湖南省委文件及易礼容的回忆，存湖南省档案馆及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②③ 《向钧传略》，存中央组织部档案室。

④ 《杨开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特为烈士题词：“向钧同志是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模范党员”^①。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央档案馆编：《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4月版。
2. 向钧烈士档案资料，存平江县民政局。
3. 谢觉哉给向三立的回信，存向三立处。
4. 李维汉：《向钧烈士事略》（1954年）及给向自治的信，存向自治处。
5. 曾三、熊瑾汀、陈永清回忆向钧烈士，存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环保室及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6.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有关向钧的书信及注释。
7. 易礼容的多次回忆，存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院环保室及平江县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
8. 向复、向三立、向锡淳、向锡藏等人的回忆。
9. 访问刘爱农、张琼、朱端受、黄力沸、向愚、张忠廉等40余人的谈话记录。
10. 《平江县革命历史人物志》，存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
11. 《中央政治通讯》湖南秋收暴动专号（1927年10月27日），存湖南省档案馆。
12. 伍丹、罗迈、何资琛1927年给中央的信，存湖南省档案馆。
13. 《向钧烈士革命活动简况》，存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
14. 1924——1926年湖南《大公报》。

^①存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院环保室。

叶天底

邵水荣 宋镜人 陈华建

叶天底在我党初创时期参加革命，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第一批团员之一，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也是中共上虞县党组织的创建人。他不仅是我党早期政治活动家，也是二十年代较有影响的革命文艺战士。一九二八年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

(一)

叶天底，原名霖蔚，学名天瑞，又名天砥，一八九八年生于浙江省上虞县谢家桥。父叶翰芳，是落榜文人，曾在家乡教过书。叶天底有两兄一妹，他排行第三。

一九一五年，叶天底毕业于上虞县第一高等小学。同年秋，到上虞驿亭，在经子渊（亨颐）所创办的敬修小学补习。

一九一六年，叶天底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①。“一师”是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校长经亨颐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叶天底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①《杭一中校庆75周年纪念册》1983年5月。

一九二〇年二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杭州发生了著名的“一师学潮”，叶天底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三月二十八日，杭州学联理事长宣中华，发动学生四千余名，向省公署请愿，要求收回“驱逐经亨颐”的成命，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被师生一直视为安分守纪的叶天底，这时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飞快地冲到了示威队伍的前面，厉声责骂那些为当局充当狗腿子的帮凶。警察竟用枪托向叶天底脸上打去，叶天底被打得鼻青脸肿，满面鲜血，晕倒在地。同学们见状赶快把天底抬起来，送往安全的地方。叶天底稍一苏醒，嘴角虽然仍在淌血，但还昂首大声高呼：“打倒军阀！”^①

“一师学潮”后，经亨颐校长、陈望道先生被迫离职。这使天底更感愤慨，临毕业前一个学期决意离开学校。有的同学为他可惜，劝他等毕业后再去。他坚定地回答：“读书并不是专为文凭而读。”

一九二〇年暑假，叶天底去上海，由陈望道推荐，在一家印刷所校对《新青年》文稿，结识了正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沈玄庐。他和沈玄庐、陈望道等一起学习，一起作画题词，相处甚好。沈玄庐曾赠叶天底一幅《竹石画》，画意是一块大石头下，一支新笋，经历艰难，还是破土而出。陈望道在这幅画上题词：“石压笋，笋斜出，搬开大石头，新竹根根笔头直。”天底把此画作为座右铭，挂在书房，勉励自己应该象新笋那样不屈不挠地与反动势力斗争。在此期间，叶天底与陈独秀、邵力子、杨明斋等交往频繁，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组织青年，发

^①邵仁：《回忆叶天瑞同学》，1983年10月14日。

动青年，抓青年组织的创建工作。由陈独秀约集俞秀松、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办法。八月二十二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①。俞秀松、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和第一批团员。

一九二〇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在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叶天底主持团务^②。天底在此攻读俄语和马克思著作，思想认识大为提高。他认为中俄两国情况尽管有差异，然而中国的问题，也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解决，俄国人走过的革命道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

一九二一年春，叶天底获准与同乡王一飞赴苏学习，后叶天底因伤寒猝发，不能如愿。五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俞秀松和大部分团员离沪去苏俄，留在国内的团员思想比较复杂，信仰各有不同，对待实际工作，意见往往不一致，因此，团组织奉命暂时解散，叶天底因此回家养病。但他总是思念革命事业。这年夏天，叶天底曾给在沪的好友写信，信中说：

“我要在对我‘情长望远’的好朋友面前表白：‘堕落便

^①郑澆：《关于社青团成立的史实》，载《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②仿鲁：《清算陈独秀》，载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印行，存上海图书馆。

是心死’，我身不死，我心决不先死……。我昨天已经有信给望道先生和别的友人了，问几个共产党机关中有否缺人办事，倘若接到他们的信，说缺人办事，我立即要带着药罐去……。”^① 这年秋天，叶天底病体稍有好转，就在上虞第一小学任教。他向进步教师推荐《新青年》、《新潮》等书刊，在校积极推行新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日，上虞春晖中学正式开学，经亨颐出任校长。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②。该校音、美教师丰子恺外出缺勤时，叶天底常去代课。叶天底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课余饭后，常在校园里与学生玩耍聊天，用自己亲身在沪杭参加革命斗争事例讲给学生听，使青年学生首次听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

这年冬，叶天底和同事们在校外首次办起了农人夜校，组织附近农民学习文化^③。他每星期担任四课时的国语，结合农村生活的日常事例，向学生讲解谁养活谁的道理。一次，他要求学员解释《蚕妇》（宋·张俞）诗，学员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解释得生动准确，又有特色，叶天底很是高兴，联想到农民进校后文化和思想认识的提高，颇有感慨，特地撰写了《白马湖上伴农民读书半年》，记述了在湖上伴读半年之情景。一九六一年春晖中学四十周年校庆，胡愈之同志亲写贺

①叶天底：《处女》（影印件），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春晖中学60周年校庆纪念册》，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叶天底：《白马湖上伴农民读书半年》，载1923年5月1日第11期《春晖》，存上虞春晖中学图书馆。

信，信中热情颂赞叶天底，称赞他是上虞革命运动的点火人、引路人。他说：

“三十多年来，当中国革命还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在这个地方白马湖边上，有一位最可敬的英雄的革命青年，曾经艰苦地生活，静默地工作，散播最早的共产主义革命种子，并且为此付出他宝贵生命，这个就是上虞早期共产党员叶天底。现在他所散播的种子，早已开了灿烂的花，结了丰硕的果。”^①

（三）

叶天底“最心爱绘画一门”。他在“一师”受到象经亨颐、李叔同等许多长于词赋书画的师长谆谆教导，艺术才能得到很大发展。二十年代初，天底不倦地探索新文艺，学习中外艺术家的长处，吸收各种精华，撰写了不少论著，创作了许多作品。

在“一师”读书期间，由于经亨颐校长的开明学风，学校内艺术空气十分浓厚，这对叶天底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他除了在上课时如饥似渴地吸收艺术营养外，还积极参加“桐荫画会”和“乐石社”组织的艺术活动。创作了《江干船户》、《吴山民房》和《葡萄》等优美作品。他创作的三幅西洋画，一九二四年元旦在上海画展会上展出，曾博得中外画家的赞赏^②。

①胡愈之：《春晖中学四十周年校庆纪念》，1961年11月14日。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东方艺术研究会绘画展览会记略》，载1924年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叶天底在文学方面素有修养，他的文学作品，笔调幽默诙谐，旗帜鲜明，发扬了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精神。他在《民国日报》附刊《觉悟》和《小说日报》、《妇女评论》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曾辑成《处女》出版^①。后还陆续发表过《秋夜》、《日本大地震》、《黄海之夜》、《乡下》等。通过典型塑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唤醒民众，推进反帝反封建运动。

一九二三年秋，叶天底由陈望道介绍在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从事艺术研究。该会是上海研究画学的唯一机关，由日本东京国立美术大学毕业的周勤豪和经历欧洲各国考察美术的陈晓江主持。这个研究会在《民国日报》开辟附刊《艺术评论》，以联络海内外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共同探讨艺术和艺术教育。叶天底任《艺术评论》编辑^②，为这一栏目撰写了不少艺术评论文章。他的这些艺术评论文章，对青年一代冲破思想禁锢，开拓革新，吸收西方民族文化的精华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

叶天底在东方艺术研究会工作期间，经常去上海大学听课并参加一些活动。他在陈望道的帮助教育下，结识了邵力子、瞿秋白、罗亦农、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员。在这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知识，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

①叶天底：《处女》目录，1921年5月31日（影印件）。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杨赓德：《回忆叶天底同志》，1961年3月25日，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斗终身的远大理想。一九二三年底，由瞿秋白和恽代英介绍，叶天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四年七月，叶天底去乐益女中任教，授国文、图画两科^②。当时苏州还没有中共党的组织，只有个别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活动。叶天底按照上级组织指示，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参加社会活动。

在学校教学中，叶天底向师生们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情况，推荐《向导》、《觉悟》等进步书刊，还经常举行演讲会。叶天底在演讲会上，曾作了题为《九七与五卅》的讲话，激励青年学生为解除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而奋斗；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教育学生热爱祖国，抵制日货。课余，他去苏州铁机厂、丝织厂，组织工人上夜校学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努力奋斗。

同年冬，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各地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而苏州国民党内对此尚存观望态度。叶天底和许金元等人，联络发动苏州国民党内中左派，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召开了苏州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邀请恽代英到会作演讲，有力推动了苏州民主运动的发展^③。同时，叶天底又筹建了苏州非基督教同盟支部，自任宣传委员。亲自到苏州街头巷尾散发通俗

①钱念先：《忆大革命时期叶天底同志在上虞建党的情况》，1962年5月9日。

②《乐益女中之新猷》，载1924年7月15日上海《民国月报》第7版“苏州新闻”；胡山源：《叶天底在苏州活动情况》，1983年10月4日。

③《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消息》，载1925年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

宣言，分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苏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起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叶天底、陆秋心等九人为筹备委员。四月四日，在苏州体育场举行孙中山追悼会，恽代英发表演说。苏州另一个进步民众团体壬戌友谊社召开孙中山追悼会，叶天底到会发表演说，深切哀悼国共两党合作的典范——孙中山先生^②。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恽代英从上海到苏州，与叶天底商议支援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五月三十一日，叶天底先在乐益女中召开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大会，后去苏州青年会会址召开会议，具体研究集会游行事宜。同时，他陪同恽代英等人到知名人士家中走访，发起成立“苏州各界联合会”，领导全城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六月二日，发动了苏州各团体三千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再次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并发动各界募捐，支援上海被害工人。会后，他发动青年学生，分批前往车站、码头、剧院宣传和募捐活动。叶天底还组织乐益女中学生募捐演出。为了保证演出的及时进行，叶天底日以继夜地赶画布景，双眼都熬出了血丝。三天募捐演出，场场暴满，尤以《昭君出塞》、《红拂传》和张闻天辅导排演的《虬髯客传》轰动全市。上海《申报》报导：支援上海工人，组织募捐，苏州乐益女中成绩最佳。

同年暑假，著名革命活动家侯绍裘，应聘去乐益女中任校

①许金元：《苏州的非基督教运动》，载1925年1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苏州各团体发起之孙中山先生追悼会》，载1925年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务主任，中共上海区委鉴于苏州建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则委派侯绍裘在苏州建立党的组织。为此，侯绍裘邀请中共党员张闻天、王芝九和团员张世瑜、徐诚美以及侯绍裘的弟弟侯绍伦（砚圃）同赴乐益女中任教。九月初，侯绍裘在乐益女中秘密主持建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直属上海区委领导，叶天底为独支书记。这是苏州第一个中共党的组织。

中共苏州独支建立后，在叶天底主持下，组织党员和具有一定觉悟的优秀分子学习《资本论浅说》、《共产主义ABC》等理论书籍，并讨论了乐益女中的办学方针，决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党组织通过王芝九、沈晓云等联络各校，成立苏州学生联合会，还逐步建立和发展了青年团、学生会、工会和妇联等组织，发动各阶层的群众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在实际斗争中，党支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吸收了四名工人、五名教师、二名学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侯绍裘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新的苏州市党部，由许金元任常务委员，叶天底为委员^①。新党部成立后，团结各界人士，进一步推进了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

苏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他们指责乐益女中“赤化”。在反动势力的威迫下，乐益女中校长张冀庸极为害怕，借口学校经济困难，于一九二六年春宣布学校停办。原在乐益女中任教的外地教师侯绍裘、叶天底、张闻天、徐诚美等不得不离苏赴沪。但是以侯绍裘、叶天底建立起来的

^① 《苏州三十年大事表》，苏州档案卷号 53。

苏州党组织却在以后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壮大，成为领导苏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①。

（五）

一九二六年春天，叶天底由于病魔缠身，经党组织再三劝说，不得不放弃了上海繁重的工作，离沪返乡养病^②。临行时，党组织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养好病；二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

叶天底回乡后，在写给胡愈之的信中说：“我虽在病中，而在可能范围内，不为社会做点事情也有些自愧。”于是当他身体稍有好转，便在谢家桥镇上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自编自教，连所需的经费都是他自己出的。后应上虞县教育会聘请，主编《教育月刊》。在这本铅印的小册子上，他先后发表了《苏俄国家的教育》、《九七纪念在国民教育上的重要与青年教育者应有的新觉悟》等文章，激励青年教师团结起来，谋求现代生活问题的根本解决。

叶天底通过艰苦的工作，很快就在上虞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并为上虞县的建党工作打下了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六日，在上虞谢家桥，叶天底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共上虞县直属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四项决议：1. 建立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2. 开展农运，成立农民赤卫军；3. 改组县警队

^①薛晞申、肖斌如等：《侯绍裘》，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152页。

^②《叶天底给愈之先生的信》，连载1926年10月12、15日《上虞声》。

为工农纠察队；4. 争取国民党左派，发展共产党员^①。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

同年秋天，叶天底到前江民强小学、春晖中学、百官小学和谢塘小学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区分部。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全县建立了十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发展国民党员一百余名。十二月十九日，在县城明伦堂召开全县国民党党员大会，成立了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叶天底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叶天底兼任农工部部长^②。

这年冬，全县各地农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县城西南门外西溪湖和松厦等地还发展了农民武装。叶天底的舅父俞恒山，是个恶贯满盈的土豪，当地百姓都叫他“东门老虎”。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兄弟站出来参加斗争，激发更多的人投身到农民运动中来，叶天底大义灭亲，首先在丰惠县城召开斗争俞恒山的大会。这一行动，县城东郊农民无不拍手叫好，叶天底也更加受到了农民兄弟的衷心爱戴。

一九二七年初，中共上虞支部根据国民党县党部建立后的形势，研究了加强农民武装的问题。在三月间召开的县党部执委会会议上，叶天底提出，要改组县警队，成立工农纠察队，并提出领导人选，要求派一些共产党员充实工农纠察队。叶天底的提议，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县长的反对，辩论了三天仍无结局。会后，叶天底和支部成员分头向国民党党部各执委做工作。在第二次执委会议上，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提议，并获得

①钱念先：《忆大革命时期叶天底在上虞建党活动的情况》，1962年5月9日，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上虞县临时县党部开成立会》，载《上虞声》，1926年12月21日，存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

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批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局势急剧逆转，右派势力抬头，反动商会会长刘介安纠集一批地痞流氓和受蒙蔽的群众，妄图火烧县党部，进攻纠察队，杀害叶天底。叶天底不顾个人安危，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作出决定：镇压暴乱，埋藏武器，分散隐蔽。当时，叶天底重病在身，农友们连夜用轿子把他抬到山里隐蔽起来。右派势力几次派兵追捕，由于农民的精心的掩护，全都扑空。然而上虞的党组织被破坏了。

同年五月初，叶天底秘密前往杭州，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新委任的上虞党务指导员郑师泉（左派）的同情和支持，与钱念先等四人先后回上虞，秘密重建党支部^①。他们以上虞城里的义务小学为中心，成立了石榴社，出版《石榴报》。并秘密组织农会，取出了埋藏的武器，建立了武装队伍，上虞的农运又有所恢复，上虞的革命活动又逐步活跃起来。

八月间，叶天底接到绍兴党组织化名为“源人”的来信，通知他去绍兴参加九县联席会议。这次九县联席会议主要内容是：积极开展“二五”减租，恢复农民武装，准备秋收暴动。叶天底回到上虞后，根据会议精神，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相应决定：训练农民自卫队，成立渔民友谊社，创办《星期周刊》。十月下旬，全县二千七百余农民集合在县城运动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实行“二五”减租。经过一天的说理斗争，于当日下午七时，迫使县长方赞修签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①钱念先：《忆大革命时期叶天底在上虞建党的情况》，1962年5月9日。

十一月，中共浙江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进行浙东大暴动，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消灭反动武装^①。叶天底带病与党支部同志研究，决定分头发动农民，组织人员，调配武装力量，制订行动路线，待命行动。但暴动计划被敌人探悉，叶天底于十一月十二日在上虞被捕，不久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②。

在陆军监狱，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问，他毫不妥协。敌人劝他说：“只要你在自首书上签一个字，就可释放。”他说：“要我签一个字？我宁可死！”敌人又降低要求说：“只要讲一句‘我以前走错路了’，就可放你。”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天底走的是光明正大的道路！没有错！”敌人又利用叶天底在“一师”的一个同学来劝降，结果也被他训斥了一顿。敌人没有办法了，抛出了软化他的最后一招——“监外就医”。叶天底识破了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对亲友说：“天底相信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现在因患病被敌人抓住。我遗憾的只是我替党做事太少了。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预备好。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③敌人的最后一招也失灵了，叶天底又被关进了牢房。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叶天底预料敌人将要对他下毒手了，他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决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但我最放心不下母亲，希望你代我尽责，扶

①《浙东暴动计划》，转载浙江《象山党史资料》1983年第1期。

②《铲共丛论》，第139页，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编印。存浙江省档案馆。

③万正：《不朽的人》（影印件）。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养母亲。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①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二月八日拂晓，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刑场上。一起就义的还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等共产党员^②。

^①《叶天底给哥哥的信》，1928年2月3日，存上虞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28年2月10日《上海时报》。

唐 鉴

吕芳文 吕九林

唐鉴，又名才儒，字士衡，小字秀光；一九〇三年十月一日，出生在湖南省宁远县保安乡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家有薄田六亩，靠父亲唐其玉苦心耕耘，勉强维持全家生活。

唐鉴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大哥才俊随父务农。二哥才杰毕业于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三哥才佳比唐鉴大五岁，从小念书。一九一四年初，十一岁的唐鉴随其二哥在李宅相村发蒙。一九一九年毕业于竞化（现禾亭）高级小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念书的三哥假期回乡，向家人叙述三师进步师生开展反帝爱国活动的情景。唐鉴听后深受教育和鼓舞，立下“求知学识、救国救民”^①的志向。一九二〇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②。

唐鉴就学第三师范后，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思想豁然开朗，开始关心社会问题，注意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书社第三师范新书报贩卖部和星期讲演会的活动。一九二一年春，三师组织了革命团体“心社”，接着成立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唐鉴在蒋先云、贺恕、黄静源等的帮助下，积极参

^{①②}宁远县保安乡上古溪《唐氏族谱》（1938年），存中共宁远县委党史办公室。

加“心社”活动，并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年冬，毛泽东在第三师范培养和发展的蒋先云、黄静源等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在湘南地区最早的基层组织——中共湖南三师支部。恽代英、毛泽东、何叔衡、邓中夏等先后到第三师范讲演，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唐鉴每次参加听讲，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一九二二年夏，陈独秀派张秋人到第三师范负责地下党团工作，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唐鉴是其中之一。唐鉴入党以后，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认真完成党团组织交给的任务。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他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冬初骤寒的早晨》和《深夜钟声》两首诗，以爱憎分明的感情，对“重披羊裘”，吃“山珍”、“热酒”的“富贵人们”，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对“穿着薄旧棉袄”，“缩着头、弯着腰、袖着手”的穷人，寄以无限同情。他以“深夜钟声”为号召，“唤醒人们见光明”，迎接“普天光明境”^①。唐鉴为了学好救国救民的本领，认真攻读文化科学知识，以热心社会活动和学业成绩优良取得同学们的信任，被大家推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干事，还先后担任《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和《湘南学生》主编。

一九二三年春，继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之后，唐鉴与袁痴、罗严、黄静源、唐朝英等，领导同学开展了一次反压迫、要民主，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他们起草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革新校务宣言》，控诉刘志远压制民主、任用亲信、克扣学生伙食等罪行。唐鉴等五十多名同学因此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反动当局的这一恶劣行径，激发了同学们

^① 《唐鉴烈士资料》，存衡阳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陈列馆。

的革命怒火。唐鉴等同学在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下，分批组织学生请愿团，乘船赴长沙，向省政府教育司请愿，进行绝食斗争。请愿团的正义行动，得到了长沙各校的支援。团省委和省学联负责人夏明翰、夏曦召集省学联紧急会议，通电全省大中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举行总罢课，声援第三师范学生的“驱刘”斗争。教育司司长李剑农慑于学生的威力，终于答应了第三师范学生请愿团的要求，更换了第三师范校长，给被开除学籍的五十三名学生分别复学或转学^①。

“驱刘”学潮胜利后，唐鉴于一九二三年下学期，转学到长沙岳云中学。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每学期均名列前茅，学校免收他的学膳杂费，校长和教师都很喜爱他。

一九二四年夏，唐鉴在岳云中学毕业，旋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在这里，他对于世界各国历史书籍无所不阅，尤其关心近代的历史。为了研读和理解《资本论》中的数理公式，他一改重文轻理的观点，刻苦学习代数知识。在一本《算学解释法》上，他写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是书浅近，入手方针。行远自迩，穷干先根。茫茫数学，理极精深。宇宙事物，藉数而明”^②在南京期间，唐鉴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学运活动。在实践斗争中，他表现有胆有识，依靠群众，埋头苦干，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干事。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以学界总代表身份到处奔走呼号，声援上海工人爱国运动。他在《中国学生》等进步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师生合作》、《赵恒惕倒了》、《读书呢，革命呢？》、《斥醒

① 《三师学运资料》，存衡阳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陈列馆。

② 原书存衡阳市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陈列馆。

狮报破坏全国学生运动之谬论》等文章。他指出：“赵恒惕之倒，证明反动势力之崩溃已在目前。”“只有打倒现政府，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有读书的机会”。他还批驳了“醒狮派”及其《醒狮周报》诬说学生运动“赤化”、“过激”、“共产党操纵”的谎言，指出：“舍了‘强权’不抗，‘国贼’不除”的“醒狮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号召大家“不要为他们美丽的面孔所迷”，要“重新抖擞反帝国主义的精神”，“投身国民革命”^①。

一九二六年初，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武装镇压、政治陷害和金钱诱惑之下，学生爱国运动受到了挫折，部分学校的学生会遭到破坏，有的学生悲观失望，退出学生会。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卑鄙伎俩，启迪学生的觉悟，唐鉴以鉴君笔名，在《中国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学潮失败以后》、《消灭学生运动的三个口号》、《禁止学生爱国运动之新方式》、《野性的学生》等文章，总结学潮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赤化”、“过激”、“受人利用”是“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消灭学生运动的三个口号”，是“他们离间学生感情、延长自己寿命的符咒”；我们“只有勇猛的向前冲锋”，“加入国民革命的大队伍里去，联合工农群众，组织强固的革命营垒，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扑灭反动分子”，“才是学生运动唯一的出路”^②。五卅惨案发生一周年之际，他又在《中国学生》上发表了《五卅运动之失败和成功》一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

^{①②}《中国学生》第32、33、34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

验，指出“全国民众应不分彼此，不论党派”，“形成全国一致的反帝国主义伟大的联合阵线，奔向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①。

唐鉴在参加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斗争中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一九二六年夏，他被推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干事。这时，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全国学联总会为了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确定新形势下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政策，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召开了筹备第八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的会议，决定唐鉴、李硕勋、刘昌权三人赴粤主持筹备工作。唐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李硕勋、刘昌权于七月初到达广州。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支持下，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大会的筹备工作，到各大、中学校调查学生运动情况，起草大会工作报告、决议和宣言，在近一个月的紧张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筹备任务。

七月二十三日，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广东大学胜利举行。唐鉴在大会上作了《一年来宣传工作之概况》和《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使命》两个报告^②。他在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情况，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反帝斗争的形势，确定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政治任务。报告指出，自五卅以来，全国人民虽一致努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但仍未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全国学生“要继续‘五卅’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的精神”，“积极参加民众一切的运动”，“任何派别的学生都应一致在共同要求之下，同心同德，向共同的敌人进攻，以期求得胜利”。他大声疾呼，要

^{①②}《中国学生》第33、34期。

“危舟共济，同仇敌忾，以求共同铲除共同之敌人”，“完成中国学生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本身解放运动历史上之使命”。唐鉴的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他所提出的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七项使命，经代表讨论通过，全部纳入了大会决议：《总结一年来会务总报告决议案》、《统一学生运动决议案》、《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文化运动决议案》、《拥护民族利益决议案》、《反对反动军阀决议案》、《学生在校及假期中实际活动决议案》。这些决议案，“引导全国学生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使全国学生运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唐鉴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编辑部常务委员。

大会结束后，唐鉴先到长沙、杭州等地，宣传大会决议，整顿学联组织；后到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协同总务部常务委员林肃夫领导全国学生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肆意镇压学生和民众的爱国运动。九月初，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万县惨案”发生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通告各地学联和民众，举行反英运动周。十月三日，学联总会第二次召集上海各分团联席会议，商量反英事宜。英帝的走卒、军阀孙传芳闻讯，派出二十多名武装警探，悍然闯进学联总会，拘捕了在场的学联总会代表和职员十八人。唐鉴因公外出返回会所时，见探警正在会所搜索，急速返身，机智地逃脱了追捕。两天后，军阀又封闭了会所。唐鉴面对会所被封，总会负责人除自己以外全部被捕的严峻局面，没有气馁，继续英勇顽强地进行斗争。他立即在法租界找到了办公地点，聘请两人帮忙，从事总会会务工作。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他以总会名义，致电孙传芳，请其释放被捕代表及职

员；他还致函上海商学工各分团及社会名流，请求援助；同时通电全国各省学联和民众，申述孙传芳受英帝指使摧残爱国学生运动情况，表示总会“誓与黑暗奋斗到底”的决心。各地接到电函后，异常愤慨，纷纷要求孙传芳启封总会和释放代表。孙传芳慑于全国人民的义愤，于十月十二日释放了总会代表和职员。唐鉴旋即撰写《总会被封纪实》^①一文，揭露英帝和军阀摧残总会真相，号召民众“努力打倒孙传芳”、“打倒帝国主义”！

十一月中旬，唐鉴署名君健，在《中国学生》上发表《军阀统治下之中国学生》，数列了“教育经费无着落”、“教育内容反动”、“校舍被封”、“学生被捕，无罪被戮”等惨景，指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学生，是一大群狱中戴着锁枷的苦囚”，是“将赴刑场的死囚”。我们“只有高举反抗之旗，大家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打倒军阀”，“才是我们的出路”^②。

一九二七年春，全国学联总会在上海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唐鉴赴鄂调查，拟将总会迁鄂办公。

二月二十日，唐鉴风尘仆仆到达武汉，受到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汉口《民国日报》接连两天刊登他赴鄂的消息。湖北省学联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数百人参加的大会，欢迎唐鉴赴鄂视察学生运动，欢迎全国学联总会迁鄂。唐鉴下船后就前往武昌、汉口、汉阳学联和大、中学校学生会视察，详细了解学生运动的情况，征求总会迁鄂的意见。第二天，他分别拜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264—267页。

② 《中国学生》第32、33、34期。

访了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武汉市党部和市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团体，向各团体传达了上海工人罢工、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情况，敦促各革命团体声援上海工人运动^①。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事学生运动，整顿和改组湖北省学联组织。三月十日，唐鉴在武昌大朝街武昌学联内建立了全国学联总会驻鄂办事处。翌日，湖北省学联在武昌首义公园召集武汉学习大会，热烈庆祝全国学联办事处开始办公。唐鉴向到会的学生发表讲话，要求大家既要刻苦学习，又要积极投入国民革命运动。当蒋介石在江西捣毁南昌、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学联会等团体的消息传到武汉后，唐鉴立即到湖北省学联商量对策。省学联、武昌学院、中山大学等学联纷纷通电质问蒋介石，“誓与反对工农运动而危及革命的蒋总司令奋斗，以保障革命的胜利。”^②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全国学联于三月十八日召开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同意唐鉴的意见，决定总会迁鄂。三月三十一日，全国学联在鄂召开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唐鉴介绍筹备工作情况，提出了新形势下学联的任务，并决定全国学联于四月一日在武昌正式办公。这天下午，唐鉴在武汉各团体代表庆祝全国学联总会迁鄂办公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学联的新任务：“一，到军队去，宣传军队，使之成为民众的军队；二，到农村去，使全国工农组织起来，打倒封建势力的基础。”^③

在以唐鉴为首的全国学联总会的直接领导下，湖北学生运

^①1927年2月10日、2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2月25日，3月10日、23日、26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3月28日、31日，4月1日汉口《民国日报》。

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全省共有四十个学生会，参加学生会的学生达六万多人。重庆惨案发生后，唐鉴在全国学联会上声援重庆反英爱国运动，再次号召学生到军队去，到农村去，组织工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湖北各级学生会和童子团纷纷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为“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基础，达到中国民族之自由平等，进而打倒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之完成”^①而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反动军阀也蠢蠢欲动，形势越来越紧张。四月二十一日，全国学联总会举行第三十次常务会议，决定唐鉴为总务部常务委员，包泽英、郑鼎勋、胡业崇等分别为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常务委员。五月四日，唐鉴出席了湖北省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武装起来，到农村去，打倒新军阀蒋介石”^②的口号。第二天，他参加了省学联在首义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以农工为革命的基础”，“打倒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达到大同的共产社会。”在这段时间里，唐鉴除经常参加各级学联召开的会议，大造反帝反封建的舆论外，还以全国学联的名义召开各种招待会、纪念会，发出各种通告和告全国学生和民众书，号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亲日媚外的蒋介石！”“争取工农解放！”^③

五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于湖北的宜昌和湖南的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派叶挺部及中央军校武力进剿夏斗寅叛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唐鉴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朝夕奔忙，废寝忘食。他以全国学联的名

^{①②③}1927年4月2日、12日、21日，5月4日、5日、9日汉口《民国日报》。

义，通电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同时，组织学生慰问队慰问伤员，通知北伐战争区域内的各省学联“应竭力尽慰护之责”。当叶挺部和中央独立师的伤员撤到武汉时，唐鉴同省学联的负责同志率领慰问队携带饼干、毡毯、毛巾、茶壶等慰问品，前往医院慰问，鼓励伤员为国效力^①。

继长沙“马日事变”后，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冯玉祥在河南附蒋反共。革命中心武汉，已被反革命势力四面包围。唐鉴在这险恶的形势下，领导全国学联总会接二连三地通电各省学联，指出“南蒋北张，同为民众的仇人，若不一律铲除，终成巨患，深望痛加挞伐，鸣鼓而攻。”^②

六月二十日，唐鉴参加了中央青年部召开的经常宣传委员会成员会议。会议决定由他负责起草《宣传工作要点》和做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唐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当晚，唐鉴在“普海春”举行全国学联总会招待新闻记者大会，做了专题讲话，希望各报多登学生工作通讯，多做反蒋反帝的宣传。为了做好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六月二十八日，唐鉴主持召开全国学联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具体研究了筹备事宜。唐鉴因忙于中央青年部交给的任务，提出由林隶夫负责筹备工作。会议同意他的提议，决定林隶夫为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处主任。七月初，当参加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各省学联代表到达武汉后，唐鉴主持召开欢迎大会，向代表们介绍了湖北学生运动情况，阐述了反帝反蒋的意义。七月十五日，全国学联总会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礼堂，召开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时值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时局非常混

^{①②}1927年5月22日、26日，6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

乱。唐鉴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团结同志，战胜阻力，使会议按计划进行。大会开了六天，他到会做了热情洋溢地讲话。

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共组织派唐鉴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①。当时，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共合作已彻底破裂，党团工作已转入地下。他接到组织调令后，立即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和爱人李绶玄从武昌搬到汉口三道街，以商人身份租了一套房子，从事地下工作。为了协助唐鉴工作，组织上还派了一位武汉籍的共青团员吴丽珊，以佣人身份与唐鉴夫妇住在一起。他认真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暴动。

长期辛苦的工作，唐鉴白皙的四方脸开始变黑，戴着眼镜的眼窝凹得很深。李绶玄见他逐渐消瘦，经常含泪劝慰，要他注意身体。他总是委婉地宽慰爱人，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会注意的。”当时，唐鉴的处境确实很困难。国民党特务已对他盯梢。为了唐鉴的安全，组织上要他从三道街搬到一元路。他在一元路住了五天，又搬到四维路。形势越紧张，他越坚定沉着。他已做好了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武汉暴动失败后，他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参与制订年关暴动计划。会后，他连夜召开共青团省委会议，组织团员参加暴动队。后因暴动计划失密而未实现^②。

一九二八年初，中共中央调夏明翰到武汉，支持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开展工作。三月下旬，夏明翰因叛徒出卖被捕牺

① 《列宁青年》第1卷第2期，1928年10月31日出版，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

② 陆定一、吴丽珊等人的回忆文章和访问座谈记录。

牲。当时，武汉国民党当局每天要杀害数十名至上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有人劝唐鉴暂时转移农村，他坚定地回答：“我不能离开武汉，要为烈士报仇。”是年四月十六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唐鉴在汉口刘家庙秘密举行团省委扩大会议，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研究新的暴动计划。由于联络员被捕叛变，唐鉴等十九名团省委负责人被捕入狱。

唐鉴在狱中，与难友谈笑取乐，态度从容。国民党当局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要他投降。他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道：“你们是军阀的走狗，我肯做军阀走狗的走狗么？”敌人请他喝酒，许以厚禄高官，要他供出同志的所在。他一手把酒桌推翻，激昂慷慨地说：“我就是唐鉴，你要枪毙快点枪毙，不要絮絮叨叨的多话。”^①刽子手恼羞成怒，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坚贞不渝。

四月三十日（农历二月三十日），唐鉴被敌人绑赴汉口刑场。经过女监时，他见怀孕的爱人李绶玄悲泣不止，便从容地笑着与爱妻道别，并顺手书以“继续奋斗”四字赠之。然后他傲然向刑场走去，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苏维埃万岁！”声音悲壮激昂，旁观者皆为泪下。牺牲时，唐鉴年仅二十五岁。

唐鉴宁死不屈、光荣就义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全省团员青年为之悲恸。当年十月，陆定一在《列宁青年》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唐鉴同志的死》一文，沉痛地悼念唐鉴烈士。他写道：“唐鉴同志英勇的死了，他的遗嘱永远萦绕在每个革命青年的脑子中：‘继续奋斗’！”

^① 《列宁青年》第1卷第2期。

张 昆 弟

唐 义 方 各

(一)

张昆弟，号芝圃。一八九四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湖南省桃江县板溪乡一个农民家庭^①。他五岁死了母亲，十三岁时父亲也不幸病故了，以后和祖母和叔父一块生活。张昆弟七岁进入私塾读书，五年念完了《四书》、《诗经》和《春秋》。十三岁（一九〇七年）考入离家八十华里的益阳龙洲书院（旧制高小），在这里学习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初步打下了近代文化知识基础。一九一三年到长沙，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张昆弟在一师学习了五年，对他的成长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五年。当时的第一师范，不仅学习条件好，拥有杨昌济、方维夏、徐特立等一批学识渊博的教师，而且不收学宿膳费。他利用这里的良好学习环境，珍惜分秒，发愤读书，以极大的兴趣钻研文学、哲学和历史。遇有喜爱的文章，总是整段

^①张氏六修族谱载：贻于长子昆弟，号芝圃，清道光二十年甲午正月十二酉时生，即公元1894年3月18日。

摘录下来，并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在读书笔记上。在张昆弟家里保存的一本五万余字的笔记中，全部是抄摘《庄子》、王船山的《史论》、《新青年》里陈独秀的文章，并夹有评论一百多条^①。例如他批判宗教，认为“宗教是世间极不平等、不自由、不自主的障碍物”。在课堂之外，他以虚心诚恳的态度，经常聆听杨昌济先生讲治学和处世之道。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九月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十三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九月八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工夫多，存养之工夫太少，须从存养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九月十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吾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②由于他学习勤勉，功课、品德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和同学的爱戴。“在学校内部举行人物互选时，全校十一个班学生共四百余人中，毛泽东票数最多，张昆弟第四名”^③。

张昆弟在第一师范求学，非常重视与朋友的交往，经常和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瓚一批志向远大的同学静读“君子亭”、漫游“岳麓山”，研究学习，锻炼身体，探讨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写了这样一篇日记：“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近黄昏，遂宿如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

①张昆弟读书笔记，1984年12月由桃江县委党史办公室送交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②张昆弟在湖南读书时所写日记，原件存湖南省博物馆。

③肖三：《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55页。

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十一句钟矣”。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使张昆弟无限敬佩，奉为师友，在道德、学问上努力向他们看齐。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读友人日记，令人愧惭交集，何人之日异而月不同，道德、学问蒸蒸日上之势。而吾则不见其进，若或有退焉。振汝筋骨，奋汝雄心，冲决汝一切魔障，向前追进，大呼无畏，大呼猛进，为汝作先锋队焉。”^①激励自己向前追进。

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把这班志同道合的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讨论，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社会要改造，自己要进步，非组织一个团体不可。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下，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便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刘家台子蔡和森家的“沔痴寄庐”成立了，这是在湖南最早建立的倾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张昆弟参与了新民学会的创建工作，是这个学会的重要活动骨干之一。

一九一八年六月，张昆弟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找到

^①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第144—145页。

实现新民学会宗旨的道路，他没有回家，遂同毛泽东、蔡和森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自修。他们“吃的是蚕豆拌米饭，还要自己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①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一面进行自修作业，一面进行“新村生活”尝试。走遍了岳麓山下的小镇、村庄，试图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那种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不久，他们发现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快放弃了这种打算。正在他们重新探讨民族前途和国家出路的时候，已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告知他们，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便在第一师范附设小学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友会，着手在湖南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张昆弟对这种既工作、又求学的办法极表欢迎，决定实践“会友向外发展”的方针，最早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行列。

(二)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偕同张昆弟、罗学瓚等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二十余人到达北京。当时，华法教育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还不能马上赴法，张昆弟经杨昌济先生协助，被介绍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补习了一年法语。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张昆弟和李维汉、李富春等一百六十二名学生，乘坐“宝勒笱”号法轮由上海赴法，经过三十六天航海旅行，于十二月七日抵达法国马赛^②。当时的法

^①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第92页。

^②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史料》。

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萧条，失业严重，那时已来法的学生，大都找不到工作，又无钱进学校，处境十分凄苦。初到法国的张昆弟，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和大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他花了很大气力，已在法国北部的香拜尼找了一家工厂做工，“日得十余佛郎，工余可读书二、三小时”。但为使全体勤工俭学学生都能工读，他多次与李维汉、罗学瓚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系，发起在留法学生中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当时，他们组织这个团体的目的，是“为了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互相勉励，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以及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通过一个多月的联络和筹备，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了成立大会，张昆弟被选为干事会的负责人之一^①。自此，他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挤出时间阅读法国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使他的思想渐渐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化。同时，他还深入法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与工人的广泛接触，更加缩短了这种转变的过程。他在《法国北海岸之华工》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出路在哪里？他指出：“工人要想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想别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推翻不可。……工资增加于工人，毫无益处，因为工资增加，是随物价增加的。你增加工资，他把物价越增贵，结果还

^① 《〈工学世界社〉简介》，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3期。

是资本家得利处。”这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见解，是他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与此同时，他与李维汉等在蔡和森的影响和帮助下，完成了“工学励进会”的改组，基本澄清了这个组织中的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九二〇年八月，“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蒙达尼召开了第一次年会，讨论和修改社的宗旨。张昆弟、罗学瓚等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和森在会上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对社友中出现的革命和改良两种主张，做了理论上的分析与批判。在激烈的辩论中，张昆弟旗帜鲜明地赞同蔡和森“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①使得那些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社友转变了认识，懂得“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②使“工学世界社”的宗旨，实现了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

张昆弟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还参加和领导了“工学世界社”及勤工俭学学生进行的三次重要斗争。这些斗争一是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的请愿斗争；二是同年七月，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同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三是同年九月，发动“争回里大”，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反对校长吴稚晖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张昆弟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愧为赴法勤工

^①芝圃：《法国北海岸之华工》，载1920年12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

^②《〈工学世界社〉简介》。

俭学学生中的精英和领袖”^①。

一九二一年九月，张昆弟等领导和参加的“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斗争被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称为“小小的十月革命”。当时的北洋政府通过募捐勤工俭学资金，在里昂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名义上是为勤工俭学学生找求学出路，可是把持这所学校的吴稚晖从国内招来一批官僚富商子弟，对已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一个不收，于是激起全体留法学生的极大愤怒。九月中旬，在蔡和森、赵世炎、张昆弟、李立三等同学的领导下，举行了“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开放里大”的斗争口号，组织了进占里昂大学的“先锋队”。九月二十八日，蔡和森、赵世炎、张昆弟、陈毅等率领“先锋队”冲进里昂大学，占领校舍，准备与校方谈判，不料陈篆（驻法公使）、吴稚晖勾结法国当局，派出数百名军警，将蔡和森、张昆弟等一百〇五人拘捕。面对残暴的武装镇压，张昆弟表现十分勇敢而坚强。在被押送法国兵营途中，他们高呼“誓死争回里大”。在关押期间，张昆弟还隔着铁窗用法语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提出中国学生的正义要求，得到了法国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在狱中他还参加了抗议法国当局虐待被捕学生而组织的一次绝食斗争。经过二十八天的囚禁生活，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于十月十八日深夜把他们强行遣送回国^②。就这样，他被迫结束了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

^①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②《湖南党史人物》第1辑第39—40页。

(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张昆弟经香港回到上海。他刚踏上国土，就以满腔激愤的心情给叔父张翰宾写了这样一封信：“侄海外奔走，大志未成，南望洞庭，惟有洒泪而已。侄本拟酬报家庭，以付诸叔送读之殷，但处此恶浊社会，倘不严加整刷，则人民永无幸福，吾决断从事改造社会之大业，社会解决家庭亦随之解决也。”^①此后，他积极投身于国内更大规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春，张昆弟由上海来到北京，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自此，他无论是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或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都坚定地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石家庄、郑州、天津、山东及湘鄂西苏区从事工人运动，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浇灌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上。

一九二二年秋，李大钊为了开展北方的工人运动，通过高恩洪（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朋友”关系，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北方几条主要铁路线上担任“密查员”，以此公开身份为掩护，在铁路工人中秘密从事建立工会组织的活动。张昆弟就是这次被派往正太铁路工作的密查员。八月，他离开北京来到石家庄，首先在法国人修建的石家庄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与工人积极分子孙云鹏见了面。他说：“我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以后常到这里送

① 《张昆弟给叔父张翰宾的信》，由张雁书提供。

② 摘自罗章龙 1980 年 9 月 7 日《回忆张昆弟同志》。

《工人周报》，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联系。地点是北京沙滩中老胡同，收信人张昆魁（化名）”。他白天住在天桥街劝业场胡同的一家旅馆里，了解工人情况，晚上深入到工人聚集的朱振芳茶馆同工人交谈，很快结识了赵永庆、滕邦志、施恒清等一批有觉悟的贫苦工人。张昆弟向他们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揭露北洋政府“保护劳工”的虚伪面目。他启发工人说：“我们工人要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有自己的工会。长辛店的工人起来了，你们怎么办？”当听到工人揭露工贼王纯、陈顺来出卖工人利益的时候，他鼓励大伙“咱们另立一个工会嘛！”^①在工人积极分子的带动下，正太铁路总机厂所属各小厂的工人小组秘密组织起来。九月三日，全厂召开了有九十多名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成立了正太铁路第一个工会。在总机厂工会的影响和带动下，通过张昆弟的具体组织工作，正太铁路工人也发动起来了。十月十八日，在同乐戏院召开工人大会，正式成立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工人俱乐部）。张昆弟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赠送了“劳动万岁”的锦旗，发表了正太铁路全体工人《宣言》^②，点燃了工人的斗争烈火。年底，在张昆弟的领导下，爆发了年关大罢工。当时他担心初次领导罢工没有经验，怕失败，专程由石家庄赶到唐山，向罗章龙汇报了罢工的准备情况，并邀请罗章龙、张德韞来石家庄，共同研究和决定了罢工的三个问题：“①分析了罢工的条件，认为时期已经成熟，可以罢工；②加强罢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由富有作战经验的张德韞组织和领导工人纠察队，③定下罢工的日子（年关），并以孙云鹏的名义正式提出罢工。”“这次罢工虽有挫折，但是胜利

^{①②}《张昆弟来到总机厂》，载《石家庄市工运资料》第1卷。

了，其中张昆弟是有功劳的。”^①一九二三年，他又发动正太铁路和石家庄的广大工人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的残暴镇压。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总结了这次罢工失败的教训，改组了北京区委，成立了北京地委，张昆弟担任了工农部部长，负责领导北京各地的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推翻了北洋军阀在北方的统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进驻河南（任河南省督办），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要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起来”。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派张昆弟、李振瀛到河南恢复、发展工人运动。他们来到郑州，同胡景翼搞“合作”，很快把京汉、陇海、道清铁路总工会恢复起来了，“原资本家每块钱扣发的两个铜子又全部补发给了工人”。同时，还建立了焦作、六河沟、新安煤矿、豫丰、安阳、新乡纱厂和开封兵工厂、铜元厂等厂、矿的工会组织。到一九二五年夏，这些厂矿的工会会员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工人向资本家的斗争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②。这年八月，由于豫丰纱厂（中日合办，拥有五万纱锭）经理穆藕初欺压女工，在月薪上制造新老工人矛盾，激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会召集全厂五千余名工人开会，提出改善政治、经济待遇的十二条条件，遭厂方无理拒绝。八月七日，张昆弟来到工厂组织工人罢工，又提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不得开除办工会的工人等两个条件，要求“十四条”全部答应才能复工。罢工持续了十多天后，厂方重金收买厂丁百

^①摘自罗章龙1980年9月7日《回忆张昆弟同志》。

^②《河南党史资料》第1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141页。

余人，又从安阳雇来一批流氓打手，于二十日下午，突袭纱厂工会，打伤工人七十余名，死亡两人，并劫走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二千余元。在反革命暴力镇压面前，张昆弟、李震瀛与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王荷波一道，发动京汉、陇海铁路总工会工人参加罢工，并决定对豫丰纱厂实行棉、煤、纱、布“四不运”。由于广大工人的联合斗争，迫使穆藕初接受了全部条件，发给被害工人每人抚恤金三千元，赔偿了工人损失，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①。这时，党根据河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河南省总工会，并于九月十八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张昆弟被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他要求做工会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去，关心工人利益”。会后，他经常到郑州、信阳、洛阳等地检查指导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张昆弟转移到天津，在北方局和顺直省委任工委书记。并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出席了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列席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回国后，他除了同刘少奇、陈潭秋等领导顺直省委的工作外，同时还担任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央派张昆弟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湘鄂西苏区开展工人运动。那时，苏区的工人运动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工会组织被合并，工人运动实际上已处于被取消的状态”^②。张昆弟到达苏区以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同年七月二十日，他主持召开了湘鄂西

①《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②杨光华：《回忆张昆弟在湘鄂西苏区的活动》（1984年4月），未刊稿。

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湘鄂西省总工会，选举许少卿为委员长，张昆弟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因为他是党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总工会的活动受张昆弟的指导”^①。自此，苏区的工人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首先是恢复和建立了监利、沔阳、潜江等八个中心县的工会组织，会员发展到二万多人。他还派出一批工人干部到宜沙、武汉、岳州等地建立了工会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会工作扩展到了白区^②。其次是动员工人参军，“拥护红军”，支援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张昆弟主持召开了省总工会工作会议，作出了《拥护和扩大红军保证红军给养的决议》，发动各级工会动员工人参加红军，先后选派了二千三百七十多名工人参加了红三军。同时，还领导工人群众组织了“工人赤卫队”、“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这个组织在湘鄂西来说，是有它特殊斗争的历史作用”^③。其三是帮助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一九三一年秋，苏区遇上了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堤垸倒溃，一片汪洋，灾民近百万。为了战胜水灾，巩固苏区，张昆弟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解决水灾问题上。他派出一批工会干部到灾区，动员了几万受灾群众到附近白区，汇合当地群众没收地主的粮食财产和大商人的木材、盐、布分配给灾民。“仅汉川南河一区没收现金一万余元，粮食六千余石，此外耕牛、船只、鸭棚等不计其数，这显然解决了灾民的生活困难。”^④洪水退后，他又发动各级工会修复堤垸，掀起“赶秋运动”，帮助苏区群众渡过水荒。

①杨光华：《回忆张昆弟在湘鄂西苏区的活动》（1984年4月）。

②③1931年10月18日《湘鄂西省总工会对全总的报告》。

④1932年2月26日《湘鄂西省委关于工会工作向中央的报告》。

正当张昆弟领导工人群众巩固胜利成果的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全面贯彻《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一新的冒险主张。到会代表在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对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提出了严厉批评。张昆弟同万涛、潘家辰等主要干部就“红九军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方面所作的批评，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响应。但是，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省委派到中央汇报的代表返回洪湖，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把万涛等干部对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夏曦的批评，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对中央分局负责人进行批评了，少数代表转而跟着他们指责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被少数人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压下去了，大会完全接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和下达的任务。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规定“现时工会工作最中心的问题是领导灾民向外斗争”，“发动白区工人罢工、游击战争、一直引导到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省总党团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建立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路、武长路……的职工运动”。扭转了工会工作的正确轨道，使苏区工商业、手工业遭到了进一步破坏。灾民到白区后，不论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的粮食财产统统没收，造成赤白区群众的严重对立。这种“左”倾盲动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张昆弟的不满和反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支持，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于一九三二年五月，错误地开始了第一次“肃反”。他们把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

派别的阴谋活动”，还说：“有一小部分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指责“省总以张昆弟为家长，没有张昆弟几乎连工作都要停滞”，“工会中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家长制命令主义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充满了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他们完全混淆了肃反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界限，将革命队伍中一切对“左”倾领导不满的同志，都视为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任意逮捕，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残酷迫害。在这次“肃反”中，张昆弟被诬陷为“罗章龙右派的首领”^①，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同年秋，被秘密杀害于湖北省洪湖县瞿家湾^②。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对张昆弟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学校时的挚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最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五十多年过去了，革命的历史长河冲刷了许多往事，但张昆弟这位烈士的崇高形象，却一直刻印在革命人民的脑海之中。

① 1934年2月16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

② 杨光华：《回忆张昆弟在湘鄂西苏区的活动》（1984年4月）。

旷继勋

冯玉临

旷继勋是人民军队早期著名的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青年时代开始追求进步，在担任川军旅长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党的指示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创建红六军；后到鄂豫皖根据地，率领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反击敌人“围剿”，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和曾中生等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执行的王明“左”倾错误，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被诬陷为“国民党改组派”而秘密杀害。

(一)

旷继勋，原名大勋，号集成。一八九五年六月十六日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塘湾一个贫民家庭。他出生不久，全家迁往县城。父亲旷广明，号光甫，少年时曾读过几年私塾，跟郎中（即中医）学过一些中医药知识，后靠赶乡村集市场会串村卖药维持全家生计。母亲姓熊，是一位善良勤俭、全力维持家务的劳动妇女。父母终年辛勤劳累，仍难以维持全家九口人的生活。旷继勋三岁那年，因农村灾荒严重，曾跟随二姐在思南城里乞讨。因为他是家中最大的男孩，父亲

求人借债，弄了点钱让他读了几年私塾，后辍学在家，随父亲串乡摆摊卖药。这期间他利用闲时刻苦自学，读了不少古书，还练了一手好毛笔字。青少年时期的旷继勋，经受了贫困生活的磨难，深切地了解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他父亲热心为穷人治病、济人之难的忠厚为人，对他教育和影响也很大。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一九一六年全国民众掀起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使旷继勋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旷继勋的舅父曾被军阀政府诬为“通匪”而遭枪杀。对此，他极为愤恨，发誓要为舅父报仇雪恨，曾几次想外出寻找报仇的机会，都被家里人发现阻拦，未能如愿。但他并不甘心。有一天，他得知四川来贵州演戏的一个戏剧班子即将乘船返川，便偷偷混入人群中上船躲藏起来，随船顺乌江而下到达涪陵，被招募到四川军阀赖心辉部队当兵。他有文化，身体强健，又刻苦学习军事技术，深受上级赏识，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连长；一九二三年再升为营长。他本来可以乘此谋取更大的权势，但他没有为此而钻营。他阅读进步书刊，觉得自己和那些欺压人民、结党营私的军阀、官僚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在和朋友的交谈中，他曾慷慨激昂地表示，自己决不军阀化^①。

当时四川军阀派系多，矛盾大，为争夺四川霸权互相倾轧。一九二五年，旷继勋所在的旅被四川督理杨森打败，宣布脱离赖心辉部，归杨森指挥。但不久杨森又被另一派军阀邓锡侯、田頌尧、刘光辉、刘湘的联军击败，旷继勋所在的旅又被编入邓锡侯的江防军。旷继勋升任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后来江防军缩编，原第二师改为第七混成旅，第四旅编为第二

^①参见《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团，旷继勋任团长，驻防彭县、崇宁一带。在军阀混战中旷继勋进一步看清军阀统治的反动本质及其对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无穷灾难。他决心脱离军阀部队走上光明之路，为人民大众谋取幸福。

(二)

一九二五年，旷继勋所在部队改编为第七混成旅的主力团。当时第七旅旅长刘丹五是国民党左派，他支持旷继勋在部队中宣传三民主义等活动。因而部队中进步空气较浓。旅部的秘书王文鼎思想也较进步，他和旷继勋常在一起谈论时局，发表政见。有一次，王文鼎到外地出差，得知广东黄埔军校及一些国民革命军中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回部队后，王文鼎便找旷继勋谈及此事。旷继勋主张在全旅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把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人都组织起来。经过酝酿与筹备，这年冬天，该会在七旅宣告成立，选举旷继勋、王文鼎等为分会执行委员，旷分管财务，王负责政宣工作。随后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派监察委员钟克家和孙青松二人赴广东接头。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由旷继勋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由钟、孙二人带去找广东革命政府接洽；另一份则带去找共产党组织接头，了解黄埔军官学校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请共产党派人来四川领导分会的工作。

这期间，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召开会议，对开展分会活动进行讨论。旷继勋等主张在全旅举办下级军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班。征得旅长刘丹五同意后，即由旷继勋制定了分期

分批办训练班的计划。训练班开课后，旷继勋除担任讲授军事课外，还讲政治课，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思想。通过这些活动，旷继勋进一步体会到，还必须把革命工作扩展到地方上去，同地方上的进步势力联合起来。当他得知彭（县）崇（宁）地方进步分子董人宁等正与当地的反动团阀杨监于等进行斗争时，他就主动接触和团结董人宁这一派，支持他们反对反动团阀的斗争。这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好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冬派去广东联系的钟克家与孙青松，与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钟克家也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广州加入了共产党。根据他们提出的要求，党的组织决定派曾经赴法勤工俭学后又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员秦青川，随钟克家一起回彭县开展工作。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他们到达旅部驻地彭县，受到刘丹五、旷继勋、王文鼎等的热情欢迎。二十八日，旷继勋宴请秦青川、钟克家以及旅长刘丹五和王文鼎等人。席间大家畅谈了如何在部队、地方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等问题。旷继勋向大家表示，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该有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大志。

秦青川到第七混成旅后，负责旅政治部的工作。他和钟克家常到各团活动，给战士上政治课，宣传国民革命思想。旷继勋每次和大家一样，认真听秦青川的演讲，还和士兵们一起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期间，他在秦青川的帮助下，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觉悟进一步提高，追求真理，要求革命的思想更为迫切。一九二六年底，秦青川、王文鼎介绍旷继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旷继勋率部驻崇县、郫县。有一次该团马伕放马，吃了农民的庄稼。农民闹到团部，要求部队赔偿损失。马伕不

但不接受意见，反而蛮不讲理打骂农民，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于是，上千农民成群结队闹到县城，包围了部队，要求赔偿损失，惩办打人凶手。中共川西特委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找旷继勋商量，要他马上查明事实，如果部队损坏了农民的庄稼，欺压群众，该赔偿损失的要赔，该处分打人凶手的一定要处分，并希望他代表犯错误的士兵作检讨，向农民表示歉意。旷继勋立即亲自接见农民代表，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接受了农民的合理要求，对殴打农民的马伕进行了处分。随后，他又向部队提出遵守“五不”的纪律要求：不拉夫、不扰民、不嫖、不赌、不吸鸦片。无论何人，谁要是违犯了都要受到严格制裁^①。经过整顿，部队纪律有了好转，士兵也不敢任意欺压群众了。

秦青川到部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发展了不少进步军人入党，在军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派了一些党员到该旅工作，使该旅成了共产党掌握的一支可靠的武装。此后，中共四川省委和川东特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到该旅驻地秘密召开。旷继勋担负了接送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的重要任务。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清党运动，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旷继勋在白色恐怖下更加坚定、沉着。他完全听从党的指挥，随时准备接受党所交付的重任。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没有活动经费，旷继勋就设法筹款资助；党的秘密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就利用部队的条件设法保护和转移干部；他配合党的地下组织，及时惩处一些凶恶的

^① 《黔东英烈传》第1集，第57-58页，中共湖北省铜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未刊）。

敌特分子；不少党员因已暴露无法在地方隐蔽时，他就按省委指示，把这些同志安排到自己部队里来工作。旷继勋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时候，坚信革命，坚持工作，对帮助地方党渡过难关，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下，第七混成旅日益受到反动军阀的怀疑和监视。他们企图寻找机会通过整编来消灭这支队伍；旷继勋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有随时遭到被捕的危险。

一九二八年秋，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与田頌尧等勾结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军阀组织“四川同盟军”，攻打盘踞川东一带的军阀刘湘。邓锡侯和江防军司令黄隐商量决定，派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去川东作战，妄图以此既可以攻打刘湘，又可借打仗来削弱或消灭该旅。如果此举未达目的，也可以趁机把这支可疑部队从成都附近调开，然后设法消灭之。旷继勋觉察到这是邓锡侯企图打击和消灭革命势力的阴谋。怎么办？应不应该率部队下川东参战？他和该旅的共产党员商量后，随即向中共四川省委作了汇报，请求指示。中共四川省军委为此事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同意让第七混成旅去参加川东之战，指示该旅党组织在作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利用军阀混战保存和发展自己；同时设法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支持正在蓬勃发展的川东农民运动。旷继勋遵照省委的指示，在部队中组织党员和革命军人讨论省委的指示，统一认识，随后率部队东下广安、合川。一九二八年冬，第七混成旅在重庆作战中失利，乃退驻李、罗防地。这时，旅长刘丹五把旅长职务交旷继勋代理，自己回到成都，并称病不返。从此，第七混成旅就以旷继勋代旅长。

旷继勋所部，由于有进步党员的政治工作，广大士兵都有

一定的革命觉悟，打仗勇敢，战斗力强。军阀罗泽洲曾亲自宴请旷继勋，要他介绍练兵的方法，同时也对这支军队深怀恐惧和疑虑。不久，旷继勋率部移驻李家钰防区的遂宁县射洪嘴、蓬安镇一带。这时，江防军司令黄隐到简阳，了解到旷旅的一些情况后，便命令旷继勋速将部队开回成都整编。旷继勋召开部队中的党员、骨干讨论对策。认为这仍是黄隐以整编为名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决定暂不执行命令，注意观察动向。后来，黄隐又通知旷亲自到简阳面谈。旷继勋认为此去一定有去无回，凶多吉少，故先派一位连级干部去敷衍。黄隐以旷继勋拒绝带部队回成都接受整编，又不亲自到简阳来面谈为由，下令停发了旷部的粮晌。随后，黄隐又勾结李家钰、罗泽洲等频繁调动军队，阴谋吃掉旷继勋所部。旷继勋感到形势严重，立即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要求批准率全旅举行武装起义，将部队带到边远山区去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省委接到旷继勋的报告后，当即批准了他的起义计划，并派省委负责人之一的罗世文和朱三元去参加领导起义工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旷继勋指挥下，全旅四千多官兵开到蓬溪牛角沟，宣布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根据省委指示，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任前委书记。部队起义后，旷继勋等率部转战蓬溪、西充、南部、营山、梁平、达县之间，打土豪、分浮财，受到工农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据当时成都、重庆的一些报纸记载说：起义部队“纪律严明”、“沿途不扰贫民”、“沿途宣传活动颇力，多受人民欢迎”^①。经过一个多月的转

^①转引自《黔东英烈传》第1集，第58页。

战，七月三十日，起义部队进到梁平县虎城场、猫儿寨地区。这时各路军阀部队向旷部凶猛扑来，前有敌军凭险阻截，后有大批追兵赶到，部队面临着强大的敌人。旷继勋指挥部队英勇反击，但由于起义军寡不敌众，在进攻猫儿寨的战斗中严重失利。撤退时，一部被击散，另一部被敌收编。

后来，中共四川省委曾在旷继勋请示部队失败后怎么办的一封信中说：这次起义的政治影响很大，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政治上却是胜利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党鼓励旷继勋等不要灰心，应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战斗。

（三）

起义军在猫儿寨战斗失利后，一九二九年八月初，四川省委决定送旷继勋到苏联学习。起义部队其他一些党员干部，则分别打入军阀各部队中去做兵运工作。旷继勋由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披云陪同去上海找党中央。他们先到重庆，再乘船东下上海。沿途两人以表兄弟相称。旷化装成病人，头包白布帕，贴上一张膏药，躺在铺上，佯称到上海治病。到上海后，党中央鉴于当时上海党的机关常遭国民党敌特和青帮歹徒的破坏，决定旷继勋不去苏联学习，留他在上海，参加由特科陈赓领导的“打狗队”（也称红队），严惩敌特和歹徒的工作。旷继勋机智勇敢，枪法又好，善打双枪，在与国民党特务及青帮歹徒的斗争中，成了陈赓的有力助手。当时青帮头子黄金荣，常勾结敌特对我进行破坏。旷继勋侦知他的行踪后，在一家浴室里痛打了这个家伙。事后，黄金荣给党的机关写信，表示今

后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再也不敢随便勾结敌特对我党的活动进行破坏了。

为支援和加强各地的武装斗争，党中央应各革命根据地的要求，把一批军事干部分别派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冬，旷继勋被派往湖北洪湖地区。他化装成客商乘轮船西上，于年底到达江陵。他在江陵、当阳等地，利用过去在军阀部队时的熟人关系，找到当地白军中的几个下级军官。经过教育，很快组织了三连白军起义，进入洪湖地区参加了红军。

根据中共中央和鄂西特委的指示，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监（利）、沔（阳）、江（潜江）、石（首）两支游击队在监利县的江家桥组成红六军。旷继勋在孙德清因病离职后接任军长。红六军下辖二个纵队，全军约六七千人。

红六军成立后，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了迅速恢复和巩固江、石、监、潜、沔交界的根据地，旷继勋和军政委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等领导人决定，先取江陵东北部要地龙湾寺。二月中旬，部队顺利攻取龙湾、熊口、老新口和张河等重要集镇；接着又攻克监利北部重镇新沟嘴和沔阳的鱼洋镇，歼敌新五师的一个连。这时，驻湖北反动派第三编遣主任刘峙，命令两个正规团进驻郝穴，夏斗寅部开赴新观寺，另派重兵把守江、监县城，还纠集地方团防武装对苏区围剿，妄图聚而歼灭。针对这一情况，旷继勋和周逸群等决定集中兵力夺取敌守备薄弱的潜江县城，打破敌之包围。部队攻破潜江县城，俘敌警察局长、土豪劣绅等多人，缴枪七十余支，子弹四千多发。三月初，部队攻取郝穴，击败敌十四旅两个营，缴枪一百六十余支，俘敌分队长以下八十余人。中旬，红军主力一部，再取观音寺，逼近沙市郊区；随后挥师南下，先后攻克长江南

岸的重镇藕池、调弦口、石首城等地，缴枪六百余支。旷继勋和周逸群指挥红六军转战洪湖苏区，取得了巨大胜利，迅速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推动了苏区政权建设的发展。同年四月，成立了江、石、监、沔、潜等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

根据中央的指示，贺龙率领的红四军和旷继勋指挥的红六军要在洪湖地区合编为红二军团。当旷继勋得知贺龙已率红四军从鹤峰东下，即将到达松滋、公安时，即率师西向，一举攻下公安县城，于七月四日在公安县城和红四军会师。会师后，两军前委召开了联席会议，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红六、红二军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任二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柳克明（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为参谋长。下辖二、六两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逸之。六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由柳克明兼任。全军团共一万余人，枪五千余支。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地区革命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和湘鄂西苏区的巩固与扩大，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贯彻和影响，红二军团领导同志之间对部队行动方针及洪湖苏区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作为中央代表的领导人邓中夏，坚持主张二、六军攻打沙市、宜昌、武汉的错误方针。旷继勋奉命指挥红六军按统一部署攻打荆（州）沙（市），遭受重大损失。后来，他率部进入监（利）、沔（阳）地区，镇压苏区内部的反动团匪“白极会”，配合红二军拔除苏区内的敌人据点。贺龙后来回忆说：“湘鄂西初期虽曾受过挫折，但仍然坚持了斗争，建立了根据地，发展了武装”^①。旷继勋在洪湖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红

^①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见《星火燎原》第1卷，第617页。

军方面是作了贡献的。

(四)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党中央调旷继勋到上海中央军委负责同各根据地的联系工作。十一月下旬，中央又派他和余笃山等前往鄂豫皖根据地，领导那里的游击战争。

十二月初，旷继勋、余笃山从上海经武汉到达鄂豫皖苏区，同苏区临时特委书记曾中生和红十五军长蔡升熙会面，并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关于合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的指示。当时，红一军在皖南粉碎敌人的围攻后驻豫南二道河。曾中生即派旷继勋和蔡升熙到红一军去传达中央关于合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的决定。红一军领导听了旷继勋和蔡升熙的传达后，即率红一军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驻在那里的红十五军会合。两军正式合编为红四军，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合编后，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政委余笃山，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俊。全军共一万二千余人，编为十、十一两个师^①。

红四军合编前，围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经过我军民一个多月的反击作战，被歼五千余人，转为守势。所以，红四军成立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把敌人的围攻彻底粉碎。鄂豫皖特委决定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加以消灭；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后方，巩固根据地。旷继勋根据特委决定，指挥红一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围攻麻城以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

北磨角楼，以吸引援敌。当时磨角楼驻有夏斗寅一个营。旷继勋指挥两个团攻坚，徐向前带一个师和另一个团作预备队，相机攻城或打援。经过三天战斗，攻克磨角楼，打垮了驻该地之敌及由麻城来援的敌人，歼敌五百余人，缴枪千余支。

二月，旷继勋又指挥红四军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攻打战略要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新集三面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多，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它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踞的顽固堡垒，以曾、刘两姓大户为首，统治全城，并组织数以千计的反动民团及红、黄枪会，凭坚固守。我军将新集包围后，旷继勋命令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围攻一个星期，仍未能攻下。旷继勋和余笃山、徐向前等领导人进一步察看地形后，果断决定，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开辟攻击道路。他们命令部队利用城北门外的几家小店作掩护，秘密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接近城堡，然后把几百斤炸药塞到棺材里，推进坑道引爆。当点燃引线后，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塌一截。旷继勋、徐向前等立即指挥部队沿缺口冲入城内，与敌人搏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逐屋争夺，全歼守敌千余人，胜利解决了战斗。新集麇集着不少从根据地逃出来的地主豪绅，捉住后都交地方政府处理。从此，解除了我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①。

这时，蒋介石正调整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平汉路南段空虚。旷继勋和军部领导人决定乘虚向西出击。他指挥部队开至武胜关路东的三里城地区，首先派红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32页。

军十一师攻打李家集车站。部队冒雪夜袭，截住一列敌兵车，全歼车上敌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继袭柳林车站，又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两个团，共毙俘敌两千多人。

接着，旷继勋又指挥我军攻打刚抵双桥镇、立足未稳之敌三十四师岳维俊所部。三月九日拂晓，战斗打响后，红军和赤卫军将敌团团围住，经过七小时的激烈战斗，将敌三十四师全部歼灭，俘敌师长岳维俊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千余支，迫击炮十四门，取得了空前大捷。

岳维俊在一九二五年曾任国民党二军军长，徐向前是他属下第六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在旷继勋和徐向前审问他时，他知道徐是他的老部下后，便长叹一声说：“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于是，旷继勋、徐向前和曾中生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俊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旷继勋和徐向前也同意了，还提出要二万套军装。后来，他的家属先送来十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是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维俊组织反革命团体，把岳维俊枪毙了^②。

后来，旷继勋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对来鄂豫皖根据地后的这段斗争，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在商城赤区的一军及第十五军混编后，即回黄麻，恢复赤区中心。前后与夏斗寅、吉鸿昌、赵观涛、岳维俊各部激战数次，掳获甚多，并击毙袁世英之旅长侯镇华，俘虏岳维俊等。将进攻红军五到六师以上的

①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32、135页。

白军逼成守势，而又极大地破坏了京汉路的铁轨，断绝敌人的交通，以响应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鄂豫皖苏区确取得相当的成功”，“惟干部人材太缺乏，整个工作上难免不存一些缺点，请中央多派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前来帮助”^①。在彻底粉碎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作战中，旷继勋同特委书记曾中生等一起，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的运用了一系列作战原则，如“采取内线作战法，以飘忽的战略”，“围点打援”，“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消灭之”^②，等等。这说明旷继勋不仅在反“围剿”斗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亦有很多建树，不愧为我军早期的优秀将领。

(五)

一九三一年初，党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把持党中央的领导权，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并派张国焘等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调动了十二三万人限令“五月完全肃清”红军。四月中旬，皖西敌四十师、警卫一旅等七个团，向我根据地侵犯。特委决定由旷继勋率主力红军出皖西击敌。在独山镇一仗，全歼陈调元二千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给东进之敌以迎头痛击。余敌惊恐，向霍山地区溃逃，皖西根据地之危遂解。而后旷继勋率部返回鄂豫边区，与徐向前所指挥的一部会合。

^① 见《黔东英烈传》第1集，第52—53页。

^② 《继勋同志来信》（1931年），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第99页。

这时，张国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组成中央分局，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红四军领导干部亦进行了调整。旷继勋仍任红四军军长，调曾中生任政委，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

旷继勋和曾中生等四军领导人，鉴于当时外线敌人暂处于守势，而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曾向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系区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认为他们的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予以否定，并命令旷继勋和曾中生率红四军去商南亲区，解决顾敬之的民团。旷、曾等四军领导人反复向中央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的建议。但又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四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①。

旷继勋抵制“左”倾路线，实事求是地先后两次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同意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的不符合实际的指责与批评。他认为立三路线及其残余应该批判和肃清，但不能伤害好同志。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在六安苏区金家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立三路线之残余，已将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②。随后，他在五月间向中央写工作报告，不承认前段工作（指曾中生到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以来——引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③。这充分表现了他对王明“左”

^{①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43、144页。

^②《黔东英烈传》第1集第53页。

倾错误路线的不满和抵制。但当时的党中央收到旷继勋的报告后，不仅不接受他的正确意见，反而支持张国焘的错误，于五月三十一日复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省委：反立三路线问题，继勋两封来信中均有这样的话：“立三路线之残余已逐渐肃清，请勿虑及之”，或者，“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中央认为继勋这段话包括有下列严重错误：“（1）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2）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没有无情的不调和的斗争”；“继勋同志虽然再三着重要求中央‘勿虑及之’，但中央正式回答继勋同志，中央必须时刻虑及，并且要继勋同志及全党每一个同志随时随地都要虑及”。当时中央指责旷继勋“在反立三路线的几个月当中，还不去详细研究一次立三路线及国际路线的实质问题，以致继勋同志到现在还不了解鄂豫皖苏区工作中立三路线的实质”。他们要“继勋同志多多找中央分局同志帮助”，“以便迅速的改正这些错误。继勋同志是四军及鄂豫皖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中央对继勋同志更要加重的帮助，因此，特别指出继勋同志这些根本观点的错误来，使继勋同志能及时纠正”^①。

旷继勋在反“立三路线”问题上，同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襟怀坦白，实事求是，不屈服于中央的错误指责。六月二十八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再次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工作的成绩，以“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立

^①转引自《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第3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三路线残余”为名，“加重帮助”了旷继勋。七月中旬，又改组了红四军的领导，撤销了旷继勋的军长职务，降任红十三师师长。旷继勋虽受张国焘的批判和降职，但他以大局为重，不计较地位高低和个人得失，仍指挥红十三师配合徐向前等所率主力部队，击退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并拔除了光山西南的打银尖、大山寨等十余处反动堡垒，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不久，旷继勋又被派到皖西从事基层工作。他在那里依靠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使当地革命群众武装发展很快。于是，分局又指示他组建红二十五军，并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在麻阜成立红二十五军，旷继勋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当时旷继勋所部在皖西活动，未能赶来参加七里坪的大会。改编后的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辖四军、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二十五军仍由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另有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尚待组建中^①。

按照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统一部署，旷继勋率领二十五军继续转战皖西。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商南战役和苏家埠战役中，二十五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五月，他又指挥刚组建的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解放了霍丘县城。七月七日，敌右路军第一纵队徐庭瑤率重兵围攻霍丘。根据霍丘利攻不利守的地形及敌强我弱的严重情况，旷继勋等军领导向方面军总部和张国焘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66页。

汇报，并提出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的作战意图。但张国焘却坚持“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保卫苏区”、“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命令旷继勋等坚守县城。旷继勋指挥红军和地方部队，从七月七日起，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一连血战五昼夜，终因敌众我寡，伤亡惨重，敌人突破城门攻入城内。旷继勋抱着与霍丘共存亡的决心，没有撤离县城突出敌人的围攻。结果守城部队一千余人全部损失，仅旷继勋及少数人从西门突围脱险。旷继勋因此被撤职，二十五军军长由蔡升熙接任。此后，旷继勋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当红十二师师长陈赓负伤后，旷继勋被任命为十二师师长。

（六）

鄂豫皖根据地的对敌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向平汉路以西突围。旷继勋率十二师随大部队艰苦转战至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这时，杨虎城的重兵已卡住关口，挡住我军西进的去路，胡宗南等部队又追了上来，将我军合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中。在敌人前后夹击、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旷继勋指挥的第十二师受到重大损失。张国焘认为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未能把敌人击溃，撤去了他的师长职务。

这时，旷继勋、曾中生等对张国焘执行的“左”倾路线和他的军阀作风更为不满。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当红四方面军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时，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张琴秋、朱光等酝酿，商议派人到党中央告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后因故未能成行，改由曾中

生代表大家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意见，要求他停止部队向西转移，在川陕边一带建立根据地。张国焘为了缓和指战员对他的不满情绪，被迫于十二月十日，召开了部队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旷继勋等对他提了不少意见和批评，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张国焘对大家的批评是极为反感的，但在会上佯装接受曾中生、旷继勋等的批评，而实际怀恨在心，并伺机对曾、旷等人进行打击迫害。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积极着手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通江解放后的第五天，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通江城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省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前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旷继勋参加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和组织法的起草。按照组织法规定，政府设主席、内务委员、土地委员、粮食委员、经济财政委员、文化教育委员、秘书等。旷继勋被任命为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和主持川陕省的各项工作。他领导革委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基层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工农青妇协会等群众革命团体。

旷继勋担任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在四川影响很大。因为他原来领导第七混成旅起义，不仅在当地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在一些军阀部队的同僚中也享有声誉。这时，他们听说旷继勋是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更为崇敬。旷继勋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建立革命统战关系，他写信给原在军阀部队时的老朋友谢德堪（旅长）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开导他们拥护中国工农红军，争取他们率部起义。但旷继勋的信却被张国焘派来监

视旷继勋的人截留。张国焘认为这是打击旷继勋的好机会。他无耻地诬陷旷继勋与反动军阀秘密勾结，搞反革命统战关系，阴谋破坏革命，并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逮捕了旷继勋。接着，张国焘又不经过任何合法的审讯，也不上报中央，便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在通江县洪口场将旷继勋秘密处死。旷继勋其时年仅三十八岁。

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毛泽东曾指出：“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做烈士待遇”^①。

附 本文主要参考目录：

1. 《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2.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3. 《黔东英烈传》第 1 集，中共铜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5 年印。
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版。
6. 《红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
7. 作者到延安、大悟、新县和湘鄂西等地纪念馆、老苏区调查、访问、搜集整理的资料。

^①转引自《解放军将领传》第 1 集第 386 页。

黄 励

罗庆新

黄励，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秋，任上海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四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七月就义于雨花台。

(一)

黄励，幼名黄益智，又名黄丽，湖南益阳人。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城一个贫民家庭里。她是一个遗腹女，出生时父亲已不幸病故。因家境贫困，黄励和姐姐曾随妈妈一度寄居在长沙的舅父郑业中家里。舅父送她进长沙益湘小学读书。性格刚强的母亲不愿长久寄住在哥哥家里，后来又带着两个女儿回家，靠自己和大女儿做鞭炮及替别人洗衣服挣钱为生，节衣缩食让黄励继续上学，黄励的舅父也热心资助。黄励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缝纫科，学会了剪裁缝纫技术。

在衡粹女职，课余时间她喜读书报，关心国家大事。对当时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与丧权辱国，对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充满愤激之情。她愤恨地说：“我欲上街，手持利刃，

横刀直前，把这般穷凶极恶、欺压百姓的军阀、贪官污吏，斩尽杀绝而后快！”^①

一九二四年黄励考取了武昌中华大学。在大学里，她不仅勤奋学习功课，而且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的工人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在党的领导下，黄励参加了街头宣传、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还经常带领同学参加校内外的民主活动。在党的教育与影响下，在现实斗争中，她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是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的根源，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就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为了保存力量和培养干部，决定选派黄励和一批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按照党组织的通知，他们事先准备好了衣物和路费。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阴历八月十五日）夜里，黄励和武汉女师的宋炜、杜琳两位女同学，及胡彦影、伍修权等八位男同学，在武汉六号码头上船，由武汉学联领导人胡彦影领队同去上海。到达上海后，他们住在党中央指定的位于法租界的一家旅馆内。接到党中央通知后，他们于十月二十日暮色苍茫中步行到黄浦江码头，乘小舢板划出吴淞口，登上停泊在长江上的苏联运煤船。上船后，他们遇到了来自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山西、陕西、湖南等省市的青年学生共一百多人，由周达文、杨明斋任领队去苏联。十一月初，轮船到达海参崴，接着就换乘火车向莫斯科进发，于十一月下旬到达

^①王名恂：《关于黄励烈士青年时代的回忆》，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莫斯科。在去苏联途中，黄励与同行的杨放之交谈融洽，志同道合，奠定了感情的基础。

（二）

黄励和同行的青年学生们到达莫斯科不久，就进入中山大学读书，黄励编入了俄文班。

在中山大学，黄励以顽强的意志刻苦地学习。她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及夜里别人睡觉以后，自己悄悄地学，因而不长一段时间之后，她就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俄文译本和列宁的原版著作了。一九二六年夏，她和杨放之结成了革命的伴侣。一九二七年，黄励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被分配在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

黄励历任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委员，对支部工作积极热情。为了发展党员，白天、晚上经常找人谈话，还及时向支部办公室汇报工作。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她还曾担任工会女工委员会主任，常带领一些女同志到莫斯科各工厂，宣传中国的工人运动。她生活上艰苦朴素，善于接近群众，在争取和团结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进步的国民党员（中国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国民党员）的工作中，她表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一九二八年秋，在德国柏林召开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党中央在莫斯科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黄励作为代表团成员，夜以继日地为代表团搜集、准备材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二九年初，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在海参崴

召开，黄励和杨放之作为代表团成员，随邓中夏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将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书记处由汉口迁到海参崴，并发行用中、日、朝三种文字出版的《太平洋工人》月刊。黄励和杨放之担任中文版编辑，他们整天忙着写文章，介绍中国江西、湖南红军的战斗情况，有时还应邀到附近工厂里，向工人介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

《太平洋工人》曾秘密发行到我国东北一些地区，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争热情。

(三)

一九三一年十月，黄励和杨放之回到上海。党分配黄励担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同时在沪西区做工运工作。

她到沪西日本纱厂开展工作。她穿上自己改制的工人装，深入工人区，和女工们拉家常，帮助她们裁剪衣服、做饭、带孩子，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向她们讲解革命道理，很快就取得了女工们的信任。女工们有了困难就找她解决，甚至发生了家庭纠纷也来找她。她还编了歌谣教女工们唱：

“北风呼呼声怒嚎，手提饭篮往外跑，望一望工厂未到，哎哟，哎哟！望一望工厂未到。

马路跑过两三条，两只腿脚都酸了，去迟了厂门都关了，哎哟，哎哟！今天的工钱罚掉了。”

当时沪西最难开展工作的是日本资本家开设的喜和纱厂。

这家工厂直接从江苏、安徽农村招收了一批小女孩当童工，对她们控制极严，与外界完全隔绝。黄励自告奋勇去开辟这个厂的工作。她首先设法结识了这个厂的成年女工杨阿姐，通过杨阿姐及其他女工，逐步与小女工们建立了联系，后来又吸收她们参加沪西区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学习。黄励有时亲自去给她们讲课，边教文化、边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火种终于在这个资本家严密控制的工厂里燃烧起来了。后来在“一·二八事变”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活动中，喜和纱厂的小女工们也参加了斗争，全厂女工并和沪西区工人一起，成立了“沪西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坚持了两个多月的反日总同盟罢工，使日本资本家大为震惊。

中国革命互济会是援救被捕革命者、救济被捕者家属及死难烈士家属的革命群众组织，它的任务：一是营救被捕的革命者，使他们少判刑或减短刑期，早日出狱；一是救济被捕者家属及烈士家属。当时斗争尖锐复杂，互济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提高互济会的战斗力，黄励在大夏大学办了学生干部训练班，在日华纱厂办了工人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互济会骨干。她依靠互济会的全体同志，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开展营救工作。如利用可靠的社会关系和被捕者亲属出面发动群众，用群众的力量迫使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者；或请律师辩护，使被捕者少判刑期等。她常对同志们说：“做营救工作必须胆大心细、机智，善于接近群众，尽量避免损失。”由于她依靠群众，方法灵活，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使不少人免遭杀害，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全省各界群众代表大会，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

协定，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国民党政府军警特务包围会场，当场逮捕各界代表和群众数十人。黄励闻讯后，立即和互济会的同志进行紧张的营救活动。她到处宣传，并化装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她说：“东北义勇军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当然应当援助他们。参加群众大会的代表是我们选出来的，他们代表着我们的要求。如今他们被捕了，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营救我们的代表。……”^①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互济会及各方面的宣传动员，群众发动起来了。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慑于群众的威力，公安局急忙将这批爱国人士解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一部分人解往南京审讯。黄励为了营救革命者四处奔波，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但由于她精明干练，警惕性高，又善于化装，特务们虽然费了不少心机，却难于发现她的踪迹。

黄励生活上勤俭朴素。当时她住在互济总会机关，地址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甘世东路口新安坊内。互济总会机关是以革命同志朱大娘一家为主体而组成的“家庭”。黄励作为朱大娘的大女儿，和朱大娘住在前楼，朱大伯和他的儿子及女儿晓云住在后楼，邓中夏住在亭子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是非常讲究穿着的，要避免敌人的注意，衣着得体就更为重要。黄励凭着出色的剪裁手艺和辛勤劳动，她不仅让“全家”人服装整洁，式样入时，而且家庭环境也搞得整齐清洁。朱大娘处处关心爱护黄励，黄励也把朱大娘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她常讲革命道理和党的知识给朱大娘听。一九三二年，黄励介绍朱

^①帅孟奇：《怀念黄励同志》，见《红旗飘飘》第7集（1958年4月）。

大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大娘的二女儿朱文英为革命牺牲了，黄励就给晓云兄妹讲朱文英烈士的英勇事迹，鼓励他们学习姐姐的榜样。她还教会晓云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和《囚徒之歌》。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党决定调黄励到中共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长。

当时党组织常遭破坏，党的工作开展比较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黄励在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应当以工厂、特别是大工厂为主开展工作，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要成为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她还指出，街道支部要提高警惕，防止叛徒混入党内。

到江苏省委工作后，黄励搬出了互济会总会驻地。她白天拼命地工作，晚上还要忙到深夜，有一次因劳累过度而晕倒，经过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

一九三三年四月，江苏省委因叛徒出卖接连遭到破坏，敌人正在到处搜捕黄励，于是党中央决定调她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而这也正是她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就在她准备动身的前夕，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周光亚被捕了。周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他供出了黄励的身份和住址。当夜十一时，敌人突然包围了北山西路顺庆里四十一号黄励的住处，可是他们扑空了。原来周光亚被捕后，组织上立即通知黄励和周妻搬了家。搬家后，黄励和周的妻子住在一起。黄励不知道周光亚叛变，一面叫周妻到巡捕房去探望周，一面还在积极设法营救他。可是周妻为了想换取丈夫的“自由”，竟向敌人供出了黄励的新住所。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黄励

在法租界西爱威斯路寓所被捕了。

(四)

黄励早已被列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追捕的黑名单，因此，被捕后巡捕房立即将她移交给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天，法院刑庭就开庭审理。

法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黄励答：我叫张秀兰。

问：受过什么教育？

答：没有。

……………①

于是法官要求市公安局督察符某报告案情。符某说，四月九日被捕的共产党员廖平凡（即周光亚）供称，张秀兰即黄励，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法官当即喊廖平凡出庭指认。

当黄励看见周光亚被带上法庭时，眼睛里立刻喷发出愤怒的火焰。她几口唾沫吐在叛徒的脸上，厉声骂道：“你这个无耻叛徒，还有脸来见我！赶快滚开，不要站在我的面前，玷污了我的眼睛。”

法官大声喊道：“这是法庭，你竟敢在法庭上蛮横辱骂证人！”

黄励愤怒地回答：“对这些叛徒就是要骂。你们这种法庭专门迫害革命者，将来在我们的法庭上，不但要审判叛徒，还

①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讯笔录，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要审判你们这些‘法官’！”

法官狡猾地反诘道：“这么说，你承认你是黄励，承认你是共产党了？”

黄励豪迈地回答说：“我就是共产党员黄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共产党的事我做了很多，就是不告诉你们！”

“你们国民党不抗日，甘当亡国奴，还不许共产党抗日，逮捕和屠杀爱国者。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打倒你们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和走狗！”

法官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你说国民党投降卖国有何证据？”

黄励理直气壮地回答：“前年‘九·一八事变’，是谁不放一枪就退出沈阳，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去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奋战，是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是谁迫使十九路军撤退、逮捕和屠杀爱国群众？这些不是投降卖国又是什么？……”^①

法官急得大声嚎叫：“黄励，住口，不许你在法庭上作宣传。”接着就宣布黄励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归案讯办”，匆匆退庭。

当年的上海《申报》对这次审讯作了如下报导：“闻高三分院提审时，张秀兰……对庭上所询，一味强硬顶撞，答非所问，是日公安局到案迎提，并将其书记某甲带案质对。张见甲面时，怒目狰狞，恨不能一口吞甲下肚，以伸其泄露秘密之恨，……”^②。

^①帅孟奇：《忆念黄励同志》。

^②1933年6月2日上海《申报》。

黄励被捕后，党立即展开了紧张的营救工作。五月三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营救黄励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黄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是上海无产阶级所信赖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她在被捕后勇敢坚决，在法庭上怒斥敌人和叛徒，不愧是中国革命斗争的领袖。”通知要求，各区应在群众营救会的基础上，组织区委员会乃至全上海的营救委员会，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释放黄励及一切政治犯。通知并要求党组织，大力宣传黄励被捕后的英勇斗争事迹，充分揭露叛徒周光亚及一切叛徒叛变投敌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动员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营救黄励^①。

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急速将黄励解到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叛徒王云程、胡大海、汪盛狄等来找黄励谈话。黄励看到这伙叛徒，心里顿时升起一团怒火，挖苦他们是“国民党的新同志。”黄励说：“你们满口讲的都是违背自己良心的谎话。如果关起门来，没有国民党的威胁时，你们应该承认自己的罪恶行为了吧？你们这些叛徒，自称学会了马列主义，可是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出卖灵魂甘当敌人的奴才！”^②这些家伙被骂得无言以对，以后再也不敢来找她谈话了。

敌人妄想动摇黄励的革命意志，把她安排到所谓“优待室”住，一个人一间房子，而且不上锁，让她随意出入，还可以看报纸，并让人给她送来板鸭、香肚等上等食品。黄励从来

^①1933年5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紧急通知》，原件存上海一大纪念馆。

^②叶获生：《关于黄励烈士的一些情况》，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不吃这些东西，如遇上有生病的难友，她就送给他们吃。她还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消息，暗中告诉难友们。敌人的阴谋失败了，只得把她调出“优待室”，送回原来的号子。

黄励对敌人恨之入骨，对狱中的革命同志却十分关心。她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国际歌》，还把苏联的《海员歌》译成中文来唱，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立场与敌人斗争。在黄励的帮助和影响下，难友们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一位同志撕毁了写了一半的自首书；另一位同志在敌人送来的自首书上，写下了怒斥国民党卖国投降的声明；戴云同志在黄励鼓励下坚持在狱中学习文化，准备以后为党工作。

敌人为了限制黄励的活动，减少她对别人的影响，把她关到两人一间的新号子，妄想以此把她孤立起来。然而敌人又失败了，黄励在新号子里继续斗争。每天晚饭后“放风”的时候，她就积极活动，找同志谈话，鼓励大家坚持下去。敌人无奈，只得又将她押回原号子。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把她一人关进看守所办公室旁边一间小屋内。小屋前是革命同志被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第二天凌晨，敌人从男监里一连拉出了十几位同志，经过这里押到雨花台枪杀，想以此来吓倒黄励。黄励坚定地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敌人的阴谋又失败了。

监狱里一个青年看守张良诚，原是一个孤儿，在陈赓、黄励、夏之栩等的争取教育下，他鄙视叛徒，同情狱中的政治犯，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领导人尤为敬佩。

有一天，黄励对张良诚说：“你年轻，又诚实，很好。当一名所丁，这样下去很可惜。青年人要有志气，找出路。”

张问：“怎样找出路呢？”

黄励说：“你在司令部是没法找到出路的。”

张又问：“要向哪一方面找出路呢？”

黄励回答说：“共产党是不讲资格的，你想找出路，只有走这条路。”^①

此后，张良诚常暗中给政治犯传递条子，甚至把某某人叛变的消息告诉他们。当时与黄励同号子的一位难友，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一位女看守很喜欢这个孩子，常常从牢房送饭的门洞里把孩子拖出去抱，其他看守也抢着抱，张良诚也抱。日子长了，同志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写好的条子装在孩子衣服口袋里，告诉张良诚送男号子某人。张良诚就把孩子抱到男号子去巡逻，男号子的难友就从牢房门洞里把孩子拖进去，逗孩子玩，顺便摸走字条。写回条也用这个办法。

陈赓被营救出狱后，离开南京之前托张良诚带一张字条和五块钱给黄励，被当时与黄励同室的一个叛徒告密，敌人立即将张良诚关押审讯。原判徒刑三年，可是宪兵司令谷正伦认为情节严重，为了杀一儆百，将张改判“枪决”。当张良诚被押赴刑场时，他象共产党员一样，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震惊全监。看守所长的文书金国南是张良诚的好友，他也在陈赓、黄励、夏之栩等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到了延安。

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均告失败，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示迅速处决黄励。同号子的难友钱瑛、夏之栩等，特地为她准备了一套就义时穿的干净衣服。黄励也知道自己牺牲的日子

^①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官李华龙供词，存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不远了，但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仍然谈笑自若。当难友们问到她的情况时，她拍拍后脑勺幽默地说：“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①“放风”时，她总是抱着同号子那位难友的女孩，在小院里边走边唱，她坚信革命必将胜利，事业后继有人。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凌晨，狱卒传呼黄励。黄励换上难友们为她准备好的衣服，用手理了理头发，向同室难友们一一告别。她叮嘱难友们：“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的！不要为我难过。保重身体，将来为党工作。”当她步出牢房时，整个女监的难友们几乎都痛哭流涕，有的人还高呼“黄大姐！”尽管狱卒厉声催逼，黄励从容地走向过道，当她看见两旁门洞里有人时，就高声说：“我去了，同志们不要哭，要坚持革命到底呀！”^②一出铁门，就传来她响亮的口号声：“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接着是嘹亮的《国际歌》声。全监震动了，许多难友伴随着唱起了《国际歌》。

囚车在向前疾驰。在囚车上，黄励抓紧这段宝贵的时间，做了最后一次共产主义宣传。她对押送她的国民党宪兵们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枪毙一个人可以得到两块钱养家，我同情你们生活困难。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站在穷苦人一边，为帮助穷苦人翻身而闹革命的！中国的革命者，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都是爱国的。革命者不怕死，也是杀不完的！国民党干尽了坏

①程子健：《黄丽烈士材料》，存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②郁正维：《烈士黄励在狱中表现的片断》，存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事，屠杀革命者，寿命是不会长久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起来打倒它，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①讲完后，她高呼口号，又唱起了《国际歌》。

在雨花台刑场，行刑的刽子手慌乱得发抖，怎么也瞄不准，接连放了好几枪，才完成了他们罪恶的使命。

^①罗合如：《关于黄丽同志》，存雨花台烈士陵园史料室。

蔡 协 民

刘 贯 康

蔡协民，湖南省华容县人，生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青年时就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投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八月，党送他到广州进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十二月上旬毕业后，党派他回华容县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蔡协民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从广州经长沙回到华容县，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向广大群众讲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介绍广州的大好革命形势及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号召群众起来开展反帝反军阀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另一方面，秘密进行组织建设工作，发展党、团员，建立了中共华容县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同时，深入群众中访贫问苦，联系农民、教师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开办平民学校，并成立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区分部，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国民党师范学校区分部、黄湖山区分部等七个区分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党华容县党部，蔡协民任农民部长。在蔡协民的领导下，华容县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各地农协组织逐渐建立。华容县城内的店员、木工、缝纫等工人也分别建立了工

会组织。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胜利进军抵达华容县境，党即通过农民协会、工会及学生团体等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学生群众直接参战。同时组织侦探队、慰劳队、运输队，为北伐军放哨、捉间谍、带路、送信、运送粮食和弹药，支持北伐战争。十月十日，蔡协民率领三千多群众在县城举行庆祝北伐胜利游行示威，并开展对被称为“华容王”的恶霸劣绅张巨卿的斗争。在北伐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华容县就有四个区四十九个乡建立了农会组织，并成立了县农民协会，蔡协民任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与此同时，中共华容支部改为华容特支，蔡协民任特支书记。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华容县委成立，杜经修任县委书记，蔡协民任组织部长。在县委领导下，华容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十万余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二千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的许克祥也于五月二十一日进攻长沙的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由于陈独秀一再妥协退让，党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血腥屠杀，致使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被反动派扼杀了。

“马日事变”后，蔡协民被反动派通缉，党派他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工作。不久，他随军离开武汉抵达江西的南昌。

蔡协民到达南昌后，参加了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的连指导员。起义军撤出南昌后，蔡协民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转战到粤北、湖南一带活动。一九二七年底，蔡协民被派往湖

南郴县开展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暴动，蔡协民率领郴县农民武装参加了湘南暴动。一九二八年四月，蔡协民跟随朱德、陈毅带领湘南暴动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宁冈耒市胜利会师。

一九二九年一月，蔡协民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三月中旬，在闽西长汀县长岭寨，歼灭军阀郭凤鸣部，占领闽西重镇汀州城。红四军在长汀整编，军部下辖三个纵队。四月初，回师赣南后，红四军前委任命蔡协民为第三纵队党代表，伍中豪任纵队司令。五月间，红军第二次进军闽西，龙磔一役歼灭敌陈国辉部主力三千余人，解放了龙磔城。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并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闽西的土地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七月间，中共闽西特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上杭蛟洋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决定调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参加闽西特委工作，领导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闽西第一次党代会上，蔡协民当选为闽西特委委员、组织科科长。

蔡协民参加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工作后，与特委书记邓子恢、军委书记张鼎丞等人一起，领导闽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那时，各县、区、乡先后成立了红色政权，在五十多个区、六百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闽西特委按照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没收一切地主土豪的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乡村人口为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闽西苏区的八十多万人获得了土地，

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

一九二九年冬，党调蔡协民到中共福建省委工作，在厦门、福州等地开展白区斗争。蔡协民到中共福建省委工作后，最初是在省委军委任秘书，协助省委军委书记王海萍开展兵运工作，指导福建各地的武装斗争，后调任省委秘书。一九三〇年八月，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把党、团、工会等组织合并，成立福建省行动委员会，罗明任行委书记，蔡协民任秘书长。这时，蔡协民和罗明、王德（曾宗乾）等人，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领导是有所抵制的，他们不同意中央对福建形势的分析，反对中央要闽西红军出击粤东的错误决定，因而被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李立三“左”倾错误被纠正后，十一月，福建省行动委员会解散，党、团、工会等分别恢复原有组织系统活动。蔡协民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德先后调离，由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福建省委由王海萍代理省委书记，杨峻德（杨实）任省委秘书长，蔡协民任省委军委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这时，蔡协民和邓子恢等一起，以福州为中心，领导包括闽北、闽东和莆田、福清等地的革命斗争，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在农村建立农会组织，发动“五抗”斗争，并在莆田、仙游、连江、福安等县建立武装，进行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三月二十五日，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被敌特破坏，杨峻德、李国珍等人被捕，先后牺牲。为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党、团两个省委和省互济会撤出厦门，迁到福州。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为继续接受中央指导，领导福建各地革命斗争，决定由蔡协

民、曾志、董云阁建立临时省委机构，由蔡协民负责召集会议，开展工作。四月底，王海萍从上海回到福州，带回中央指示：在斗争环境极端恶化的情况下，临时省委机构撤销，原省委领导人以巡视员身分分别到各地指导斗争。王海萍到漳属一带巡视，邓子恢到莆、仙及福州邻县巡视，蔡协民到泉州一带巡视，指导各地党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蔡协民不顾反动军警、特务的搜捕，带病进行工作，使各地党的组织没有因省委机关遭破坏而失去联系。七月，党中央决定福建省委暂不恢复，成立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和闽东、闽北的斗争，并任命王海萍为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蔡协民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蔡协民领导和发动福州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抗议国民党政府反共卖国政策，号召群众起来共同抗日。同时，在连江、长乐、福安等县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在蔡协民、邓子恢领导下，闽东、闽北及莆田、仙游各县的革命斗争处于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

一九三二年一月，蔡协民调厦门中心市委工作，陶铸接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三月，蔡协民以市委巡视员身分到惠安县领导和发动惠安群众的抗捐斗争。地方军阀陈国辉为搜刮民财，扩大反动武装，强令惠安农民扩大种植鸦片，抽取巨额鸦片烟税以饱私囊。广大农民群众对陈国辉的横征暴敛，压榨人民的罪恶极为不满，纷纷起来反抗。蔡协民到惠安后，同中共惠安县委一起，组织和发动惠安农民开展抗捐运动。蔡协民在惠北以兰朱乡为中心，发动周围十八个乡的群众，团结各阶层

反抗陈国辉的力量（如惠安的“四八”、“五三”两个封建帮会组织，拥有三四百名武装力量，他们与陈国辉有矛盾）。在抗捐斗争中，党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发挥这些武装的作用。当陈国辉派军队镇压群众的时候，党即发动群众连同这些帮会武装共八百多人包围敌军一个团，坚持斗争了两个多月。最后，这场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运动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从江西赣州分三路向福建进军，经闽西直下闽南，击溃敌张贞师主力，东路军于二十日解放了漳州。蔡协民、邓子恢、陶铸等到漳州迎接中央红军。在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的领导与帮助下，闽南革命委员会在漳州宣告成立，王占春任主席。同时，中共闽南特委改为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王占春、冯翼飞、尹林平等为委员，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直接领导。在中央红军的协助下，蔡协民、邓子恢、王海萍等分别到漳浦、龙溪等地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发动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并建立地方武装。五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漳州回师江西，蔡协民和王占春领导漳属一带的地方武装在漳浦赤区进行整编，成立了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蔡协民兼任总指挥，冯翼飞任团长，尹林平任副团长，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发展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在闽南的统治，反动派非常恐慌，于是调动军警残酷“围剿”红军游击队和闽南苏区。闽南红军第三团在蔡协民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围攻。后来，由于执行分兵把口、坚守东本的错误战略方针而失利，王占春、冯翼飞先后壮烈牺牲，部队损失过半。为此，红三团集中在小山城、龙岭整训。漳州中心县委在龙岭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东本失利的经

验教训。这一期间，改组了中心县委领导机构。十月，蔡协民、曾志调厦门中心市委工作。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对蔡协民采取了错误的过“左”的组织处分。蔡协民受到“左”倾错误的打击，到上海党中央汇报申诉，由于错误地被内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蔡协民在上海与党中央接不上关系，遂经福州返回厦门。厦门中心市委停止蔡协民的组织关系，决定他到市郊从事打石头等劳动，进行考察。蔡协民虽然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打击，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一日三餐都难以温饱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抱病坚持为党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党派蔡协民到安溪县任中心县委秘书。蔡协民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有丰富的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的革命者。他到安溪后，积极参与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的游击战争逐步发展起来，有力的影响与推动了福建各地的斗争。同年年底，党调蔡协民回厦门开展城市的基层工作，在工人群众中秘密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陈之枢等人叛变投敌，福州党组织受到巨大的损失。由于叛徒的告密，四月十六日，厦门党组织领导的互济会也遭到敌人的破坏。蔡协民不幸被捕。在狱中，蔡协民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和威迫利诱，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的气节。五月，蔡协民被敌人杀害于福建漳州，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福建省委、厦门中心市委的有关报告。
2. 蔡协民致中央和市委的报告。
3. 程学敬：《回忆湖南华容县党的创立和早期活动》。
4. 访问罗明等人记录。

邓乾元

严延桃 欧阳仪

邓乾元，名兴坤，化名董清，生于一九〇四年五月，湖南省溆浦县新坪乡车头村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学运、农运、工运、兵运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工作。曾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武汉军委委员、红八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一九三四年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不幸牺牲于江西瑞金，时年三十岁。

投身革命洪流

邓乾元的父亲邓绍叶，别号迎丰，略识文字，精明能干，其母为一农家妇女，为人淳厚朴实。他家以种田为主，亦农亦商，开一爿“迎丰商号”，经营小本生意，常年磨豆腐。由于经营有方，二十年代初，已有田地三十余亩，成了一个小康之家。绍叶有三子，乾元居大，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父母对他寄望甚厚。

一九二二年秋，邓乾元从溆浦二区高级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常德隽德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办的基督教教会

学校。邓乾元学习勤奋，对英语很感兴趣，憧憬着将来当一名出色的翻译。学了不到两年，就能口译笔译，堪称全校的高材生。

常德是湘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湘西的革命摇篮。一九二二年，这里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从此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三年上学期，邓乾元在旅常德读书的溆浦籍团员同学的帮助和启发下，冲破学校当局的重重阻挠，应邀参加了常德省立第二师范的团组织主持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基督教的宣传队。他中等身材，长得眉清目秀，红润的脸上透出一股英气，戴一副咖啡色眼镜，显得文雅大方；且思路敏捷，能说会道。他的演技甚佳，常扮演女主角，演得惟妙惟肖，活龙活现，深得观众和同学的好评。这期间，他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及其它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联，不改变军阀混战、列强横行的局面，不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自己的美好愿望终将化为泡影。在斗争实践中，他从一个一心想当翻译的书生，变成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立志投身于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

一九二四年夏，邓乾元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委为隽德中学团支部书记。这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委作出了一项决定：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必须在下学期开学之前瓦解隽德中学，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邓乾元。隽德中学是美帝国主义者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所学校，要摧毁它，谈何容易！而邓乾元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与学校团支部的同志们一道，利用暑假期间学校教师大都回家度假的有利时机，日夜奔走于同学家中，

做同学及家长的思想工作。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揭露帝国主义者利用教堂和教会学校作工具，进行文化侵略，麻痹、毒害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并以常德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请省学联出面，把退出隽德中学的学生全部转到其它学校。邓乾元的爱国行动，使许多学生和家长深受感动。经过将近一月的努力，隽德中学这个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反动堡垒，终于土崩瓦解了。

随后，邓乾元转入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湖南大学前身）学习。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选为省学联负责人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常德的国民党右派与我党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在青年学生中，我党、团领导的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这集中表现在争夺对常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问题上。这种斗争，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尤为突出。该校的反动学生自从在一次学联代表大会上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争夺学联领导权失败后，经常采取打架斗殴等手段，来破坏团的组织及其对学联的领导，双方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常德第二师范内国民党右派的一伙爪牙，趁该校团支部秘密开会之际，手持刀棒，打伤并抓走了四位党、团员同学。在反动校长张伯良的操纵和策划下，四位同学被送到常德地方法院关押，蓄意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二师事件”。

事发之后，学校当局又借故开除了滕代远等三十多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的学籍。接着，常德地方法院电告伪省长叶开鑫，说被他们关押的四位同学是“过激党”，“聚众闹事”，“伤害人命”。反动省长叶开鑫复电：就地处决。与此同时，常

德的共青团组织以常德学联的名义派代表赴长沙请愿。中共湖南区委闻讯后，立即派邓乾元率十余人以省学联和济难会的名义出面，前往常德进行营救。当时，敌人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情况危急，刻不容缓。邓乾元到常德后，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到处奔走呼号，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伪法院不敢轻率判决，反动驻军亦不敢贸然行动。时值北伐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对此，常德的反动派惶恐不安，迫不及待地强迫伪法院对四位同学作出极刑处置。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争取时间，邓乾元废寝忘食地与党、团员们商量对策，研究营救的办法，最后决定请律师出庭辩护。可是，对于这样一件生命攸关的案子，地方上那些挂牌的律师都不敢接手，唯恐招致祸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出庭辩护的律师姚某。他却提出必须先交二百元大洋，否则不干。为了把自己的战友尽快救出虎口，邓乾元四处奔波，辗转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终于凑足了这笔钱，如数交给姚律师。姚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和案情，对伪法官强加在四位同学头上的罪名一一予以辩驳，弄得伪法官哑口无言，尴尬不堪。在众目睽睽之下，伪法官理屈词穷，只好暂缓判决。是年八月，北伐军攻克长沙，贺龙挥师逼近常德，政治局势为之一变。常德驻军师长贺耀祖迫于形势，表示同情被捕的四位学生；伪法官也只好宣布将被囚四个多月的四位同学无罪释放。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终于以革命者的胜利而告结束。

一九二六年初，邓乾元在长沙邀集四百多名旅省湘籍学生组织了“湘浦学友会”，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他们投入革命，他被推选为总务主任（即会长）。他领导湘浦学友会会员一并加入了反帝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

并代表学友会撰写了《本会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刊载于溆浦学友会主办的《溆浦月刊》第一期之首。在《宣言》中，他写道：“最狡猾最残暴之帝国主义者即利用其先锋队侦探系——基督教——插足其间，以自由实行其非革命之奴隶教育，既假借名流，恐吓官吏以遂其武断乡曲，包揽词讼之兽欲；复罗致娼妓，利用金钱以成其引诱良民，收买教徒之目的。……对此民族革命前途之障碍物，禁止爱国之帝国主义的宣传品，自不能不奋全力排诸于太平洋之外。”他号召广大群众一律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掀起“反基督教大运动”，“驱彼佗奴”；对于那些“奉迎洋人，狼狽为奸以欺吾父兄，以残我兄弟姊妹者，誓与溆民共诛之”。他还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状和当时青年学生苦闷、彷徨的思想状况，写了《解决“前途茫茫”的两条汽车路》，明确地提出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才能拯救濒临危亡的祖国，中国人民才能从受剥削受压迫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他写道：“学生的使命是要替社会谋利益的，单只为解决个人生活而求学的人，便不是真的学生，是人类的米虫。”“学生最宜注意的就是看社会上需要甚么？然后学生给他们找起来，才是学生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社会到底需要什么呢？若果我们放眼一看，便可见整千整万的饥民正在惨风凄雨中嗷嗷待哺。再看乡村中不知觉的极困苦极可怜的农民，虽日夜不辍的耕作，也是朝不保夕的，所以妻离子散。更有工厂里一日做近二十点钟工作的工人，等到血汗出尽，便驱出工厂以外，绝不会有人顾恤的。”“中国处此半殖民地地位，事事被外国人奴视，而我国的军阀，由是甘心受人指挥——干他继续不断的压民政策，‘二七’、‘五卅’便是两个实例。由以上种种的情形看来，我们纵少已经看见社会上的

需要是打不平了。”“到底怎样才可以使经济问题解决呢？据我的意思，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条路。”他的精辟论断，象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涟漪一样，打动了青年学生的心，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这年暑假期间，旅省的溆浦学生和党、团员纷纷回县，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开展农民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天主堂！”的口号震撼大地。随即，天主堂被捣毁，神甫被赶走，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溆浦城乡。

领导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冬，邓乾元与刘英等一道赴武昌两湖党校学习。结业后回长沙。是年底，由湖南区委派赴汉寿，以省委特派员和中共汉寿特支书记的双重身份，负责筹建汉寿县委，指导以农运为中心的各项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继任汉寿县委书记。在以他为首的县委领导下，汉寿县各级党团、工会、农协等组织迅速发展，斗争土豪劣绅、减租退押、清理公产、封仓平粜、阻止盗卖粮食出境、严禁盗匪、禁吸鸦片、不准打牌赌博、扫除封建迷信等活动在全县城乡普遍开展。同时，经过他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很快成立了。并先后打垮了鸭子港团防局及镇龙庵团防局，赶走了反动的县团防局长，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还制造了上千把梭镖、大刀。不到半年，工人纠察队发展到三百多人，农民自卫军多达四、五千人。

在异常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邓乾元还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在汉寿西南乡修筑了沧港义护堤，并修复了鸭子港的大障

废墟。

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和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的危急情况下，邓乾元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全体党员和干部立即下乡，发动群众，坚持斗争，詹乐贫等率领工农武装撤往笑腾港、云台山一带，加紧扩大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帅孟奇去武汉与中央取联系；邓乾元亲赴长沙，打听省委的消息。各项工作安排停当之后，他匆匆离开汉寿，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秋收暴动中

为了避免敌人注意，邓乾元扮成商人，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他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经历了多少艰险，才找到了省委。他被安排在省委组织部，负责全省地下党、团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尽管这里的环境异常险恶，他却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为党的事业顽强地战斗着。

马日事变之后，衡阳女师共青团员董彩云、董彩霞姐妹因被反动当局通缉而辗转到长沙，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董彩云被分配在省委组织部，与邓乾元一道工作。在朝夕相处中，他们之间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不久，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有情人结成了革命伴侣。翌年夏，董彩云在株州工作时不幸被捕，解回衡山监狱关押，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她临产前夕，反动当局才允其亲属保出分娩。彩云出狱两天后，生下一男孩，邓乾元曾在与彩云临别时嘱咐说：“今后我们可能很难见面了，也许只有梦中相见。你生下的不管是儿是女，叫‘梦莲’好了，愿他（她）象莲花那样纯洁无瑕，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一

男孩取名梦莲。随后，彩云逃亡他乡，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年之后，因贫病交加，离开人间。邓乾元与儿子始终未曾见过一面。解放前夕，梦莲已成长为一个英俊彪悍的棒小伙子。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安新邵溆边区游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组织和部署秋收暴动，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八日回到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讨论了秋收起义的有关问题，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确定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安源、岳阳等县于九月十一日同时暴动，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指派邓乾元为中共醴陵县委书记。

九月初，邓乾元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秋收暴动，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我党掌握的部分矿警队及萍乡、醴陵、安源、莲花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王新亚任团长，邓乾元为政委。会议还指定二团自安源一带出发，经东门市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前进，然后逼近长沙。

会后，邓乾元回到醴陵，立即决定在西一区雷钵山召开区委书记和各区、乡农运特派员会议，传达省委决定，部署秋收暴动。由于开会通知被交通员不慎丢失，只得改为个别传达。但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反动部队窜到醴陵，“大杀特杀，杀得醴陵成了一个血县，比较革命的人及家庭，无人免于难者，死者一千多数，伤者不计其数”。因此工农革命团体被封闭，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短期内组织武装暴动，绝非易事。然而，邓乾元并未因此而退缩。他紧紧依靠原有的五百多名党员，深入群众，秘密串连，层层发动，很

快发展了六百多名新党员，全县有十三个区先后恢复、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农民武装。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传达后，各区乡立即开始筹集武器，侦察敌情，部署武装力量。仅几天时间，就搜集到梭镖七百多支，驳壳枪七支，步枪三十多支，机枪一挺。同时，摸清了敌军在醴陵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并派人深入敌巢，进行策反，争取到伪警备队在暴动时保持中立。为了配合革命军合攻醴陵县城，还组织了二百余名党员和武装农民；并计划于部队攻城时劫狱、组织出狱的同志参加战斗。

九月九日晚，城区工作的同志秘密处决了马日事变后在醴陵疯狂清乡的刽子手、清乡委员彭成美。十一日晚上八时许，全县四乡农村掀起总暴动。十二日下午，农民武装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向守城顽敌发起猛烈的进攻，一举攻克醴陵城。当天傍晚，邓乾元同县委其他同志与部队一道，着手建立红色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召开军民联欢会，公布有关政策和军队纪律，号召市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秩序；公开成立工、农、商、青、妇革命群众组织。县农协发出通令：恢复各级农协，征调武装农民保卫县城。县总工会召开各行业工会联席会议，决定重新建立工人纠察队。同时，成立了宣传队、慰劳队，广泛宣传秋收暴动的伟大意义，慰劳革命军队，散发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土地革命和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大纲。一时，“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胜利万岁！”等标语口号，贴满全城，蔚为壮观。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场面，到处的欢欣鼓舞的人们！昔日死气沉沉的醴陵，经过这一番革命的洗礼，气氛全变了！

秋收起义极大地震惊了湘赣两省的反动派，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锻炼了党和人民，壮大了革命军队，使我们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坚持边界斗争

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八年春，邓乾元离开醴陵不久，湖南省委派他到井冈山，一度曾担任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同年十二月，湘赣边界特委改组，组成了以邓乾元为书记，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的湘赣边界特委。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军与红五军军委及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南进军，以调动进攻井冈山之敌，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坚守井冈山，领导和发动根据地军民作好反“会剿”斗争的准备工作，以便打破敌人的“会剿”，巩固边界政权。邓乾元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第二天，就召集边界特委和红五军负责人在下庄开会，具体研究如何坚守井冈山，巩固根据地的问题。

一月二十五日，湘赣两省的敌人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举进攻。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英勇顽强痛击进犯之敌，激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黄洋界、八面

山等阵地被敌人攻破。二月，敌人占领了井冈山。特委随五军撤退至遂川边境时，被敌人冲散，邓乾元被迫转移到鄱县大院，继续坚持斗争。

四月，邓乾元返回边界，与陈正人、朱昌偕、宛希先等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恢复特委，成立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随即进行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邓乾元身先士卒，带领全体特委常委深入各县直至支部，帮助基层整顿党的组织、清理投机动摇分子。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永新、莲花、宁冈、茶县、遂川、恭陵等县都相继成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区委、特别区委，党员发展到五千人左右。这不仅为整个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领导骨干，而且为以后湘赣省委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邓乾元先后几次以特委的名义指示各级党组织：赤卫队集中指挥，以打击分散的敌人；尽可能地武装赤色区域的群众，领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并尽量进行黑夜游击，扰乱敌人，使其不能驻扎；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策略：对于转为灰色的区域，在不失掉群众的原则下允许其尽量灰色；不能灰色的区域尽量武装、积极备战，准备在敌人搜山时四面打击敌人。虽然敌人乘根据地兵力空虚之机占据了边界大部分地方，但邓乾元却在这些艰难的情况下，领导边界军民坚持斗争，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逐步地恢复和发展了边界各县的红色政权。永新、宁冈都有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存在；莲花、茶陵、鄱县、遂川有公开的割据区域；永新还有秘密的苏维埃政权。湘赣边界在没有正规红军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奋战，先后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重要军事根据地。地方武装在斗争中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五月初，红五军奉前委命令重返湘赣边界，边界的力量顿增。为了重新布置边界的全盘工作，改变边界的工作方式，与五军共同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邓乾元于五月十日在宁冈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问题及特委本身的工作，讨论了前委给特委的信，根据东固根据地的经验和边界斗争的实际，决定对边界的工作采取由公开割据转为秘密割据的方式；对地方武装采取集中统一指挥和分散游击的战略战术；制定了游击工作大纲，并规定了游击政策，划分了游击工作区域。根据客观形势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决定把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由宁冈转到永新，从此大力经营永新。以邓乾元为首的边界特委，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的行动纲领，具体体现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会议作出的集兵政策，不仅适应当时的时局，而且充分再现了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在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邓乾元领导边界军民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牵制和打击了大量的敌人，为红四军主力顺利地进入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使其发展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八月，邓乾元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途经汉口时，向湖南省委写了《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情况和经验教训，为湖南省委于同年九月六日作出的《湖南省委关于湘赣边界工作决议案》提供了依据。他在报告中，根据边界

党的现状，就如何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提出了鲜明的、很有见地的看法。指出：“如欲改造边界党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其基本工作有两项：第一是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之意识领导，……第二是要严密党的组织，认真执行列宁党的章程，不按选举程序参加支部会议、交纳党费及不努力工作者，应严格洗刷。”这些见解，是很有意义的。

组织大冶兵暴

一九二九年十月，邓乾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与柯庆施、石仲伟一道，风尘仆仆地奔赴鄂西，寻找宜昌起义的部队，将该部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七军，由他们三人组成该军前敌委员会，负责第七军的军事行动。但到宜昌后，由于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无法联系，又找不到起义部队，只得返回汉口，请示中央军委。军委改派以柯庆施为书记，邓乾元、石仲伟为委员的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武汉军委，领导湖北、湘北、豫南地区的军事组织工作，开展游击斗争。

武汉军委成立不久，即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秘密交通站设在武昌北郊的一所小学里，共产党员赵品三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负责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一天，赵品三同程子华在汉口的一个旅馆里会见柯庆施、邓乾元、石仲伟等人。程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独立十五旅任排长，全旅有三十多名党员，他是负责人。程子华汇报说，独立十五旅奉命将开往大冶、阳新一带去打红军，他们准备趁机在大冶举行兵暴，组织前线起义。柯、邓、石听了当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派石仲伟回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和请示兵暴的有关问题；邓乾元

随部队前往，负责沟通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同起义部队的联系。

邓乾元经过许多周折，打通了同鄂东南特委和红五军第五纵队的联系。红五纵队随即开到浯源湖东岸兴隆铺、曹家院一带。大冶中心县委与五纵队负责人还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兵暴的战斗部署，决定程子华率起义部队在城内暴动，五纵队在外面攻城，并规定了有关的暗号。十二月十四日晚，大冶兵暴的枪声打响了！程子华带领五、六连的党员同志，按照预定的计划，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连里的一些反动军官，喊出了“兵暴，当红军去”的响亮口号。红五纵队紧密配合，向城内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里应外合，很快打垮了敌人的反抗，一举攻克大冶城，胜利实现了兵暴计划。这一仗，我军俘敌千余名，活捉敌营长和伪县长，缴枪九百多支。随后，起义部队与红军会合，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李灿担任五纵队司令员，何长工为政委，邓乾元为五纵队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为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五纵队由一千多人扩大到六千多人。

大冶兵暴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的继续。大冶兵暴的胜利，使得敌独立十五旅进剿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扩大了红军队伍，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为真理而战斗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在大冶刘仁八召开，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及鄂省党的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

五纵队扩编为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何长工。七月，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为政委。并将红五军和红八军编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兼五军军长，滕代远为总政治委员兼五军政委。旋即挥师南下。七月三日，五、八军紧密配合，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中旬，部队开到平江，军团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命令，决定红三军团与湘鄂赣边境地方武装配合攻打长沙。会上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大多数人认为，眼下蒋、冯、阎、李等军阀内战打得正烈，长沙城内兵力薄弱，且杂牌部队多，战斗力不强；而我军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打下岳阳后，武器弹药又得到了补充。因此，纷纷要求乘虚攻打长沙城。邓乾元力排众议，认为，尽管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就全国政局而言，大革命失败后所形成的敌强我弱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国民党控制了全国政权和经济，又与各帝国主义相勾结；各大中城市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其部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先进。在这种情况下，攻打长沙是徒劳无益的，是军事冒险主义的行动，是英雄式的拼命主义；要夺取武汉，红军的力量也还不够，倒不如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积极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只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

七月二十二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天岳书院草坪举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二十五日离开平江城，向长沙挺进。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冲破敌人层层防线，粉碎了敌人的重重阻截，于二十八日攻占了长沙城。八月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长沙疯狂反扑，形势顿时逆转。红三军团不得

不退出长沙，转战浏阳、平江一带。

英勇的红军虽然一举攻克湘军何健盘踞的老巢长沙城，威震湘鄂赣，影响到全国各地，大长了红军的志气。但是，正如何长工在《难忘的岁月》中说的那样：“攻打长沙，虽然不是按照立三同志的直接命令去打的，但却不容否认，是在上海会议‘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产物；它的胜利，在客观上又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毛泽东在回忆红军攻占长沙时也指出：“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建立国家政权，那末这种行为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在革命运动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期，企图把长沙当作一个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略上的错误。”如果按照邓乾元的意见，那将对革命更加有利；很可惜，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

红八军退出长沙撤到浏阳县城的当天晚上，军团部和五军也赶到浏阳。军团领导同志要八军继续前进三十里，让五军在浏阳城宿营。由于连日作战，指战员们非常疲劳，都已就地宿营。于是，何长工要邓乾元去军团部请示，让部队休息至拂晓再走。经请示后，未获同意。由于何长工坚持要休息到翌日拂晓，因而八军当晚没有行动。军团领导认为邓乾元不执行命令，第二天，突然下令撤销了他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派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这一处置，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何长工在《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中所说：“邓乾元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县级干部，后任湘赣特委书记，工作和思想都很有水平，到八军任政委后，在维护军团领导和五、八军团结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虽

然那天晚上和军团领导吵了几句嘴（以后才知道），未坚决执行命令，是不对的。但军团部当时也没开什么会，把问题讲清楚，就撤销他的职务，并缴枪牵马，此事处理得过于草率。以后并说，八军当晚开会要和五军分家等，我和健在的八军几位老战友都不知道有这个会。”

邓乾元被撤职后，虽经受了无数次批评，忍受了不少委屈，但仍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从不懈怠。八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五、八、十六各军党的代表大会改选前委。邓乾元致信，肯定了攻打长沙在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同时陈述了自己反对攻打长沙的种种理由，仍然坚持进攻长沙是军事冒险的拚命主义。因此，受到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并令其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

一九三二年初，邓乾元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一九三三年，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邓乾元被平白无故地打成 AB 团分子，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一九三四年长征前夕，被迫害致死。

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作出决定：凡被当作 AB 团误杀的，给予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看待。从而推倒了强加于邓乾元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在七大会上，毛泽东对邓乾元表示了深切的怀念之情，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

邓乾元对党忠诚，始终不渝，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无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或是在腥风血雨笼罩的地下斗争时期，还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临危不惧，一身正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勇于同党内的错误倾向进行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陈为人

吕芳文

陈为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创建中共东北地区的组织，保卫中共早期的珍贵文献资料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一)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陈福涛、伟人、陈涛、张惠生、张道立、张道惠、张明、张敏、蔚英等名字，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百家尾村一个贫苦农家。祖父陈世深壮年病逝。父亲陈昌寿，幼年寄居外祖父家，为人放牧，常受富人子弟欺凌。后来在五里营、大路铺等处佃耕和经商，逐渐发迹，又搬回祖籍百家尾居住。陈为人童年求知欲强，但家里无力供给读书，他便利用劳动之余，向邻里同龄学童求教，刻苦自学。一九一四年，十五岁的陈为人背着家人到县城沱江镇报考县立高等小学，被录取后，父亲竟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后经祖母说情和陈为人的苦苦哀求，父亲便以包下饲养耕牛为条件，同意他进校读书。一九一八年，陈为人高小毕业后，千里迢迢，由江华步行到衡州（即衡阳），考

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此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第三师范这个湖南地区的最高学府，是个新思潮奔涌的地方。陈为人从偏僻的山乡来到这里，学习分外发奋，除攻读规定课程外，常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翻阅各种新书报刊，汲取各种新知识，并结识了蒋先云、夏明翰、黄静源、肖明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为人与蒋先云等一道投入反日爱国斗争，曾被选为学联会代表，担任交际联络工作。在学联，陈为人竭力协助蒋先云、夏明翰等湖南学联负责人，组织全市游行示威和抵制、销毁日货的活动。一天，衡阳教育当局召集各中等学校校长在三师举行会议，密商对付爱国学生的办法。陈为人闻讯，立即与黄静源等跑到湖南学联和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通知蒋先云、夏明翰等，组织衡阳各校的爱国学生，赶赴会场，进行质问，揭露教育当局秉承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旨意，企图提早放暑假，分散爱国学生力量的阴谋，并争取一些开明校长和进步教师的支持，允许退出部分膳费，资助各校学生会，利用暑假组织宣传队、讲演团，分赴湖南各县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陈为人和肖明、蒋先云等在车站、码头和城郊农村，散发传单，演出《自由血》、《爱国泪》、《哀台湾》、《惩办曹章陆》等时事新剧，揭露日货充斥中国市场的危害，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土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

随后，陈为人同肖明、蒋先云等因积极投入驱逐张敬尧及其余孽的斗争，而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

这时，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和吴玉章等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消息传到湖南学生联合会，陈为人积极响应，回到县里申请了部分旅费赶赴上海。但有关当局却借口他耽搁时

日，私分了他赴法勤工俭学的一部分经费。陈为人出国不成，被窘困在上海，生活陷于绝境。一天，他来到黄浦江边，眼泪汪汪地望着滔滔江水，悲观颓唐。以上情景被一群常在江边散步的青年人看见。这群青年中，有个名叫李启汉的湖南人，竟是陈为人的江华同乡。异地遇乡亲，两人谈得格外投机。原来，李启汉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正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李启汉的介绍，陈为人结识了张太雷、罗亦农、刘少奇、许之桢等一批先进知识青年，思想受到很大启发。以后参与筹组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为了培养干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并为此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陈为人等二十余人，聚集在这里，学习俄语，学习有关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常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老渔阳里二号，向陈独秀、俞秀松等人求教，积极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他同李启汉一道，在小沙渡等处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分别担任日夜两班的教课任务；并同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印刷工人建立联系，组织工人俱乐部、工人游艺会等，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

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陈为人积极为《劳动界》写稿，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今日劳工的责任》、《劳工要有两种心》、《天冷与劳工》、《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劳工歌》等文章和诗歌，揭穿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我们底劳动力哪

里去了》一文中说：“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偏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而我们做工的人，“倒反不及那般坐吃的资本家有那样好的衣穿，好的吃食，好的房子住，好的器具使用；我们有时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最后，他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去了：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①。陈为人在《今日劳工的责任》一文中，向工人们发出呼吁说：“兄弟们呀！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隶，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我们自己努力去做呢！弟兄们啊！我们的责任既是这样大，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②从而唤起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共同革命，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陈为人和董锄平等六七人被列为第一批赴俄留学生。为了试探路线，组织决定陈为人一人先行。他辗转到达长春、哈尔滨，准备取道满洲里入俄。但他抵达满洲里时，已身无分文，连最后一笔车马费用也付不出了。于是，他只好写了一张便条，夹在土布背包里抵作川资，趁车夫上厕所时偷偷溜走。后与该地的苏俄同志取得联系，签好出境护照，先期启程赴赤塔。

陈为人到赤塔初，曾被苏俄方面误作间谍逮捕起来。他用

^{①②}原载《劳动界》第14、15期，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

俄语耐心解释，才消除了对方疑虑，获准通过。陈为人抵莫斯科不久，即与稍后转道日本、海参崴来俄的二十多个青年，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总结这段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说：“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能解决本身问题，何以能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此后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①

（二）

陈为人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短训班学习将近一年，一九二一年底奉调回国，被派到北京铁路工会工作。随后，他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铁路系统由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控制。北方几条主要铁路线，如津浦、正太、京绥、京汉和京奉等线，都塞满交通系的工头。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陈为人等确定“抓一个点，带一条线”的部署，首先集中力量把始发站党的工作做好，再以此为基础伸展到全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在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线的始发站——西直门站、前门站、前门西站以及永定门站建立起中共的基层支部，培养了一批骨干，从而为北方各铁路线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后，交通系内阁垮台，但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依然存在。吴佩孚为彻底排除异己，对工人进行拉

^①原件存中共江华县委党史办公室资料室

拢。李大钊和当时北方中共组织认为应利用军阀之间的这种矛盾，以扩大中共的活动和影响。于是，经吴佩孚同意，在北方一些主要铁路线上各派一名密查员，以巡查违章事件，也秘密侦察交通系的势力及其活动。北方中共组织便派陈为人、张昆弟、何孟雄等六人去交通部，被分配到京汉、津浦、京绥、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上工作。陈为人等名义上是交通部的密查员（后改为“视学”），实际是中共派往铁路上开展职工运动的特派员。陈为人主要是在正太路开展活动，有时，也到京奉路沿线去工作。他利用执行交通检查任务的名义，开展党的工作，如在铁路上建党建团，建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开展扫盲活动；罢免一些最坏的工头，打击反动势力，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

这年九月，中共山东组织负责人王尽美即将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调赴北方区专作工运工作。中共派陈为人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他认真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会议，肯定王尽美、邓恩铭自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山东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认为他们“作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工作，唤醒工人同志觉悟不少，党中央是熟知的。”^①他在王尽美的推荐下，介绍并发展了马克先等一批人为中共党员。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帮助王尽美等正式建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一说叫中央直属小组），推动山东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陈为人在济南还参加指导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山东社会主义

^① 《陈为人帮助建立中共山东党组织问题》，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

青年团书记王复元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的一封信，曾这样提到：“自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成立时，为人同志任主席，计十人出席，中央已接到报告，不再赘”^①。

为了贯彻中共二大的决定和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地区开辟党的工作。李大钊根据中国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罗章龙到东北考察工人运动回来报告的情况，立即委派陈为人、李震瀛去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建团工作。陈为人等于一九二三年三月抵哈尔滨后，首先认真了解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尤其是工运、学运等方面的形势。当时，哈尔滨除日文报刊外，中文报刊共有八家。他们发现只有《晨光报》“色彩比较鲜明，方向比较正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之下，文字力求白话通俗，以期人人易懂，特别为劳动者所喜爱阅读。”^②他们进一步了解到，一九二二年初，哈尔滨各界群众曾举行过反对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的大示威，并成立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其发起人和组织者韩铁声、于芳洲、张树屏、袁子安、沈矫如等一批青年，大部分都在《晨光报》工作。陈为人、李震瀛先以给《晨光报》投稿的机会，与韩铁声取得联系，后又以该报记者身份开展工作。由于他们才思敏捷、办事利索踏实，很快取得了韩铁声等进步青年的信任。他们把这些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与市内各学校、各文化团体和知识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开展工作。

六月，陈为人作为满洲中共组织的代表，以陈福涛的化

①《陈为人帮助建立中共山东党组织问题》。

②韩铁声：《忆陈为人同志》（1964年2月），未刊稿，原件存衡阳市湘南学联陈列馆。

名，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回到哈尔滨，宣传贯彻三大决议和宣言的精神，力倡国共合作，主张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和发展进步势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进步青年教员和工人中发展了汪洁曼、李铎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五人入团，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

八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彭守朴和陈作霖来哈尔滨，协助陈为人开展党团组织建设工作。不久，彭守朴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书记，兼作党务工作。接着，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成立。九月初，陈为人因在《晨光报》上发表的文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势力的攻击，哈尔滨当局也向《晨光报》发出警告。陈为人、李震瀛和该报负责人韩铁声被迫退出报社，旋即倡议创办哈尔滨通讯社。他们选好道里中国十四道街，作为秘密开展工作的据点，决定“以宣传消息、介绍文化、拥护舆论、编纂各项统计调查为宗旨”^①。九月中旬，通讯社获得官厅批准正式成立，社长由韩铁声出任，陈为人担任编辑主任，李震瀛担任新闻主任。哈尔滨通讯社建立起来后，即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联系，在业务上争取该台台长刘瀚的支持，由电台供给电讯稿，英、俄文新闻稿经由陈为人、李震瀛译成中文加以改编，再供给哈市和外埠地方报刊采用。陈为人和李震瀛还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各方采访，以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和劳动群众，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阵线。

九月下旬，陈为人等又“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宣传文化，改善社会为宗旨”^②，通过韩铁声向官厅备案，取得公开

①张福山：《陈为人同志在哈尔滨》，载《黑龙江史志》1985年第2期。

②韩铁声：《忆陈为人同志》。

办青年学院的合法权利，在道里外围二道街（现中医街）正式成立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学院设有政治经济组、文学组、哲学组、实业组和俄文班等班组，陈为人、李震瀛、韩铁声等人分别在有关班组任教。前来学习的许多青年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陈为人等的启发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东北中共组织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十二月十六日，陈为人主持召开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和哈尔滨团支部联席会议，决定党团员混合编成两个小组，在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青年工商运动和团体运动等方面，确定专人负责，广泛开展工作。陈为人和李震瀛还建立党在东北地区的临时交通线，担负起护送中共党员赴苏联的出境工作。

年底，原《晨光报》反动分子向奉天、吉林当局告密，形势逐渐恶化。陈为人、李震瀛二人转移到奉天、大连等地活动。他们在南满医大组织木铎社，开展学生运动；帮助整顿中华工学组织，向其负责人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工运情况，为其起草章程，使之与全国总工会建立联系。他们还到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三一小学等单位作讲演，进行革命宣传。这期间，他们发现和培养了关向应、赵悟生、傅景阳、杨志云、栗丰等一批工人知识青年，并吸收关向应、傅景阳等先进分子入党，为在当地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创造了条件。

（三）

一九二四年一月，陈为人被分配在中共上海区委从事工运工作。他先后深入上海、杭州等城市的职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宣传发动，恢复和建立工会组织，培养和发展先进分子入

团入党。一九二四年，他曾一度被调到中央宣传部门，协助蔡和森、高君宇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撰写了《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国民革命与劳工运动》、《工农教育》、《什么是工农运动》、《我们的教育》、《论日政府禁止华工入境》、《上海卷烟商人抗税失败》、《中俄邦交恢复中的列强干涉问题》、《废约运动》、《药山农民反抗贪吏劣绅》、《北洋大学学生的真正的对敌》等四十多篇政论和通讯、文章，在《向导》、《中国青年》和《平民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热情地赞扬了民众的革命精神，批驳了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的种种谬论，有力地支持了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陈为人奉命回到北京，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继赵世炎之后，兼任职工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他曾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和北方区委的决定，深入印刷和报馆行业的工人中进行活动。他先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的串连发动，成立了报业、印刷工会。这年年底，北京报业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这次罢工持续三天^①，取得了胜利。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陈为人领导北京市一千八百多名印刷工人举行前所未有的大罢工，迫使全城二十七家报馆停止出报多日，显示出北京的工人阶级觉悟以后的巨大力量。

随后，陈为人抓住这有利形势，发动京汉铁路印刷工人刘鉴

^①刘鉴堂：《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发行的经过》，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堂和工人骨干林维翰等，在东琉璃厂外太平巷一号（后迁往南池子小苏州胡同五号）组织工人俱乐部，相继接纳人力、搬运、五金、机械等行业工会和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财政部印刷局、电话局等工会加入“工人俱乐部”^①。在这个基础上，陈为人会商各行业工会负责人，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成立了北京市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北京市总工会，公开领导北京市的工人运动。

市总工会成立后，陈为人培养工会干部，还举办了职工训练班。他亲自上课，详细地向学员们介绍苏联职工运动的情况，用大量生动事实，从组织、人才等方面阐明职工在苏联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中国做职工运动的人们，有的以为吃苦耐劳就是做职工运动的本领。固然，做职工运动要吃苦耐劳，然而，尤须要有做职工运动的知识”^②。他要求做职工运动的同志，学习苏联的经验，珍惜和保护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做职工运动的骨干，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为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陈为人和陈乔年召集刘鉴堂等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第三教室开会，经过酝酿，决定创办北京地区党组织的第一个秘密印刷厂——昌华印刷局，以印刷《向导》、《政治生活》及有关传单。为时不久，这个印刷厂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时有警察和侦缉队前来查问。印刷厂遂转移到北城花枝胡同十一号，并改名为明星印刷局。在此期间，陈为人还主编过小型刊物《北京工人》，

^①刘鉴堂：《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发行的经过》。

^②为人：《苏联职工运动的现状》，载《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版。

并以“伟人”、“陈涛”等化名撰稿。该刊结合现实，通俗易懂，深受工人群众的好评^①。

陈为人在担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期间，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商同宣传部负责人赵世炎，在原石老娘胡同（现在西四北祖家街北边一个胡同）和北大三院，办起中共北方区委的第一所党校。首届学员有北京和北方各省市来的党团员骨干达两百多人。陈为人担任教员，讲授《职工运动》课程，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陈为人在领导职工运动的同时，还和农委书记李怀才等人一道，发动和组织顺义县农民举行抗捐暴动。京东一带的贫困农民一般每户都养有几只母鸡，以蛋换钱，补贴度日。那时，控制天津几个打蛋厂的洋商，百般刁卡农民，肆意降价收购鲜蛋，使农民蒙受重大损失。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派李怀才前往顺义县领导群众斗争。陈为人主动提出，要和李怀才一起去顺义。李大钊担心他忙，抽不出身。陈为人说：“职工运动方面的事，我已有所安排，可以离开一下。”李大钊这才表示同意。

陈为人和李怀才等人到顺义后，每日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往返一百四十余里；有时就干脆住在农民家里。在当地秘密党员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很快将养鸡户组织起来，一致不向天津外商打蛋厂送蛋，而将鸡蛋送往北京出售。接着，京东几个县的养鸡农户相率参加了抵制洋商盘剥的斗争。但狠毒的洋商串通顺义县衙门，在县城和通往北京的交通

^①赵庚奇、梁湘汉：《陈为人早期在北京工作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载《北京史苑》第1期，1982年版；笔者访问乐天宇的记录。

要道，层层增设税卡，强行敲诈勒索，妄图阻止农民将鸡蛋西运北京。群众气愤已极，纷纷向县当局质问：“我们卖的钱，连家小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钱缴税！”“洋人卡我们的脖子，你们也如此欺压我们，难道你们和洋人穿一条裤子不成？”在陈为人、李怀才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八百多“荷鸡子”的农民，在一个大集日，来到顺义县城，掀起了“八百条扁担打税局”的抗捐暴动。农民们个个抡起扁担，把县税局围得水泄不通，砸了税局的牌子，举行示威游行。反动当局被吓得“闭门五日”，惊呼：“共产党潜伏大杏洛(村)，借鸡卵捐苛税，哄动愚民入党，暴动。”^①一天深夜，反动军警突然袭击大杏洛村，陈为人不幸被捕。陈为人佯称是生意人，敌人搞不清他的身份，加上党组织的营救，不久获释出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学生界等团体在组织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后，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进一步组织国民大示威运动。陈为人与赵世炎、陈乔年等参加了李大钊领导下组织成立的行动委员会，陈为人负责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月底，工人、学生与市民连续在神武门、天安门等地举行国民大会，提出“打倒段政府”、“建立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会后，赵世炎、陈为人等带领各方面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借口大沽口事件，向我递交最后通牒，进行严重的挑衅，激起了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三月十七日，陈为人和刘伯庄、陈乔

^①赵庚奇、梁湘汉：《陈为人早期在北京工作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

年、邓洁、陈毅等，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有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等二百多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议在十八日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政府严正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在最后通牒上署名的帝国主义公使出境，废除不平条约。会后分两队到段祺瑞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重伤六人，轻伤数十人。

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主席台前悬挂着前一天受伤代表的血衣，引得满场群情激愤。大会在通过驳牒、驱公使等六项决议后，在李大钊率先引导下，陈为人、赵世炎、王一飞、陈毅等，组织各路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抵达国务院所在地铁狮子胡同，预先埋伏在附近的卫队士兵手执大刀、木棍向游行群众乱砍猛冲，继而开枪射击，造成死亡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的惨案。李大钊和陈为人、赵世炎、陈毅等站在最前列，一面掩护和指挥群众退却，一面布置抢救受伤人员。

当天晚上，陈为人等协助李大钊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席会议，议决务必坚持斗争到底，慰问受伤者，为死难者组织追悼会等；随之又参加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北京各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善后事宜。

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段祺瑞是“彰明昭著的卖国凶犯”；强调指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

三一八惨案后，陈为人继续留在北京地区从事地下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五月，他前往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就在这期间，李大钊等二十位革

命者惨遭奉系军阀杀害。陈为人在武汉出席了国民政府及武汉各界人士为李大钊等烈士召开的追悼会。后来，陈为人根据自己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曾说过：“黎明前的世界是最黑暗的，我们千万不要麻痹。”^①

陈为人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同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等商量决定，除留下几位同志在机关观察动向外，其他都转入地下活动。他化装潜伏在燕京大学，一面布置“善后事宜”，一面将党的文件和人员妥善转移。

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被破坏后，北方党失去了领导中枢。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五大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彭述之来北方恢复党的工作。彭述之到北方后，于八月一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第一届顺直省委，由彭述之任书记，刘伯庄负责组织，陈为人负责宣传兼工运。八七会议后，中共决定将北方党和顺直省委的领导机关转移天津。陈为人奉命率先去天津作出安排。他与刘伯庄等先住在天津大饭店，后在法租界天主堂屋后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一楼作客厅，二楼刘伯庄夫妇住用。陈为人与一位名叫韩慧英的教师及另一名叫李芳的北大女学生，组织一个假家庭，住进了三楼一套陈设讲究的房间。这样，为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了工作机关。当彭述之以北方局副书记和顺直省委副书记身份被中央派来天津后，为了保密和安全，陈为人等分散他住，建立临时工作机关。此后，陈为人与韩慧英正式结为革命伴侣，互相帮助，坚守在党的战斗岗位上。

后来，顺直省委应中央决定，在蔡和森主持下进行改组，

^①韩慧英：《追念陈为人》未刊稿，原件存烈士亲属陈爱昆处。

党组织处在更加秘密的状态下。九月二日，王荷波、蔡和森到达天津，他们召开了北方局扩大会议和顺直党的活动分子会，蔡和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开得较长。陈为人等认为天津环境日趋险恶，建议北方局不要继续驻在天津。北方局采纳陈为人等人的意见，又返回北京建立机关。

(四)

八七会议后（又一说在五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三省省委。邓洁等被派到大连后，不幸遭到逮捕，中共中央北方局即派陈为人到东北筹组满洲省委，统一满洲党的领导。这是他第二次被派往满洲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陈为人、韩慧英来到沈阳。其时，因中共北方局被破坏不久，原先确定的关系地点都转移了。陈为人经过许多曲折，才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他往返奔走于抚顺、本溪、营口、吉林、哈尔滨等地，同早已在哈尔滨工作的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共同研究，于十月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陈为人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大会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要求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当前主要是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相机组织斗争与暴动，破坏与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陈为人任中共满洲临时委员会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农运、工运、青运、军事等工作，均确定专人负责，韩慧英则更

名韩惠芝做妇女工作。

这次大会后，陈为人对东北地区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调查，了解到“满洲土地大部分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分租给许多佃农，没有地主生产而仍是小农经济”^①；地主阶级、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通过地租与纳粮、高利贷、“官银号”、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军阀、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日益增多，千百万的农民破产，作成他的奴隶，这一过程现在正在继续发展。”他为满洲省临委起草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推翻地主军阀的政权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军阀官僚无代价的占有土地”，“一切土地应无代价的分配给农民，并资助其开垦，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他领导省临委检查过去“没有切实领导农民切身利益的斗争”等错误^②，确定“发动及领导农民斗争是农运的中心工作”^③；“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同时也是农村中革命的中心领导力量”；“主力是当然的贫农”；“必须采取拉住中农的策略”；“要使富农中立”，“提出没收地主土地，而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他明确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彻底的胜利”^④。

一九二八年一月，陈为人在沈阳主持召开省临委第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了《政治党务报告》。此前，由于执行委员刘相宜被捕，省委通信机关和长春、哈尔滨、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停止。鉴于这种情况，陈为人在执

①②③④满洲省委：《农民运动决议案》，复印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吸取经验教训，加强秘密工作，“每个同志都要在支部学习组织工作与秘密工作”。他针对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强调在改造土匪的工作中，“不能梦想土匪不经过分化和党的组织，不经过农民群众的发动，能领导他们暴动、取得各县的政权。要用党的政策去分化改造他们”；“在职工运动中，由于提出‘组织秘密工会’等高口号，常使工人怕与我们接头”，“今后要用各种方法(如拜把)接近工人，兴奋工人”；“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不仅注意发展工农分子，也要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是多数能为无产阶级牺牲、作革命工作的，当然不能以另眼看待”^①。他还对前段在策略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错误，带头作了自我批评。

为了加强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将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委经过整顿和健全组织，战斗力大为增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后，周恩来、邓颖超、张国焘、罗章龙、夏曦、张昆弟，以及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代表的安全往返，都是经由东北地区、由陈为人和哈尔滨市委迎接和护送的。

六大以后，中共满洲省临委随即在沈阳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六大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二十一人，代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二十五个地区二百三十名党员。陈为人代表省临委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和《职工运动报告》。他根据六大精神，着重检查和分析省临委过去在政治指导上执行盲动主义错误。究其原因是，“由于不分析

^① 《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4期。

满洲革命的客观现象，不去考察革命主观的力量，很机械地拿别地暴动政策死板应用。事实上满洲革命力量太薄弱，暴动政策在满洲推不动工作”；“政治路线既错误，工作的路线和策略也跟着错了”。他指出，盲动主义在满洲，虽不象其他省遭到严重损失，但是脱离群众，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影响党内同志的革命情绪，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①。

这次大会通过了陈为人起草的《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会议完全同意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的确定”和“关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会议确定党在东北地区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反日反国民党反军阀政权号召之下，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无产阶级及一般农民贫民的政治觉悟，建立群众的广大组织，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促进革命的发展，以准备革命的高潮。”^②大会还提出党在东北地区的具体工作任务，决定改中共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张任光等七人被选为省委委员，陈为人任省委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部长，唐宏经任工运部部长。

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成立后，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到一九二八年底，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奉天市委、沈北区委、辽阳区委、关东县委、安东特支、抚顺特支、台安特支、营口支部、沟帮子支部、延边区

① 《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4期。

② 《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3期。

委、哈尔滨县委和市委等党的组织，共有党员二百七十多人。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先后组织了反日爱国游行示威。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修筑铁路，中共满洲省委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领导与发动各方面群众开展斗争，到年末，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停止了原订的修路计划。陈为人还经常到大连、奉天、鞍山、抚顺、营口、本溪、长春、哈尔滨等地以及京奉等铁路系统，深入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指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一时期，以陈为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出版了《满洲通讯》、《满洲红旗》、《满洲工人》等刊物；还通过短期训练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党的基层干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陈为人、吴丽石等十四人，在沈阳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时，因警惕性不高，与会者不幸全被警察逮捕。

受中共中央委派来东北参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刘少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得以幸免。他在事发后的第二天，即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次年一月二日，两次写信就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的原因和教训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汇报指出：“会议的地点既选择在敌人所注意的兵工厂附近，事前对于会场又无一点的布置，竟在同一时间内有着若干式样服装的十余人到一间工人居住的小房子里，怎么不会引起侦探者的注意，既带有文件，而彼此的关系又先不弄好，所以警察一来，只好是束手待缚。”^①

^①薛景平、陆锦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不是由于叛徒出卖》，载《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3期。

陈为人等十四人被捕后，在长达七个月的关押期间，相互以表兄弟等关系相称，通过韩惠芝（即韩慧英）与党组织派来的谢觉哉等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斗争。无论在狱中，还是在法庭上，他们都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虽经受敌人各种严刑拷打，然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秘密。敌人由于没有取到任何凭证，便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将陈为人等十四人释放。

陈为人出狱后，会见了来东北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得知自己将要奔赴新的岗位。他向韩慧英询问了几个月来机关的情况，即催促她赶快将儿子南红抱到旅馆来。身陷囹圄半年多，他多么想早点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他很快洗了澡，理了发，刮了胡须，并上街买了玩具，在房里等着。韩慧英借故拖了两天，才将南红染病经过、不幸夭亡的悲痛消息告诉陈为人。他听后，沉静了好一阵，把头一抬，说：“走吧，组织调我们去上海！”^①

（五）

一九二九年八月，陈为人奉命偕韩慧英来到上海。开始，陈为人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化名张明，与曾中圣、彭干臣等协助李维汉举办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地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叉口后侧的一栋三层楼双开间的弄堂房子里，对外称住家兼客栈。训练班的学员多系苏区、白区的地方军委和中央机关直

^①韩慧英：《追念陈为人同志》。

接选送的干部，每期十几至三十来人；训练内容主要有政治和军事两项。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上课、讨论，都集中在楼上后间，吃住也在楼上，保卫工作直接由中央特科陈赓和刘鼎等负责。训练班人员中的对外称呼、相互关系、所住房号等，都预先作好安排，如曾中圣是“房东”，彭干臣是武汉驻沪“蜜蜂经理处”经理，其他都是房客，有的住亭子间，有的住灶壁房……。周恩来、项英等都曾化装成商人，以做生意为名，来训练班给学员上课。陈为人和曾中圣等也担任苏联革命概述和革命者应有的素质等课程的讲授。韩慧英和彭干臣的夫人江鲜云以炊事帮工和家庭主妇身份，负责煮饭、送开水或担任瞭望。

一九三〇年初，陈为人夫妇奉命搬到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一栋两层楼的风子里^①，与谢觉哉、李求实等住在一起。李求实等住楼上，陈为人和韩慧英住楼下，谢觉哉住在亭子间。几个青年人对陈为人夫妇称兄呼姐，大家对谢觉哉尊称“阿叔”，以此掩护共同担任编辑党中央秘密出版发行的《上海报》。李求实担任该报主编，并负责组织通讯报道，陈为人夫妇担任经理和交通，谢觉哉任主笔等。这张四开小报，每月一期，内容十分丰富，既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困苦情况和斗争状况，又及时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暴政，还报道了各根据地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消息等。因此，它出刊后多次被反动当局查封，送报者及报务发行员先后被捕和遇难者近百人。但该报在陈为人等人巧妙的安排下，突破敌人的重重阻拦，继续组织出版发行，致使六易其名的《上海报》，在群众中影响

^①一说在沪东胶州路的一栋小洋房里，见《谢觉哉传》。

越来越大。正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红旗》第十七期所指出的：“我们的《上海报》成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群众中的权威，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吓得发抖。在发行方面虽然受尽了最艰苦的压迫，但终于不能阻止我们《上海报》的发展。”

一九三〇年八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红旗日报》以后，陈为人夫妇和谢觉哉、李求实等，奉命搬家。按照组织安排，陈为人夫妇迁往北四川路，驻守中央机关的一个据点，公开登记的是一个中等商行。为了工作方便，中央又调夏娘娘同陈为人夫妇住在一起，帮助他们管理家务，带小孩，照看机关。中共中央批评“立三路线”的几次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后来，由于夏娘娘被捕，尤其是顾顺章叛变，陈为人夫妇又几经搬迁，始终担任着驻守中央机关据点和中央特科分配的有关交通任务。

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陈为人到另一个机关办事，超过了预定时间不见回来。次日，赵世炎的姐姐赵世兰通知韩慧英：陈为人已经出事，并约她隔日在虹口公园会面。但在约定的时间未见到赵世兰。这样，韩慧英的组织关系，突然中断。她带着孩子过着走亲靠友、昼伏夜动的艰险生活。这年冬天，陈为人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又在贫病交加中夭亡。

陈为人是在出事机关门前，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嫌疑犯逮捕的，先关在上海法租界西牢里，后来被引渡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当时，这里已经拘押了八名同志。经过特科介绍，陈为人和刘晓、谢宣渠组成中共龙华狱中支部委员会，领导狱中政治犯进行斗争，并对新来的难友进行帮助教育，对没有暴露身份的关向应等特别加以保护；同时，在军警

内部开展分化瓦解工作。一些警察受到狱中党支部的教育，也主动帮助政治犯送物件、传递消息。以后，韩慧英的组织关系，也通过陈为人在狱中接通。此后，她和陈潭秋的夫人许一真、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发生联系，互相转达消息和文件。

一九三一年底，敌人仍找不到陈为人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加之韩慧英和何宝珍等在监外通过党的“互济会”的营救，陈为人被释出狱。但这次狱中生活，因受刑过重，造成他两腿麻木，并染了严重肺病。组织上决定，要他安心休养。他先住在小沙渡路刘少奇家里，最后搬到静安寺路明月坊。陈为人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组织上派了一位西医给他打针吃药，并嘱他继续休养治疗。一个把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怎么能如此休养下去！尽管上级党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但他在刘少奇离沪去苏区后，便主动担任起教管两家孩子的责任。他常用讲故事等形式启发孩子们，让他们支持妈妈的革命工作，有时还教给他们如何对付不速来客和军警特务的办法。时间久了，孩子们用陈为人教给的种种办法，跟着妈妈，竟完成了一些秘密任务呢！

陈为人休养一段时间后，身体逐渐好转。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奉中共中央派遣，⁴ 负责担任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文库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参加党的会议，也很少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按照党组织布置，文库对外以一个湘绣店作掩护。他们白天穿上组织上给他们购置的款式漂亮的衣服，以生意人的面目出现。一到晚上，陈为人就在三楼上把窗子关死，遮好灯火，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把厚纸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宽边空白纸剪掉，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并按地区、时间、问

题加以清理，然后重新装箱，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这批珍贵的文件资料，共六箱、两万多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各种会议文件，如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决定和会议记录；有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如宣言，通电，告工人、农民、士兵书等；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来往文件；还有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报告、调查材料、会议记录、党内刊物，留法、留德支部的文件；各革命群众团体的文件；还有一些著名革命烈士遗留下来的材料。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的反映了中共的活动和历史面貌，是中共最珍贵的一部分文献。陈为人担负保管文库的工作后，不同外面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即张唯一）的人单线联系。搬家转移时，移动成箱的文件是最吃力、最担风险的事，但几次大转移，陈为人都谨慎地完成了任务。每到一个新地方，陈为人就在自己工作的房间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放着火柴，将经过整理没有用处的纸片、书籍随手烧掉。陈为人夫妇还做了严密的防范计划：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有一段时间情况相当紧张，陈为人夫妇就将文件当作家当，一起搬迁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的楼上去住，因为敌人万想不到在白俄家里竟会有这样重要的共产党文件。一九三四年，陈为人夫妇的小女儿就在这里诞生，玛利这个名字，就是那家白俄老太婆给取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中共八个活动据点，“张老太爷”被捕。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也被等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

韩慧英被捕以后，陈为人立即用高昂价格租下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十五号一幢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

库的全部文件。可是，从这时起，陈为人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他陷入极度痛苦中：除了一个人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三个孩子。韩慧英被捕的当天，家里已经无积蓄了，一天两顿红薯充饥。陈为人肺病吐血，只好把萝卜当做水果吃。为了掩护身份，瞒过楼下的房东，陈为人每次在楼下煮好红薯后，常常把一片干鱼盖在上面，再往楼 upper 端（表示生活正常），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那片干鱼收藏起来，怕不懂事的小孩看见抢着要吃。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用了一个月之久。后来，连掩护机关所需的经费也成了问题。陈为人急得没法，曾去找过鲁迅帮忙，还靠进步知识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书给予接济。到了七月，陈为人已再无法维持下去，不得已写信给在河北省一所小学教书的妻妹韩慧如，告以姐姐“重病”，要她前来“看望”。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韩慧如对往事仍记忆犹新。她曾多次对人说：“当时要保证文库的绝对安全，就必须维持为人住的房子。要维持房子，就得凑足钱按时交房租。为人已经得不到组织上的接济，付房租就成了火烧眉毛的大事。”韩慧如把自己当小学教师积蓄起来的三百银元全部交给了陈为人，但这只够付十个月的房租。为了交足一年的房租，陈为人只好把二楼的家具变卖掉，连能卖的衣服也卖了，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最困难时，一日三餐的山芋粥，大人小孩每一顿只能均到一小碗。韩慧如讲了一件陈为人不许孩子多吃粥的感人肺腑的事：小女孩因饥饿难熬，经常啼哭，陈为人怕招致祸害，经常把手指塞在她嘴里止哭。大孩子喝下点稀粥不饱肚子，看见锅里还有，就说：“爸，我没吃饱，还要吃。”陈为人哄着孩子说：“这是吃点心呀！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能吃饱的。”孩子又问：“爸，

为什么妈妈走了以后，我们总是天天吃点心呀？”陈为人看到孩子们愁苦的脸，立即站起来，笑着对孩子们说：“来，我和你们一起跳个舞吧！”他就一个人先跳起来，逗得孩子们乐得笑个不停，不再嚷着要粥吃了。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锅里剩下的那点稀粥是留着作全家晚餐的。

早已感染上肺病的陈为人，由于忍饥挨饿，病情开始加剧起来。尽管这样，每天晚上，他还是继续整理文件，或者到外面奔走找关系。他曾去找过何香凝，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他下次不要再来；他用暗语登过寻人广告，还要韩慧如去张贴过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帖子，但都没有结果。陈为人内心焦急万分。

一九三五年底，韩慧英被释出狱。原来，韩慧英在“张老太爷”家被捕时，她已随口改名王英，伪称走错了人家。敌人搜身检查时，她早已将文件毁掉处理了，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敌人将她与“张老太爷”一起关在龙华监狱中，两人假装不认识。后又把她送到苏州反省院，与夏娘娘关在一起。夏对她暗示：我是坚决的。她心里更加坦然。无论敌人严刑毒打，还是用精神战术摧残，都未从她的嘴里得到任何口供，最后不得不放了她。

一九三六年春，韩慧英通过李慕英的介绍，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通过工作接触，她认识了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渐渐了解到罗和党有关系。通过罗叔章，她终于和中共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徐强接上了关系。当时，在中央特科情报组工作的徐强，受党的委托，也正在到处查访寻找陈为人呢。

一九三六年初秋，陈为人穿上一件灰绸夹长袍，走到一家饭店楼上，看到一张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书边有梨一

只，一个高大个子的男子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个人就是徐强。陈为人走上前去，对上了接头暗号，心里高兴极了。但在初次交谈中，陈为人并没有立即将他的住址告诉徐强。自从与组织失掉联系以来，他随时准备着可能发生的意外。他早已下了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地将整个中央文库交出去。饭店接头以后，他又几次和徐强交谈，终于解除了疑虑。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将徐强带到他的家中。徐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身上的担子重啊！即使在同我交谈时，我也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①

其时，党组织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的工作交由徐强指定的另一个同志保管，并立即组织将文件转移。当陈为人送完最后一箱文件回来，一进门就大口大口吐血不止。为了抢救他的生命，组织上把韩慧英找去，对她说：

“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还派了纪纲^②和一位名叫老金的同志与韩慧英等保持联系。纪纲是个中医，常给陈为人开药方。但陈为人的肺病拖得太久，已经到了晚期，眼看已无法抢救。组织上征得韩慧英同意，叫陈为人对组织和家人留下遗言。但为人个性强，而且乐观得很，根本不承认他会死。他说：“我不死，我还要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晚上九时许，韩慧英见他神情不安，象是身体不舒服，而又在勉强挣扎，便关切地问：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陈为人捏紧双拳，对韩慧英说：“你不要怕，不要紧的……”。

^①郑伯亚、费云东：《党中央地下档案库》，载《瞭望》周刊1984年第42、43期。

^②纪纲解放后在中央内务部工作。

他这样重复了几次，声音越来越小。就这样，他躺在病床上，走完了战斗的历程。

当天晚上，韩慧英用被子将陈为人盖好，领着三个孩子守在床沿边，陪他安睡了最后一个夜晚。次日，在毛达恂^①、罗叔章和一些朋友们的帮助下，给陈为人料理后事。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向韩慧英表示慰问，并发给路费，要韩慧英把三个孩子送回湖南。陈为人入棺后，停放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里。后来他的遗体同湖南会馆毁于日寇侵占上海的战火中。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满洲省委烈士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4.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期。
5.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
7. 辽宁省档案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衡阳市湖南学联陈列馆、中共江华县委党史办公室等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8. 访问李维汉、肖劲光、罗章龙、刘仁静、董锄平、罗叔章、易礼容、肖三、张琼、钟英、屈子健、乐天宇、张光奇、王鹤寿、韩铁声、韩慧英、韩慧如、徐强、马克先、赵云蓉、李慕英及其烈士后代陈爱昆、陈爱仑、陈玛利等的记录。

^①毛达恂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 敷 仁

刘 杰 谈

李敷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民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曾任《老百姓》报、《民众导报》主编、延安大学校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主任等职，为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倡导报刊革命化、大众化，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促进抗日民主运动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敷仁，小名蒲成，学名文会，字敷仁。曾用过老百姓、咸贞、劳百星、护人、富韧等笔名，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二十日）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家庭。兄弟三人，敷仁为长。六岁上私塾读书，一九一三年入咸阳高等小学。一九一七年，李敷仁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考入模范营骑科，学习军事。一九一八年夏，李敷仁奉命随军剿匪时，接家中来信，说母染重病。李敷仁辞军职回到家中侍奉母病。其间，在当地坐馆教书、办团练，并当了三个月的团练副团总。

一九二〇年秋，李敷仁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靠给学校刻蜡板，半工半读。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李敷仁等被举为三中学生会代表，率领爱国学生在文庙集会，并上街游行，到省长衙门示威。一路上，他带头呼口号，撒传单，宣传

反帝爱国。后来，由于受《北京评论》、《胡适文存》等书刊的影响，加之反动当局的分化、瓦解，三中学生分为两派。他为“保持学籍和免交学费所束缚，不愿和学校反脸”^①。因此，后来学潮闹到驱吴（驱逐督军吴新田）运动时，李敷仁脱离了学生会，对革命一度消沉。

一九二五年，李敷仁中学毕业，被陕西军队何经纬部以月饷银十三两的薪俸，委任为教导队分队长。李敷仁在教导队既教历史、地理、数学等文化课，也讲战术、操典、野外等军事课。有一天，何经纬派他去南操一带催粮，他结识了国民革命军驻陕总部邓宝珊的副官崔某。崔某把国共合作，打倒军阀，农民运动等小册子给李看，李敷仁迅速觉悟，决心离开何经纬部，另谋出路。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李敷仁向何经纬写信，请辞军职，回乡教书。何经纬复信允许李敷仁回家办学教书。李敷仁遂到咸阳县立高级小学当国文教员。他把自己学到的革命理论结合实际进行讲解，同时又根据农村的需要，教一些写地契、文约、书信、请帖等应用文，使学生学有兴趣，家长也很高兴。

半年以后，李敷仁升任校长。他尽量选聘德才兼备的教员，注意搞好县上各方面的关系，使学校越办越好。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气氛也卷入咸阳农村。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赵宝华（共产党员）介绍，李敷仁加入了国民党。他串连了几个积极分子，和乡里的总乡约（乡长）接

^①李敷仁著：《虎口余生记》，载《李敷仁诗文选》第3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头，在关帝庙前召开大会，成立了北杜镇农民协会。李敷仁负责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识字、读书。接着，又组织调解组，帮助农民排难解纷，颇受农民欢迎。

有一天，冯玉祥的一部分军队到村里搜粮，还把乡约和甲长用绳子绑了一大串，拉在车后。农民无奈，都来找李敷仁想办法。李敷仁知道冯玉祥的军队最怕“总司令”。于是，率领农民群众拉着那帮搜粮的军队，声称“一同进省去见总司令！”那帮军队的副官听了，连连回话，表示认错，放走了绳拴的众人，又退了一些粮食。

一九二八年秋，李敷仁经同乡魏西岩介绍，到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和书报邮件检查工作。后来，他当了科长，升任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总编辑。他曾在《中山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进了潼关》一文，把陕西人民受到日货、借款及教会剥削压迫的痛苦，从根到梢儿说了一遍，引起当局不满。接着，他又在《觉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地皮将透的咸阳》，揭露军阀、土豪、贪官、污吏狠刮地皮，鱼肉人民的罪行，气得军阀、贪官暴跳如雷。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笔批字，要“枪决”李敷仁。

李敷仁闻风逃走，后经宣传部解释，被撤掉总编辑职务，仍回宣传部工作，负责主办“暑期党务训练班”。他聘请共产党员何寓础、雷五斋等几位专家名流，前去讲课。李敷仁主讲社会进化史。他自编讲义，结合实际教学，学员们很受教益。李敷仁还利用周会作时事报告，在号召学生谨守校规的同时，抨击时弊，宣传革命，深受师生欢迎。不久，他受聘担任了省立一中、二中、西安市中学等校的公民课教师，被进步师生誉为

“公民专家”，同时也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指为著名的“左混”（左倾混蛋分子）。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杨虎城率军入陕，赶走了冯玉祥部刘郁芬的势力，占领西安；当了陕西省政府主席。次年，李敷仁由杨虎城资助到日本留学。他经上海、横滨到东京，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毕业后，继续上东亚高等班，学日本历史。他学习刻苦，不仅按时学完学校规定的课程，而且经常阅读共生阁和白杨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到校外的街道、工厂、贫民窟去参观调查，采用中日对比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在这里，他从小学生上学背砂包，中学生日日打野操，人民天天上晨操，满载士兵的火车用帆布蒙着向中国运送，感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形势日益严重；同时，他从服装店中美丽的少女站在玻璃橱中当“望子”，从新宿、月岛通的家家妓院和舞厅，更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钱，把人治成活死人”^①、把人不当人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李敷仁住在猿乐町青木家中。他买了一张《朝日新闻》，见刊有皇军进入沈阳的大字标题，他坐不住了，跑到中国留学生的中心——神田青年会。经过磋商，留学生组织了个抗日的组织“革命学生会”。李敷仁被选为监察委员。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并排队到公使馆，要求公使“断绝国交，下旗回国”。后来，革命学生会派李敷仁负责西北宣传工作，李敷仁即放弃了上明治大学的计划，乘船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奋发努力，干上前去，在可能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②回

^{①②}李敷仁：《虎口余生记》、《日记》，载《李敷仁诗文选》第58、91页。

到北平后，李敷仁一面在北京大学听课，一面翻译日文经济著作，后因经费匮乏，生活无着，又回到陕西。

当时，有人推荐李敷仁去当国民党的官，他说：“我志在教书，不在做官。”^①于是，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开始，李敷仁先后在凤翔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学校担任过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教公民课、国文课或社会进化史课，一直到一九四五年。

李敷仁在教育工作中，从事革命活动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认真备课，用真理武装青年。李敷仁讲课，不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搜集各种著作、资料，研究分析，溶为一体，编成讲义，然后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讲授。例如讲社会进化论，他把日文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田茂林的《普罗列塔利亚世界史》、郭沫若的《古代社会》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书，融会贯通，编写成通俗讲义，结合生活，进行讲授。学生听了感到新鲜、深刻、系统、好记。

国民党的公民课，许多是歪曲真理，进行封建法西斯教育的。李敷仁讲公民课则是完全撇开教育部规定的公民课本，自编讲义。如在讲“三民主义”时，他说：“三民主义不能挂着羊头卖狗肉，光用来骗人。我们讲三民主义，一定要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讲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讲新三民主义。在现阶段，民族主义就是讲反帝，中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讲土

^①李敷仁：《日记》，载《李敷仁诗文选》第91页。

地问题，讲‘耕者有其田’；民权主义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人民当了家，作了主，国家才能富强，对外才有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第二，评讲时事，宣传抗日救国。

李敷仁于“双十二”事变后，参加了由杨明轩、何寓础等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并和张寒暉、姚一澂等进步教师，组织“生活教育社”团结广大教职员工，实行抗战教育。他利用“训育主任”这个合法身份，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救国。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著作，结合现实斗争，溶汇于教材之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在“五卅”惨案十三周年纪念日，他结合“五卅”惨案经过，痛斥帝国主义罪行，激励起许多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还积极支持学生组成“农村工作团”，“假期工作团”，“流动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战，教群众防空、防毒，动员群众捐献抗日物资。

第三，介绍进步书刊，指导学生从事革命实践。

李敷仁认为“进步书刊是青年走向革命的桥梁”。所以他到每个学校，都帮助图书馆购进大量的进步书刊，并指导学生阅读。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思想控制以后，他仍然秘密给学生介绍《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新哲学大纲》等马列著作和《大众哲学》、《群众》、《解放》、《西北》等革命书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这期间，李敷仁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自觉地为革命培养、保护和输送人材。

一九三六年秋的一天晚上，共产党员、女学生余小珊，因

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被反动军警追捕，李敷仁忙叫进步师生喊醒正在熟睡的余小珊，让她藏在后花园的灌木丛中；然后他和进步师生设法将反动军警引开，又带着余小珊翻过后墙，潜入杨虎城将军家中。后来，余小珊辗转到了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三七年十月，李敷仁在西安师范经何寓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事事处处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团结进步教师，设法保护学生，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进步学生送到延安去。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一九四二年十月国民党派他到重庆伪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给他蒋的半身照片一张、短剑一把。但是，李敷仁毫不动心，悄悄地请王炳南带他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了周恩来副主席，同时他还去拜访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等著名人士，和他们商谈讨论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等重大问题。

李敷仁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千百万群众“和敌人作战”。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创办了《老百姓》报。他在刊头语中明确写道：《老百姓》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老百姓》报是周报，七日一期。开始两版，后扩大为四版。栏目内容丰富，有社论、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文体形式多样，有政论、杂文、快板、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它从创刊到一九四〇年四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一百一十三期；订户曾突破一万份，共发行了一百多万份；行销十三个省区，远销美、英、苏、加、匈、法、瑞等国。成为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很受

群众欢迎的通俗报纸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正如著名记者穆欣一九三九年十月，在祝贺《老百姓》报创刊两周年时所指出的：

第一，它用老百姓最能了解的话，帮助教给老百姓抗战工作及上前线打日本的法子。使每个多少识几个字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也能听得懂，不象其他的报纸，说些老百姓们都不能懂的话（文话、洋话或是古话）。

第二，《老百姓》报真配称得起“民众喉舌”四字，它代表着千百个老百姓的利益，表达了他们心中的苦痛，提出乡村中许多欺压老百姓的事情。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报的读者，才能遍于西北各省，为老百姓所拥护、所爱戴，并且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第三，《老百姓》报有着丰富的内容，有文有词，有诗有话，有的谈抗战，有的说怎样做庄稼，有的替老百姓呼冤，有的解答老百姓的问题。而且这些都合乎老百姓的口味，使他们更注意改良生产，应征兵役，解决妇女小孩等问题，因此连小孩和妇女们，也都把《老百姓》报当成自己的朋友。

第四，《老百姓》报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地方，便是报社同仁刻苦耐劳的作风。编辑先生要编稿子，要写稿子，又要校对，打关系，办外交，就是买纸的事也得自己办。这种“穷日月”，正和乡下老百姓过的生活一样。因此，老百姓们都乐于拿出自己的钱，去帮助《老百姓》报^①。群众亲切地称李敷仁为“老百姓”。

李敷仁过去当过编辑、记者、主编，因为替老百姓说话、

^①穆欣：《可贵的探索》，载《革命英烈》，1984年第1期第21页。

写文章，几乎被枪决，深知要办《老百姓》报，要讲老实话，必然要和统治者进行严酷的斗争，甚至可能牺牲。所以，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筹办这张报纸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如果把《老百姓》‘失塌’（查封）了，咱办《小百姓》；把《小百姓》再失塌了，再办一个《百姓报》。就象邹韬奋《生活》查封了出《永生》，《永生》查封了出《新生》，咱们就是这样子。”①

在《老百姓》报出刊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它有过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编辑部先后有常奋等三位青年被逮捕，为报坐牢，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

作为报纸的主编，面对这些明枪暗箭，李敷仁毫不慌乱。他以他那通俗、幽默、辛辣、犀利的笔锋，继续在屠刀丛中战斗！如在《老百姓办公处》专栏中，解释词义时，他写道：

“军阀，就是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势力，牺牲当兵的性命，给他们自己挣房子，挣地亩，办老婆，发大财。”又如根据读者来信写的评论《一味存心搜刮，并不关心国难》一文，揭发勉县县长不顾国难，大刮地皮的丑行，在结尾时写道：

“我们想，在这贼兵深入、国难严重的今日，身为县长，不设法改善人民生活，组织民众帮助抗战，我们希望舆论界对于这样洋钱熏心的县长予以严厉制裁！”

一九四〇年四月，《老百姓》报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闭了，李敷仁悲愤地说：

“我的‘儿子’被掐死了！”②

①李敷仁：《老百姓》，载《李敷仁诗文选》第147页。

②穆欣：《可贵的探索》。

但是，他并不灰心，不屈服，而是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投入了西北地区的民主救亡运动。一九四四年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创办了《农村周报》。人们见了，奔走相告，齐声欢呼：“《老百姓》又复活了！”

然而，《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又被国民党顽固派绞杀了。

李敷仁不屈不挠，设法再干！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又走进官办的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受聘主编《民众导报》，巧妙地运用合法斗争的方式，使《老百姓》报的革命精神，在这张官办的报纸上复活了。不久，导报发行到两千份、四千份，以至于出万份纪念专号。为了以合法的形式宣传革命，李敷仁不仅非常注意斗争艺术，而且每篇重要的稿子都配备有“预备军”，以便抽掉一篇，即把另一篇编入见报。例如有一篇报导东北解放区实况的稿件，接连三次没有登上，报纸几乎开天窗。他设法改头换面才见了报。

为了替老百姓说话、办事，发展抗日民主运动，李敷仁往往把办报和组织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内外夹攻。一九四五年春天，他把咸阳的灾情、县长刘发钰贪污害民和咸阳人民的要求，写成稿子，发表在《民众导报》和《秦风·工商日报》上；同时印出传单，要求全县人民举代表进城告状，呼吁免粮。

受苦的人民一呼百应，全县踊跃。伪县长刘发钰到处送礼说情，并且请了一位名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上刊登启事，把李敷仁的文章逐条批驳。斗争激化了。李敷仁走出编辑部，去到农村，深入调查，把刘发钰一九四三年勒征灾区免征粮麦四千余石，盗卖壮丁，打死人命等十多条恶迹，了解清

楚，并组织群众，推举代表，成立了“控诉委员会”，草拟诉状及反驳启事，连夜派人进城控诉。

李敷仁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组成了反贪官的统一战线。咸阳学生成立了“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市民、工商业者召开了“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了声援议案。《民众导报》及时报导、宣传，小学教员、开明士绅、青年学生纷纷参加。后来，咸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驱刘大会，十一个乡的十个乡长也来参加，甚至连咸阳的三青团头头、国民党骨干、县政府秘书等也来参加。李敷仁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驱刘大会上，问得刘发钰面红耳赤，一句话都答不出来。面对铁的事实和广大群众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将刘发钰撤职，并令他退还贪污的赃款和赃粮。

一九四五年秋，杨明轩、杜斌丞介绍李敷仁加入民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

一九四六年春天，中共关中工委韩夏存在西安莲湖公园约见李敷仁。韩夏存原是李敷仁的学生，李只知韩参加了革命，却不知他已是关中工委的负责人之一。当韩夏存问他是否知道“李扶云”时，李敷仁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记得李扶云是他在加入地下党时用的名字，只有党组织知道；如今韩夏存问李扶云，不就是代表党组织正和自己接头吗。他严肃回答并认真汇报了自己八年来的工作情况。韩夏存肯定了他的工作，并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放手发展民主运动，只是不要搞得太红了……”此后，李敷仁深入学校，团结教师，帮助和支持青年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活动。在西北大学学生驱逐特务校长的斗争中，在西安进步学生反对反动派组织“反苏游行”的斗争中，李敷仁奔走呼号，宣传党的主张，起了重要作用。他还以

《民众导报》社论的名义，写了一篇《为陕西人民请命》的文章，矛头直指陕西反动当局。

李敷仁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派的极大仇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继《秦风·工商日报》被反动派捣毁之后，李敷仁在去民众教育馆的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CC特务的绑架。

原来，四月三十日这一天，蒋介石到了西安，召见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CC特务给蒋介石当面报告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秦风·工商日报》赤化，造谣生事，《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把西安的激进青年完全抓过去了；一件就是共产党准备五月四日在西安暴动……。

这样，李敷仁被几个戴着黑色眼镜的CC特务绑架进了一辆黑色大卧车，双眼被一条染有血迹的毛巾捆扎着，几个小时以后，他被几个特务拖出汽车，左右架起，往一条荒芜的战壕边跑去！

一个特务手提匣子枪，跟在后边，走了一截儿，端起枪来，瞄准李敷仁的脑袋，“叭”地打了一枪。

李敷仁顽强地站着，不肯倒下，只是本能地把头偏了一下。特务又端起枪来，瞄准他的后心窝，打了一枪。

他眼前一黑，倒在了血泊里。

匪特们驾车走了。

一位农民发现倒在血泊里的人没有死，忙把他唤醒，又回村叫来许多人来搭救。有的想往家里抬，有的主张向县上送，各执己见。这时，大路上来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人，跳下车来一看，立刻大喊：

“哎呀！这不是我伙计嘛？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人们都围过来，注视着 他。

赶车人对众人说：“这人就是北杜村那位李敷仁，我的老同学。就是他，给咱们办的《老百姓》报，办的《民众导报》呀！”

几句话勾起了人们对《老百姓》报和李敷仁的怀念。大家立刻行动，找来一副担架，天快黑的时候，把他抬到了北杜村。北杜村的人为了他的安全，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他多处转移；老人们为他求神问卦；小伙子为他东奔西跑；妇女们为他准备吃喝；连那些小孩子们也都立誓：“不乱说李叔（对李的尊称）的动静！”

李敷仁没有死。老百姓救活了他，保护了他。党组织派人护送他到解放区马栏。

党中央派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专程从延安到马栏，给李敷仁开刀取出了敌人的子弹，治疗枪伤。李敷仁在医院对前去访问的记者挥笔疾书：

知尔杀人数不清，
焉知民力大无穷，
一滴鲜血一抔土，
杜鹃血染麦浪红。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敷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七月二十四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习仲勋、谢觉哉等千余人，听了赵伯平报告李敷仁被难脱险经过，又请李敷仁讲话。他说：

① 《李敷仁先生访问记》，载1936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但他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要炸毁他们自己！（全场热烈鼓掌）”^①

七月三十一日，李敷仁致函民盟，揭露国民党西安当局暗杀罪行，要求审判正凶。

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李敷仁，对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勉励他养好身体，为革命继续奋斗。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曾先后接见他，表示慰问。

李敷仁感动地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谚语说，‘有钱难买回头望’！现在想起来，我的血是没有白流的！今后民盟将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一九四六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虽然他伤病初愈，身体不好，但却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办好延大，为党培养干部。他不仅领导学校改革教学方法，而且亲自给新闻班讲课，带学生实习，和教师、学生谈话，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胡宗南调集了二十多万兵力进犯延安。李敷仁率领延大师生坚壁清野，把粮食和重要物资向后方转送，把桌椅书籍埋藏起来，准备撤退。延大撤离延安后，他虽然身体虚弱，却不愿骑马、吃小灶，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喝菜糊糊。到了住地，他尽量多找群众谈话，了解情况，并带领学生帮助群众打柴、挑水、打扫院落、收割、锄草，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①《延安各界集会欢迎李敷仁先生脱险抵延》，载1936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在严酷的战争中，李敷仁还组织延大师生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经常给全校师生作时局分析报告。撤离延安初期，有些同学对自卫反击战的前景担心，李敷仁通过讲春秋战国时期齐鲁长勺之战，分析边区自卫反击战的各种条件，说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还常拿出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的那颗子弹，向大家讲：

“敌人这颗子弹没有杀死我，却要杀死他们自己，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①

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关头，李敷仁先人后己，关心全局，指挥若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延大驻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大批敌人从三面扑来，上级令延大向东转移。但这时木头峪渡口边，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渡船很少。敌军逼近，枪声已闻。师生情绪紧张，都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让高中部和教育班先上船渡过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有人关切地让他上船，他说：

“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同学送过河去，我才上船！”

第二天，李敷仁奉命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乘船渡过黄河。众师生在黄河滩上，长长地舒了口气。李敷仁尤为高兴。他用手杖在沙滩上写了八个大字：

“延大渡河，纪律严明”。

一九四七年秋，延大在晋绥边区临县吴家湾和隰县川口镇一带，进行轰轰烈烈的查成份、查工作、查思想的三查运动。由于受当地土改中“左”的影响，有人在学生中组织“贫雇农小组”，捆人、打人。李敷仁对此坚决反对。一次开大会，有

^①刘端棻：《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原载《革命英烈》1984年第1期第25—26页。

些学生一哄而上，要捆那个被斗的同学。李敷仁走上前去，夺来绳子，压在自己屁股底下，大声地说：

“不能捆！也不能打！这是党的政策！”

延大在三查运动中没有发生更大的过火行为，李敷仁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表扬。

西安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敷仁先任副校长，后任校长。由于他能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能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解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因而西北民大学生学得好，进步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

一九四九年他任西安军管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主任委员。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的七年时间里，李敷仁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和国际活动，宣传、动员各界人民，抗美援朝，建设祖国，发展中苏友好，加强军民团结，为繁荣祖国的思想文化，为发展国内、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冬，李敷仁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任西北分团团长。他不辞劳苦，不怕牺牲，迎着美帝国主义的炸弹，奔上前线，亲切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士。回国后，他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宣传中朝友谊和子弟兵的英雄业绩。他先后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市民中，作大型报告五十多场，每场听众少则几千，多到上万人。

一九五一年，李敷仁任西北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三年任中苏友协总会赴苏参观团团长，回国后编写出版了《苏联集体农庄》一书。一九五四年任全国人

民慰问解放军西北分团副团长，慰问了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司令部以及青海军区所辖各部队。

一九五四年，李敷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一九五五年，李敷仁被选为西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陕西省中苏友协会会长、全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

一九五八年二月初，李敷仁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民盟中央全会，并在两个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但是，由于长年过分劳累，回到西安后，于二月十九日，因“心力衰竭”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李敷仁生前所记日记，原件存其女儿李荷丽处。
2. 李敷仁参与编辑的《老百姓》报、《民众导报》、《农村周报》。
3. 陕西省革命烈士编纂委员会编《革命英烈》1984年第1期。
4. 作者在咸阳、西安、北京等地访问了汪锋、刘端棻、武伯纶、杜松寿、田克恭、郭仪、吕夷、李荷丽等同志并参阅了访问以上同志的笔记。

何耀榜

陈光旭

(一)

何耀榜原名何耀忠，字瑞周，一九〇七年四月一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何耀榜的父亲何明善，靠佃耕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母亲赵氏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父母早逝，何耀榜靠三位兄长抚养。他五岁上山拾柴，六岁讨饭，八岁到地主家当放牛伢。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常常躲在学堂后面听先生讲课，有时还找来《三字经》、《百家姓》等书，边放牛边读。私塾先生见他用功，破例免费让他读了两年书。

一九二二年夏，十五岁的何耀榜随家乡青年到信阳市一家缝纫店当学徒。他在这里既接触到了现代物质文明，也看到了贪官污吏乘兵荒马乱之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罪行，激起了他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

一九二五年春，何耀榜因遭店老板毒打，一气之下从信阳跑回了家，又跟随哥哥种地、打柴。这时，他的大哥何耀勤、三哥何耀主在宣化店参加了共产党员郑新民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兄长的影响下，何耀榜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第二年十

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宣化店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何耀榜参加办农会、打土豪等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加了郑新民领导的革命组织“穷人会”，受到了锻炼。

一九二七年底，黄麻起义受挫，刘敬丹、刘少丹等共产党员从黄安县转移到宣化店活动，在何耀榜的家乡秘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第二年的一个夏夜，刘敬丹、刘少丹吸收何耀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对他说：“入党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就是你的亲人也不能讲。”从这时起，何耀榜始终牢记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这期间，宣化店周围的农民普遍发动起来，有两千多人参加党领导的“穷人会”。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罗山县委发动和领导了罗山农民起义。起义后，“穷人会”改名赤卫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何耀榜任茶坳村苏维埃执行委员兼赤卫军连长。

一九三〇年春，他当选罗山县宣化区严畈乡苏维埃武装委员兼赤卫军营长。三月十六日，一架敌机因汽油耗尽降落在严畈乡苏维埃所辖的宣化店西南陈家河。何耀榜带领赤卫军赶到现场监护飞机，并立即向鄂豫皖边区军委报告。这架飞机经过维修后，飞往鄂豫皖首府新集，被命名为《列宁号》。

这年，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很大发展，红军不断扩大。十月，何耀榜带领乡苏维埃赤卫军参加了鄂豫皖红色野战军第八师，配合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师攻破丰家店地区的陈家燕窝、傅家堂、观音寨三个反动据点，使宣化店和汪洋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色野战军第八师改编成罗山县独立团，转战于宣化店、四姑墩、夏店、河口等地。三月，罗山独立

团配合红四军在双桥镇活捉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俘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千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五月，独立团改编成红四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何耀榜任该团连长。八月，成立罗山独立第五团，何耀榜调任该团营长，后升任副团长。他同团长陈家洲一起，带领独五团参加了十一月十日开始的黄安战役。战后，独五团战士编入主力红军。此时，中共罗山县委又建立罗山独立十六团，何耀榜任副团长，不久，又改任团长，率部在宣化店、丰家店等地打游击。

一九三二年春，中共罗山县委积极领导群众发展地方武装，拔除反动据点，实行土地革命，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这期间，土豪劣绅一部进入城市，一部逃入赤白交界的大山区。在光山、罗山两县的大山区九里十八寨就盘据着不少土豪劣绅，继续组织民团顽抗，有时还瞅空子下山袭击宣化店，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从四月开始，何耀榜以独立十六团为主力，发动三千多名赤卫军参战，经过四十二天的围攻，打下了九里十八寨中最坚固的杜家寨、银山寨、大山寨，全歼寨内的民团和红枪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平毁了寨墙工事，重挫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此后，部队继续在罗山南部游击，又接连获得一些胜利。

(二)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地区。十一月二十九日，鄂豫皖地区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徐海东任七十四师师长，何耀

榜任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团长。此时，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敌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两个团孤军深入到红军根据地郭家河。何耀榜参加了郭家河战斗，指挥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进犯之敌。随后，他又率部在罗山、陂孝北等地与敌“清剿”部队兜圈子，接连获胜，迫使深入宣化店地区的敌人后撤。

五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命令红二十五军立即发动七里坪战役。这一决定是一个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目行动。当时，七里坪驻有国民党主力十三师的三个团约六千人，而且筑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红军虽有一万之众，却既无攻坚条件，又无围城打援的余力；加之根据地经过国民党军反复“清剿”洗劫，人民生活困难，红军给养毫无保证。初战十天之后，红军便断了粮草，不得不以野菜、树皮充饥。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何耀榜率部到罗山县、河口县等地筹粮。时值青黄不接，虽然许多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把粮食献给红军，但数量甚微，而且运输困难，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反映这场消耗仗打下去不妥，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干部建议撤围，何耀榜也曾找师政委戴季英提出撤围的建议。师政委对何耀榜说：“根据省委《第一〇七号通告》的精神，现在不是撤围的问题，而是要肃反”^①。

七里坪战役久攻不克，中共鄂豫皖省委不从战略指导思想上找原因，反而认为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捣乱的结果，错误地把指战员对战役指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与反革命破坏联系起来，因而，使红二十五军的“肃

^①何新洲：《回忆何耀榜在红军中的革命活动》（未刊稿）。

反”进一步扩大化，何耀榜亦被作为“动摇围攻七里坪”的“政治罪人”抓进了保卫局，罚以坐牢做苦工。坐完牢后，又被下放到伙夫班。何耀榜在伙夫班任劳任怨，常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军锅，随部队在光裕山、杨真山、紫云山、鸡笼山行军作战。尽管政治上受委屈，生活上异常艰苦，他仍然满怀豪情，常常唱着当地流行歌谣：“山沟野洼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哟，照样打胜仗。”徐海东很爱惜这位有勇有谋的团长，每到战斗紧急时刻，就叫他参加作战或指挥战斗。何耀榜虽屡立战功，但“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说：何耀榜害怕劳改，企图以勇敢杀敌来换取党的信任。他对于这些不白之冤、诬蔑之词，始终泰然处之。

一九三四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整编，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不久，何耀榜从伙夫班调任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副团长。他率部在晏家河与国民党易本应部首战告捷，恢复了一块游击根据地。这时，敌人以重兵“进剿”，在光山县凌云寺一带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何耀榜按军部指示，突出敌人包围圈，奔袭铁铺，歼敌正规军一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百余支。随后，部队转战于三里城、大新店、双桥镇，先后缴获许多粮食、物资。短短两个月，何耀榜运用游击战术，率部转战五个县，行程两千余华里，作战数十次，歼敌一千三百余名，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八月，红二十五军主力转移皖西后，省委在鄂东北成立罗孝陂特委，何耀榜留任特委委员、军事部长，活动于国民党礼山县政府管辖的宣化店一带。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迅速在礼山、经扶两县交界的黑沟寨组成一支二十余人的便衣队，并兼任指导员。当时，宣化店一带的保长、民团极为嚣

张，不仅烧、杀、抢，而且捕捉红军战士、迫卖便衣队员的妻子儿女，给便衣队的活动造成种种困难。为了使便衣队能在群众中扎根，何耀榜带队首先枪杀了宣化店何家湾的保长何晏卿，接着又镇压了信南民团团总丁应昆和罗山县自称“老天爷”的刘子石、阮义伯两个反革命头子。从此，一些保长再也不敢胡作非为，有的还暗中给共产党帮忙。反动民团有如惊弓之鸟，害怕遭到便衣队的袭击。便衣队趁机狠狠打击小股、分散的敌人，并大力筹集军需物资，改善供给状况，以便坚持长期斗争。

(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夕，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留下部分武装部队和干部重组红二十八军。何耀榜亦被留下，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的第二天，鄂东北党组织在罗山四区金竹林召开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重新组织中共鄂东北道委，由王福明、徐成基、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五人为常委，王福明任书记。会议组织了道委直属便衣队，何耀榜任指导员；调整了罗孝陂特委，徐成基任书记，何耀榜任副书记。新的道委、特委以黄安、礼山、罗山、光山、经扶交界的高山岗、老君山、天台山和宣化店地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集中了十多个团的兵力对鄂东北地区进行梳篦式地搜查。何耀榜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与敌主力作战，要粉碎其进攻，必须时而在内线与敌人兜圈子；时而组成战斗小组，摸到敌人外线据点

附近或交通要道旁，白天隐蔽起来，夜晚袭扰敌人。一次，何耀榜带领便衣队破坏了罗汉公路上的发模墩公路桥，击毁敌人十二辆汽车，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次战斗，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便衣队的声威。

当时的斗争是异常艰苦复杂的。在敌人的屠刀下，许多共产党员坚贞不屈，但也有少数人变节自首、叛变投敌。便衣队员刘庆梦害怕严酷的斗争，叛逃投敌，供出了许多与便衣队有联系的革命群众，致使两百多人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宣化店监狱中。何耀榜受道委指派，化装成农民，只身进入宣化店，营救被捕群众。他首先到开明士绅、联保主任家，要他们设法保释群众。随后，又与打入民团的共产党员联系，要他们联络联保主任、保长、士绅出面请客作保。在取保的宴会上，何耀榜又化装成何家山新任保长何再洲出席。饭后，地下党员、打入民团任队长的刘达诚拿出保状，首先签名保刘姓群众；何耀榜签上何再洲的名字，保何姓群众；地下党员甘允吉签名保甘姓群众；郑远刚签名保郑姓群众；联保主任甘青山也只好顺水推舟地签了名。紧接着，何耀榜又以何再洲的口气，同甘允吉互相呼应，讲了刘庆梦枪杀保长何晏卿、吊打孕妇何明月的经过，激起了保长们的“义愤”，都要求到区里控告刘庆梦。第二天，在国民党宣化店区署礼堂内，何荣芝控告刘庆梦杀死她父亲何晏卿，董刘氏控告刘庆梦带人杀死她丈夫董文朗，其他群众也列举了刘庆梦反共是“假”的许多事实，使国民党区长疑窦丛生，当场扣押了叛徒刘庆梦，释放了被关押的两百多名群众。这场斗争的胜利，使何耀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国民党为消灭红军便衣队，又增调云贵军一〇二和一〇三师分驻宣化店、河口、七里坪等地，将中共

鄂东北道委和罗孝陂特委围困于高庙山。为摆脱困境，何耀榜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将便衣队员、轻伤员和革命群众八十余人组编成鄂东北特务二营，并命令营长易元鳌、政委冯益万率领部队突围。特务二营从高庙山突出重围后，打进大、小鸡笼山，与鄂东北独立团会合。不久，围攻高庙山的国民党军尾追到鸡笼山，红军特务营与独立团分别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直插三里城，歼灭何斌如民团一部，旋即转战到新城、夏店、河口一带。在甩开跟踪的敌人后，何耀榜和易元鳌又率特务二营越过平汉铁路，攻克信南谭家河，见到红二十五军派来的交通员，收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指示信。这封信要求鄂豫皖军民继续坚持老区的斗争，以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和各个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何耀榜接信后，立即返回罗（山）礼（山）边界，将信交给了鄂东北道委，道委又迅速将信转交给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道委整顿了罗孝陂特委机关，充实了领导力量，由何耀榜担任特委书记。

这年夏秋之间，国民党军改用“碉堡、地捕哨、倒林（即砍掉树林）“三位一体”的办法，继续对鄂东北的红军及便衣队进行“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何耀榜认真总结和运用过去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采用游击战术、昼伏夜动、两面政策和挖墙脚“四位一体”的策略对付敌人。按照何耀榜的部署，便衣队和特务营采取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术，首先进攻九里十八寨的主寨香炉寺，乘敌不备全歼陈治忠的民团。接着，又到宣化店西南的茶坳，智擒民团头目董治均、罗麻子，并令其带路喊开碾子湾的炮楼，俘敌三十余人。以后，又相继平毁三十多座碉堡。这些军事行动，既打击了国民党军，又争取了一些保长和开明士

绅，动摇了敌人的统治基础。一次，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强迫农民在宣化店北边的施家洼增修碉堡，企图断绝便衣队从东大山到西大山的通道。当地保长暗里找何耀榜，询问怎么办。何耀榜说：“敌人要修碉堡，你们不敢不修。但要做到四条：第一，不准强迫群众修碉堡；第二，便衣队从碉堡附近经过，不准开枪射击；第三，要给便衣队送情报、弹药、医药；第四，要保护红军及便衣队的伤病人员。否则，你白天修筑，我晚上派人拆除。”^①这样，敌人虽然在施家洼修筑了碉堡，但并未妨碍便衣队的活动，有时还能为便衣队隐蔽伤员，提供情况。

九月，鄂东北独立团和便衣队在西大山一带活动。国民党军认为是倒林“搜剿”的好时机，便调集一个师和一个旅的人马，将大、小鸡笼山包围起来，胁迫一万多名群众砍树倒林。何耀榜根据道委的指示，迅速疏散特委机关人员，转移伤病人员，留少数便衣队员坚持当地斗争，组织群众破坏敌人的“倒林计划”，其余部队都转移到外线去作战。不久，敌人发觉红军主力和便衣队不在西大山，遂中止了“倒林计划”，转而到东大山追寻红军主力。

此时，蒋介石军事顾问团人员正在鸡公山避暑。何耀榜按道委的决定，派黄云先便衣队上鸡公山捉“洋人”，以“调动”敌人，解东大山根据地之围。黄云先带十余名便衣队员，在各方面的配合下，夜袭鸡公山，抓住了蒋介石的三个外国顾问。国民党南京政府闻讯后慌了手脚，急忙下令让其地方政府与便衣队接触，设法“救出盟友”。经过谈判，国民党地方当

^①朱青山：《何耀榜在宣化店的革命活动》（未刊稿）。

局被迫接受何耀榜提出的停止“围歼”红军便衣队和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不几天，国民党武汉行营也给便衣队送来了现款和物资，并给其部队发出了“为救山盟友，一星期不出击”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秋末，蒋介石委派程汝怀为鄂东北“剿匪”总司令，代行武汉行营主任职权，并调其嫡系三十三师到鄂东，配合一〇二、一〇三师发动所谓秋冬攻势。程汝怀上任后，一面组织民团和红、黄学武装，配合正规军搜山抢粮；一面指令政府强制实行移民并村，把山区农民赶到指定的移民点居住，并派特务暗探加以监视，防止老百姓与便衣队联系，扬言要在今年冬季“断绝共产党在大别山的根苗”。这时，何耀榜和便衣队员基本上不能和移民点的群众联系，只得隐入深山住在石洞里。时值寒冬，战士们没有棉衣、棉被，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尽管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何耀榜和便衣队员送饭，但战士们生活仍然很艰苦，有的伤病员已被拖得骨瘦如柴。何耀榜说：“我们不能在山洞里蹲着等死，要冲下山去，打击最顽固的敌人，解放被禁锢的群众。”他率领便衣队下山，在仰天窝伏击罗申华的民团，活捉了敌中队长刘树生；在王家庄枪杀了侵占群众财产、迫卖红军家属的联保主任董化之；在徐家寨捕杀了在移民点中干尽坏事的保长何练青。这样，他们抓到人质，迫使敌人很快送来了粮食、衣服；杀了坏家伙，既使其他的敌人有所收敛，也给便衣队和广大群众壮了胆。当地群众说：“何耀榜名声大，坏人知道他下了山，也就不敢再干坏事了。”^①随着春天的到来，移民点瓦

^①刘清燕：《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何耀榜》（未刊稿）。

解了，便衣队又活跃在大别山区。

开春不久，鄂东北道委根据高敬亭的指示，组建了光麻特委，并以光麻地区原有武装组织为基础，扩编组建三路游击师，道委任命何耀榜担任光麻特委书记、三路游击师师长兼政委。何耀榜到任后，调整了所属各区的党组织，充实了便衣队，使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走向新的高潮。

(四)

一九三六年九月，何耀榜率领光麻特委机关人员和三路游击师武装，先后摧毁敌人碉堡三十多个，歼灭一批民团，缴获一百多支枪。国民党忙调一个团“追剿”。何耀榜甩掉敌人后，又转战到了经扶县境的扎家湾。此时，林维先率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来到扎家湾，向何耀榜传达高敬亭的命令：调何耀榜接任皖西特委书记、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他接到命令后，经过三天三夜的征战，力挫国民党二十五路军的追击和十一路军的堵截，在商城辛店与高敬亭汇合。他们又经过艰苦的转战，到达岳西县的鹞落坪。十一月，皖西特委在英山桃花冲召开会议。会上，高敬亭作政治报告，总结了红二十八军的游击战争经验，并对皖西特委会的管辖区域作了调整，成立皖鄂边特委会，何耀榜改任皖鄂边特委书记，其机关设鹞落坪。

会议结束后，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到鄂东北根据地活动，何耀榜和特委几个干部，分头把已经痊愈的伤病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特委警卫队。接着，何耀榜在岳西县小河南召开了特委会议，传达了桃花冲会议精神，正式宣布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会

成立。会议经过两天讨论，详细分析了皖鄂边的形势，通过了关于《支援红军主力部队》、《上下内外保持正常联系》等问题的决议。会后，各地代表满怀信心地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开展工作。

此时，敌人主力被迫从山区撤到各集镇据点，建筑在根据地内的碉堡都由民团驻守。何耀榜乘势加紧反击，在皖西大山区广泛出击敌人，先后毁敌碉堡数十座，歼灭民团多股。特委武装在斗争中迅速壮大，由开始的五十余人发展到两百余人，各地便衣队也有很大发展。以鹞落坪、大岗岭为中心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红军和便衣队的对敌斗争十分活跃。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皖鄂边的群众工作也有很大起色。

一九三七年初，何耀榜和皖鄂边特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大岗岭一带打游击。他们住在临时搭成的草棚子里，借着一盏小油灯的光，反复看着国民党刚出版的《扫荡报》，研究“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为了彻底弄清“西安事变”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何耀榜派出三个交通员，分别到潜山、九江、西安去了解情况，并且通知便衣队暂时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各回原地守备待命。

过了两个多月，我交通员姜术堂才在西安七贤庄找到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汇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王稼祥给了几份党中央的文件，并对姜术堂说：“你回去告诉何耀榜同志，要尽量设法同国民党谈判，谈判的条件文件上已有规定。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国民党军歼灭我们。谈判时，我们的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作为部队的集合地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

央最后决定。”^①姜术堂很快回到皖西，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交给了何耀榜。不久，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来到鹞落坪。何耀榜将党中央的文件交给了高敬亭。他们认真学习了党的文件，领会到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战”，并根据鄂豫皖地区的情况作出决定：发动革命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为实现全面抗战作准备。

此时，党中央对于鄂豫皖地区的国共合作谈判已有布置。在“七七事变”前夕，毛泽东派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到红二十八军参加改编整训的工作。毛泽东说：“红二十八军有位同志派人找到红二十五军，向党中央转交了一个报告。”郑位三插话说：“是的，那位同志叫何耀榜，是鄂皖边特委书记。”毛泽东又接着说：“从报告看，他们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二十八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②郑位三等五人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启程前往鄂豫皖地区。

七月中旬，鄂豫皖地区的国共合作谈判开始进行。高敬亭派何耀榜出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谈判代表，皖鄂边特委会的工作由徐文初代理，军事方面由周奇云负责。何耀榜进驻岳西县三区蓝田村后，立即派人把我方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公函送到区公所，委托他们转交给国民党“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两天后，何耀榜接到“卫督办岳西办

^①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②程启文：《从延安到七里坪》，《湖北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事处”送来的回信，表示愿意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为了摸清国民党的底细，何耀榜又以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何师长警卫队吴队长的名义，到蛇形岗炮楼附近同国民党当局交涉有关事宜。在接洽时，国民党方面一再以官衔和金钱向红军诱降，企图达到几年来一直梦想消灭红军的目的。何耀榜当即驳斥说：“我是来交涉谈判的，而不是做买卖。你回去问卫立煌，他是真心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想团结抗日？你们打了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今天想叫共产党投降，那是你们白日做梦！老实告诉你，我们出来谈判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奉我党中央的指令来的。”^①

七月十六日，卫立煌派他的少将高级参谋刘纲夫为代表，来到岳西衙前，同鄂豫皖共产党代表何耀榜及化名红二十八军政治部“李主任”的高敬亭商讨有关谈判议程。经过双方协商，组成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并决定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在青天畷汪氏祠堂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何耀榜根据党中央的精神，结合鄂豫皖的具体情况，代表我方提出了如下的条款：“一，我军在鄂豫皖的集合点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至礼山县宣化店一带的村镇。二，我军在鄂豫皖三省共设三个办事处，分驻河南省确山县、湖北省黄安县和安徽省立煌县。三，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我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要与国军相同。六，我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一律由国民政府负责。七，我军驻地如有土匪扰乱和违犯社会秩序

^①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

者，有权予以镇压。八，我军进驻七里坪途中，友军不得堵击、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九，我军最后集合时间在年关以前……”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款是：“一，不打土豪。二，不破坏交通。三，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四，不经国民政府许可，不能扩兵。五，军队行动要有护照，否则不負責任。六，友军集合后，不能在各地保留便衣队，否则按土匪处理。七，鄂豫皖的红军在三个月内集合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①就以上条款，双方经过充分协商，终于正式达成停战协议。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

谈判后，红军即执行协议，高敬亭、何耀榜将皖鄂边的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向七里坪及宣化店集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正当红军向该地集中时，国民党又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先指派一〇二师在麻城地区进行挑衅，后又由鄂东行署专员程汝怀出面，大摆“鸿门宴”，妄图捕杀何耀榜。由于何耀榜及其部队英勇而机智的斗争，才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八月，毛泽东派来的全权代表郑位三等到达七里坪。他们向高敬亭、何耀榜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按照郑位三的安排，何耀榜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汇报谈判情况，后被留在办事处工作。至此，何耀榜光荣地完成了他在鄂豫皖地区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五）

一九三八年三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何耀榜、刘名榜、

^①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

易元鳌、黄宏儒等十八人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们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章，从而明确了党在新阶段的总任务。

一九三九年一月，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由河南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三月，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到大悟山地区。此时，何耀榜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以鄂豫皖省委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回到大别山，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参加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活动于礼山县的宣化店、丰家店、黄陂站、四姑墩等地。四月，鄂东地委成立，何耀榜任地委军事部长。他一方面找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老党员联系，恢复他们的党籍，组织他们起来抗日；同时还利用统战关系，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统战工作，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何耀榜与国民党宣化区区长曾伯龙有点远亲关系，他首先去做曾伯龙的工作，进而做礼山县县长王子法的工作，使他们相继与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何耀榜利用这一合法关系，在宣化店徐家寨办抗日医院，在黑山冲办党员训练班，并顺利地组织起三十多人的抗日武装。这支部队，白天生产，夜晚袭扰敌人，坚持敌后斗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发展到三百余人。

随着鄂豫边区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一九四〇年一月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鄂东地方武装编为鄂东游击总队，何耀榜任副总队长，活动于东、西大山抗日民主根据地。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敌伪顽统治区“犬牙交错”，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何耀榜在边区党委领导下，正确执行党在统一

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当时，光麻经（光山、麻城、经扶三县交界地区）县委书记田东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被国民党顽固派拉过去了。何耀榜同鄂东地委书记程坦一起，在卡房召开了整风会议，采取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法，批评了田东的错误思想，积极消除了王明右倾错误在鄂东地区的影响。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驻鄂东的顽军也积极制造反共磨擦。为粉碎这次反共高潮，何耀榜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孤立最顽固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对开明士绅、中小地主讲：“只要你们不反动，愿意给我们筹集粮食，掩护抗日战士，不向敌人和顽固派通风报信，我们就既往不咎。若是要当汉奸或反共顽固派，我们就不讲客气了。”这样，讲明政策，区别对待，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不敢配合顽军制造反共磨擦，有的区长、乡长、保长还找上门来保证不干坏事。何耀榜还利用这些统战关系，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去进行“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宣传。驻在宣化店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在春节期间向新四军进攻。何耀榜派人趁春节玩花灯的机会，混入宣化店国民党驻军营房内贴标语，有的贴在他们的床上，压在办公桌上，有的贴在看花灯的官兵的背上。第二天，顽军见到到处有标语，惊慌失措，好似兵临城下，紧闭宣化店的城门，不敢轻举妄动。

一九四一年四月，新四军第五师成立，李先念任师长。鄂东地方武装改编为第三纵队，何耀榜任司令员兼政委。十一月三十日，新四军第五师组建特务旅，罗厚福任旅长，何耀榜任政治委员，活动于陂安南地区，十余次进攻日寇据点，给敌人以重创。一次，何耀榜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夜袭花桥日寇据

点，毙敌十余名，缴枪十多支，摧毁了碉堡。次年二月十五日，何耀榜又率领特务旅配合十三旅在麻城乘马岗区还击顽军保一旅的进攻，俘其参谋长以下官兵二百多人，缴枪一百五十余支。敌伪顽从此不敢贸然侵犯陂安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二月底，鄂豫边区党委调整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撤销特务旅，成立三个军分区，何耀榜任第一军分区（即鄂东军分区）副司令员，下辖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和自卫第一团、第二团，以及罗礼经光、陂孝、安南、安麻、安礼、礼南县大队，共一千八百余人。一军分区管辖到豫东南地区，何耀榜兼任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在此阶段，他和军分区司令员一起，数次率部还击了顽军的反共磨擦，粉碎了敌伪军的大规模“扫荡”。七月间，国民党军鄂东保安第一旅和保安第八团向我安麻边根据地进犯，何耀榜率自卫一团，在两道桥、叶家河一带配合十三旅歼灭顽军一个营，缴枪两百多支。八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军保安第四旅又企图配合五战区李宗仁的部队，向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驻地大悟山进攻。何耀榜率自卫一团、二团，在礼山县丰家店、王家店一带配合十三旅歼灭保四旅，活捉旅长蒋少璠，缴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九十五挺，重机枪八挺，迫击炮四门。十二月二十八日，武汉周围日寇集结了第三、六、四十、五十八师团各一部，分路“扫荡”大别山，何耀榜率自卫二团、三团，在罗礼经光地区活动，配合十三旅和第五军分区特务团，拔除敌人据点，切断公路、电线，截击运输车辆，使其腹背受击。这些战斗不仅保卫了以大悟山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使部队越打越壮大，军事素质大为提高。

为了对付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一军分区划分出

豫东南地区，并在一九四三年六月组成豫东南三路游击师，何耀榜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团，约六千名战士，主要在罗礼经光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边区党委在大悟山八角门楼开办干部整风班，集中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六月，整风班第二期开学，何耀榜调任整风班大队长，参加学委领导，负责军训、警戒、伙食等工作。他说，“我参加整风班的工作，同各地来的干部朝夕相处，是十分有意义和经久难忘的一段经历”。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耀榜调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一九四六年一月，任豫东南军分区司令员。六月，任中原军区部队独二旅副旅长。

中原部队突围前夕，他突然接到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通知，要他马上赶到中原军区司令部。何耀榜一到司令部，李先念就说：“为了牵制敌人，决定把你留在大别山。”郑位三接着说：“中央要求留下部队坚持鄂豫皖地区的游击战斗。你熟悉大别山的情况，你留下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今后的斗争就是异常艰苦，也要坚持下去，战斗到一人一枪也要坚持下去。”^①何耀榜明知任务的艰难和形势的险恶，但他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定地回答说：“坚决服从命令，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六月二十六日夜晚，中原部队主力开始向平汉铁路以西转

^①苏波：《何耀榜战斗在鄂豫边》（未刊稿）。

移。六月二十九日，独二旅五千余人由宣化店向东突围，以策应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独二旅各团和旅部直属队在太湖西北的玉珠畈会合。这时，独二旅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中央又指示他们回头向西，重返大别山，继续坚持鄂豫边境的游击战争。西返途中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到八月底，独二旅转移到黄梅县张家塆。旅党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坚持。旅长吴承忠、政委张体学、副旅长何耀榜各率一支部队，白天隐蔽于高山密林，夜晚继续行军作战，使大别山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又蓬勃兴起。他们一部分在圻春、黄梅、广济、英山；一部分在黄冈、罗田、浠水、麻城；一部分在罗山、礼北、光山、经扶；一部分在礼南、孝感、黄陂、黄安等县，分别开展游击战争。十月，何耀榜同五团团长沙超、四团政委肖德明和副政委张岱松、六团一营副营长谭准彪一起转移到东大山，与刘名榜、肖前发、邱进敏会合。他们在宣化店东边刘家冲召开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会议，刘名榜推选何耀榜任中心县委书记，何耀榜却认为自己只能任副书记。“两榜”相互谦让，还是刘名榜任书记，何耀榜任副书记。在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虽然不到一百人，但对敌人的威胁却很大。

中原部队突围后，国民党军队用烧光、杀光、抢光，打死、饿死、冻死，情报网、公路网、碉堡网的“三光”、“三死”、“三网”政策，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仅存的少数党员已转入地下隐蔽起来，勉强能够进行秘密活动的村庄寥寥无几。何耀榜秘密活动在东大山地区。他有时化装成农民，有时扮作风水先生，到各地去秘密联系地下党员，从下而上的重建各级党组织，并

且组成了一些精干的便衣队，使罗礼经光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处境极端艰苦。何耀榜和同志们一起住石洞，盖树叶，吃野菜。由于长时间住在石洞里，何耀榜的关节炎发作了，加之天寒地冻，脚趾被冻坏了，但他还是让警卫员扶着指挥作战。同志们考虑到何耀榜的健康状况，劝他和部队一起转移到华北去。何耀榜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说：“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留下独二旅在大别山打游击，是为了保持鄂豫皖苏区的红旗不倒。我们一走，就是放弃大别山这个通向武汉的桥头堡。自黄麻暴动起，鲜艳的革命红旗一直在鄂豫皖地区飘扬。这面红旗不能在我们的阵地上倒下，就是付出最大的牺牲，战斗到一人一枪也要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①他的话，增强了同志们的信心和力量。十二月底，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重新组成中共大别山工作委员会，何耀榜任书记，刘名榜任副书记，肖前发、邱进敏等为委员。

为了恢复同上级党委的联系，何耀榜又主持召开军事工作会议，决定扩大武装斗争，寻机打击敌人，迫使敌台广播，以使党中央和中原局知道大别山还有游击队在坚持斗争。他们首先出击国民党民团林朗山的部队。在激战中，国民党七十二师一部赶来救援民团，从外线包围了何耀榜的游击队。何耀榜率部且战且走，退到老君山。敌人紧追不舍，包围了游击队。何耀榜指挥部队奋战突围，警卫连长陈义德负伤，警卫员罗杰英勇牺牲。敌人搜山时，见到已经牺牲的罗杰，误以为是何耀榜，将头割下带回去邀功请赏。敌人借此大肆宣扬，并在黄陂

^①苏波：《何耀榜战斗在鄂豫边》。

站街口城门上悬头示众，胡说什么“大别山的共产党已被斩根除苗”。敌人还组织宣化店的群众到黄陂站去“参观”，但认识何耀榜的人都暗自好笑。他们说：“何耀榜当红军时悬过一次假头，现在又悬第二个假头，他真是一个三头六臂的人”。

这次打民团，没有达到目的，何耀榜总结经验，寻找时机，准备再战。一九四七年春节后，国民党地方武装“大别山联防指挥部”的副主任杜玉成，准备在他的老窝杜家寨召开“庆祝反共胜利大会”。何耀榜认为这又是一个好时机，于是作了部署，派出身边的游击队员配合地方便衣队，化装成农民，混进会场。当杜玉成宣布开会时，便衣队员一齐掏出盒子枪向主席台射击，一下子打死杜玉成等二十三名匪首。国民党反动派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不可低估，并由电台和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党中央得知大别山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在坚持斗争，立即派郑志惠前来联系，传达指示。当何耀榜见到郑志惠时，反复说着一句话：“你来就好了！你来就好了！”郑志惠向何耀榜讲了自己接受任务的经过，他说：二十天前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主席来到郑位三的窑洞里，一坐下来就说：“今早两点，我听到国民党的广播又在骂何耀榜是惯匪，说他包围了‘庆功’会场，还打死了好多人。这说明鄂豫皖地区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那里的武装还有力量，要派交通员去联系。”这样，当晚大哥郑位三就叫我挑一担木耳回来找你们联系。说着，郑志惠从木耳中抽出写有密码信的草纸交给何耀榜。信的内容是：“一定要坚持，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中央就要派大部队南下。”^①党中央的指示给大别山的游击战争指明了方

^①苏波：《何耀榜战斗在鄂豫边》。

向。从此，活动在大别山罗礼经光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更加坚定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

（七）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形势开始好转。当何耀榜得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消息时，对同志们讲：“刘邓大军快到大别山了，我们再不能在山里周旋，而要下山去袭扰敌人，准备迎接南下的刘邓大军。”为了迎接大军的到来，何耀榜迅速建立各级支前委员会，发动和组织群众筹集粮食，购买柴草，征集民工，成立农民协会，并动员农民参加游击队、便衣队，扩大革命武装。他从实际出发，及时地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组织部队以便衣队为作战单位，依靠群众，灵活作战，分散对付敌人，积极扩大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到达大别山区。八月二十九日，何耀榜派出迎接大军的游击队，终于在七里坪街北头木桥上同刘邓大军的李德生旅会合了。刘伯承、邓小平留何耀榜任随军参谋。

一九四八年二月，根据整个战略的需要，刘邓大军离开大别山，转移到了淮河以北地区作战。这时，何耀榜仍留在大别山区，随第六纵队留下的同志们一起坚持战斗。当部队转战到罗田县韭菜河时，何耀榜的左腿伤口恶化。该部卫生所王所长说：“这只腿保不住了，要马上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医生就在石堆上搭块门板给何耀榜做截肢手术。当钢锯锯开他的左腿时，敌人的两个团包围了韭菜河。战士们一边同敌人战斗，一边帮助医生做手术，与敌人持续了五个小时的战斗，才

把手术做完，身上的麻药未醒，同志们又抬着他转移。何耀榜经过野外手术，因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养伤没有好环境，敌人到处搜查，今天把他抬到这里，明天又抬到哪里，他总是说：“这给组织增加负担，还是把我送到天台山那个石洞里去吧！”同志们那能忍心丢下这位久经磨炼的战友呢，不管战斗多么艰苦，仍然抬着他转战在大别山区。

四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派人将何耀榜接到苏皖解放区。随后又派人把他送到华北。何耀榜在邢台县城见到了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此时，他身体更虚弱，高烧一直不退。郑位三、李先念请钱信忠医生给何耀榜看病。经检查，才知道是第一次手术锯少了，左腿腐烂的肌肉在继续向上波及，必须动第二次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这样，钱信忠在邢台天主教堂里给何耀榜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

解放后，何耀榜屡次当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湖北省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他虽然疾病缠身，长期住院治疗，但革命意志不衰。国家给他的生活待遇是实报实销，但他从来不多花国家一文钱，经常穿着有补钉的旧衣服，经过劝说，即使同意做了一件新衣服，也常常放着不穿。他说：“现在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能丢，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不能要。”即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家里有时只能喝粥，他也从不伸手向国家要求增加供应指标。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日，何耀榜因病在武昌逝世，终年五十七岁。生前他著有《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这本回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书，通过何耀榜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党所领导的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事业，全面地歌颂了烈士们不朽的英雄事迹，完整地记载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坚贞不屈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是一本教育干部和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的优秀著作。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大别山上红旗飘》。
2. 《红二十五军战史》。
3. 《红二十八军战史》。
4. 《皖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黄山书社出版。
5.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
6. 《鄂豫边区革命史》。
7. 《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
8. 湖北省档案馆、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写办公室、孝感地区档案馆、河南信阳地区档案馆、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办公室、大悟县委党史办公室存放的有关档案资料。
9. 访问何耀榜生前战友陈福胜、伍昆山、夏紫忠、刘名榜、邱进敏、程坦、罗厚福、黄宏儒、程启文、肖德明、马友才、余潜、谭准彪、黄国清、陈义德、石健金，亲属何大姐、陈苏波，家乡老贫农、老党员、老红军、老便衣队员共八十余人的记录，以及他们所写的回忆录。

陈伯钧

邱 锋 松 筠

编者按：这篇传记主要是依据传主的日记写成的。传主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他的日记对党史、军史的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有所反映。因系当时日记，所以比较真实，为党史、军史留下可贵的研究资料。为储存史料，这篇传记的体裁和文字，保留了一定日记记述的痕迹。

(一)

陈伯钧，四川省达县河市乡人，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一个小康农家。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陈伯钧在河市坝小学读书，课余从事家务劳动。这期间，他在父兄的影响下，选读了《史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历史书籍和文艺小说。书中除暴安民、打抱不平的豪侠事迹，深深吸引着他。

一九二二年，陈伯钧高小毕业，翌年春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

万县师范是川东地区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中心。革命先

驱王若木、吴玉章、杨闇公、恽代英等在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县师范也深受影响。一九二三年春，肖楚女到第四师范任教后，大大推动了该校的学生运动。陈伯钧听过肖楚女的演讲，并读了《新青年》、《先驱》、《向导》等进步书刊，深受教育，积极参加了该校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把国家主义派骨干、四师校长驱逐出校。五卅运动中，陈伯钧又积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帝反封建。由于他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被学校当局开除。

此时，适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到重庆招生，陈伯钧和刘梦笙赶去报考，被录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开学。陈伯钧与罗瑞卿、刘型等同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二队。同学中还有游雪程、徐彦刚、王良、刘梦笙、张赤男、徐林、程子华等。军校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扛枪出操，常常腿肿得不能下蹲。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此外，毛泽东、沈雁冰、李达（鹤鸣）等也到校演讲。

当时武汉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军校学员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陈伯钧酷爱读书看报，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江西工人运动领袖陈赞贤遭惨杀，武汉等地的反蒋运动高涨。陈伯钧积极参加了追悼陈赞贤、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反蒋斗争，三月下旬，武汉分校正式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蒋介石的校长制，改为五人委员制，实由恽代英负责。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袭武汉，前锋抵达离武昌只有四十里的纸坊。危急关头，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迎击叛军。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当天开到纸坊作战，经土地堂打到贺胜桥，又乘胜追击，转战咸宁、蒲圻、嘉鱼、赤壁新堤，最后攻克沔阳，击溃了叛军。

陈伯钧学习用功，训练刻苦，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加上在这次平定叛乱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经熊修武介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咸宁前线被接收为中共党员。

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许克祥五月二十日在湖南叛变。六月，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人出境；何键在武汉高喊“清党”，蠢蠢欲动，汪精卫集团的反动面目愈加暴露。为了保护军校这支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的革命队伍，党组织借“打野外”之名，将队伍拉到武昌市郊。此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招兵买马，党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校学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形势急转直下。陈伯钧的父兄均来信要他回家，甚至以“母病重”为由，催他速归。陈伯钧拒绝了父兄的要求，决不离开革命队伍。

八月二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教导团同时离开武昌乘船东下，准备经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乘轮船的警卫团中途在黄石港上岸，乘木船的教导团因失去联络，一直开向九江。八月四日，大木船刚靠九江太古码头，就被张发奎预先布置的部队缴械。陈伯钧等被押送到第四军的陆军医院附近露营。

陈伯钧感到不能就这样束手就范，应该去找起义部队。他和刘梦笙暗约了七八个同志，脱掉军装，趁黑夜溜出宿营

地，经瑞昌、德安、永修向南昌兼程前进。途中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向抚州方向开拔，张发奎占领了永修、南昌。去南昌已不可能，他们便来到高安，与县委负责人聂思琨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中共高安县委将他们六个四川同志编成一个临时党支部，暂时隐蔽下来。

当时，湖南中共组织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以二十军独立团名义，奉命寻找叶、贺部队，几经周折，也开到了高安。陈伯钧等人由中共高安县委介绍，到独立团工作。陈伯钧任团部副官。

(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陈伯钧随二十军独立团从高安出发，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宜丰到达铜鼓县城休整。为训练新兵，团部设立了训练处，由陈伯钧任主任。他既教军事，又教政治，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九月十日，正是农历中秋节。那天，毛泽东从浏阳脱险来到铜鼓。在团部驻地肖家祠召开的排以上干部会上，陈伯钧听了毛泽东号召举行秋收起义的讲话。会后，毛泽东又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

此后，独立团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第三团的任务是协同第一、二团打下平江、浏阳、会攻长沙。前委书记毛泽东直接领导第三团行动。

九月十一日，陈伯钧随军挺进浏阳白沙镇。第三团兵分三路，击溃一营敌军和当地挨户团，打死打伤敌军十余名，击毙

敌连长一名，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九月十二日下午，陈伯钧随三团继续西进，攻打浏阳东门市。是役击毙敌排长，守敌溃逃达浒。三营营部驻围山书院，各连分做群众工作。团长苏先骏因连战皆捷，骄傲自满，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未在制高点设了望哨，结果敌人从平江调来两个团，分两路包围工农革命军，占领了羊牯脑制高点。陈伯钧所在的三营配合一营在羊牯脑两侧拚命反攻，激战六小时，最后因伤病员太多，又遭敌人机枪猛烈射击，只得转移到上坪。

毛泽东在上坪召开三团干部会议，得知第一团进军长寿街，因遭到叛变的第四团邱国轩部（刚收编的夏斗寅残部）的偷袭而失败；第二团攻克浏阳后被围，大部伤亡、失散。攻打长沙的计划已不能实现，遂决定通知一团速来会合，并亲率第三团退向铜鼓的排埠。

九月十九日，陈伯钧和第三团随毛泽东进军文家市，接着卢德铭率第一团也来会合。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说服师长余洒渡，放弃攻打浏阳、长沙的计划，决定向湘赣边界地区退却。

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卢德铭率一、三两团离开文家市南进。途经萍乡芦溪，又一次遭到敌人伏击，卢德铭英勇牺牲，后卫第三团遭到很大损失，仅陈伯钧所在的第三营在营长伍中豪带领下冲出重围，追上第一团，赶到永新县，参加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在三湾，工农革命军缩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仅有一、三两个营。陈伯钧虽患虐疾，经张子清、游雪程推荐，仍

担任了三营八连一排排长，还一度代理连长。

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陈伯钧参加了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井冈山建立留守处，并争取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

部队到酃县水口后，毛泽东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上井冈山，去做团结改造袁文才部的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水口朱家祠找他们促膝谈心，要他们充分认识争取这支武装的重要性，注意搞好团结。当天，陈伯钧等随袁部交通离开水口，经过三天行军，到达茅坪步云山。

袁部平时分散活动，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练兵。不久，毛泽东也到茅坪养脚伤，并进行调查研究。他经常找袁文才和陈伯钧等谈心，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讲《封神榜》的故事，鼓励大家学土行孙和哪吒上天入地、能打能走的本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陈伯钧的努力下，袁部很快走上正规，并接受了作战任务。陈伯钧率一个排负责维护井冈山同茶陵前方的交通联络，掩护和接送来往的伤病员和工作同志。

十二月，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毛泽东去茶陵找主力部队。出发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夜宿茶陵坑口圩。次日，一班战士先回井冈山，只留陈伯钧和毛泽覃等与毛泽东同行。大约离县城二三十里，前方传来机枪和步枪声。毛泽东决定在离城五六里的小村子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侦察。晚上大家轮流放哨，毛泽东和陈伯钧值下夜班，以应付紧急情况。天刚亮，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茶陵城东门通井冈山的浮桥被拆掉了，敌人尚未进城，而我军却向南撤退。毛泽东判断情况有

变，决定马上追赶部队。陈伯钧说：“我打掩护，你们往前走！”赶到水口，天已黄昏，终于追上了正在休息的部队。当晚，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争论很激烈。毛泽东命令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砦市开拔。散会后，毛泽东交给陈伯钧一封信，要他连夜走小路赶回砦市，送交中共永新县委。随后，毛泽东带着大部队返回砦市，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处理了团长陈皓（旧军官）等企图把部队拖去投靠方鼎英的事件。

毛泽东总结这个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任命吕赤为队长，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很关心教导队的成长，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听取陈伯钧等的军训工作汇报。

一九二八年一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等率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二月攻打宁冈县城（新城），教导队负责攻打西门。三月初，工农革命军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陈伯钧随部队到达酃县，全军按毛泽东的主张，在中村整训后，在酃县、桂东一带打土豪、分田地，作群众工作。

同年四月，陈伯钧从教导队调到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工作。为了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陈伯钧随毛泽东、张子清在酃县参加阻击战和掩护战。途中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由桂东向汝城的一段路，几乎每天都要与地主武装打几仗。

攻打汝城时，遭到敌人猛烈反扑，陈伯钧等奉命率第一连保卫团部。他们根据团长张子清的命令，跑步前进，迅速通过一条干涸的小河，沿着河边向敌人侧翼攻击，打败了敌人的反扑。

在鄱县战斗中，敌人追兵有三个团，张子清带领第一团侧击来犯之敌，并亲率陈伯钧所在的第一营，抢先占领鄱县县城和城北的高地堵击敌人。第一连在陈伯钧带领下积极参战，打败了敌人十多次冲锋，坚持了两三天，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在毛泽东率部接应和掩护下，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砦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砦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陈伯钧所在的第一团改称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陈伯钧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不久，赣敌两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陈伯钧所在的三十一团奉命在七溪岭阻击敌人，掩护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黄垌。接着又侧击进犯五斗江之敌，打垮敌人第八十一团。全军乘胜追击，第一次攻下永新城，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五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进剿”。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三十一团一营佯攻茶陵的高陇，并到谭延闿的老家收集报纸，以便进一步判断敌情。陈伯钧率第一连随营进至高陇，营长员一民布置一连担任警戒，二连作预备队，三连去侦察游击。三连刚到山腰上，与敌遭遇，敌凭有利地势射击，三连连长牺牲，被迫撤退。陈伯钧立即集合一连与敌接火，猛烈反攻，当战斗快要结束时，员营长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陈伯钧临时代理营长的职务，率一连和三连撤到梅花，适逢二十八团前来增援，合力打垮了敌军。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他们又连夜摸黑赶回永新湴田。当地靖卫团急忙向县城敌师长杨如轩报告，杨派七十九团进犯湴田。陈伯钧等随部进至距永新十五里的草市垌，与敌七十九团相遇，激战两小时，打

死敌团长刘胡子，乘胜直捣永新城，正在听留声机的杨如轩仓皇爬城逃跑，被红军打伤。这是二占永新的大胜利。

六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共十个团联合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在新、老七溪岭一带歼敌。陈伯钧所在的三十一团第一营，奉命和二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陈伯钧派两个排埋伏在望月亭营指挥所两侧，伏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把敌人打退，又配合坚守老七溪岭的二十八团，乘胜追歼逃敌于龙源口。此役全军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粉碎了敌人的“会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城，使井冈山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

七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群众掩护下，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十一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三十华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之战。陈伯钧率第一连在永新北乡坚持战斗，直到战役快结束时，他在九都负伤，子弹打穿了左大腿，被送回井冈山治伤。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迎接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的途中，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当时只有三十一团的两个连赶回井冈山参战。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研究黄洋界保卫战部署。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主持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红五军坚守根据地。陈伯钧和张子清、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军部工作。红四军出发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

一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二十一个团围攻井冈山。陈伯钧等积极参与保卫井冈山的斗争。后井冈山失守，彭德怀率部突围。陈伯钧因大腿伤重，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未随五军突围，留在山上打“埋伏”。结果被白军搜山搜出，解往吉安监狱，关了五个多月。

在监狱期间，陈伯钧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后来通过地下党员申忠等，与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王怀、陈正人等联系上。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被营救出狱。

(三)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时，曾通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要陈伯钧以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身份，留在红二、四团，领导这支武装，保卫兴（国）、桥（头）、永（丰）、宁（都）地区的革命政权。

一九二九年五月陈伯钧出狱后，因二、四团远在赣东，而赣西正有一支武装需要加强领导，于是便由特委分配到北路行委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赣西延福地区有游击第三纵队，纵队长柯武东。三纵队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成分、纪律均好，军事技术较差；第二大队是由原国民党第十二师的骑兵连倒戈后编成的，军事技术好，群众纪律差。上级决定陈伯钧以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身份，兼任该纵队参谋长，负责改造工作。陈伯钧提议：两个大队合并，以表现好的同志帮助差的同志；用军事技术好的人来搞训练，使之共同提高。

两个大队合并后，约五百人，四百支枪。在陈伯钧等指挥

下，主要游击于赣西各县，曾打下吉水、峡江等县城，后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一九三〇年四月，省委特派员的巡视报告中指出：在短短的时间内，三团和二团“在吉安北部共作战七、八次，只打一次败仗，且系安全退却，其余都是胜仗。峡江之役两团共获敌枪七十余支；三曲滩，两团获枪二十余支；袁州（今宜春）之役，三团获枪二十余支；固江之役，三团获枪二十余支”^①；其余小的战斗未计在内。当年赣西特委负责人曾山回忆赣西南的革命斗争时指出：“开始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起来的，所以开始时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吉安特委和省委派了得力的军事干部，如陈伯钧、李湘舫、柯武东同志等，加强了领导，因此，这支革命武装也便很快地发展起来。”^②

一九三〇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赣西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二、三、四团改编的，柯武东任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下辖二、三两个支队，二支队队长周子昆。一纵队为六军主要部队，共有枪七百余支，党员三百多人，“政治影响甚好，与群众接近而又能和敌人作战，深得群众的拥护、敌人的恐怖。”^③

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在吉安的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中共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确定以扩大根据地和工农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夺取江西全省为主要任务。会后，二月二十三日，敌唐云山旅进

① 《张怀万（幄筹）巡视赣西南的报告》（1930年4月5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②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1960年）。

③ 《张怀万（幄筹）巡视赣西南报告》。

逼吉安水南。毛泽东、朱德指挥四军全部及六军一纵队夺取水南。陈伯钧和柯武东等率一纵队于二十四日晨出发，上午十时到达，即与敌军开火。这次战斗，仅用了半小时，红军就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五百余支，水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子弹四十担，残敌六七百人向距离吉安城四十里的值夏、施家边逃窜。

二十六日拂晓，四军和六军一纵队带领武装群众万余人，进攻施家边。红军上午十时到达，敌人还在山上筑工事，想用机枪顽抗。红军英勇进攻，激战至下午五时，敌全部缴械。号称“铁军”的唐云山旅全军覆没。

在水南、施家边两次歼灭战中，陈伯钧指挥六军一纵队参战。他身先士卒，追歼逃敌于乌江时，右腿负重伤。

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军事会议决议并经特委常委通过，成立红二十军，下辖四个纵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上级考虑该军军长曾炳春是师范生，没有进过军校，但是“只要有一好的参谋长也可以指挥”，遂决定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二十军参谋长。此时，陈伯钧养伤地区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二十军二纵队（后改称第二团），他还一度兼任该纵队（团）政委。

八月下旬，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第八次围攻吉安。由北路行委调工农武装两万多人，配合红二十军第二团向真君山进攻。二十七日，陈伯钧指挥第二团猛攻真君山，打下了敌人的几个地堡之后，直扑吉安城。由于敌人装备精良，地形好，城外又有几道铁丝网和又宽又深的壕沟，攻城没有奏效。

不久，二十军占袁州、出峡江，九月底回师打吉水，断绝吉安交通和粮食出路。十月二日，二十军奉一军团命令，由南

源出发，进至湖家、三角塘、华家一带。陈伯钧亲自带人侦察吉安城西真君山、天华山一带地形，准备四日拂晓攻击。根据上级命令，二十军在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敌佯攻，与三、四、十二军协同作战，发起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

为了攻占真君山阵地，陈伯钧和军长曾炳春指挥二十军在螺子山附近配合四军一部，从敌人的薄弱点打进城去。敌拚命反攻，激战一天。后兄弟部队陆续赶到，终于把敌人赶跑，占领了吉安城。是役陈伯钧在螺子山负伤。

打开吉安后，陈伯钧见到毛泽东，表示希望回到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让他暂时养伤，并兼任红军学校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

三分校是“二七会议”后成立的。校长朱德，政委毛泽东，学生总队队长是原二十军政委陈东日，主要任务是培训红军干部。

十二月上旬，肃反扩大化的所谓“打 AB 团事件”越演越烈。担任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先抓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后带一连人到富田抓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其他领导人。因李韶九在红二团时与李文林有矛盾，在六军一纵队时又与柯武东不和，所以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 团”问题，并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

陈伯钧到红军学校后，听说李韶九要抓该校负责人陈东日、李天柱。他认为陈东日和李天柱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可能是“AB 团”，便亲自出面做工作，保护了他们。陈、李两同志曾当过红军的军政委和军长，后来，都为革命牺牲。

被李韶九抓起来的二十军干部中，有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和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刘敌以同乡关系说动李韶九而被释放后，即说李是反革命，鼓动部队先包围军部放出谢汉昌，又与谢一起率部冲到富田，把被李韶九关押的人全部放出，把二十军一部拉到河西，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史称“富田事变”。

在“富田事变”中，陈伯钧也被不明真相的二十军部队扣押。他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说明真实情况。看管他的老部下对他了解，把他放了。他和古柏等先后安全回到河东。

这时，蒋介石以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从十一月下旬起，已经侵入到富田、东固一带。由于“富田事变”的影响，这一带群众对红军有怀疑，都上了山，当时形势很紧张。陈伯钧从河西回来后，担任红三军主力第七师师长（政委李湘龄），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

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毛泽东、朱德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坚壁清城”的方针。红军主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奉命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以七师为先锋，拂晓前进占黄竹岭前面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张辉瓒师；八师、九师紧接七师向龙岗东北攻击。第二天拂晓，“雾满龙岗千嶂暗”，陈伯钧、李湘龄率七师进到居高临下的预定阵地，待日出雾散，看到张师先头部队正在爬山时，陈伯钧立即命令部队开火。七师虽然是三军主力，但实际只有一团兵力。他们不畏敌军的强大火力，接连打退敌军的进攻。打到中午，敌展开两团兵力，战斗更加激烈。总部抽不出增援部队，派参谋处长前来查看。陈伯钧告诉他，前线已稳定，全师正在顽强作

战。下午三时许，张师四个团完全展开，多路猛攻，七师仍坚守阵地。就在此时，红十二军向敌侧后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部队也从龙岗北面的高山上冲下，敌军全线崩溃，一片混乱。陈伯钧、李湘龄率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直捣张辉瓒师部。此役全歼敌师部和两个旅，俘虏敌师长张辉瓒以下官兵九千余人。

龙岗战斗的胜利，吓得敌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红军分三路追击谭师至东韶，红三军担任右翼，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克祥师，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南端，向东韶之敌攻击。

陈伯钧等指挥七师和兄弟部队从东韶以南山中冲出，与谭师激战至中午，毙敌团长、团副各一名。下午四时，敌人伤亡更大。谭道源带领残部向宜黄东南逃窜。整个战斗歼谭道源师过半，缴获步枪四千支，机枪四十六挺。

东韶战斗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在渔子街召开的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经验的师以上干部会。会后，陈伯钧率七师随方面军活动在赣东各县，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二十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起，分四路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东固地区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之久，诱使敌王金钰所部的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而歼灭之。

陈伯钧率七师先是单独执行任务，在南边牵制敌十九路军，然后从兴国江背洞、龙岗头快速向东固集中。这时，红军主力

三面受敌，距离不过八十里，形如“钻牛角”。三万多红军云集一块，正值五月，粮食少，供应困难，只好挖竹笋、采野菜、拣田螺、捉泥鳅充饥。夜晚，七师师部只能点两盏灯，陈伯钧和李湘舫一盏，作战科一盏。大家忍饥耐性，一直把敌人等出了富田工事，在白云山区摆下了战场。

五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号令全军作好迎敌准备。敌上官云相师沿观音崖、九层岭向我东固攻击，公秉藩师经中洞向东固进逼。红三军奉令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迎击公秉藩部。

陈伯钧等率七师和兄弟部队走小路到白云山区，在中洞南侧山林中隐蔽，居高临下，监视敌人动向。等公秉藩师经过中洞时，七师立即从山上用战斗队形横压下来。“飞将军自重霄入”。犹如高山滚石，势不可当。正在行动中的敌人摸不着头脑，乱跑乱钻。红七师在敌前，红九师在敌后，象铁钳一样，紧紧咬住敌人，一直打到桥头岗敌人司令部，俘虏敌师长公秉藩（后逃跑）在内的全体官兵。

白云山区首战告捷后，陈伯钧等随红军主力于五月十七日在富田胜利会合，乘胜追击敌四十七师和四十三师的一部于水南。敌军背水而战，所架便桥又被当地群众拆毁，终被红军击溃。第二天，红军围攻白沙，截住逃敌，全歼四十三师大部、四十七师一个旅残部，接着又在沙溪镇攻打敌郝梦龄师。

继而，红军乘胜向东横扫，五月二十三日，攻击中村之敌高树勋师。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及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分别把守濠源、木樟脑、桥下坑一带，防止敌人逃跑。高师一旅盘踞在中村西南的高湖垴险峰负隅顽抗。后红三军和十二军改任右翼，攻南团，经过九次冲锋不克，与敌相持。朱德、毛泽东来

到前线指挥，调四军十二师迂回到中村右翼，攻敌侧后，配合红三军再次发起冲锋。经两昼夜激战，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只好败退突围，向招携逃去。

中村战斗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重新成立。五月二十五日，在洛口严坊召开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红军分三路向广昌进军，并派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到广昌甘竹阻击敌人，截断敌人南援的要道。

五月二十六日，红三军根据陈伯钧、李湘龄的侦察情况，向朱、毛报告：甘竹之敌不多，大约是一团兵力左右，七师已向甘竹派去游击队对付敌人。据此，总部决定派红三军追击敌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由于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向南丰方向追击朱绍良的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截断广昌守敌的退路，从而保证了红四军夺取广昌，击毙朱部五师师长胡祖玉，全歼守敌；同时也保证了红三军团和十二军于五月三十一日奔袭建宁，歼敌朱部刘和鼎师三个多团，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陈伯钧奉命率七师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经费和给养，同时总结经验，训练部队。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德、日、英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兵三十万，采取集中主力，“长驱直入”的方针，于七月初开始了凶猛的第三次“围剿”。

七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千里回师赣南。陈伯钧所部和各兄弟部队从所在地出发，转移到于都银坑、琵琶垄山沟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路，

诱敌南进。

陈伯钧等奉令率七师到兴国老营盘一带集结。黄昏时，发现敌军哨兵。接着，其它部队也相继发现敌人。原来敌军陈诚、罗卓英纵队已进驻富田一带，北边是蒋光鼎、蔡廷锴，南边是蒋鼎文，红军已三面受敌。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前哨后移，竭力隐蔽，决定红军主力乘夜向莲塘方向转移。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在四十里的敌人间隙中朝东突破。八月七日，打了莲塘，歼敌上官云相师一个多旅，接着又在良村歼敌郝梦龄师大部。八月十一日，红三军向龙岗佯动，保证了主力在黄陂歼敌毛炳文师四个多团。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支。

黄陂战斗后，敌人发觉了红军主力，向东追来。陈伯钧率部随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共三万人马，在朱、毛首长指挥下，从南坑和君埠之间，离两边敌人间隙不过十公里的尖岭埗，巧妙地跳出敌人包围圈，返回兴国白石、枫边地区集结休整。等敌人发现时，红军主力已在外线休整半个月了。敌人被整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因“两广事变”发生，只好从兴国撤退。

当地的老百姓向陈伯钧等报告，敌人要从老营盘方向逃跑。他们遂决定从七斗岭翻过去，打老营盘。九月七日早晨，薄雾夹着毛毛雨。敌人因为要逃跑，撤了哨。陈伯钧率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冲到山脚，又过了一条小河，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很快把敌人封锁在三角地带，经奋力进攻，歼敌一个旅，还将敌医院的药品、器械设备全部缴获。

老营盘战斗后，陈伯钧率七师又随红三军回师向东北追击敌人。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

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逃跑。这一仗，俘敌五千多人，缴获步枪四千五百多支，机关枪九十多挺，还有两百多匹骡马和一百多万发子弹。

(四)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陈伯钧、李湘龄奉命率七师在赣南连续攻打土围子，搞政权建设。一九三二年一月，七师攻克仙娘寨、蛇蝎、礼汾等地土围子，二月随红三军开往信丰集中。

三月，红三军拨归红五军团，并由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随军指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打开局面，并要在信丰的五军团尽快到龙岩。

陈伯钧率部于四月十四日赶到龙岩，十九日与一军团协同进攻漳州。守敌是张贞的一个师，装备精良。红军抢渡龙江支流东溪后，与敌人打了一仗，在天宝大尖上又打了一仗，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陈伯钧率部由石平北门进入漳州。此役张贞主力大部被歼，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残部逃到诏安，再也没有恢复起来。二十二日下午，陈伯钧在漳州城参加了红三、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会，听毛泽东报告作战经验及布置今后任务。随后，红军在漳州附近筹款、宣传、维持秩序。三军驻漳浦，陈伯钧等率七师驻石榴坂，并向龙岩方向游击，监视敌人。这期间，陈伯钧和邓子恢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研究主力红军走后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署。当时，饶（平）、（平）和、（大）埔边界有支小游击队，和七

师接上了头。陈伯钧、李湘龄派干部到该部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东江纵队。

陈伯钧率七师在漳州地区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十九路军已进入福建，粤军侵入赣南，红军于五月二十日撤离漳州，六月初回到赣南。

七月初，陈伯钧调任红十五军军长。此时，正逢粤军十二个团占赣南数县，有六个团踞南雄附近；蒋介石五个师驻赣州北；何键在湖南包围红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及独立三师奉命由信丰直取南雄，诱粤敌南援，以解三军团之围。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乌径。五军团奉命歼灭该敌。八日凌晨，五军团向乌径进发，发现该敌由泮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翦角村，隔河与敌接火。陈伯钧率十五军任右翼，配合正面十三军、左翼红三军迅速击溃敌人两个团。九日，粤军布置第四师固守水口待援，又派第三师和独二旅急由南雄驰援水口，以优势兵力向红军猛扑。红五军团误将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拚杀。五军团官兵非常英勇，许多战士手持大刀与敌肉搏，双方伤亡很大。后一军团和十二军赶来增援，终将敌人击溃。水口战役后，粤敌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

八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并调主力北上，发起乐安、宜黄战役。

八月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布置红五军团在乐安城南做预备队，保证一军团攻占乐安城。八月二十日，一、三、五军团协同攻打宜黄，激战一天，继续夜攻，守敌高树勋师全部被歼。两仗共俘敌五千多人。

乐安、宜黄战役后，陈伯钧率十五军随一、三军团到达南城外围。该处守敌有三个师，工事很坚固。全军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将主力撤退到新占区做群众工作。五月上旬，敌以六个师的兵力重新侵占了乐安、宜黄、南丰。一、三、五军团撤回东韶、洛口休整。

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批评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说他三次反“围剿”后，以主力打土围子不是正规作战；说他放弃打南城是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等等。十月十二日，中央免去了毛泽东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也因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十月间被免去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主力向金溪、南城进犯。一月八日，一、三、五军团联合进行浒湾战斗，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英勇牺牲。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用能征善战的陈伯钧再回前方。他离开红校，经石城、建宁、黎川、资溪赶到前方。一月三十一日，红军总部决定陈伯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地嘱咐陈伯钧说：“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工作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打不好都要找你是问！”

陈伯钧欣然领受了任务，立即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二月初，敌中路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十二日，我军主动进攻南丰。陈伯钧和董振堂、朱瑞指挥五军团攻克南丰城外的堡垒据点。陈伯钧亲任全军渡河司令员，与一军团合围南丰。陈诚急调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奔宜

黄南部，前来解围。于是，我军迅速从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西地区，然后从两翼北上包抄，进行大兵团伏击战。

黄陂战役是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的一、三军团和二十一军为左翼；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为右翼。右翼部队由陈伯钧协助董、朱指挥，从横石、俱坊沿东陂一线，进至黄陂，向西还击敌人，并负责掩护全军右侧背。二月二十七日，敌人两个师进至黄陂圩、登仙桥附近。敌五十二师两个旅抵蛟湖，遭一军团和三军团截击，敌师长李明被打伤活捉。五军团在北线向敌五十九师发动猛烈进攻，该师两个旅溃退霍源东面的佛岭垌，又遭五军团和二十二军的阻击，伤亡过半。至二十八日中午，该师余部被歼在摩罗嶂东麓山谷中，敌师长陈时骥被俘。此役共歼敌两个师，俘虏一万多人。

敌第五军军长罗卓英获悉两个师遭红军截击，带着十一师和九师前来增援。当他们滞留东陂附近的草台岗、霹雳山、雷公嶂地区时，红军分左右两翼出发。一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为左翼，由西北向东南攻击；五军团和三军团为右翼，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五军团还负责牵制东陂之敌并防止新丰敌人回援。

三月二十日，敌师长肖乾率十一师进入霹雳山，见路险雾浓，停下露营。夜半，陈伯钧协助董、朱指挥五军团主力从西北攻击，激战彻夜。次日拂晓，五军团以一部由东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攻东陂，牵制五十九师温旅及李延年的九师。于是南至霹雳山，北至东陂，全线处于激战中。后一军团、三军团也赶来参战。红军与敌反复冲杀，白刃格斗，最后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号称“骁勇善战”的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及其

参谋长和三十二旅旅长均被红军击成重伤，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跑；敌前纵队仓皇向南丰退却。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①

陈诚不甘心失败，又在广昌附近集中了四个师，想经新丰市增援东陂。红军总部准备以红五军团在正面迎击，以一、三军团转到新丰市以北，由北向南打。后来敌方德国顾问指出：陈诚的计划是愚蠢的，会被红军全部消灭，陈诚才认输。

第四次反“围剿”后，正规红军增加到四、五万人，地方武装五万人。敌人也改用“堡垒政策”的战略，准备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全面“围剿”红色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控制了整个中央苏区。他们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不主张红军大战后进行休整，而要红军实施冒险主义的不断进攻。三月组织乐安战役，红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参战，包围乐安，强攻两天两夜。四月组织乐安、永丰战役。六月初又组织宜黄战役。虽然红军打的很英勇，但始终没有突破敌人的堡垒线，只好撤围。那时，陈伯钧和董、朱率五军团从永丰龙州到公陂、屋头街一线多次作战，虽给敌人沉重打击，但整个局势进展不大，处于拉锯式的僵持状态中。

六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发布长篇指示，决定“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要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打击敌人。七月初，三军团和七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到

^①蒋介石给陈诚的手谕，转引自《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78页。

福建作战；五军团和一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陈伯钧等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地区。七月十二日，他写了《论运动防御》一文，对乐安、宜黄等战役的打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运动战的重要性。接着，他又写了《学习和提高军事技术与加强军事组织作用》一文，上送红军总部。

七月底，陈伯钧和董振堂由方面军总部任命为纪念“八一”检阅大会的检阅主任，代表方面军检阅各军团工作。八月一日，红一方面军在东沙召开的检阅大会上，陈伯钧被授予红星勋章。这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建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的奖赏^①。

会后，陈伯钧等率五军团辗转宁都、广昌、黎川之间，和闽赣军区（司令肖劲光）商谈军事部署问题。八月三十一日，陈伯钧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

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根据地打击迫害对“左”倾错误不满的同志。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他们即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由，批判了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五月，又通过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撤销了他们的职务。此后，从地方到军队，层层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多同志遭到打击和迫害。陈伯钧也遭到批判，被迫写了两次声明书。

^①1933年8月4日《红色中华》报；另见1933年7月29日朱周提议授给二、三等红星奖章者名单的报告，《一方面军1933年历史档案汇编》。

十月初，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军改为第十三师。陈伯钧被免去军团参谋长职，调任十三师师长。他不计较职务的变化，到十三师后，立即投入繁忙的作战行动。十月上旬，他率十三师连续在新桥、梅岭、杨家山、何家庄、资溪桥、雁石、陈坊、崔坊、下桐早、寒丰桥、新甫等地作战。十月中旬，又连续在大元、苏元地、资溪桥、武家坊和百顺等地作战。每次战后，他都亲自起草战斗详报，并写了《枪林弹雨中的半月话》，如实地记述了该师紧张而繁重的战斗生活。

十一月下旬，十九路军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秘密派人到中央苏区谈判签定停战协定。“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予合作，反而说他们比蒋介石还要坏。陈伯钧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善于应用目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和力量（即使是不革命的力量），只要他能削弱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我们都应善于利用它。”很可惜，“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拒绝这种意见。三军团和五军团奉命由福建撤回。结果，福建人民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攻打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失败。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后，便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强调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各军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都被分配去修筑堡垒，五军团还奉令以连排为单位去守堡垒。

从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三月，红军进行了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如十三

师攻打资溪桥，敌人凭牢固工事重兵把守，打成僵持局面。又如十三师一部协同三、九军团打团村，由于兵力不足，和敌人的优势火力拚消耗，伤亡很大，三军团两个师长牺牲，最后只好撤退。有些战斗，如三都、德胜关、邱家隘、将军殿等，由于陈伯钧等指挥有方，指战员英勇顽强，打得比较出色。军团首长认为十三师“指挥员的顽强抵抗、勇敢沉着的精神好”^①。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战斗更加频繁。陈伯钧指挥十三师在前村、烂泥坑、杨林渡、张坊、大徐、新桥、水元、新华庵、峨眉峰、天井围、延福嶂、南华山等地，连续打了十余仗。新桥战斗攻打汤（恩伯）、樊（嵩甫）两纵队时，指战员战前未睡足，未吃饱，还翻越大高山；突击时，不顾疲劳，英勇冲锋，以一当十，迅速将敌人击溃，毙伤敌团长两名，营长五名，排连长以下八九百人，吓得敌旅长丢掉符号，烧掉房子，遗弃资财和许多伤兵，狼狈逃窜。红十三师不愧为“坚师”，充分体现了红五军团“不但长于守，而且也会攻”的战斗风格。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军委《红星报》发表了陈伯钧写的前线通讯《新桥战斗中“坚师”的英勇战绩》。

从四月下旬起，“左”倾教条主义者组织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广昌战役，集中了一、三、五军团八个师与敌十一个师作战。博古、李德曾到广昌督师，一共打了十八天。敌人在盱江右岸前进，遇红军“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做工事，另两个纵队沿河架桥，转移到左岸前进；等红军到左岸“短促突击”时，敌人又转到右岸前进。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打了十天。当时，陈伯钧很气愤。刘伯

^①五军团德胜关战斗详报（1933年12月15日—16日）。

承也风趣地对他说，这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损失很大，最后撤出广昌。

红军从广昌撤出，五军团奉命退守头陂以南地区。高虎墟、万年亭战斗后，红军退到驿前。这期间，陈伯钧率十三师和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一起作战。他们和敌人距离很近，几乎是“鼻子对鼻子”。敌人飞机一响，炮兵就打，接着就是冲锋。红军还没有出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短促突击”根本用不上。对此，陈伯钧意见很大。

驿前战斗失利后，五军团奉命参加西线掩护战。这时，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陈伯钧率十三师赶到兴国，增援西线的地方部队和六师。之后，从八月到十月，他指挥十三师在高兴圩、兰田圩、新田、狮子垵、塘石、山口、埠头节节抵抗，和敌人浴血战斗。指战员几乎日日夜夜守在阵地上，伤亡很重；连以下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完全靠干部打仗。

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正象毛泽东指出的，“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盲目地和敌人拚消耗。陈伯钧曾写过《怎样去提拔和培养大批新的干部来适应目前战争的需要》和战术讨论提纲，希望部队能及时总结教训，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便痛痛快快地打仗。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把持下，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一直未能打破，最后只剩长征一条路了。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夜，第十三师从兴国曲利出发，开

始长征。陈伯钧身患虐疾，带病率部行动。十月底，他指挥十三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十一月一日，过新城，冲破江西敌人的封锁线，陈伯钧指挥三十八团，击溃盘踞铝厂圩之敌，占领稳下圩，掩护全军通过。四日，党中央代表陈云到十三师指导工作。六日，陈伯钧率部过热水圩，冲破湖南敌人的封锁线，十二日与敌战于钩刀垌。二十三日，在下灌、红岭之线作战。这是一次危险的遭遇战。由于陈伯钧指挥得当，三十七团动作迅速，抢占了制高点；三十九团突击肉搏四、五次，给敌李云杰部以很大打击，掩护了友军三十四师的安全。

二十八日，陈伯钧又奉命拒止西追之敌，取运动防御之势与敌周旋。三十日，由文市经鲁坚到石塘圩，十三师仍为最后卫，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被敌人截断，后面敌人又追了上来。陈伯钧沉着指挥，以三十八团占领鲁坚西北高地，与敌对抗，其余部队则设法弯过隔壁山到目的地集中。这一天，他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恶仗，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这时，十三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比全师人数大两倍。他们转移时，刘伯承（时任五军团参谋长）派人给陈伯钧带来陈云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①十二月一日，陈伯钧率十三师和掉队人员在藤子渡过湘江。六、七两日，过老山界天险，因八军团疏于防范，予敌以隙，不战而走。陈伯钧指挥十三师侦察连与敌对峙。过铁坑、葱坪时，又留后卫团占领阵地，抗击来追之敌，并令三十七团警戒洪水方向敌人。部队胜利经过湘桂黔边境，到达贵州境内的洪州。

^①转引自陈伯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回忆》，（1959年在高等军事学院报告记录稿）。

十二月十八日，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八军团和十三师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调回军团部，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五军团到达猴场时，陈伯钧因腿伤加剧，经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会诊，确定为骨膜炎，必须开刀。一月十七日，陈伯钧在遵义开刀治伤。此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朱德、陈云、刘伯承、聂荣臻和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等均来看过他。手术第三天，他即随军离开遵义到达桐梓。因战斗频繁，行军忙乱，上级考虑到袁国平（总政治部副主任）和陈伯钧两人的伤势和安全，组织了袁、陈休养所，随军委四局行动。

三月十八日，三渡赤水到茅台时，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即回五军团，仍任参谋长，当天就同军团长董振堂上鲁家坪看阵地，指挥三十九团和三十七团主力在两河口、善人场之间作战，掩护大部队西移。

三月二十二日，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率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然后沿河向上游前进，在马桑坪没收地主豪绅的盐店数家，分发给当地穷人。接着，率部急行军南下，冲出敌人封锁线，掩护军委纵队过了白腊坎。待敌人发觉后，他们机智地率部改道元宝山、大水井一线，在扁岩塘渡河。

三月三十日，到苦茶园与敌遭遇。陈伯钧指挥身边的直属队抵抗，把敌人赶走。次日奉军委电令，在此打击由泮水来追之敌，掩护大军渡过乌江。为便于九军团南渡，陈伯钧派军团工兵及三十九团一部，会同二师及干部团工兵，在梯子岩赶架浮桥；六日，他指挥部队打击由马场开赴羊场之敌一个团。

四月九日，由元宝寨至梅家庄，因前卫部队行军错乱，追敌紧逼，危险万分。陈伯钧率部与追敌对抗，打了一个反冲锋，才迫使敌人停止追击。十一日，由青岩到翁贵途中，又因前卫未按规定路线行军，拥挤混乱，致使担任掩护的五军团部队被敌人咬住。陈伯钧指挥五军团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钟头，才阻止了敌人的追击。四月中旬过彝族区，沿途又与零星土匪作战。陈伯钧还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土司习仲芳部交涉通行。十六日，在高寨附近，陈伯钧率部打退两百土匪的尾追。十八日，指挥先头团攻打贞丰，驱逐守敌，掩护军委机关进驻该城。四月下旬，敌分数路追击，为掩护前卫部队由富城向草场营集中，陈伯钧派兵一团到沙寨附近打击追敌，于黄昏前扼止敌人于大树脚以东地区。二十七日，为求机动，陈伯钧率部急行百里，迅速甩开敌人，继续西进。

五月四日，陈伯钧和董、李率五军团掩护前卫部队抢渡金沙江，布置一营在龙海塘赶筑工事，扼制追敌。是时，毛泽东、朱德等正指挥大军在绞平渡附近抢渡金沙江，给五军团的任務仍是打掩护，护卫全军的行李辎重过江，如果被切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和董、李奉命指挥五军团在石板江、龙郎河一线及坎凳东南山地构筑工事，扼止追敌万耀煌部。我大军渡江要四天，一、三军团在别处渡江不成，也要到绞平渡来渡江，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更重。陈伯钧和董、李指挥部队击溃追敌于坎凳西南山地，并阻敌于绞西之南。等到一军团渡江完毕，五军团才于五月八日星夜冒雨急行军一百六十华里，由龙郎河到中屋山渡过金沙江。

五军团渡江后，仅休息了一个上午，又继续行军六十里，赶到会理县境。第二天，陈伯钧在睡梦中接军委电令，要所部

移至会理城东北之交芦堡、杉松坡集结，准备随时打击增援之敌。他立即率部出发，沿途不顾敌机扫射，赶到观音桥备战警戒，保卫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会议后，部队继续北进。陈伯钧率先头团在半站营与一团敌人战斗，俘敌两百余，缴枪三百支，残敌向西昌溃退。五军团继续追击到西昌城边，掩护主力北进。

五月下旬，三军团奉中央军委电令来西昌接五军团防务，陈伯钧等率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经泸沽、冕宁县城到平坝，进入大凉山区。他们一面做宣传解释工作，争取彝民；一面加强警戒，严防匪徒偷袭；于五月二十六日顺利通过了彝民区。二十八日，五军团攀越三座大山，行程万里，经安顺场到田湾。

六月三日，陈伯钧等率五军团在双桥子附近佯攻清溪之敌，拖住敌人，反复攻击数次，打成对峙，战至次日凌晨，才奉军委电令撤离。六月五日，又攀登高山悬崖，到达新庙场。陈伯钧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太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虽生长蜀中，过去尚不以为然，现处此，方证实。……敌人时常梦想我将步太平天国石达开之后尘，而我竟于最短时间，超出敌人意料之外，不但超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逼汉源，使敌人退缩，全取守势，应付忙碌，东奔西驰。是我战略指导之极端机动与神迷、一般战士之坚苦勇猛所致。此又是敌所未料及也。”他从内心深处拥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正确的战略指导。

六月十二日，陈伯钧和董、李率五军团在灵关附近，负责掩护整个大军北上的任务。十六日，奉军委电令回守宝兴，五军团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于真武宫附近，将敌全部击溃，夺回新老关口。与此同时，有一营敌人占领东端高山，陈伯钧又派两

个连向敌发起攻击，将敌驱逐并缴获一部。

六月二十六日拂晓，陈伯钧奉军委电令，亲率三十九团开赴达维、巴郎山接替红四方面军的警戒；二十七日，过夹金山（雪山）。“山头空气稀薄，北风起时，行人过之，稍不注意，即有晕倒之虑”^①。下山后，即到达维。二十九日，陈伯钧接军委电令：目前战略主要为创建川陕甘新苏区，以利向东发展。五军团准备七月三日继续北进。

七月四日，陈伯钧到懋功，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会合。次日，他指挥三十九团攻占大坝口据点，并击溃老营反动武装。

长征以来，五军团一直当后卫，一路上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苦战，功勋卓著。五军团在红军中以能打防御战和掩护战而著称。军团参谋长陈伯钧也有“铁屁股”之称。这一点连李德（奥托·布劳思）也不得不承认，五军团“享有只擅长于掩护战的名声，……其实，他们也很善于进攻。一九三五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贵州非常勇敢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攻下了贵州省军队防守的布满堡垒的山坡。”^②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均改称为军。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陈伯钧调任第九军参谋长。他到九军后，即由懋功行军到抚边，抓全军整训，并负责监视大小金川及松潘敌人，以一部迅出阿坝，占领夏河流域。八月初，陈伯钧指挥二十七师在抚边、石观音、潘家山之线作战，三次击溃进攻之敌，然后转移到两河口，部署夏洮战役计划。

八月中旬，陈伯钧从两河口到大藏寺，向朱德、刘伯承汇

^①陈伯钧 1935 年 6 月 27 日日记。

^②〔德〕奥托·布劳思：《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82 页。

报抚边战斗及九军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八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目前任务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

八月二十二日，陈伯钧由大藏寺出发，到安得山露营。朱德委托他召集二七六团及总部直属队干部讲解行军注意事项及对付敌人骑兵问题。二十四日，他到石匠关收容第九军落伍人员；二十六日到达查理寺。总部得知中央机关所在的右路军已进占班佑，希望左路军赶到班佑集中。朱德、刘伯承当即决定五军由查理寺直向班佑前进，总部随后跟进；留陈伯钧部暂驻此地，负责传达各部任务，研究作战部署，分配警戒区域，察看地形，查明道路，维护交通，接应来往部队等。

此时，张国焘暗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再拒绝中共中央的来电，加紧控制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五月一日，中央再次电催张国焘前来会合，但张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东进。九月三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致电中央，要求右路军南下，擅自决定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他的支持者要其挟持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当即立断，决定先率一、三军团于九月五日凌晨北上。

九月六日，陈伯钧率政治保卫队及船工会人员行军一百二十里，赶到中阿坝。次日，张国焘也到达中阿坝。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随军长、政委去张总政治委员处，听一般同志谈及一、四方面军纠纷问题，深为愤慨。”晚饭后，“即写一信给总政委，要求当面谈话，表示我对一、四方面军会合

后的一切纠纷问题的意见。”九月八日上午，陈伯钧找张国焘，表示：“我深感个别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既不坦白承认各方面之错误，又不迅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解决各种纠纷。假（给）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陈伯钧当面提出要张国焘“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装模作样地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又不能及时办到。”最后，陈伯钧义正词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

九月九日午饭后，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未遇，便与刘伯承谈前两天见张国焘的情况。刘伯承告以镇静，冷静，仔细观察事变的进展，并注意斗争策略。当晚，陈伯钧写报告要求调动工作。

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直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才见张，张答应晚上答复。当晚，陈伯钧去见张国焘时，一个高级干部劈头就问：“陈伯钧呀，听说你反对我们张总政委？”“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陈伯钧也不示弱，气氛很紧张。张国焘赶紧假惺惺地对陈伯钧说：“坐下坐下，有话好说。”那个高级干部连珠炮似地向陈伯钧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围剿’及突围后的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陈伯钧据理一一答

复。最后，张国焘表示，要陈伯钧到总部“休息一个时期”。九月十四日，陈伯钧离开九军。他的骡子、望远镜等均被扣下，马夫被打，警卫员挨整，只好只身去总部。

九月中旬，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十月下旬，陈伯钧随红校撤离中阿坝，一路行军筹粮，对付地方反动武装。十一月上旬，红大改为中级干部队，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调前方工作，但无结果。十二月初到灵关，陈伯钧身患重病，有人还说他患的是“政治病”。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受张国焘迫害，精神是痛苦的。但他坚定乐观，有时还高歌数曲，以泄胸中郁气。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鉴于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自己南下方针的失败，被迫北上。由于军事指挥工作需要，二月十一日，陈伯钧带病到第四军任参谋长。三月初，经懋功到抚边，指挥第十师（师长陈锡联）作战、筹粮，并侦察北进道路。四月初，他率部进占瞻化，整训部队，对四军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原军长王宏坤回忆说：“当时环境恶劣，部队减员多，加上张国焘分裂主义干扰，工作很难做。陈伯钧胸怀宽广，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因为他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经常主持战术讨论，工作抓得很好，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对他的印象很好，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①

四、五月间，陈伯钧在瞻化地区奉总部指示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少数民族首领诺那，以及上瞻、中瞻、下瞻、河东、河西等地土司德格王、翁须多基、巴登多基等的投诚，打开了群众工

^①王宏坤谈话记录（1983年6月16日）。

作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陈伯钧为军训需要，还写作了《步哨动作》、《侦察勤务》、《简易的射击动作》等一系列教材。

六月初，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甲哇寺。十七日，陈伯钧与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等会见，详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及开“锁口”会议的情形，直至深夜十二时；次日又谈了一夜。六军团的领导人听了陈伯钧的介绍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

七月四日，陈伯钧到东谷。朱德、任弼时、刘伯承接见并通知他调六军团任军团长。当天下午，陈伯钧到职工作。

陈伯钧到六军团后，和政委王震等决心迅速扭转和纠正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太差的情况。他们一面深入基层，抓紧班排以上干部的教育，一面改进机关工作。部队北上行军到哑龙寺时，王震率模范师及十七师随三十三军筹粮，陈伯钧则率十六、十八师和军团直属队到上阿坝。七月二十三日，陈伯钧涉水侦察，到东岸会见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商谈渡河事宜。七月二十六日，他指挥全军渡河到中阿坝，会见二方面军首长贺龙、关向应。

七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指示六军团迅速北进，配合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次日，陈伯钧和王震率部从下阿坝出发，经郎垭到木耳马。这一带是著名的草地，气候多变，全军遭大风雨及冰雹袭击，浑身湿透，呼吸困难。第二天翻越长江、黄河之分水岭，因向导带错路，全军露宿大坝子。八月一日，陈伯钧赶到先头团指挥所，指挥部队沿河而上，找到了通往箭步塘的道路，然后率部过噶曲河，向包座挺进。

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行军、备战、筹粮，八月下旬，六军

团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在紧张的行军途中，陈伯钧还研读了《唯物史观》等书籍。九月中旬，全军经礼县、成县、徽县、两当、凤县到双石铺，沿途均有战斗。

十月四日，陈伯钧率部从甘肃西南边界的两当出发，向天水附近进军。五日，和王震在高桥会合。六日，他们指挥十六师夜袭天水以南之娘娘坝。七日，在罗家堡与敌激战数小时，然后向通渭前进。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亲笔来函：“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同努力！”

十月十八日，陈伯钧和王震率部由青姜驿到达老君坡，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会合。陈伯钧欢欣鼓舞，主持了欢迎会，并致欢迎词。二十一日，他陪同二方面军首长，应一方面军首长之约，会见于平丰镇。二十四日，他参加方面军营以上军政干部活动分子会，听邓小平报告统一战线及回民问题。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六)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东北军两个骑兵师企图截击我军，胡宗南所部也由新营尾追。陈伯钧奉令率六军团一部经杨明堡向红井子集中，途中遇敌人飞机并和骑六师遭遇。然后向吴家庄、刘家井之线集结。

十一月二日，陈伯钧随朱德到上龙池二方面军司令部开会，研究部队改编、备战训练及打胡宗南等问题。会议决定，

六军团暂缩编为四个团。为了及时训练干部和提高军事技术，上级决定暂由陈伯钧、张子意去协助总参谋长刘伯承办方面军培养指挥干部的随营学校。因刘伯承正在养伤，随校工作主要由陈、张负责。

十一月五日，陈伯钧安排好六军工作；即起程赴宁夏的预旺堡附近的新庄子，与任弼时商谈，决定抽出和集中二方面军大批干部进随校。随校办有高级班、上级班和中级班，培养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仅第二军就输送学员五十余人。不久，陈伯钧、张子意率随校住甘肃环县木钵，与一、四方面军两个步校毗邻。

十一月二十六日，陈伯钧在木钵参加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集的一、二、四方面军三校负责人会议。军委决定将三校编成红军大学第二校，以刘伯承任校长。

当时敌情紧张，胡宗南和东北军等部企图进占甘肃与陕西边界的洪德、环县和曲子。周恩来派陈伯钧率随校师生到曲子协同独立师阻击东北军一〇六师。当天午后，陈伯钧赶到曲子指挥由孟家寨至李家塬、高家崾崄之线作战，给曲子之敌以相当打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二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和前方总指挥部打电报要陈伯钧、张子意回六军团工作。前总首长彭德怀、任弼时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回六军团加紧整顿司令部，严肃军风纪，克服游击主义，适应新的作战需要。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军团奉命南调，由甘肃之合水经宁县

向陕西之淳化集结，相机迎击进逼西安的国民党军。在驻军石桥镇期间，陈伯钧和王震等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抓训练，扩大红军，讲形势任务和战略战术，还组织了盛大的点验（检阅），受到方面军首长贺龙、任弼时等的鼓励和赞许。在驻军庄里镇期间，抓当地士绅的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给各界人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二月驻军田家，陈伯钧抓军事教育工作，部队学习风气空前高涨。

三月八日，陈伯钧出席了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十八日，他和王震主持六军团党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六军团工作进步很大，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在检查工作中表扬六军团活泼、政治化、团结一致。

四月中旬，陈伯钧到陈炉镇二方面军总部开会，听彭德怀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传达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决议。

四月下旬，陈伯钧随贺龙等赴延安出席苏区党代表大会。在耀县会合刘少奇同往洛川。途中，刘少奇谈及白区工作经验，陈伯钧很受启发。五月三、四日，他连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听毛泽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五月八日，听毛泽东作结论。九日上午，随朱德游清凉山。傍晚，到毛泽东驻地与秋收暴动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遗留下的部分同志合影。五月十六日，在红军大学听毛泽东、朱德讲话。在延安的十来天，使他大大提高了对从内战转向抗日战争的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二十二日，他从延安返回庄里镇。五月底，率六军团参加方面军的五卅运动大会，在政治、文化、体育竞赛中均名列第一，获得总优胜。

陈伯钧在红军中奋斗十年，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形成，他才与在白区的二哥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四哥、五哥通信，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红军的宗旨及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在驻军流曲镇期间，陈伯钧抓紧战争暂停的空隙，进行学习。白天工作，晚上钻研《政治经济学》，看近代史及《世界知识》等书刊。他勤于读书，每日坚持写日记，使他成为红军领导干部中较有文化素养和理论素养的干部。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军委电令：日寇占领华北，我军以十日准备，待命出发。陈伯钧在繁忙的备战工作中，抓紧时间钻研毛泽东的《战略学》（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实践论》，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六军团编为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陈伯钧任旅长。

九月二日，一二〇师开誓师大会，朱德到会讲话。次日即由庄里经蒲城、合阳向山西开拔。王震率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先走，陈伯钧率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暂留陕中，九月五日经耀县北进，驻防洛川。

洛川是苏区和白区的交界处，是延安的南大门。为了扩大部队准备新的机动，并做好杨虎城部骑兵团的统战工作，上级决定陈伯钧暂留此地，主持全面工作。

当时国民党在洛川设有专员公署、县政府，还驻有陕西省政府委员、四川刘湘的代表，情况很复杂。陈伯钧经常同各种人物打交道，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并以红军的模范行动影响他们，争取共同抗日。

陈伯钧在统战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七一八团的训练、警戒和剿匪任务抓得很紧。该团在驻防期间，无论是

作战训练，还是军政、军民关系，都搞得较好，受到当地群众好评。为了保证我党、政、军干部往返延安、西安间的安全，陈伯钧经常派小部队负责护送，并押运粮食和军饷到延安。他们接待、护送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战士和爱国知识青年，还有国际友人及部分领导同志，工作颇有成效。

九月十八日，江华带六万元军饷由西安到洛川，适逢陈伯钧要向军委汇报，便亲自护送江华回延安。二十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二十二日又在抗大听毛泽东作时事报告。二十三日，毛泽东约请四川代表偕陈伯钧兄弟俩吃饭。深夜，毛泽东还向陈伯钧谈军事政治训练、统一战线、学习和陈的家事。二十六日，陈伯钧启程返洛川。

十月十一日，陈伯钧收到二哥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十月九日的亲笔信，通知队伍准备开动，在七天内准备完毕，并安排陈伯钧的亲属回四川，嘱咐：“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十九日，军委来电报，要陈伯钧赴延商谈要事。二十二日陈伯钧到延，当晚毛泽东约他谈话。二十六日，毛泽东通知陈伯钧留中央党校学习四个月再回前方。三十日，陈伯钧去中央局参加军事问题讨论会后，即到中央党校学习。

在党校期间，陈伯钧勤奋地学习马列著作，同时积极钻研军事理论。他回顾自己参加秋收起义以来进行游击战争的实践，根据毛泽东的组稿计划，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撰写了《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约一万五千字），经毛泽东修改，以《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为题，发表在一九三八年第二十八期《解放》刊物上，“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的参考”^①。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七)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钧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训练部部长。负责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这时，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在国破家亡的痛苦中，向往共产党，纷纷投奔延安。党中央决定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抗大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百余名新学员。全校先后编成八个大队，下分四十三个队，共有学员五千五百多人。学员中知识青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有华侨、留学生、记者、作家、技术专家，以及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陈伯钧除抓全校训练工作外，还自己写提纲，编教材，讲授军史、战史、战略战术、游击战争等课程，很受学员欢迎。

七月间，陈伯钧接待了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雷克难、傅路德、稚德（女）等四名国际友人。他们慕名来校参观，得到很好的印象，要求抗大承认他们为“名誉学员”。临别时，他们说：“在中国各地以延安的印象为最佳，在延安尤以抗大为最好。”^①

为了办好抗大，加强学校的基本建设，陈伯钧参加了校首长主持的《抗大组织条令》的编写工作。他们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在条令中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间，英

^①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第63页。

勇奋斗，完成革命任务”。条令的颁发，保证了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把学校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二分校以原抗大第五期一部分，陕北公学、旬邑分校的毕业学员以及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以及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各一部分组成。

十二月二十三日，陈伯钧率二分校第一梯队从延安出发，艰苦跋涉经蟠龙、清涧、绥德、米脂、佳县，渡黄河，过临县、岚县，越过同蒲路，冲破重重困难，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胜利到达冀中灵寿县。陈伯钧在蛟潭庄向聂荣臻、彭真报到。第二梯队在邵式平副校长率领下，从关中地区出发，于二月下旬到达冀中陈庄。两千多名教职学员胜利会师。

六、七月间，晋察冀边区连降大雨，陈庄一带水灾十分严重。陈伯钧率二分校立即投入救灾运动。全校师生自愿把一天三餐改为二餐，以黑豆做主食，挖野菜充饥，以减少群众负担；每人还抽出一两个月的津贴救济灾民；还帮助群众修屋筑路，排水耕种，搞卫生大扫除，防止发生瘟疫。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为二分校扎根群众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陈庄是晋察冀边区的大集镇，驻有许多机关、团体，是敌人注意的目标。八、九月间，日军曾四次轰炸陈庄。九月二十七日拂晓五时，日伪军集中一千五百多人，偷袭陈庄。陈伯钧率分校学员与敌在沙岭一线激战。二十九日，敌被我三五八旅、四分区五团、抗大二分校等部包围。在陈伯钧、邵式平和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的直接指挥下，全歼敌军于万寿岩。共缴获长短枪约四百支，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近十挺，俘

伪军五六十人。十月中旬，在陈庄召开了祝捷大会。贺龙、彭真、聂荣臻、罗瑞卿、甘泗淇、周士第、张际春、张宗逊、成仿吾均来参加。陈伯钧是这次祝捷大会的主办人，十分忙碌。

十一月七日，完县和唐县的敌人向二分校新驻地葛公村逼近。当时，前线无部队，陈伯钧派一大队前往北大悲，并抽调军区教导团两个连协助阻敌，还受命指挥神南后方部队参战。八日，他率少数通信人员上山观察，见敌人进逼南北洪城，即下令留驻人员全部投入战斗，并逐次转移，节节抵抗，终于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五月十三日，陈伯钧、舒同等率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团由驻地蛟潭庄出发，向延安前进。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因负责掩护的部队侦察不切实，代表团疏于防范，在白水村遭到日军伏击，虽经陈伯钧等努力组织抗击，有位代表不幸落马牺牲，后因七大推迟召开，中央便决定全体代表留延安学习。陈伯钧、舒同等暂留总政治部。

七月中旬至九月中旬，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哲学研究会、战争研究会和总部的参谋工作讨论会。

十月十一日，陈伯钧被正式分配到军政学院工作。

军政学院负责“培养具有理论基础能充任师、旅等级宣传教育指导人材”。陈伯钧直接负责教育工作。他编写了《参谋长工作讲授提纲》、《我军战略战术在抗战三年来之发展情形》等教材。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为了加强对高级军事干部的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将军政学院的四区队与抗大三分校组成军事学院。朱德为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

一九四二年二月，陈伯钧申请再入中央党校学习。比较系

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认为“这才是现实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全党均应好为体会与坚决实行之。”^①

五月初，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陕甘宁边区形势也很紧张。正在党校学习的陈伯钧，由毛泽东提名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担任军事指挥工作。他接受任务后，立即深入边远地区部队驻地。途经八九县，行程数千里，检查工作，布置防务。

一九四三年一月下旬，中央调陈伯钧任三八五旅副旅长。毛泽东、朱德、贺龙向陈伯钧交代任务后，他于三十日赴甘肃庆阳就任。在陇东，除备战反摩擦外，全旅还要拿出相当的人力搞生产。他们备战一年，解决了吃饭问题。在陇东工作的将近三年时间里，陈伯钧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全旅各项工作都有较大进展。三八五旅成为保卫边区的一支主力旅。

一九四五年三月初，陈伯钧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四月二十三日，七大正式开幕。陈伯钧五月六日在大会上发言，谈了游击战争的概念及其发展，以及对胜利转变的几个建议。六月十一日，七大闭幕后，陈伯钧又参加五省联防司令部会议。会后即返陇东，传达贯彻党的七大精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级来电调陈伯钧到延安任联防军副参谋长，协助贺龙（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兼参谋长）主持工作。他负责拟订冬季整训教育计划大纲，筹备成立工兵、炮兵营，并指挥河东部队占领永和城。

^①引自陈伯钧日记。

(八)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批准陈伯钧去东北前方工作。十月十八日，他率八百名干部及部分战士、家属共一千三百余人由延安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十一月下旬到达承德。因去东北的火车不通，中央改令，将这批干部留冀热辽分配工作。陈伯钧安排好这批干部，然后参加打遵化、保卫热河战役。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中旬，陈伯钧在冀热辽军区，协助指挥冀东部队在玉田、遵化、平泉一带作战。一月十九日，叶剑英来电要他到北平军调处工作，后来委派他担任热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二月下旬，驻平泉附近的国民党十三军第五师向棒罗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第四师又占我方大石桥、小寺沟车站等地。为此，三月一日，陈伯钧等三人小组前往冲突地点，在党坝订立了临时协议。国民党方面接受了我方提出的“第四师及进占小寺沟车站一带之顽军完全撤退回平泉原阵地”^①的要求。

当时，斗争尖锐复杂。国民党代表岳昌瀛无理狡赖，诬蔑我方破坏停战协定。他们明明向我方进攻，却说是“猛烈突围”。陈伯钧据理驳斥，写了书面材料，并绘制地图，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这份材料用大量事实说明，破坏停战协定、进军热河、引起一切冲突的，正是国民党。

三月十七日，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讹载承德执行小组记者招待会的内容，有意诬蔑我军。陈伯钧立即去访美方代表，当

^①承德小组工作报告第二号（3月5日）存中央档案馆。

面核实，证明《华北日报》和中央社记者均未参加招待会，所载消息全属捏造。他据实辟谣，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挑衅。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整个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无法开展。上级调陈伯钧去东北前线。八月初，在哈尔滨，经陈云谈定，分配他到军政大学任教育长。

东北军大前身是延安抗大。一九四六年底搬到通化市才改现名。陈伯钧在校期间，经常给学员们做报告，讲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工作做得很出色。

一九四七年五月，陈伯钧任合口军区司令员。这时正值东北解放军进行夏季攻势、准备秋季攻势，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的重要时刻。他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扩充了地方武装，筹集了大批作战物资，为以后东北战场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七年八月，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作战思想，陈伯钧又调东北野战军总部直接领导的上干大队任大队长。翌年五月下旬，又调他到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工作。同年八月下旬，他返哈尔滨，见林彪、罗荣桓，得知中央命令将前线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司令部，肖劲光任司令，他任副司令。九月初，他到长春郊区四家子兵团司令部。

长春守敌有国民党一个兵团部、两个军、六个师，约十万人。九月十日，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了作战部署：以五个纵队对付沈阳敌人，一个纵队及九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阻止敌人突围。

十月十五日，长春守敌曾泽生派人到兴隆山接洽起义事宜。陈伯钧等提出三个条件，即“起义必须有行动表示；听我命令开到集结地点；派高级主官前来谈判。”十七日，陈伯钧

等指挥所部向长春急进，以掩护曾泽生部起义并威逼新七军投降。

由于东北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围城达四个月之久，加上我军迅速攻克锦州的胜利。十月十五日，新七军被迫投降，长春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当即来电嘉勉：“对六十军及新七军之分别处理办法得当。甚慰。”

十月下旬，陈伯钧等指挥所部分头南下，集结昌图、开原、通江口之线，以策应主力在彰武、新立屯、黑山、北镇间之大会战。后因黑山敌人已被我军主力包围，沈阳敌人可能逃跑，陈伯钧等又组织各师向沈阳急进。三十日，陈伯钧等指挥独十师攻占抚顺，独六师攻占本溪。十一月二日，我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

十一月十九日晨，陈伯钧接东总转来毛泽东电报，要求部队早点入关，抓住敌人。二十一日夜，陈伯钧和肖劲光到沈阳，东总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迅速地、秘密地把部队开进关内，切断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堵住敌人，不准敌人逃走。东总还委托他们负责指挥进关的先头部队。二十四日，陈伯钧等率部离沈阳向关内进军。八十万大军，十万骡马，成群结队的各种大炮和车辆，洪流滚滚，奔向华北。陈伯钧和兵团部随五、六纵队走北路，经喜峰口出遵化。接着，又从二十六日开始，夜行晓宿，迎着寒风雨雪，越过河岔、夹沟、山道，于三十日半夜到达马相营，参加平津战役。

十二月九日，陈伯钧等到达三河县北的王庄子。这时，敌人企图打通平绥路，以保持其向西回窜的退路。总部决定由肖劲光、陈伯钧指挥三纵、五纵插到沙河、南口、昌平间，阻击怀来敌人，并牵制敌九十四军的行动。当陈伯钧赶到五纵驻

地杨各庄商讨部署时，怀来敌人已向南突围，敌九十二、九十四两个军缩回北平。于是，总部又命令陈伯钧等指挥三、六、十纵队，隔断平津之敌，堵击北平敌人南逃。

陈伯钧等按毛泽东“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指示，朝着平、津两面修筑工事，待机歼敌。几天后，华北七纵队也拨归陈伯钧等指挥。十七日，五纵两个师逼近北平西城根，缴获几十辆坦克。十八日，三纵七师占南苑机场，缴获四十余架飞机及一批高射炮。二十一日，聂荣臻来兵团部谈北平守敌情况。二十五日，总部电令肖劲光、陈伯钧等指挥一、三、六、十、十一等五个纵队，打突围之敌，并要回电提出部署意见。陈伯钧等研究决定放弃南苑机场及马驹桥一带，以吸引敌人进入我袋形阵地而后围歼之。次日，总部批准了此项部署。陈伯钧连夜起草命令、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按照新部署迅速移动。

十二月三十日晚，总部发出命令，分兵包围北平和准备攻击天津。当夜，总部来电，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总攻天津，一兵团严密监视北平之敌，防其逃跑。

天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九十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傅作义二十余万守敌团团围住。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对北平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密包围，给外围敌人以沉重打击，并发动了政治攻势，最后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陈伯钧等负责改编傅部的四兵团。

二月三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轰动世界的北平入城仪式。当陈伯钧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目睹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行列和欢腾的人群时，感慨万千。经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了。

(九)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陈伯钧主持天津的警备工作。刚刚打开工作局面，又奉命率部南下豫鄂，策应渡江作战。

三月下旬，陈伯钧到许昌。根据刘邓大军的要求，兵团部在许昌召开了南下会议，研究对付桂系部队的作战方针。月底中央军委电示：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已到北平谈判，我军不应太过逼近，等四野主力到达时再去接收武汉。于是，部队离许昌向信阳前进，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并布置新区的剿匪事宜。

遵照毛泽东、朱德四月二十一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短短几天时间，相继占领南京、杭州，解放武汉三镇。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公布十二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兼政委，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韩先楚为第二副司令。兵团下辖四十、四十五、四十六三个军。五月中旬，十二兵团入汉口。陈伯钧先后到鄂城、大冶、黄冈等地，检查四十五军各师的工作，动员大家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

七月七日，陈伯钧奉命率四十五军由鄂城出发追击国民党军。他们冒盛夏骄阳，沿鄂湘赣边直插江西修水、铜鼓，占领萍乡，截断南（昌）、萍（乡）路，配合第十四、十五兵团歼灭江西的敌人。

八月初，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八月下旬，陈伯钧赶到长沙兵团部开会，按照中央军委对白崇禧部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分三路大军南进的战

略，十二兵团为中路军，经湖南南部直趋广西北部。九月下旬，陈伯钧率四十五军进军广西。十月五日，前锋一三五师插向衡宝路南灵宫殿之线，咬住了敌人。此时，四十五军和十二兵团其他部队，已将开始撤退的白崇禧的主力四个师团团围住。十月十日，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我一三五师歼敌一七二师师部及两个团；一三四、一五八师跟踪紧追敌人；一四六师歼敌一个团；遂使敌人全部瓦解。这就是解放战争史上有名的衡宝战役。

衡宝战前白崇禧率其主力向南撤至衡宝地区，集结重兵二十余万，凭借湘江、资水布防，以图顽抗。陈伯钧指挥四十五军从宝庆以东插向湘桂路，以一三五师直奔衡宝公路上的黄土铺，单刀直入，截断桂军张淦兵团的退路，击退了兵力超过自己五倍的敌人的进攻，奠定了华中战局的胜利。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曾随军采访，将他们的战绩写入《战斗着的中国》一书中。

十一月下旬，四十五军由湖南进入广西，月底过桂林后，陈伯钧指挥一三三师向武宣追击，一三五师向象州追击，一三四师直插柳州、迁江、宾阳，向南宁追击。十余天行程一千多里，没有休息过一天。

十二月初，陈伯钧挥师进占柳州，黄杰兵团残部溃退越南境内。

截至十二月九日止，广西战役基本结束。

一九五〇年元旦后，陈伯钧到容县等地布置剿匪工作。二月，他受命回长沙，担负湖南繁重的剿匪任务。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形的大小股匪尚有四百六十股、六万三千多人，潜藏隐蔽的散匪还有三万七千人。这些股匪与散匪，均活

动于省、县交界区和山岳、湖沼地区。大股的称霸一方，活动猖狂。小股的经常夜集明散，出没无常，勾结地主恶霸直接捣乱，危害我地方工作。陈伯钧召集会议，起草命令，强调在剿匪方针上以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在步骤上确定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打法，首先集中力量肃清中心区、产粮区之匪及确保交通要道的安全。

在陈伯钧等领导下，四、五、六三个月，湖南剿匪获得了空前战绩。直属七个分区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规定的任务，计歼灭土匪及收编游杂部队共十八万七千八百〇六名。从八月初至十月上旬，主要是巩固中心区，进剿夹生区的土匪。仅湘西军区就歼灭土匪近万名。有九千多个自然村成立了农会，民兵发展到三十万人，为土地改革和我军转入边缘区会剿股匪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底，湘西军区会剿五省边沿八百里长战线的土匪，计二万多人，使湘西二十二个县全部得到解放。一百年来“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被打破了。当地人民纷纷写信赞扬解放军说：“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它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教育与训练能够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高级军事干部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学院，委派刘伯承主持办校。刘伯承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选调既有实战经验又有文化理论水平的陈

伯钧来院主持训练工作。

十一月下旬，刘伯承抵南京就任军事学院院长。十二月中旬，陈伯钧从湖南赶来军事学院工作。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军事学院成立典礼在南京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发来祝词和贺幛。毛泽东、朱德亲笔题词勉励。

军事学院成立后，头三个月中心工作是完成解放战争经验总结；学习新兵种技术；建立正规制度。陈伯钧等根据刘伯承的倡议成立了有教员、学员参加的群众性组织学术研究会，还成立了吸收十五个科目的教授会主任参加的工作机关学术研究室，并对各教授会主任和军事教员进行军事测验。二月初，陈伯钧参加编写指导组，协助刘伯承主持战例编写工作。

陈伯钧根据刘伯承的指示，督促训练部门认真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志愿军的战役和战斗经验。一九五一年，军事学院先后举行了三次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报告会，请志愿军代表、赴朝慰问团负责人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报告朝鲜战场情况。

一九五一年四月，陈伯钧在刘伯承领导下，开始准备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六月十五日，他随刘伯承带着高级速成科的学员来到安徽凤阳临淮关参加预演。二十日，演习正式开始。参观的有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的领导同志和各军事院校代表，还有华东军区三百多名干部。这是军事学院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它使学员们实际看到学到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从而推动了全军的训练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陈伯钧受刘伯承委托，率军事学院见学团赴朝鲜前线学习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历时三个多月，几乎跑遍了朝鲜战场。陈伯钧同团员们一起钻地洞，走坑道，在前线取得第一手材料，学习总结了志愿军五次战役及阵

地防御作战的经验。

一九五三年，陈伯钧协助刘伯承组织了十余次演习，其中包括三月的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四月的步兵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六月的炮兵实弹射击和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的步兵师进攻后勤实兵示范演习；进攻战斗中步兵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等等。这些，对全军的军事训练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一九五四年七月，刘伯承、陈伯钧、钟期光联名向中央军委作《关于开办战役系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招收二十至四十名兵团以上高级将领入学。九月，战役系正式成立，由学员杨得志兼主任。学员中还有韩先楚、李天佑、陈锡联、刘震、秦基伟、廖汉生等。

十一月中旬，陈伯钧赴山东平度县张戈庄，协助刘伯承组织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全军有二百六十多名高、中级干部参观见学，演习线纵深三百公里，历时十四天。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军是第一次。

一九五五年初，军委实行军衔、薪金等四项制度。陈伯钧在全院干部和学员大会上说：“我们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能过三关，即金钱关、美女关、地位关。经过考验确定证明是在为党、为人民群众、为国家勤勤恳恳地工作，并把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那就不错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陈伯钧出席南京军区授衔授勋典礼。刘伯承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陈伯钧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来军事学院视察。刘伯承和陈伯钧汇报了学院情况，并陪同毛泽东视察校园。毛泽东称赞刘伯承知人善任，勉励大家把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好。

军事学院成立短短五年来，学员人数由七百多人发展到三千人，教授会由十一个发展到五十个，教员由二百九十多名发展到一千三百多名，同时选拔培养了研究生，增强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几百种，想定作业、指导法等三百五十多种，还举办了四次师资训练班，实施了三十五次实兵示范演习和十二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毕业的有一千四百多名。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底，全院共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基本、情报、政治、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十二个系，为全军最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陈伯钧出席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十一月上旬，刘伯承因病向中央军委请假疗养。军委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批准由陈伯钧代理院长。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因六个军事院校陆续分建，南京军事学院召开会议，欢送刘伯承、陈伯钧调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副院长。九月十七日，陈伯钧到北京赴任。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至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致使后来人民解放军的正规训练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陈伯钧被当作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在

会上和会后受到了长达四个多月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十一月，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兼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仍任副院长。

一九六二年九月，叶剑英辞去高等军事学院兼院长职务，军委任命陈伯钧为院长。此外，陈伯钧还兼任中央军委训练小组成员（组长叶剑英）、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以来，陈伯钧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事业。他在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整整工作了十四年，呕心沥血，为我军培养了大批高、中级指挥干部，为部队革命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伯钧为人刚正不阿，性格直爽，敢于直言，所以一直受到林彪、江青等的忌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钧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在病重住院的情况下，仍被揪回批斗、围攻、抄家，使其身体受到摧残，不幸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含冤逝世。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陈伯钧的部分档案资料、干部履历表等。
2. 毛泽东给陈伯钧的信件。
3. 陈伯钧的部分日记，及回忆文章。
4. 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根据地史料选编》（档案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5. 红一军团三次反“围剿”部分作战命令。
6. 红三军、红五军团有关战斗、战役详报。
7. 军委关于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的指示（1934年12

月18日)。

8. 陈伯钧向军委、联司的电报(1937年—1945年)。
9. 陈伯钧在热河执行小组给叶剑英和北平执行部的报告(1946年3月—1946年6月)。
10. 采访陈伯钧记录稿:《关于井冈山斗争的一些情况》、《谈井冈山斗争》等10余篇(1960—1973)。
11. 陈伯钧讲课、报告记录稿:《中国革命战争史讲课提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回顾》、《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介绍》等。
12. 刘伯承和陈伯钧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的来往信件。
13. 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1930年12月20日)。
14. 罗荣桓等著:《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5. 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6. 郭沫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出版。
17. 谢良:《铁流后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8. 访问肖劲光、许世友、李聚奎、朱良才、张宗逊、陈士榘、王宏坤、舒同、刘型、张令彬、郭化若、莫文骅、吴克华、杜义德、彭明治、张平凯、李雪山、卢仁灿、罗若服、肖文玖、李凡山、魏传统、黎东汉、袁渊、谢良、叶长庚、林浩、仲曦东、李方、李采伍、张宇晴、孙耕夫、田雨、白驰驹、胡德兰、刘勉、刘超、马殊、冯明英、李林泉、赵腾等的记录。

吕振羽

刘爱文 王兰凡

(一)

吕振羽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己亥年腊月三十）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金称市溪田村（当时属武冈县）的世代农家。祖父原是一个佃农的儿子，到振羽出生的时候，已挣得了自耕农的地位。吕振羽的父亲三十岁左右教私塾，后来请过长工，出租过土地，放过高利贷，管过公堂。

吕振羽“幼随祖父勤耕作，樵牧队里乐成群。”^①砍柴、看牛、捡茶籽，见什么干什么。一到夜里，祖父就给他讲故事。祖父告诉他，自从来了洋鬼子，溪田这地方世道大变，“缴租三石算二五”，“兑钱回扣折二八”，“借债月息三四分”，“富豪之家爱洋货”，“家机土布皆停织”，“穷人年比一年穷。”还告诉他，“长毛”（太平天国起义军留发不剃，俗称“长毛”军）“杀富济贫”，从广西打到溪田，大营就扎在他们家对面的茶山院。他的曾祖父丢下锄头参加太平起义军，当了“大旗手”。但是“长毛”走后，地主们疯狂报复

^①吕振羽：《二十七岁自述》。

穷人，吕振羽的两位曾叔祖，一位在武冈州城被害，一位只身远走云贵。……所有这些，都在吕振羽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吕振羽幼年学习勤奋，十三岁开始就读于当地吕静斋经馆，成绩优异。曾作《咏榴花》五绝一首，寄托自己的情怀，诗曰：“门内榴花树，花开血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吕静斋先生将诗改动了一下：“种得榴花树，初开艳色红。何时能照眼，此日已摇风。”对这位弟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一九一五年，吕振羽入武冈县立中学^①，受到该校国文教员肖石人的器重。肖石人是一位新派人物，曾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后辞职回乡教学。在肖的指导下，吕振羽崇信改革，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他在《答策问：盍各言尔志》的作文中写道：“如国家危亡，当以此身报黄帝祖宗于地下；如国泰民安，则不求名利，茅屋三两间，卧读唐诗足矣。”被肖石人赞扬为“圣贤行止，豪杰义烈，兼而有之”。五四运动爆发后，吕振羽在武冈联络几所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并被推为会长，带领同学演说，游行示威，开展“反日仇货”运动。这时，肖石人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爱国很好，但是光把日货烧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脸盆，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来，人们就不会去买日货了。”吕振羽觉得肖老师的话很有道理，只有工业发达，国家富强，才不会受人家欺侮。从此，他产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

一九二一年，吕振羽考入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电机工程系

^①吕振羽入武冈中学时间说法不一，尚待进一步查证。

学习。在这里，他目睹了洋人横行、军阀混战、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学校里一个号称博学多才的留美博士，面对一台出了毛病的电机束手无策。他开始怀疑：如此办工业能否真正救国？追随这样的“洋博士”能学到什么？在“同行同居”欧君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无政府主义，并团结武冈县东四区的同学，组成东四区学会，参照克鲁泡特金的办法，起草学会的《旨趣书》，提出要在乡村组织农友互助的“共耕社”，开办禾、石、瓦、竹匠合营的“平民工厂”，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人饱暖的“极乐国”。他们宣称要用这样的办法去改造东四区，改造武冈县，改造湖南省，乃至改造全中国、全世界。一九二二年冬季，吕振羽在金称市古峰学校召开大会，决议推举校长人选，接办古峰学校；选出清算委员会，向区团防局清算历年团防局经费和预征田赋。结果，当地豪绅喻炳莲密告武冈县衙门，诬蔑他通匪。团防局要逮捕他。为逃虎口，他于除夕离别家门。从此，理想中的“极乐国”破灭了。不久，吕振羽重返学校，参加驱除校长宾步程的活动，并被推为驱宾大会副主席。斗争中他结识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听过李达讲新社会学，并带着极大的兴趣研读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他决心以身许国，并写下了“遥望南天意正雄，七尺从此属工农”的誓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打到长沙。刚由湖大结业的吕振羽便投笔从戎，随军到了江西，先后担任过北伐军的中尉秘书、上尉干事、宣传科长等职务，转战宜春、赣州等地。次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被迫离开部队，从江西、福建、广东辗转到了上海。时局的逆转，使他这只“失群燕子”一度苦闷，彷徨。他曾寄居于乡人或朋友家里，并在一个小饭馆里结

过帐。一九二八年，他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扶桑，顶替一个同乡的名额在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不久因经济窘困，又返回上海。

这时，国民党政府正与帝国主义搞所谓修约活动，实质上是承认那种换汤不换药的不平等条约。吕振羽对此不满。为了帮助民众认识当时局势并规劝国民党，他开始著述生涯，写成《中国外交问题》一书。在书中，他提出要“组织世界弱小民族国际”，“与西方无产阶级联盟”，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内，“完成政治民主”，建设“乡村自治”，“改良教育制度”，“发扬民族文化”等等。

一九二八年秋，吕振羽离沪抵达北平，参与编辑《村治月刊》。在北平，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郑侃等人，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一年后，他辞掉《村治月刊》的差事，受聘于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教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九三〇年一月，吕振羽和郑侃、杨缤（后名杨刚）、刘穆（即刘思慕）等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学者，创办起《新东方》月刊，十月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以探索解放东方弱小民族，谋求独立自主为己任。他在《新东方》发表长文《障碍问题》，是他追求第三条道路的剖白。此后，他还发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东方民族与东方革命》等文章。在当时的条件下，《新东方》的进步倾向是明显的，它与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步刊物时有交换，影响不断扩大。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慧由南京到北平，企图控制和利用《新东方》，胁迫研究会南迁。东方问题研究会理事郑侃、宋斐如、谭丕谟、邓梅羹等人，反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利用，坚持解散学会，停止出版刊物，并发表由吕振羽起草的抗议《宣言》。严酷的现实使吕振羽认识

到，所谓“独立”的学术救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昼夜不分，认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卢森堡的《新经济学》、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等书，以及其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还和郑侃、杨刚、谭丕谟、宋斐如、穆雨君、邓梅羹（翦伯赞后来也加入）等创办了一个青年出版社，计划每年译著十部马克思主义书籍。吕振羽努力用新的世界观从事著述，于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和五月，先后发表了《中日问题批判》和《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他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九三二年秋天，李达从上海转移到北平。吕振羽和自己尊敬的老师久别重逢，感情更为深挚，论学议政，过从甚密。吕振羽至少每周要去看望李达一次，李达也常到吕振羽处回访。这时，李达同时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教授，并兼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在李达的推荐下，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应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仕的聘请，在该系开社会科学概论课，这实际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课。吕振羽利用这个讲坛，向学生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据当年中国大学学生史立德、荣孟源等回忆，吕振羽不仅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极为认真详细，而且上一堂课所回答的问题，下一堂课还来补充、订正，或指出某一问题应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经典著作。学生有时提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他在简单回答之后，总是说：“你有空到我家中去仔细谈。”学生到他家中求教，他总是热情接待，直到把问题说清楚为止。有时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说得兴奋了就站起

来，结合中国现实，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少青年在他的指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后来成了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一九三二年，吕振羽在组织上跟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担任中共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他经常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而奔波；有的人受到特务的追捕，请求他帮助避难，他立即设法帮助，并介绍朋友来掩护。

(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从本质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危险性，吕振羽利用教学之余，奋笔疾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写成《中日问题批判》一书。书中指出：“此次中日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的议论家，却很少肯从历史和经济的观点去解释。”他认为“市场的再分割，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继续不断的事实。中日问题因之在市场再分割的形势之下而开展出来。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本质地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满洲又是资本主义视为反俄的东方防御线。因此，中日问题的意义，又含了一个反俄的重要内容”。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吕振羽作了痛快淋漓的解剖和批判。他在《中日问题批判》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政权，乃是由帝国主义通过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一种双重式的政权。封建军阀买办阶级自始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是和帝国主义对立的。他们并没有反帝国

主义的可能，这完全是半殖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性。他们不断去向国联申诉，其意义并不是在对日本的反攻，而是极其无耻可怜地是在一个主人跟前受了委屈，转去向多个主人鸣冤。”导群书店在出版这本书时向读者介绍说，本书是“站在唯物的观点，用辩证法”去分析把握中国问题，“不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其侵略中国的动因作一精确的观察，就是对于中国现在一般的意见，也加以严厉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该书列入“共产党书刊”，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命令全国查禁。

一九三三年五月，吕振羽又写成《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上）一书。他通过大量的材料，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了深入的分析，告诉人们，正是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造成帝国主义又变本加厉的对外侵略，世界面临第二次大战的危险；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它自身的灭亡。该书出版后不久，亦以其革命的内容而遭查禁。但真理的声音毕竟是封闭不住的。这本书不少报刊和出版部门私自翻印，读者竞相传阅，深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称许。一九六二年，经济学家吴大琨在一封信中指出，吕振羽是搞世界经济的前辈，“振羽同志在三十年前研究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时，就不但从生产、贸易、金融、劳动失业等方面出发观察世界经济恐慌，而且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印度、加拿大等国的具体经济情况出发观察世界经济恐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吕振羽的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揭露敌人，教育人民。这方面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但对于吕振羽本人来说，却还有另一方面的收获，就是这种研究使他对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得更深刻，掌握得更熟练，为他尔后正确阐明历史现象，深刻揭示历史规律，“复现”历史本来面目，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他们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妄图从根本上取消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或者诡辩说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妄图排斥“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地位和力量。”为了歪曲中国的现实，他们又歪曲中国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上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并任意曲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因此，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坚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的大事，是“关系根本问题的问题”。于是，吕振羽奋起参战。一九三二年，他在北方《丰台旬刊》等刊物上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一文，是他在这场论战中的代表性著作。他在该文中以大量材料，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及买办资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情况，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不能不为宗主国的附庸而受其支配”，“中国资本主义前途无望”，封建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着优势地位，但它又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样就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特点。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使得一些革命的史学家深刻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去研究和清理中国古代史。首先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当时避居日本的郭沫若。他于一九三〇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历史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阐述了殷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一次作出中国经历

了原始社会制、奴隶制、封建制等阶段的论断，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中国。这部著作的问世，“确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①但它也遭到传统势力的群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学者和托派如陶希圣、胡秋原、李季、严灵峰、王宜昌、叶青者流，攻击得更加起劲。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他们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发起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论战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是奴隶制是否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的问题；一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亦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论战的高潮时期，吕振羽正从事经济学的著述和教学。然而，“论战”中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感，迫使他投入这场斗争。这方面，他得到了李达的鼓励和指导。李达恳切地对他说：“你搞历史很好，历史很重要。”李达还说：“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真相。”他还着重指出：“你要看看现在史学论坛上有些什么流派，每个流派有些什么基本论点，论纲如何，要搞清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看哪个流派哪些人是最凶恶的敌人，你就对准目标斗争，以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革命。”^②这些宝贵意见深刻地启示了吕振羽。他当时说过：“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

①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版。

②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

争论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到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地需要解决。其次，深深地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法论的历史家——大多不是如实地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给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了一面新面具，因此我不能冒险来尝试。”^①于是，他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广泛地搜集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和神话传说；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客观地进行分析 and 对比。经过一段时期的独立研究和探索，终于形成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系统见解。他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社会史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四册。一九三六年六月，他的论述殷周以前中国远古社会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经李达推荐，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于论战中的主要问题都有所涉及。他批判从苏联学者波格达诺夫那里抄来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和马扎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指出他们不仅“在理论范畴里”是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包含着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即取消了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他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不曾经过奴隶制的所谓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其它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且有完全同一的过程，它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现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个阶段。

但是，该书的主要成就在于对殷周以前的远古社会的研究。在吕振羽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都只从殷代

^①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

开始。托派和一些买办文人宣称中国封建社会早在秦汉以前就崩溃了，完全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也有人认为“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澄清这些迷雾是很艰难的。吕振羽以探险家的姿态，迈入了这块“荒莽的天地”。他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深刻了解史前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在此基础上，依据仰韶各期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古籍、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学等方面的材料，探求出中国史前社会的一般特征，确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是“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并对各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婚姻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两个时代之间转化，都作了具体考察，“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①从而“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②吕振羽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这在中国历史科学中是第一次，也是他在历史科学工作中造诣最高的成绩之一。这本书一出版，即为国内学术界所注意，为许多人所称赞，当年九月就再版发行。当然也有人批评这部书“对古籍真伪不分”。关于这一点，吕振羽认为：“伪史中有真的成分”。他说：“关于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从后代文学上取材，无论出自真书或伪书，都只有神话传说的价值；既一律当作神话传说看，当然就没有真伪之别

①李达：《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

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中国书店1939年版。

了”。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分别“真史中的伪的成分”，“伪史中真的成分”，给后学留下了榜样。

随后吕振羽又着手研究殷周社会，先后发表了《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关于殷代史料问题》、《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殷代经济前论》和《周人国家创造的过程》等文章。一九三四年底，他的《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册，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完稿，因出版上辗转周折，至一九三六年，才由南京文化印刷社和上海不二书店分别印行。

关于殷代的社会性质，当时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季认为殷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叶青说“在周以前的商朝还是氏族公社社会”时代；陶希圣任意穿凿武断，时而说“炎黄时代成立了初期封建国家”，时而说：“商以前是民族及原始封建时代”；陈伯达也说是“原始封建社会”。吕振羽认为，象陶希圣、叶青、李季这些乔装的“历史家”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运用的武器为实验主义和机械论，他们“把各种现象从其当时社会存在的一般的现象和特征中孤立起来去考察，甚而把各种运动的变化的因素均一一作为静止的僵化的东西在排列，或者故意把某一方面特别加以夸张”^①。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在对科学对群众负任何责任，而只需要对主子负担反对科学欺骗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便只须在御制的结论下面，用一些零星的、断章取义的材料去粉糊，便算完成了任务。”^②他认为要正确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去阐明其发展规律，“必须从其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适应和制约的总

^{①②}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1962年版。

和等方面，作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考察。易而言之，只有从现象的全体的内在联系上，从其发展变化的运动的根基等方面，去阐明其独特的形态和规律。”^①吕振羽正是遵循这个宗旨去进行研究的。

吕振羽根据考古学界对殷墟出土器物 and 遗迹的考察，从当时冶炼技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出土物数量的比例、手工业的水平、以及铜器的生产量等方面，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指出：“即或那些堆积在窖穴中的石器不是已被废弃的东西，也不可能是主要的劳动工具；在殷代占支配地位的，是人们所拥有的青铜器；”^②并明确提出殷代是“青铜器时代”。这个结论发展了郭沫若关于殷商“金石并用”的提法，后来逐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普遍接受。

但是，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是否促成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变更呢？中国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等到“铁器时代”才能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呢？吕振羽认为：“用铁最早的巴比伦的嘉陀人是处在那样容易获得铁矿的有利的地理条件下，所以他们从金石器的使用便一直转入使用铁器的时代。这构成它的一个特点，但不能说那是古代国家和氏族所共存的特点。”^③恩格斯曾指出，最初的铁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从这里，他领悟到：青铜器的普遍使用，可能创造出相当高的生产力。殷代大批存在的“僧侣贵族”、“世俗贵族”、以及脱离生产劳动的公职人员——“诸臣百工”，还有出土文物显示的殷代各种文化成果，说明那个时代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这样的

^{①②③}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程度：直接生产者已经能够向社会提供愈益增多的剩余劳动，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剥削的出现成为可能。所以，他的结论是：“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而言之，它曾完成了社会内部的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出现的主要因素，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的时代。”^①

吕振羽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是首创性的。尽管它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也没有得到“自己的朋友”的赞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所公认。

吕振羽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西周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全面研究，特别对于西周封建制的确立、发展和演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对西周封建制的确立，他既看到周人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渐进演化；同时，又特别注意阶级斗争以致于革命战争引起社会冲突过程中的杠杆作用。周人就是通过一系列战争，特别是公元前一一二二年的“武王革命”，推翻了殷代奴隶主国家，在其废墟上开始创建封建主义的国家。因此，吕振羽指出：“武王革命”乃是“封建制的历史行程的发轫”。他是首创“西周封建说”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伸和发展，涉及到思想史的领域。中国思想史领域，是长期为唯心史观所盘踞的一块阵地，直至二十年代末，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仍处于劣势。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

^①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等思想史专著，仍然有着权威的影响。陶希圣三大册《政治思想史》，以所谓“神权时代”、“王权时代”、“民权时代”作论纲，来掩盖历史上各派思想的阶级性，混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阵营，好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关于世界观问题的论战。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吕振羽认为，无情地揭穿各反动流派的反动性和欺骗性，特别是“打击其时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有些影响的陶希圣派”，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给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以初步估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于是，他在《中国史纲》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鼓起勇气，从事哲学思想史的探索。在这一斗争中，他又一次得到他的老师李达的指导和支持。

有一次，李达和吕振羽谈起哲学界的情况，李达说：“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看哪些人是最凶恶的？”吕振羽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他为首的新生命派是国民党的御用学派。陶希圣是危险人物，我们要与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不过，你对他一面在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斗争，不能让步；一面又不要侮辱他的人格、作人身攻击。”在李达的鼓励下，为了与陶希圣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吕振羽把在中国大学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取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果然引起强烈的反响。北大、清华等校的不少学生都前来听课、买他的讲义。陶希圣慌了手脚，又是请客，又是托人，要求吕振羽把中国大学的政治思想史让他上，理由是清华、北大、师大等校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是他教的，好统一起来。李达知道后很生气。他对吕振羽说：“你要黄松龄去答复陶希圣：如果他要你把中国大

学的政治思想史让给他教，那就要他把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问他同意不同意？”吕振羽照李达的意见做了，使陶希圣碰了一鼻子灰。一九三三年三月，吕振羽在南京参加谈判。他抽空把中国大学的讲稿加以整理，仍用《政治思想史》这一书名，交黎明书局印行。在该书的初版序中，吕振羽说：“我企图对这长期中社会思想的流派，从其形成、发展、死亡的过程中以及其相互对立斗争——作为各个阶级的本质的对立和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统一对立——关系上，作系统的探究。”这个目标无疑是达到了。当时上海的不二书店在介绍该书时写道：“此方面的书籍固已极少，而以正确物观方法所写成书者，更为绝无仅有。……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划时代之著作。”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吕振羽后来到延安，毛泽东还特别向他问起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一九四三年延安解放社重版了这部著作。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力量在于它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揭示，在于它的科学性。该书出版时吕振羽本人写了一些诗篇，记录他当时的心情，其中一首是：“破除道统批妖言，思想史程心物分。析论阶级穷根本，锋向托陶战斗文”。

（三）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以后，加紧推行吞并中国的步骤。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改变，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影响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中的英美派。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及其小朝廷的统治，也不得不要求抗战。这些英美派心里很清楚：要抗战就必须联共。

一九三五年冬，吕振羽收到一封南京来信，写信人是国民党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他曾在主办《丰台旬刊》时经翦伯赞介绍与吕振羽相识。这次来信的大意是：东邻侵袭，龚姜两府应联姻御侮。兄如愿作伐，请即命驾南来，云云。吕振羽即将信件交给中共北平市委派来经常与他联系的周小舟，请示如何处置。几天以后，周小舟通知他，市委决定他辞去教职，立即去南京。吕振羽“艰危未计”，于这年的十一月底“潜踪南渡”。一九三六年一月，周小舟也到了南京，两人一起担当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艰巨任务。在六七月以前，周小舟没有正式出面，他往返于南京与北平之间。吕振羽则以红色教授的身份，以铁道部专员的名义常驻南京，实际上代表中共进行谈判。他坚持原则，同时又讲究斗争艺术，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共的方针。谈判中曾养甫骄横跋扈，多方刁难，无理拒绝中共的六项正当原则^①。吕振羽则以他渊博的知识和坚定的立场，给以严厉的批判。有一次，曾养甫怒

^①据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六项原则大意是：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员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民众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气冲冲地说：“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四万条破枪！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骂我们的委员长是卖国贼头子。历史上实力就是力量。说我卖国，我就卖国；我有力量，共产党其奈我何？！”吕振羽立即反驳说：“贵党和京沪一带报纸不是天天在骂‘朱毛匪’吗？至于曾先生所说，历史上也确有人那样说过，而且那样作过，但历史都给他们一一作了公正的结论，这是可为殷鉴的。不过我相信国民党有些先生是赞成抗战的。”

对于吕振羽的这段斗争，周小舟高度赞许，认为他“谈得很好”，“完全同意”。一九三六年的六七月以后，由周小舟直接出面谈判，吕振羽继续留在南京，协助工作。

南京谈判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断，历时九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场谈判。这场谈判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作了积极的贡献。吕振羽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坚持和捍卫了党的利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即周小舟第一次由北平来南京时，吕振羽正式申请入党。这年三月，经周小舟介绍，吕振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谈判中断后，吕振羽又回到北平。芦沟桥事变后，他化装成包头面粉公司经理的听差离开北平，经天津乘船前往烟台。在船上，他与邓颖超、陈西生（王世英）等几位同志邂逅相遇。抵达烟台时，一些警察在码头上对旅客进行检查。邓颖超见吕振羽两手空空，不象旅客的样子，恐引起敌人怀疑，便将一个箱子递给他。嗣后，邓颖超等去西安，吕振羽辗转到南

京。根据陈酉生的吩咐，他几次去找叶剑英，均未遇到。于是，他给那时在毛泽东身边作秘书的周小舟写了一封信。不久，他收到周小舟的回信，信中说：“家父嘱，盼兄速回乡开荒。”传达党让吕振羽回湖南开辟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吕振羽回到长沙。同年十月，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也来到长沙。吕振羽在徐特立的领导下，经常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和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担任文抗会理事兼研究部部长。这个组织对于湖南抗战的动员和组织，乃至党的组织的恢复，都作了不少的工作。在长沙，吕振羽还经常给青年学生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路线，受到热烈欢迎。这个时期，他暂时搁下对历史科学的研究和著述，在《中苏半月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动员民众抗战的政论文章，如《抗战的前途》、《动员工作在农村》、《发扬五四精神》、《中苏关系的过去和未来》、《欧局的变化与中国的抗战》、《坚决“否认伪组织”和“厉行肃清汉奸”》、《保卫武汉与巩固湖南》、《敌国内阁的改组和今后战局的估量》等。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当时武汉可能失守、敌军必然进攻湖南的形势，确定在吕振羽的家乡武冈塘田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区乡级地方工作干部与游击战争所需要的连排级军事干部，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坚持抗战。是年六月，省委派吕振羽负责筹办此事。吕等利用当时湖南国民党CC派、复兴派、何健派之间的矛盾，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湖南参议会议长赵恒惕、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及其他一些地方上层人物的暂时的谅解、同情或

支持，终于冲破了教育厅长、CC派分子朱经农的阻挠和刁难，完成了筹备事宜。学院邀请覃振任院长，赵恒惕任董事长，并邀集当地各界名流担任理事，吕振羽担任副院长兼党代表，实际负责全院院务；张天翼担任教务主任，其它主要教职员有雷一宇、李仲融、林居先、陈润泉、王西彦、王时真等。他们或者是中共党员，或者为进步民主人士。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塘田战时讲学院正式开学。学生根据文化程度分为研究班和预备班两级。研究班攻读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创作等专修课；预备班攻读国文、数学、自然等三门课程。两级学生均以“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讲座”、“战时防护常识”和“体操”为共修课。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

塘田讲学院收费远低于国民党办的一般中学。学生除自带伙食外，每学期交学费四元。教职工和行政干部除与学生吃相同的伙食外，最初都不拿一文钱。后来由于各人自带的钱用完，才每月津贴一点零用。吕振羽两袖清风，始终与全体师生同甘共苦，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由于吕振羽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仅七个多月，学院共招收学生三百余人（陆续派往各地开展救亡工作的除外），发展党员五十余人，民先队员一百八十余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接受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他们或走上抗战的最前线，或奔向延安，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其中相当多的人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塘田战时讲学院的革命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视之为眼中钉。他们一面指令特务学生进行捣乱破坏，一面在院内

外散布流言蜚语，并利用长沙的小报对吕振羽进行诽谤：“教授吕某于北平危岌时，贪生怕死，逃回湖南，纠集同类，以文化抗敌为名，进行阴谋活动。武汉危岌，战火将烧及湖南时，又铩羽走武冈，假党国元老（指覃、赵）之名，开办塘田学院，愚弄青年，欺骗群众，肆行敲榨、剥削，昔日之穷教授，今则麦克麦克矣（意思是说他发了横财）……”^①恫吓、诽谤都没有使吕振羽屈服，国民党反动派便采用武力压迫。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陈立夫致电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据报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之西南抗大，宣传错综复杂之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众，希图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请严加查办，制乱未萌。”薛岳当即训令“专派要员查明具复”。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军队三路包围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领导全院人员进行反包围斗争和有计划的撤退。敌人无理要求他缴出全院人员名册，他愤怒驳斥：“你们要报功，拿我的脑袋去！这些青年热爱祖国，这个学校是进行抗战教育的，你们封闭了学校，难道还想按名册去陷害他们？”为了革命利益，他对教职员、学生、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对校产也妥加处理，余款数千元及一部分剩余伙食费则转为组织石火出版社的基金。一九三九年五月，学校被“勒令解散”。吕振羽与部分同志撤至塘田附近的油塘。遵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这里举办为期十天的建党训练班，随即建立新宁、洞口、绥宁、城步等县及金称市直属支部，壮大了党的组织。

^①吕一平、王建中、江明：《塘田战时讲学院回忆录》，未刊稿。

(四)

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致电中共湖南省委转吕振羽，要他速经桂林到重庆。吕振羽接到通知，即同夫人江明一道离开武冈，先往桂林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翌日，李克农让他们换上军装，和李锐、石西民等一起，乘坐宋庆龄从国外募捐来的医用手术车，从桂林出发。他们越过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重关卡，抵达重庆。

吕振羽到重庆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周恩来要求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搞统战，一面写文章。这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秋泽修二，连续抛出《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捏造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停滞的”；胡说：“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社会运动）之反复的形式”，“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的转机”，主要是鸦片战争。从而引申出中国社会非以外力推动不能前进，这次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的武力”，正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打破“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的停滞性”的主要动力。秋泽的谬论实质上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造舆论，为国民党顽固派卖国投降张目。这两本书传入中国后，一批汉奸和托派文人便随声附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研究者也误认为“新颖”而常加援引。因此，沉寂过一段的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到三十年代末又活跃起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史诸阶段的划分，奴隶社会存在的时间和具体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以

及关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等问题。因此，批判秋泽的史论，就成了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吕振羽连续写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一九四二年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对秋泽的谬论进行系统的批判。

吕振羽在文章中揭露秋泽的所谓“停滞性”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上：首先，他认为中国“农村共同体的存续、残存”，是第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东西。它规定着“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基础”。而这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复转而支配着“农业及土地所有”，“手工业、手工业工场”，“基夫特及基尔特”，“商业及商业资本”以及文化，即国家把它们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限制其发展。吕振羽逐一分析秋泽借以说明这一论点的“材料”的片面性和虚伪性后，指出：“从文献去考察，无论在同姓或异姓的村落中，本质却都是豪绅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的构成，而不是什么‘共产体’的关系。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说的：‘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和‘村社’是实质相同的东西。”“但我们不是说，在中国社会没有形成农村公社的残余形迹，不过这种残余的东西，对社会发展形势并不能生出何种巨大影响，更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从而所谓‘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的支配’等论点，不过是建筑在秋泽修二的预定观念上的空中楼阁”^①。

^①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吕振羽史论选集》第266、267页。

秋泽认为第二个重要的东西是所谓“人工灌溉”及与此相适应的大规模的水利事业由国家担任，这是中国农业的“集约性的”“小农经营”的物质基础。这“集约性的小农业”，又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桎梏”；它又是“中国集权的专制支配的基础”，即其“第二个根本原因”。吕振羽指出：水利事业由国家担任，在殷代确有其较大意义；在其后，历史上有名的郑国渠、广通渠、永济渠等所灌溉的耕地均不过数万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例是极其微小的；自“古代”到“中世”，中国的广大耕地，主要都是人民自己利用泉、井、堰、坝、蓄水池塘、小溪流、河川及天然雨量等灌溉的。中国的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流，与其说同于尼罗河那种情形（尼罗河也只能给予埃及社会的发展以较大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影响），毋宁说和泰晤士河、莱茵河、多瑙河、密士西比河等的原来情形相似。在中国全部封建史上，都是大土地所有占支配地位，并反映为大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这样，秋泽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这个“物质基础”，便从根本上被推翻了。

在揭露批判秋泽的反动史论的同时，吕振羽反复阐明，是生产方式规定中国社会的“形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而担当完成社会“形势”转变的，只能是被压迫阶级参加的“社会革命”。他认为“成汤革命”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过渡的革命，“武王革命”则是实现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革命。吕振羽指出，“把中国社会形式的发展作一个总的过程来考察，生产力、生产……以致意识形态，都是螺旋地向前发展的，并没有什么‘停滞性’和‘复

归’或‘循环’的性格。”^①古代中国创造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只有在某种外界的特殊矛盾关系的影响下，在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剥削政策特别残酷的影响下，才可能促成或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致引起暂时的倒退。”^②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致引起暂时的倒退。”^③“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和歪曲了发展的进程。”^④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之必要和必然。这一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担负革命任务的，是‘共同奋斗’的全民族各革命阶层。并只能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领导。”^⑤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还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时期的若干问题，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问题。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时期，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文化斗争的成果的汇集，属于“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⑥的一部分。它的发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称赞和鼓励。在吕振羽的带动下，当时重庆的其他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投入了对秋泽史论的批判。

在著述《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同时，吕振羽和江明开始了另一项更加艰巨的工程——《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这一任务也是党组织交给他的。有一次，周恩来对吕振羽说：“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毒害青年，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和蒋介石作斗争。”吕振羽立即接受了这一任

①②③④⑤ 《吕振羽史论选集》第269、263、272、283页。

⑥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著者序》。

务。他在复旦大学任教之余，在江明的协助下，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写出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交生活书店于是年五月在香港出版。这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

吕振羽的上述学术著述，是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的。那时他在复旦大学教课，按钟点给报酬，收入相当菲薄，有时连起码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他们经常吃红薯，为了减轻全家的生活困难，江明经常在晚上到隔壁的一家工厂去拾煤渣。吕振羽有抽烟的习惯，因买不起烟卷，经常含着个烟斗。有一次写作非常疲倦，烟叶抽光了，他就用商量的口吻问江明：“怎么样？买包烟抽抽吧！”江明毫不犹豫把家里仅有准备买柴火的三毛钱给他买了一包“老刀”牌烟。冬天，他们的衣服和被子非常单薄，一次被董必武的一个亲戚发现了，反映给董老，董老“批评”了吕振羽。但是他一如既往，有困难自己熬着，仍然不向组织伸手。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让吕振羽和江明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吕振羽到曾家岩五十号辞别周恩来。周恩来已对吕振羽此行沿途的安全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指示。时已深夜，他留吕振羽过夜，催其睡下，自己才离开。不一会，周恩来想起还有事要叮嘱，又回到吕振羽的住处，吕要起床，他将吕按下，自己站在床前和吕谈话。吕振羽思潮翻滚，感慨万千，后来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次难忘的告别：

真美人间马列心，
周祥恳切意高深。

床前形象窗前月，
寸草涓埃报好音！

（五）

一九四一年四月，吕振羽和江明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他们本来打算去延安，刘少奇和陈毅认为去延安的路上十分危险，便留吕振羽在刘少奇兼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任教。此后，吕振羽化名吕刚，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在教授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讲课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备课时，他还经常和党校的有关同志，如彭康、冯定、陈一诚、宋亮（即孙冶方）等商讨。有时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还到华中局请教刘少奇、陈毅，并经常深入学员当中去进行集体的和个别的辅导。他多次接受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邀请，到第三师师部向该师和盐阜地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讲授《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党校的许多学员不仅在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还乐于向吕振羽请教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第一期学员，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傅秋涛在毕业时，曾专门向吕振羽请教回到第七师活动的“含和地区”应如何开展工作。吕振羽便将第七师活动地区的历史、地理、群众等条件，将当时的敌、顽、我三方斗争的特点以及开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写成谈话要点，先送刘少奇审阅，刘少

奇阅后批示说：“很好”。傅秋涛听了他的谈话后很满意，认为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一九四二年三月，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跟随刘少奇赴延安。这是一次极其艰险的万里夜行军。他们一共穿越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军的一百零三道严密险恶的封锁线，跋涉万水千山。在炎热的暑天，爬过高入云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走过晋西北的冰山雪地。一路之上，多次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固军的伏击。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没有放松学习，把每一点能够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晚上如果不行军，就借助微弱的豆油灯光读书、写笔记，并对沿途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文化传统进行调查研究。行至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停留时，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其他同志通过山东分局，弄来大量的党政军民的材料及一份完整的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从山东党的历史着手，对全部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山西的一户农家，他发现一件农具形制和甲骨文中的某个字酷似，从而得到启示，加深了对这个古老文字的理解。

一九四二年底，他们胜利地到达延安。在延安整风前，吕振羽继续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延安整风后，改为学习秘书。在延安的几年，他曾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愤然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全面系统地清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历史，深刻地揭露它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实质。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

争,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

“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凡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而在一切反共分子身上,如果也寄托什么‘中国命运’的话,就只寄托了黑暗腐败的灭亡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我大军进入东北。吕振羽自延安到达冀热辽,参加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一九四六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振羽去北平,协助军调处三人小组的“救总”(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谈判。一九四七年,党派吕振羽去湖南,因交通梗阻,加之有病,遂和江明不得不在东北停留。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原来在他们离开重庆时,由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辍,他感到非常内疚,当时有一首诗反映这种心情:

稿才半卷离渝城,
未完党命心难平。
我负国区菁菁子,
投笔善事戎马行。

在大连滞留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协力编著,至一九四八年二月,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后半部的初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简明中国通史》著于戎马倥偬的年代,断而复续,时历八载,条件是相当困难的。“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也找

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初稿写成后，尚来不及复写和修改，又奉调他处工作。因此，他自己曾谦虚地说“粗枝大叶，以至错误，在所难免。”然而，作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这部著作不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编纂体例、方法，都是一个新的标志。吕振羽在初版序中说：“我的写法与从来的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第一，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第二，我注重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我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论我是否达到了这个愿望，但我认为应该以此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点。”一九四八年，吕振羽在稿序文中又说：“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全书出版不久，柴德赓教授曾就该书在年代、地理、人名、事实等方面的具体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与纠正。同时，柴也正确指出：“用新的观点方法写一部中国通史，是目前一件极迫切需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很困难的工作，直到今天，象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的《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助于历史教学的。”^①

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同时，吕振羽还撰写了一部《中国民族简史》。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哈尔滨完稿。第二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五一年增订再版。

吕振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是各

^①柴德赓：《对吕振羽简明通史的几点意见》1950年9月3日《光明日报》。

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中国古老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用很大精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的主张，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原来，吕振羽的祖母是一个瑶族妇女。吕振羽小的时候，还常被人骂作“苗子”（当地苗瑶不分）。因此，他从小就对民族歧视很反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他逐渐懂得，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参加革命以后，他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重新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批判封建主义正统观和大民族主义，恢复各民族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到延安以后，他便留心在工作中作实地调查，采访来自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在冀热辽负责救济分会和在中共冀热辽分局巡视团的工作期间，他直接接触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从经济、政治、民俗、语言、生活和历史传统等方面，了解了不少情况，积累了不少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当他从哈尔滨去大连，途经朝鲜新义州时，便坐在“榻榻米”上开始撰写《中国民族简史》，在不长的时间内，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吕振羽在初版序中说，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经迫切需要解决，但人们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还相当隔膜。“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的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著作，尤其是‘陶希圣校对’的《中国之命运》，便不过是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民族主义的撒

谎宣传，是其对中国各民族和人民的挑战。……因此，我写这本小册子——《中国民族简史》稿，由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限制，虽有不少缺点；但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工作者和研究者作参考，我以为不是全无意义的。”这本简史对于汉、满、蒙、回、藏、维等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铺叙，突出了各族人民的斗争传统。现在看来，由于史料不足，尽管内容有些片面，存有错误，但它的战斗风格和现实意义仍是很明显的，较好地起到了宣传民族史的知识作用。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史作研究，吕振羽确实作了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六）

一九四八年以后，吕振羽先后在中共辽东省委、东北人民政府、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任职，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连大学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筹备，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月正式成立的。第一任兼职校长是李一氓，不久吕振羽被任为该校专职校长、党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学办学方针的报告，并动手撰写了文章，详细阐明大连大学既要继承发扬解放区多年的办学经验和方法，但也要继续提高和正规化。对于旧中国大学的办学方法，他主张要加以扬弃。对于苏联办大学的经验，他赞成学习，但不赞成抄袭和生搬硬套。他还为大连大学起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他深感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对于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在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即派遣专人到上

海、香港等地聘请几十位专家学者到大连大学任教，陆续应聘来校的有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魏曦、张毅、孙云铸、钱今希、胡国栋、杨济时、李壕、吴汝康夫妇等。吕振羽对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十分关心，经常登门拜访。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有一位无线电微波专家，曾在美国留学八年，回国后在国民党某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应聘到大连后，立即主动向学校负责同志讲清了这段历史。吕振羽当即诚恳相待，向他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勉励他把自己的全部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和人民，使这位教授深受教育和感动。他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十分努力，作出了显著成绩。国际学术界素负盛名的细菌学专家魏曦，医学专家张毅和物理学专家王大珩等来到大连大学后，在以吕振羽为首的校党委关怀和帮助下，工作都十分出色，作出很大成绩。由于吕振羽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大连大学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建设起一支拥有教授、讲师等二百七十余人的教师队伍。

一九五一年的秋季，吕振羽奉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担任校长。在这里，他再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和革命的胆识。由于这时东北人大还处于草创阶段，数、理、化三个系是从别校接收而来，文科只有经济、法律两系，中文、历史是新增设的，基础都很差。尤其是历史系，原先只有一个教研室，中国史只两名副教授、一名讲师，世界史仅两名讲师，其余都是一九五一年后毕业的研究生，总共十四个人。因此当报纸上公布东北人大办历史系的消息时，有的人还不敢相信。但吕振羽大胆使用这些年轻人。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压上”一定的教学任务，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他们。他自己则经常和青年教师讨论学术问题，还

把自己的研究题目交给年轻人。提供许多资料给他们看。在吕振羽的关怀培育下，东北人大历史系的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如今的吉林大学历史系，已拥有教授、副教授二十余名，有的已成为国内的知名学者。这些人的成长与吕振羽的辛勤工作和培育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振羽身染痼疾，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进行许多学术活动。一九五五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东亚学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词。就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外国学者问他：“象你这样的历史学家中国是几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一万也有一千吧！”一九五七年，他出席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有吕振羽同志在场，他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讲一讲中国民族的发展史，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交叉时代很多。”又说：“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希望他能多写一点。”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民族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我国若干少数民族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再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等一批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界重视，曾加以转载。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论史学方面的文章，如《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怎样学习历史》、《关于论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等。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吕振羽兼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历史教授和历史教研室顾问，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六二年冬，吕振羽回到湖南长沙，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并在闭幕式上讲了话。接着回到家乡邵阳，搜集革命斗争史料。他先后在武冈县、邵阳县、邵阳地委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传统的报告，访问烈士的家属，参观工厂和农村，广泛地搜集和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不止一次地向地县有关负责同志建议，要抓紧时机搜集、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提出要整理二邓文集（二邓即邓弥之、邓保之，是清末的经学大师），并在武冈专门召开有关的座谈会。

一九六三年元旦过后，吕振羽满怀豪情，驱车北返，准备进一步为发展我国史学作出新贡献，不料横祸飞来，蒙受不白之冤。因他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多年，遭疑而被错捕。在被幽禁的日子里，他仍不肯放下那支战斗的笔，几年之间凭借着仅能看到的一二份报纸，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史学评论文章和三千多首论史和抒怀的诗词。这些诗文，大多写在报纸的空白处。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他在《甲辰元旦试笔》一诗中写道：

脑力衰颓羨岁华，
倔强犹欲看锥花。
近今史实须雕读，
往日吟哦待选拔。
民族余篇心有数，
哲人补述尚多家。
卅年假我殷勤学，
夫妇同窗愿不赊。

如矢驹光痛逝逝，
川流不再奈谁何！
五洲革局途还远，
万类究穷体更多；
人事斑斑相永续，
文明段段会长河。
高于共产如何似？
完美更超共产歌。

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构陷刘少奇，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吕振羽作为“重犯”而投进监狱。从被捕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为止，他被审讯八百多次，平均每天三次以上，甚至晚上也不让他得到安静，在牢房中亮着瓦数极高的电灯。这伙阴谋家想这样从他口中逼出刘少奇的“罪证”。然而，吕振羽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他高昂地宣布：“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论是伪造自己的历史，还是伪造他人的历史，都只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他多次愤怒地高喊口号：“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马克思主义万岁！”“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垂不朽！”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在狱中得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十分惊愕。他缅怀刘少奇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卓越功绩，目击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默成感怀诗三首，为我党最大的冤案鸣冤辩诬：

二十世纪“风波”寒。

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
吁天辩诬董狐篇。

在吕振羽身陷冤狱的日子里，他的夫人江明曾多次上书毛泽东，但都石沉大海。江青一伙搞“影射史学”批“当代大儒”时，企图拉吕振羽出来写文章为他们帮腔。身陷囹圄的吕振羽断然拒绝，他说：“我向来对孔子是两点论，对秦始皇也是两点论。”始终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反对迎合某种需要歪曲、篡改历史。一九七五年一月，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江明写了一封申诉信要求释放吕振羽，并在四届人大公报发表的当天，将信亲自送到国务院信访室转呈邓小平。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坐牢十二年的吕振羽才获释放。

获释后的吕振羽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了。他百病缠身，四肢发颤，手握不住一管笔，写的字东一划西一划，拼不到一起。但他考虑的不是颐养身心，安度晚年，而是完成一生中未了的任务。一九七九年春，他抱病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还讲了话，殷殷寄望于中国史学界同人。他深深知道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不愿用功夫来谈自己所受的那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没有时间去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他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白天，他除了吃饭和短时的散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伏案工作，整理旧著，写回忆录。直至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审定了《简明中国通史》的重版序言。此时，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考虑为《红旗》杂志写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修订和整理一生写的四百多万字的著述，其中包括八部历史专著以及大量的史论、政论文章和讲义稿；应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艺光

ISBN 7 — 224 — 00165-1 / K · 30

统一书号：11094 · 236 定价：4.25元